



Institute of  
Network  
Society  
网络社会研究所

# ACID

专题 复音的全球南方：  
技术交流的空间

No. 2  
2025

作者：Merlyna Lim、周蓬岸、王洪喆、  
Jason Vincent A. Cabañes、廖雪婷、  
Cheryll Ruth Soriano、Saskia  
Witteborn、Payal Arora、朱飞达、许可、  
姜奕竹、李程锦、任柄霖、韩佳欣、全昭  
祥、蔡泽锐、张钰彬、朱韵

# 复音的全球南方：技术交 流的空间

POLYPHONIC GLOBAL SOUTH: THE SPACES OF  
TECHNOLOGICAL COMMUNICATION

ACID NO.2

主编：黄孙权



## ACID NO.2 复音的全球南方：技术交流的空间

主编：黄孙权

刊名：酸，死亡前的加速公社

编辑委员：PH 试纸编辑委员会

本期主编：黄孙权

责任编辑：郑叶颖

美术编辑：李梦书、郑叶颖

发行制作：网络社会研究所

本期作者：黄孙权、郑叶颖、Merlyna Lim、周蓬岸、王洪喆、Jason Vincent A.

Cabañes、廖雪婷、Cheryll Ruth Soriano、Saskia Witteborn、Payal Arora、朱飞

达、许可、姜奕竹、李程锦、任柄霖、韩佳欣、仝昭祥、蔡泽锐、张钰彬、朱韵

(按文章出现顺序排列)

发行日期：ACID 第二期 | 2025, Oct.

期数：ACID NO.2

售价：RMB 60, or 6 \$ COOP\*

ISSN 2960-0944

联系：inetworksociety@gmail.com。本刊为不定期出刊，开放接受一般性论文、书评/展评投稿，简体繁体中文，英文皆可。来稿需经PH试纸编辑委员会同意接受稿件。请以符合APA 7th（姓名不缩写），于脚注中著名完整参考书目之格式。

\* \$ COOP指的是INS发行的社会货币，其白皮书可见此，获取方式请参阅INS电子报与网站。

**ACID NO.2 Polyphonic Global South: The Spaces of Technological Communication**

Chief Editor: Huang Sunquan

Journal Title: ACID, Accelerated Commune in Dying

Editorial Board: Editorial Committee of *PH Test Paper*

Chief Editor: Huang Sunquan

Copy Editor: Zheng Yeying

Art Editor: Li Mengshu, Zheng Yeying

Publisher: Institute of Network Society, CAA

Authors: Huang Sunquan, Zheng Yeying, Merlyna Lim, Zhou Pengan, Wang Hongzhe, Jason Vincent A. Cabañes, Sara Liao, Cheryll Ruth Soriano, Saskia Witteborn, Payal Arora, Zhu Feida, Xu Ke, Jiang Yizhu, Li Chengjin, Ren Binglin, Han Jiaxin, Tong Zhaoxiang, Cai Zerui, Zhang Yubin, Zhu Yun (listed in order of appearance)

Publication: ACID Issue 2 | 2025, Oct.

Issue: ACID No.2

Price: RMB 60, or \$6 COOP\*

ISSN: 2960-0944

Contact: [inetworksociety@gmail.com](mailto:inetworksociety@gmail.com)

This journal is published irregularly and accepts general submissions including academic papers, book reviews, and exhibition reviews in Simplified Chinese, Traditional Chinese, or English.

All submissions are subject to approval by the PH Test Paper Editorial Committee.

Please format your manuscript according to **APA 7th edition** (do not abbreviate author names), and include a complete bibliography in the footnotes.

\$COOP refers to the social currency issued by INS, and details can be found in its whitepaper. For information on how to acquire \$COOP, please refer to the INS newsletter and website.



# 目录

编辑手记  
郑叶颖

ix

## 专题 | 复音的全球南方：技术交流的空间

### POLYPHONIC GLOBAL SOUTH: THE SPACES OF TECHNOLOGICAL COMMUNICATION

#### 第九届网络社会年会 选集

专题引言  
黄孙权 3

#### 板块一：制造南方

##### PANEL 1: MANUFACTURING SOUTH

情感与算法：解开社交媒体政治的数字核心 9  
*Affect and Algorithms: Unpacking the Digital Heart of Social Media Politics*

Merlyna Lim

垃圾佬——以再利用作为平价电子产品的来源 29  
*Lā jī lǎo (Tech Scavengers): Reuse as a source of affordable electronic products*

周蓬岸

从技术浪漫主义到技术封建主义——中韩早期信息社会的  
历史比较研究 54

*From Techno-Romanticism to Techno-Feudalism: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Study of Early Information Societies in China and South Korea*

王洪喆

#### 板块二：流动的联结性

##### PANEL 2: MOBILE CONNECTIVITY

全球本土化亲密关系：来自全球南方的移动媒介化关  
系理论建构 77

*Glocal intimacies: Global South theorising about mobile mediated relationships*

Jason Vincent A. Cabañes

### 板块三：社会性媒介

#### PANEL 3: SOCIETAL MEDIA

数字行动主义与男性权益运动的民粹主义浪潮 99  
*Digital Activism and the Populist Surge of the Men's Rights Movement*

廖雪婷

平台、劳动与中介动态 116  
*Platforms, Labor, and Brokerage Dynamics*

Cheryl Ruth Soriano

### 板块四：新地形

#### PANEL 4: NEW TERRAINS

WEB3与区块链游戏：一种南方视角 147  
*Web3 and Blockchain Gaming: A Southern Perspective*

Saskia Witteborn

消除数据偏见以建立包容性技术 171  
*Debiasing Data to Build Inclusive Technologies*

Payal Arora

当人工智能遇上WEB3：共筑可持续数字经济 194  
*When AI Meets Web3: for Sustainable Digital Economy*

朱飞达

### 青年学者论坛

#### EMERGING SCHOLARS FORUM

数字殖民主义下的全球南方：消失的社交媒体和中国启示 221  
*The Global South Under Digital Colonialism: Disappeared Social Media and China's Revelations*

许可

创新还是仿造？重思“山寨（SZ）”的转变 234  
*Innovation or Counterfeit? Rethink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hanzhai"*

姜奕竹 李程锦

傅瓏的游戏历程：解码手柄上的中国计算机启蒙 248  
*FUI Zan's Gaming Odyssey: Decoding China's Computer Culture through Joystick*

任柄霖

“无奋斗，不龙华”，龙华汽车站田野调查 256  
*"No fighting, no Longhua", Field Research at Longhua Bus Station*

韩佳欣 全昭祥

## 一般论文 RESEARCH ARTICLE

红色模型：中国人工智能治理的平衡与失衡 蔡泽锐	273
“他”的政治不是我的世界——《极乐迪斯科》女性玩家认同研究 张钰彬	286
技术之云与艺术之线：人工智能生态中的攫取逻辑 与审美抵抗 朱韵	299
Acknowledgments	309



# 编辑手记

郑叶颖

本期 ACID 的足迹将在泰国清迈与中国深圳等地驻留，是对第九届网络社会年会“复音的全球南方：技术交流的空间”（后简称“年会九”）与“文化与技术三部曲”第二部曲“世界工厂：创新的现实主义之城”（后简称“文技三”）的一次温习与反刍。

“年会九”主论坛演讲内容整理收录其中，并佐以三篇一般性论文，以全球南方视角与本土案例拆解西方/中心的技术权力神话。青年学者论坛部分则包含“文技三”的三篇田野及研究论文：从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加州的奶油白色小镇，我们来到中国 80 年代改革开放前线沿海城市；也是从清迈的全球南方讨论回到中国本土，重思匮乏之下中国奋力发展的时代技术叙事，洗刷“山寨”、“世界工厂”的单一历史符号。

全球南方并非地理概念，而是一种被制造的处境。Saskia Witteborn 探讨菲律宾移民如何在基于区块链和 NFT 所有权的游戏 Axie Infinity 里边玩边赚（Play-to-Earn），灵活融入 Web3 经济，从而摆脱自身不稳定的生存境况——而不是简单的新技术平台的受害者。Cheryll Ruth Soriano 同样以菲律宾数字劳工为例，超越全球平台的单向权力流动模型，将由社交媒体在线自由职业者发展而成的地方中介组织，引入数字劳动中介基础设施的讨论，填补

全球平台和本地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研究缝隙。一种本土的智慧器官在不断生长，而社会性媒体正在改变社会关系与经济模式。朱飞达则认为 Web3 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而是协作智能与代币化经济，即如何把数据所有权及其价值还给人们。朱韵（一般论文）批判性揭示 AI 背后物质基础与攫取逻辑——植根于对全球南方生态及劳动资源的不平等掠夺；并以艺术家刘窗的作品《锂矿湖与复音岛》为例，将艺术叙事视为与资本主义逻辑对抗、重构社会技术关系的力量。Web3 区块链技术以及 AI 之下的新地形正在浮现。

回到中国本土，周蓬岸从“垃圾佬”——科技拾荒者群体入手，把“洋垃圾”到“土垃圾”再到“再制造”叙说为一段中国草根工程师及社区创新史诗。王洪喆则回望中国上世纪 90 年代自下而上的“发烧友”人文主义数字文化。然而当下技术封建主义取而代之，平台公共化迫在眉睫。而蔡泽锐（一般论文）提出“红色模型”，指出中国式 AI 治理的张力：在安全框架下优先发展，在国内稳定与全球治理野心之间不断调整；亦可视作对技术封建主义的批判性回应。

从硬件到社交媒体，Merlyna Lim 通过草根运动和选举政治案例揭示平等主义的数字网络仍是幻觉，而情感算法塑造新政治格局。许可（青年学者论坛）从 Zingme、MXit、Hike 的陨落，分析全球南方本土社交平台及其数字基础设施如何被北方科技巨头垄断，并呼唤“社交媒体权”（Right to the social media）。廖雪婷揭开互联网男性权益运动的“数字假面”——持续倚仗民族主义及反资本主义的庇护，而形成基于平台技术驱动治理的厌女症。张钰彬（一般论文）基于游戏《极乐迪斯科》，同样以女性玩家叙事指向对男性化政治霸权的日常抵抗，并提示：电子游戏作为大众文化媒介，可以成为理解社会情绪、历史政治与性别认同的重要窗口。Jason Vincent 以“全球本土化亲密关系”（glocal intimacies）为核心概念，反思西方理论“普遍性”的霸权假设，也为理解全球南方背景下移动媒介如何重塑社会亲密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Payal Arora 的演讲亦可作为年会主论坛演讲的小结：一种来自全

球北方的悲观主义技术批判，正在阻碍技术基础设施匮乏地区首先能够接入网络、获取技术的使用权。而全球南方地区的技术乐观并非天真无知，而是关于活着，关于经济、人权自由和开放表达的渴望。

青年学者论坛部分还收录了三篇“文技三”的延伸研究论文。我们于2024年夏天多次前往深圳、广州、福州等地实地调研采访，以身为度，进入田野，挖掘、记录并讲述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信息产业结构中的技术发展与创新故事，讲述中国人勤劳实干的文化基因与现代化发展如何紧密编织，中国又如何从商贸导向的全球制造工厂、芯片硅谷步入核心科技创新的新时代。

姜奕竹和李程锦着眼于“山寨手机”，重新审视“仿造”与“创新”的边界。她们将“山寨手机”视作发展中国家技术追赶之下，“足够好”（good-enough）的本地化创新路径。从而反思西方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创新范式，强调创新应被理解为嵌入全球资本、国家政策与草根能动性三角结构中的多元实践。韩佳欣与仝昭祥则深入深圳龙华汽车站招聘市场，与“三和大神”打交道，归纳整理出其在空间生成逻辑，及边缘劳动者们的聚集机制与生存策略，让不敢想象明天的人们，能够被明天的人们清晰地看见。任柄霖则讲述了中国游戏与教育的先驱傅瓚，如何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将电子游戏视为教育工具，开启中国计算机启蒙进程。

一种区别于全球北方“普遍性”技术发展路径与理论视野的讨论仍在发生。未来从不缺乏新名词与加速向前发展的脚步。全球南方并非技术（及社会）乌托邦的观众席，而是真实的人们的生存实验场。张开双臂吧！看向脚下，我们所在的土壤正在松动，那是每一个技术实践者与研究者手握铲子试图撬动。



# 专题 | 复音的全球南方：技术交流的空间

POLYPHONIC GLOBAL SOUTH: THE SPACES OF TECHNOLOGICAL COMMUNICATION

第九届网络社会年会 选集





# 专题引言

黄孙权

技术权力形成的北方/中心叙事依赖，使得全球南方成为单一故事，并巩固了某种既定现象，而对明显的紧张、细微的复杂和不一致的同时性视而不见，导致了一种慢性贫困（chronic poverty）。数位不平等的说法无法掌握此种不利数位纳入（adverse digital incorporation）的现实。经过八届网络社会年会对于理论与现实的探求，我们企图摆脱以往理论与意识形态的习惯，本年会议将以“复音的全球南方：技术传播的空间”为主题，探讨全球南方的技术传播过程在全球化与在地化的双重张力下演变的复杂路径。

复音说明在不同文化、经济和社会背景下的技术动态多样性。技术传播指的是技术从发源地向其他地区传递、转移以及互相影响的过程，这种跨地域流动充满了宰制与反抗的故事。空间不仅指地理上的位置，更涉及技术在社会结构中的嵌入与再生产。全球南方作为一个先是政治，后为经济的学术术语，通常指那些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区和国家，这些区域接受高技术成品的引入，同时提供便宜劳动力与物料。换句话说，它作为主要的劳动提供者与商品消费者，支撑了蓬勃的全球数位经济，也被生产成符合全球资本生产结构中所需要的空间，一个物质的且意识形态的空间。本次会议将聚焦东南亚地区，探讨技术如何在这些区域中相互驯服而有当今的数位星球样貌。

会议将通过四个专题讨论来深入技术传播的多维度。首先，全球南方是制造的，以及被制造的“世界工厂”；其次，移动通讯与可携式设备的连接性建构了不同身份与社群可能；第三，社会性媒体正在改变社会关系与经济模式；最后，Web3与区块链技术以及AI，浮现了一个新地形：人民对掌握自身财富的希望与国家政体控制人民的欲望同时加速。加密货币持有者所热衷脱离国家控制的网络城市，与每个国家都极力发展的国家主权式的AI布局，正在形成某种对冲的力量。

在这山壑起伏之中，拥有技术者将登上峰顶，而脱节者跌入谷底，或甚有之，人类最终只是AI的养分，而人道（humanity）成为未来梦想亟待抛弃的本性。若非如此，全球南方是最有机会绘出此新地形图之希望的区域。



## 年会九开幕致辞

各位早上好！能够在美丽的清迈、清迈大学的校园里相聚，真是一个奇妙的时刻。我想向远道而来的讲者们表达由衷的感谢，也感谢无法亲临现场、在线上参加的讲者们。当然，特别感谢清迈大学和ICDI的协助，使这一切成为可能。我还要感谢GCC对我们拓展公共项目的支持。这一周，这座城市充满活力，举办了超过百场活动——在这里，科技、知识和文化以令人惊叹的方式交融、演变。能够参与这场热烈的交流，深感荣幸。

今年是我们网络社会年会的第九年。每年我们都深入探讨与社会现实相关的主题，并邀请学者、艺术家、策展人和研究人员与我们一同探讨。

今年，我们来到了全球南方。长期以来，这个地区被北方/中心的

技术和资本深刻穿透，掌控着发展的节奏，导致了“慢性贫困”，正如萨米尔·阿明所说，这是依赖理论的受害者，一种“不发达的发展”。今天，流向南方未变，但增添了科技气质，由一群更为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数字游民来继承六零年代嬉皮、七零年代美国的新公社主义者，九零年的新世纪旅行者的旅程。我一方面对此文化的丰富与多彩感到兴奋，但也不免忧虑，这种热带的天堂只是旧囚笼里的新梦想，难道还能禁锢一整代的年轻人理想吗？

某些加密社群喜爱的公关高手巴拉吉·斯里尼瓦桑（Balaji Srinivasan）说的“网络国家”几乎变成了他们的圣经，听起来就像要抹除现实中更深刻不平等起源的私有花园。要搞清楚，他们关心的是股份持有者（shareholder），而不是利益关系者（stakeholder）。也不要忘了，从2008年以来（金融灾难与比特币开始的那一年），全球财富收入不平等加剧，2020年全球最富有的12.2%成年人拥有84.9%的财富，2008年，前1%人群的收入份额约为18.5%；到2020年，该比例增至19.3%。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隆·阿西莫格鲁和西蒙·强森，在他们的著作《权力与进步》中指出，当前的“进步”再次让少数精英企业家和投资者受益，而大多数人却感到无力。他们认为，只有在社会权力基础改变的情况下，更包容的技术的愿景才有可能实现。而这正是我所期望的——全球南方能成为推动社会变革和包容性技术的全球多数力量。我希望这一转变能从清迈开始，甚至能从接下来两天的对话开始。

再次感谢大家！



# 板块一：制造南方

PANEL 1: MANUFACTURING SOUTH



# 情感与算法：解开社交媒体政治的数字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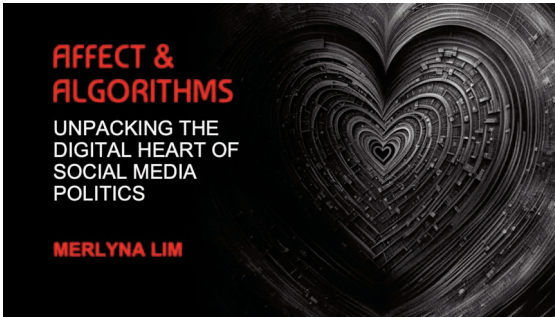
AFFECT AND ALGORITHMS:  
UNPACKING THE DIGITAL HEART  
OF SOCIAL MEDIA POLITICS

MERLYNA LIM

编译 / 许可 叶云鹤 郑叶颖

算法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看了一段猫咪弹钢琴的视频，接着算法立马觉得你适合组建一支猫咪乐队。很快，你又迷上了完全没想到的东西——比如地毯清洁ASMR。这背后有什么逻辑吗？其实并没有。社交媒体的算法并非建立在逻辑或理性的基础上。那么，我们最终是如何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某些内容，并与我们所连接的人建立联系的呢？答案就在于点赞、收藏、点击和分享这些行为，换句话说，这一切都关乎情感——通过算法调解的那些情绪化的、感性化的互动。

在本次讨论中，我将探讨这种情感维度如何超越个人消费，成为塑造我们社会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



在当今日益衰落的民主国家，社交媒体已成为一个争夺的战场，反民主的行动者利用算法、人工智能和虚假信息工具来推进反民主的议程。这使得学者们将其描述为“虚假信息操控”（disinformation order）、“信息失序”（information disorder）和“认识论危机”（epistemic crisis），并助长了“后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一些人认为，社交媒体已经从民主的工具转变为破坏民主的工具。虽然这种观点反映了最近的一种政治趋势，但它通过将社交媒体描绘一个仅仅加剧现实世界政治冲突的独立实体，从而简化了社交媒体的角色。它还忽视了平台政治的矛盾性。

在东南亚，政治领导人可能会利用社交媒体的虚假信息来操纵公众，但我们也看到了充满活力的草根运动。仅在 2021 年，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和缅甸就发生了 8789 起抗议活动，主要是由青年领导的反抗行动。

在我结合东南亚背景进行分析之前，我将先概述一下我的概念框架。首先，我要声明，认为社交媒体已从民主化过渡到专制化，或从公共领域过渡到虚假信息领域的观点是基于错误的假设。第一个是关于数字网络原本与民主相关的假设。首先有必要澄清的是，即使在早期较为静态的互联网时代，数字技术也从未真正实现过民主。尽管当时用户较少，内容也较为有限，它依然远非一个平等的竞技场。



数字网络远非平等主义；它们像巴拉巴西（Albert-László Barabási）的无尺度网络（scale-free networks）一样运行，遵循幂律分布（power law distribution）<sup>1</sup>。这意味着，新的连接往往聚集在已经流行的节点周围——本质上就是“富者愈富”。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少数主导者和有影响力的用户已经控制了大部分数字媒体，使得较小的用户单位很难获得关注。到 2024 年，社交媒体网络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平等，包括东南亚威权政府在内的强大势力都在加强对数字媒体影响力的控制。

此外，数字媒体和社交媒体一直同时被用来追求民主或非民主的目标，而非仅仅用于追求民主。各方团体—无论是公民团体的还是破坏性团体——都利用这些平台来推进各自的议程。这一现实揭示了第二个有缺陷的假设，即社交媒体曾一度使公共领域民主化。与其仅仅争论社交媒体是促进民主还是推进专制，或者它是否可以被视为一个公共领域，我们更应该专注于研究这些平台本身的基本特征。



首先，社交媒体不是为政治参与而设计的。这些平台在平台资本主义和传播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运作，主要关注点是数据货币化和市场控制。尽管它们本身并非天生反民主，但其核心目的根植于营销逻辑，而非公民参与。因此，它们通过商业而非民主的视角影响政治动态。



社交媒体的生态系统反映了“算法营销文化”（**algorithmic marketing culture**）——算法与营销策略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着内容的流通、可见度和受欢迎程度。其核心是品牌塑造，而成功的关键取决于内容的情感影响力。

在过去的十年中，各大平台越来越依赖于旨在最大限度地增强促进用户增长和广告收入的算法。通过机器学习和先进的排序算法，这些算法分析用户行为，对内容进行策划和优先排序。利用用户的情

感反馈，例如点赞和分享，这些算法推送情绪化的内容以驱动用户参与度——即“情感经济学”（economics of emotion）。与此同时，在内容泛滥、注意力短缺的环境中，社交媒体催生了“注意力经济学”（economics of attention），用户和内容都在为被看见而竞争。

在此背景下，情感成为政治信息传播的货币。各类竞选活动精心编织充满情感的叙事，因为他们深知爱与恨能够推动病毒式的传播与分享。这种对情感诉求的关注使深刻的政治讨论转向以点击诱饵和病毒式模因（viral memes）主导的哗众取宠的内容。



与其将用户视为被困在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s）和意识形态回音室（ideological echo chambers）中的被动受害者，不如认为用户与算法之间的情感互动和共同作用产生了我称之为的“算法飞地”（algorithmic enclaves）。这些“飞地”是由用户通过与算法的持续互动形成的论述性场域，在这里，人们基于一种感知到的共同身份集结并形成集体。他们捍卫自己的信仰，保护自己的资源免受现实和想象中的威胁，这些威胁往往指向一个共同的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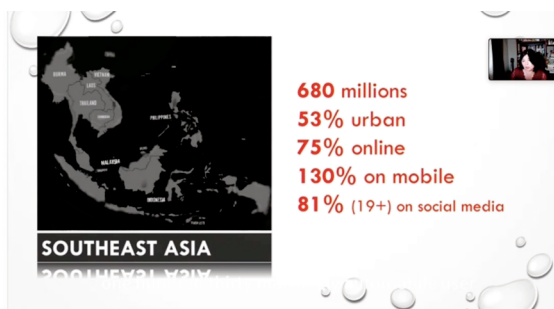
这些“飞地”围绕共同的情感而非利益建立起来，因此成为虚假信息的沃土。在二元党派结构的政治环境下，这种情况尤为明显，在这种环境中，人们只能在两极分化的对立面进行选择（如保守派与自由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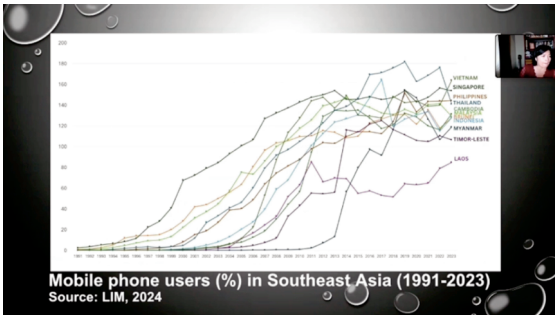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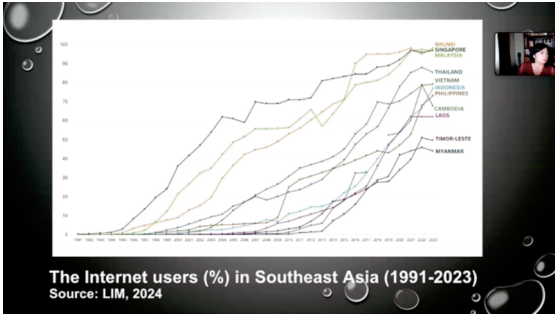
而“算法政治”（algorithmic politics）的兴起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化——通过算法操纵议题，其主要目的是主导媒体领域和塑造公众舆论。



有了这个概念框架，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东南亚。

东南亚是一个数字互联地区<sup>2</sup>，拥有 6.8 亿人口。其中 53% 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地区，有 75% 的人口上网，130% 的人口是移动用户——由于每人拥有多个账户，尤其是 19 岁及以上人群中，81% 活跃于社交媒体。





Country	Total population (million)	Urban	Literacy (15+)	Internet	Mobile phones	Mobile Internet	Social media	Social media (18+)
Brunei	0.4508	79.00%	97.20%	98.10%	127.80%	96.14%	94.40%	120.60%
Cambodia	16.86	25.30%	80.50%	67.50%	131.50%	66.89%	65.00%	88.00%
Indonesia	276.40	58.20%	96.00%	77.00%	128.00%	75.69%	60.40%	79.50%
Laos	7.58	37.90%	84.70%	62.00%	85.10%	62.00%	44.20%	61.10%
Malaysia	34.13	78.40%	95.00%	96.80%	129.10%	92.06%	78.50%	99.80%
Myanmar	54.38	32.00%	89.10%	44.00%	118.80%	44.00%	27.60%	36.60%
Philippines	116.50	48.20%	95.30%	73.10%	144.50%	71.13%	72.50%	102.40%
Singapore	6.00	100.00%	97.10%	96.90%	153.80%	86.73%	84.70%	89.30%
Thailand	71.75	53.20%	93.80%	85.30%	141.00%	81.29%	72.80%	84.80%
Timor-Leste	1.35	32.10%	68.10%	49.60%	106.60%	49.60%	26.20%	40.00%
Vietnam	98.53	39.10%	95.80%	79.10%	164.00%	75.54%	71.00%	89.00%

Source: LIM, 2024

东南亚的快速数字化进程和高度互联性使其成为一个主要受经济利益驱动的数字营销市场。随着大部分人都已在线，线下和线上体验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社交媒体将个人、社交和政治领域融为一体，使政治成为一个经常出现但又瞬息万变的元素，与猫咪照片、模因和朋友圈更新等内容共存。然而，在这一地区，互联网自由往往

往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尤其是在面临威权专制化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专制化、虚假信息的增长和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的党派斗争相互影响，在社交媒体上尤为明显，并且相互强化。



Country	Global Freedom	Internet Freedom (score/category)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 (rank out of 180)
Brunei	28/Not Free	-	142/Difficult
Cambodia	24/Not Free	44/Partly Free	147/Difficult
Indonesia	58/Partly Free	47/Partly Free	108/Problematic
Laos	13/Not Free	-	160/Very serious
Malaysia	53/Partly Free	61/Partly Free	73/Problematic
Myanmar	9/Not Free	10/Not Free	173/Very serious
Philippines	58/Partly Free	61/Partly Free	132/Difficult
Singapore	47/Partly Free	54/Partly Free	129/Difficult
Thailand	30/Not Free	39/Not Free	106/Problematic
Timor Leste	72/Free	-	10/Satisfactory
Vietnam	19/Not Free	22/Not Free	178/Very serious

Freedom in Southeast Asia (2023)  
Source: LIM, 2024



这些技术-政治和算法动态反映在该地区的政治格局中。在本讲座中，我将重点讨论两种政治形式：草根运动和选举政治。

首先是草根运动。如前所述，近年来东南亚的草根运动日益活跃。例如，仅 2023 年的统计数据就突显了整个地区抗议活动的频繁程度。东南亚的草根运动越来越多地将社交媒体纳入其行动策略，无论是在专制背景下的维权活动——如缅甸和泰国反军政府的抗议活动——还是越南和柬埔寨的维权运动都是如此。此外，以问题为导向的运动，如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反腐败抗议、马来西亚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Bersih）的选举改革努力以及“奶茶联盟”

(#MilkteaAlliance) 的跨地区联合，都将社交媒体作为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类动员的核心是诉诸情感。因此，我们看到了“情感二元框架” (affective binary framework) 的兴起，二元叙事和修辞被用来培养极端情感，尤其是愤怒，作为团结“我们”反对“他们”的一种方法。毕竟，各种形式的政治都是围绕情感展开的，不同的政党、意识形态和运动都会调动不同的情感，并在其话语中注入特定的情感印记。



情感二元框架可以将“人民”作为“受害者”团结在一起，在进步主义运动中共同反对所认为的不公正。然而，这一框架也极易被利用，用于动员针对“他者”的行动，借助既有的怨恨来加剧分裂。这种方法通过将个人塑造成“受害者”，为针对被视为威胁的群体的行动提

供正当性。在东南亚，这种情感的操纵体现在拥护极端民族主义、反民主和激进右翼政治的草根运动中。

在缅甸，Facebook 自 2012 年以来为右翼佛教极端民族主义运动提供助力，通过针对罗兴亚穆斯林（Rohingya Muslims）的极端言论和虚假信息放大了反穆斯林情绪。平台的算法动态加剧了“969 运动”和“Ma Ba Tha”等组织的反罗兴亚言论，助长了分裂和反穆斯林情绪。

在泰国 2014 年的政变中，Facebook 放大了反民主情绪，助长了“黄衫军”对君主制和军方联盟的支持。社交媒体降低了传播支持政变言论的成本和门槛，降低了支持政变的成本和障碍。



东南亚的活动故事凸显了社交媒体的动员能力和情感二元框架在草根运动中的有效性。在这里，有必要区分“动员”和“民主化”。动员是一个机械的过程，可以服务于民主、专制或其他意识形态。尽管社交媒体平台确实促进了动员，但它们最初的设计并不是为了促进民主讨论或支持公民参与。如前文所述，这些平台深深根植于算法营销文化。因此，社交媒体对集体行动的动员作用既是行动者的努力和议题相关性的产物，也是算法和营销驱动的病毒式传播的意外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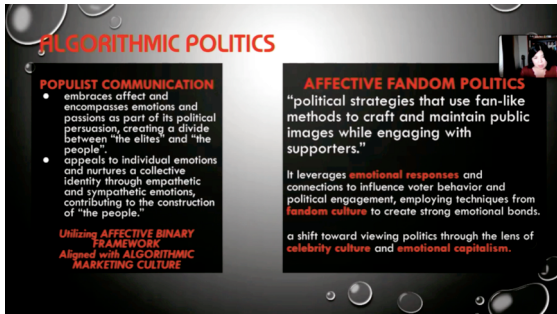
现在，让我们转向选举政治。在东南亚的政治选举和竞选活动中，社交媒体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政府的政治传播和宣传
- 选举政治中的选民动员
- 塑造和操纵公众舆论（如影响政策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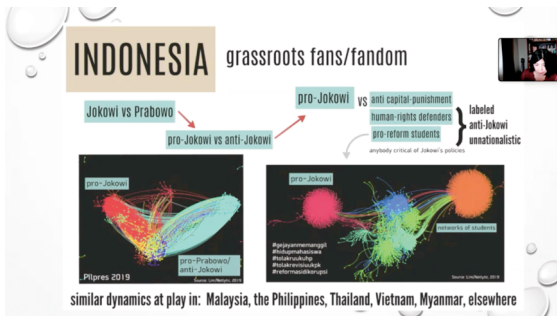


在这些背景下，算法营销文化以及情感和注意力经济学产生了两个关键现象。第一，民粹主义的传播风格，将情感和激情作为政治说服的核心要素。这种方式在“精英”和“人民”之间制造了一种鸿沟，在诉诸个人情感的同时，通过移情和同情的联系培育集体认同，最终构建了“人民”的概念。第二，情感粉丝政治，即利用粉丝式策略塑造公众形象并吸引支持者的政治。通过利用情感反应，影响选民行为和参与，借鉴粉丝文化的技巧来建立牢固的情感纽带。这

代表了一种转变，即通过名人文化和情感资本主义的角度看待政治。



例如，“支持佐科”（Pro-Jokowi）的核心用户网络表现出类似于粉丝的行为，无论佐科的价值观、政策如何变化或前后矛盾，他们都会支持他。那些批评佐科的人，包括反对有争议政策的进步活动家，往往被贴上“佐科黑粉”（Jokowi haters）的标签，从而形成极化的算法飞地。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现象。



与此同时，我对东南亚近期选举的研究不仅揭示了算法政治的日益增长，还有其对选举结果影响的不断升级。

这些算法实践有三个主要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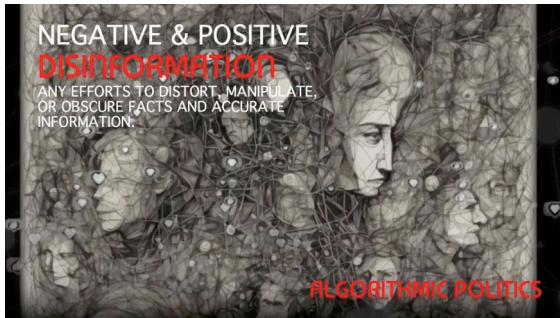
竞选活动专业化：社交媒体竞选活动现已变得高度复杂，由精英人士支持，并得到大量资金投入。政治候选人聘请专业顾问，利用先进技术和营销策略来扩大社会分歧，以确保自身权力稳固。这一行业涵盖了从政治咨询到数据分析等一系列服务，其目的都是通过战略规划和媒体管理来取得胜利。从根本上说，富裕的政治候选人利用社交媒体的动员效应，反映出“富者愈富”的态势。



通过精心策划的竞选网络操纵公共言论：竞选活动越来越多地利用自愿和受雇佣的网络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制造话题和分享信息。这种方法利用网络部队（cyber-troops，中文网络俗称“水军”）、机器人（bots）和意见领袖（social media influencers，中文网络俗称“网红”）来操纵公众言论。十多年前，这种策略在商业营销中很常见，但现在已成为政治活动的基石。有趣的是，在我研究的所有仇恨和虚假信息网络中，自愿用户的规模远远大于付费雇佣的用户和机器人。



使用虚假信息：虚假信息——包括负面和正面信息——已成为政治竞选活动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它不仅包括彻头彻尾的谎言，还包括歪曲事实的策略。以往的竞选活动主要依靠负面的虚假信息，如人身攻击和仇恨言论，而现在我们看到“正面的虚假信息”呈上升趋势。



这包括算法洗白（**algorithmic whitebranding**），即利用数字工具和自动化技术，包括人工智能（AI），为有严重争议或问题记录的政治候选人或公众人物打造正面形象或品牌。这种策略通过净化其历史并重塑叙事，以吸引那些可能遗忘其问题背景的年轻选民。



在 2022 年菲律宾大选中，邦邦·马科斯（Bongbong Marcos）利用算法洗白重塑了其家族有争议的历史，将其描述为和平与进步的黄金时代。他在社交媒体上的形象经过精心设计，展示了充满积极内容的形象，以软化他原本具有争议的公众形象。



同样，在印度尼西亚，普拉博沃·苏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将自己重新塑造成一个可爱、胖乎乎的祖父形象，在竞选材料中经常可以看到他与宠物猫在一起，并分享嬉戏视频。这种做法使他与过去作为前军事将领的暴力形象拉开了距离，塑造了一个更平易近人的形象。



两位候选人的竞选活动都倾向于“积极”的竞选策略，这吸引了忠实追随者的“爱”，就像 K-pop 歌迷对偶像的崇拜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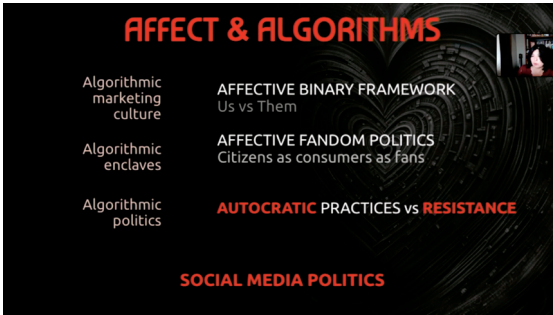
从本质上讲，算法政治正在重塑选举和公共政策的竞争方式，其采用的复杂策略融合了技术、营销和对公众情感状况的深刻理解。除了选举活动，日益专制的政权和倾向于非自由主义的政府也在利用算法政治和社交媒体的动员效应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压制异见。

东南亚的社交媒体在草根运动和民主改革中发挥着复杂的作用。虽然它有利于组织和动员起来反对强权，但其以市场导向和情感驱动的算法也可能推动倒退的、专制的议程。在情感二元框架和算法飞地的推动下，算法政治的兴起同时放大了进步和专制的声音。这些平台可以促进团结，但也会加剧两极分化，使用户退缩到排他性空间，助长部落民族主义（tribal nationalism）的力量并剥夺他人的权利。

在社交媒体中，个人和政治深深地交织在一起。社交媒体算法模糊了我们的情感生活与公民责任之间的界限，将政治转化为一种情感营销，将公民转化为消费者和粉丝。最终，情感和注意力经济学不仅决定了我们如何消费政治内容，还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并讨论政治内容以及如何投票。

鉴于这些现实，社交媒体平台不会很快消失。算法将继续塑造我们的政治格局，同时强化现有的动态。对民众情感的利用和操控，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算法上，都是关键要素。

东南亚的政治格局揭示了技术与权力动态之间微妙博弈，在进步势力和倒退势力之间。这场持续的斗争表明，东南亚民主的未来可能并不取决于技术本身，而是取决于那些致力于变革的人如何利用这些工具。在算法和政治挑战面前，那些为民主理想而战的人们的韧性，仍然是决定东南亚政治格局走向的关键。



本讲座内容源自：Lim, M. (expected Dec 2024). *Social Media and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译者注：文中加粗部分为讲者讲稿原文中加粗部分)



## 讲者介绍



Merlyna Lim是加拿大数字媒体与全球网络社会研究主席、传播与媒体研究教授，也是卡尔顿大学ALiGN媒体实验室的创始人和主任。她在印度尼西亚的达耶科洛特 (Dayeuhkolot) 出生并成长，她的研究探讨了数字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重点关注互联网、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她的工作探索了这些技术和社会动态如何在公民参与、激进主义和民主进程等领域辩证地相互塑造。她以东南亚、中东及北非地区为立足点，倡导将全球南方视为关键的研究中心，并根据其自身的条件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她的主要著作包括《东南亚的社交媒体与政治》(Social Media and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UP, 2024)、《根源、路线、路由器：当代社会运动的传播与媒体》(Roots, Routes, Routers: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Sage, 2018) 和《在线集体行动：社交媒体中群体的动态》(Online Collective

Action: Dynamics of the Crowds in Social Media) (Springer, 2014)。

---

1. 译者注：无尺度网络 (Scale-Free Networks) 是复杂网络研究中的一种特殊网络结构，其显著特征是网络中节点的度分布 (degree distribution) 遵循幂律分布 (power law distribution)。这意味着在网络中，大多数节点只有少量的连接 (低度节点)，而少数节点拥有非常多的连接 (高度节点)。
2. 编者注：指在本文讨论的范畴下，东南亚的定义是一个数字互联的区域范围。

# 垃圾佬——以再利用作为平价电子产品的来源

LĀ JĪ LǎO (TECH SCAVENGERS) :  
REUSE AS A SOURCE OF  
AFFORDABLE ELECTRONIC  
PRODUCTS

周蓬岸

编译 / 崔涵 周蓬岸

今天我将谈论一些与中国电子社区相关的话题，特别是关于“垃圾佬”（可译为“Tech Scavengers”，科技拾荒者）的内容。他们通过回收被丢弃的电子废物产品来构建可用的计算机，就像这台计算机一样。

我研究的起点是关于中国如何拥有庞大的工程师人才库的。根据官方统计数据，中国有54.1万名集成电路工程师<sup>1</sup>和超过800万名软件专业人员<sup>2</sup>。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人才库。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比如大学扩招和互联网普及等等。

但我想问，这些就全部了吗？难道没有一些更为草根、更为基进的原因，来解释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多工程师？我个人认为，不止有上述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也是电子爱好者中的一员，从我的个人经验来看，中国如此庞大的工程师群体形成的原因是多层次的。

当我们谈到中国乃至更广泛的亚洲电子市场时，我们往往会认为它看起来是类似于这张照片的情景，但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



Local electronic market: this is just the tip of the iceberg.

有一个庞大的、隐形的在线市场，专门处理电子废物，就像这个网页（石坚高端网，s0.cn）所展示的那样。这个截图是互联网档案馆 2005年的存档，列出了很多电子产品，它们通常是从进口到中国的废旧电子产品中分拣出来的。转售商把这些货物都列在网站上出售。如果像我这样的爱好者想要购买，就需要和卖家联系并在线购买。



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垃圾佬”这一现象。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90年代到2018年。主要是“洋垃圾”，也就是进口发达国家丢弃的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为什么在2018年停止了？是因为政府对废旧电子产品颁布了严格的进口禁令<sup>3</sup>。即使现在仍有少量废旧电子产品进口，但已经不是市场的主流。第二阶段是“土垃圾”，即国内的废旧电子产品。这些计算机和电子零件通常是本地企业和政府机构使用并报废的。

第三阶段是“再制造”，即通过重新设计，利用从进口或国内废旧电子产品中提取的零部件制造新的产品。

让我先谈一下第一阶段的进口废旧电子产品，也就是“洋垃圾”。它们往往是在发达国家常见的“计划性报废”中丢弃的。比如，当我在加拿大生活时，政府机构使用的电脑或服务器通常有大约五年的使用寿命。五年后，即使这些设备仍然可用，它们也会被报废，送去回收或转卖到其他地方。

然而，大部分报废的设备是可以继续使用或被修复的。因此，一些设备进口到中国后被再次售卖。这些洋垃圾相对于常规电子市场而言非常不同，它们的定价结构非常奇特。

### Example of Yáng lājī

Toshiba Libretto 50CT,  
¥ 8880 (> ≈ 40000) in May  
1998

Toshiba Libretto  
50M(basically 50CT w/ touch  
screen) RMB 950 (≈ ≈ 4500) in  
Dec 2002

1/6~1/7 price



比如这款Toshiba Libretto 50ct，在它还在主流市场也就是一手市场上销售时，价格超过8000元人民币<sup>4</sup>，折合大概40000泰铢。但仅仅过了4年，当它进入“洋垃圾”市场时常见的型号是 Libretto 50m，实际上是增加了触摸屏功能的Libretto 50ct，价格降到了大约950元人民币<sup>5</sup>，大约是原价的1/6到1/7，非常便宜。

洋垃圾中的可回收废旧电子产品分为四个主要类别。第一类是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硬件，其中有前面提到的Toshiba Libretto之类的PC笔记本，也涵盖各类台式电脑。第二类是手持设备，如PDA和智能手机。第三类是网络设备，最后一类是配件和外设。

让我们来看看第一类，PC笔记本和台式电脑硬件。这是“洋垃圾”中最大的一类，主要有三种细分类型：第一类是西方品牌的商务笔记本电脑，如ThinkPad、戴尔、康柏、惠普等，尤其是ThinkPad，它在二手市场非常流行。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叫51NB（意为“我要notebook”）的在线论坛，也就是专门网或者叫ThinkPad专门网。第二类是日本品牌，主要是一些超小型笔记本，比如富士通（Fujitsu）和NEC等。第三类是小型机箱台式机，也主要是日本品牌，我认为中国和日本的居住环境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许多人住在多层公寓里，而没有独立的住房。

- It's me in 2006
- 2<sup>nd</sup> yr undergrad
- Sony Clie S320
- Fujitsu FMV-253L
- IBM NetVista M41 Slim 6843-50J
- All of them are Japan-only model never officially sold in China, imported as Yānglājī



这张照片是我个人生活经验的一部分，是我本人在2006年拍摄的，那时我还是大二的学生，手头有很多这些东西，大多是日本品牌的。比如IBM的NetVista M41，它是日本特供的小型机箱台式机，还有富士通的FMV，它是日本的超小型笔记本电脑，还有Sony的Clie PDA。这些设备都是日本特供产品，但它们也都通过平行进口进入到中国，在当时，这种情况非常普遍。

## Mobile devices

- PDA & cellphone
- “1K PDA”
- 千元PDA->千元机 (qiān yuán jī)
- Was originally used for PalmOS PDAs < RMB ¥ 1000 (≈ ฿4800)
- Never been a formal price tag of Palm Inc.
- Expand to ¥ 1000~2000 (< ฿ 10000) phones



另一个细分市场是移动设备，就像刚才看到的Clie PDA。这个细分市场里的主要商品是PDA和手机，通常被称为“千元PDA”（1K PDA），即价格在1000元人民币左右，大约5000泰铢。这是2004年在深圳的一家叫“飞力”（szpda.com）的转售商网站。

实际上，即使千元PDA大多数都是基于Palm OS的PDA，Palm正式的零售价也从未下探到1000元区间（大多数Palm机型的官方售价要贵得多）。后来，“千元机”的价格范围扩展到1000至2000元人民币，这一概念至今仍然存在，像小米的红米手机，和另外一些中国品牌的智能手机也沿用了这一价格定位。

手机市场也有类似的现象。最重要的型号是西门子SL45，也就是西门子6688，这是一款功能手机。最初，它们的卖点是支持MP3播放。但买这些手机的人并不常用它做MP3播放器，而是为了定制固件和应用软件的功能，就像这个例子一样。你可以将短视频传输到手机里，或者用它来玩Java游戏。

这些做法和今天的智能手机非常相似，尤其是在定制固件和社区文化方面。他们有自己的术语，叫“刷机党”（可译为“flashing crowd”）。刷机党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2010年代。现在，中国仍有很多人在开发Android定制ROM。

如今，中国几乎所有手机品牌都有自己的ROM品牌，例如小米有

MIUI，华为有EMUI，类似的品牌也很多。几乎没有人使用谷歌官方的Android系统，这也是“刷机党”文化留下的遗产。



- “300 Yuan Handheld Computer” (< 1500) compare commonly 2000+(> 9500) price tag
- CASIO Toricomail, or “MC-21” (Hongkong/European model)
- Windows CE customizable with auto-run MMC card, another origin of shuǎ jī dǎng

另一个“刷机党”文化的起源是一种售价通常为300元人民币上下的掌上电脑，叫做CASIO MC-21或Toricomail。它原本作为手机配件出售的，用来通过GPRS或日本的PHS（即“小灵通”）网络发送电子邮件。但在中国市场上，它被高度定制化，用户可以使用自动运行MMC卡进行定制并运行自定义的软件组合，因此形成了“刷机党”的另一个起源。



还有一个“洋垃圾”的例子是外国的废旧手机，比如黑莓（Blackberry）。黑莓在中国的正式售价非常昂贵。至少需要每月

支付¥300来购买中国移动的手机套餐，还需要支付¥2800来购买手机，这样才能在中国使用正式发布的黑莓手机。

实际上，大多数中国的黑莓用户并不是以这种方式购买黑莓手机的。他们购买的是一些翻修的废旧手机。像这款（黑莓8700）的价格大约在一千元人民币上下，而这款（黑莓8110）大约是1500元人民币，都很便宜，通常只有原价的一半，甚至更低<sup>6</sup>。大多数中国黑莓用户都是以这种方式购买手机的。

### HTC Apache

- UTStarcom XV6700 (Verizon) / PPC 6700 (Sprint)
- Original released 2006
- Modding is required to use in China for the UIM card(SIM card, but for CDMA2000 network)
- Depend on condition, 2007 price:
- Like-new: ¥ 1600~1800 (≈ 7600~8500)
- Refurbished: ¥ 1200 (≈ 5700)
- Used(with scratch marks): ¥ 900~1100 (≈ 4200~5300)
- So, it IS a 1K PDA, qiān yuán jī



- The most important selling point:
- It has Wi-Fi but ALL cellphones in official channel doesn't due to regulation

“洋垃圾”手机的另一个代表是HTC Apache，也叫做UT斯达康XV6700或PPC 6700，它是在2006年发布的。实际上，它并没有在中国正式发布，大部分都在美国销售。当这些手机作为“洋垃圾”进入中国时，它们被改装并添加SIM卡或UIM卡的功能，从而能够在中国的CDMA2000网络中使用。

根据不同的成色，（HTC Apache）售价大致在¥1000到¥2000之间<sup>7</sup>，因此它是一款“千元机”。它最重要的卖点就是内置了Wi-Fi。在那个时候，中国市场上几乎所有通过正规渠道销售的手机都没有Wi-Fi功能，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政策原因，中国政府当时在推广自己的Wi-Fi加密标准WAPI，类似于3G网络的TD-SCDMA标准。所以，所有Wi-Fi设备在中国市

场的推出都被推迟了。直到2005年，“主流”的WLAN市场才开始兴起，但只是局限于电脑产品。

直到2010年，中国市场上几乎没有手机支持Wi-Fi功能。即使是中国联通正式发布的iPhone 3GS也砍掉了Wi-Fi模块。因为WAPI标准的原因，Wi-Fi的普及和者相关技术的引入都被推迟了。不过正如你可能猜到的，中国有（无线网络设备的）地下市场，其中一些最大的商家包括“恩山”（wifi.com.cn，淘宝最早的第94号商家）和“德赛”（dsfree.com）。



这是当时中国政府与海外工业界之间围绕WAPI展开谈判的新闻报道<sup>8</sup>。



这就是“洋垃圾”市场的另一个部分：无线网络。这是恩山无线的网站，它与我之前提到的第一个网站很相似，基本上就是一个博客，列出了他们刚到货的各种产品。



这些是德赛网络上列出的产品，截图存档于2005年之前。那时，官方市场上还没有无线局域网产品，所有的产品都在像这样的地下市场里。

## 2006 the origin of open-source wireless in China

- The start of DD-WRT and other custom firmware of routers in China
- Etoto2000, binbinbin, July 2006 on EnShan forum posted some graphical instruction of how-to install and use DD-WRT



这个地下无线市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开源无线技术，比如DD-WRT和OpenWrt路由器固件在中国的普及。最重要的早期贡献者包括了Etoto2000和binbinbin，他们发布了一些图文教程<sup>9</sup>，教人们如何在各种路由器上安装和使用DD-WRT。之后，围绕DD-WRT和OpenWrt这类开源无线固件出现了很多相关产品。

### Peripherals

- Almost everything you can find
- Signature product is (generally overpriced) Apple related products:
- 1394/Firewire HDD enclosures
- 青州小熊 qīng zhōu xiǎo xióng
- Qzxx.com



下一个市场是外设，几乎你能想到的任何东西都能在这里找到。其标志性产品通常是价格偏高的苹果周边产品，比如火线（Firewire）硬盘盒。其中一个最大的卖家是青州小熊（qzxx.com）。

- 元谷极光 (yuán gǔ jí guāng) Also known as ClearLight CL-400+
- ¥ 420 (≈2000) in Nov 2005
- Maxtor Onetouch enclosure (sold by QZXX)
- ¥ 145~160(≈760)——about 1/3 price



如果将官方市场和地下市场进行对比的话，2005年，如果你想为苹果电脑买一个火线硬盘盒。线下市场的价格大约是420元人民币。但如果你从青州小熊买，价格是原价的1/3，大约145元到160元人民币，具体价格取决于你选择的型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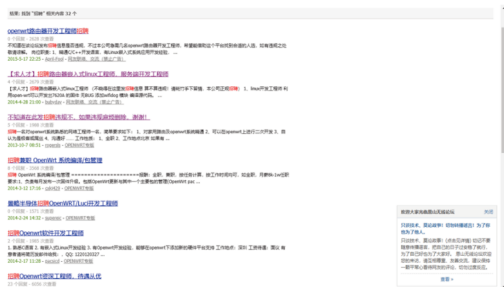
2010年后，“洋垃圾”市场开始衰落。为什么？因为爱好者开始被聘为专业开发人员、技术销售或技术支持人员。

## Hiring in PDA enthusiast's forum (Hi-PDA)

标题	版块	作者	回复/查看	最后发表
8.0 从旧物 拆解下一代 Kindle	历史遗迹	danybnd	10 / 705	passport78
8.0 再做一个蓝牙4.0设备 固件、电路和固件烧录	Smartphone	lbtzy003	2 / 1474	无泪
8.0 【求助】 android固件, 系统开发工程师	Buy & Sell 交易集市	zhu7	2 / 185	fangqimo
8.0 【求助】 android系统开发, 固件工程师	Smartphone	zhu7	10 / 639	happylf
8.0 知道谁要招人吗, 多个, 每个工资4000-8000, 做硬件工程师	Cook Table 煮菜专区	wlsmme	7 / 1136	野望一鞋
8.0 寻找软件工程师 做智能手机系统软件调试的工作	Windows Mobile, PocketPC, PPC	klasmmsun	2 / 2160	hegy_david
8.0 寻找 硬件 维修	Palmtop, Tree	lpy_saffron	8 / 860	小野猫
8.0 软件开发助理工程师	DC, NB, MP3, Gadgets	javaboz33	1 / 3125	alan
8.0 需要为windows的手机做一条有usb功能 的线, 需要不懂被测试, 测试,	Windows Mobile, PocketPC, PPC	soft1234	0 / 615	soft1234
8.0 这样的事情有人能胜任的吗(请回复)	Discovery	任广雷	4 / 150	电音新

在一些论坛上，比如说Hi-PDA，就有关于PDA爱好者的招聘广告。如果你非常熟悉移动操作系统，比如Windows CE或Android，你就有机会在这里找到工作。

## Hiring in wireless enthusiast's forum (En'shan)



这个截图来自恩山无线论坛。类似的，如果你非常熟悉DD-WRT或OpenWrt之类的技术，你也可能会被聘用。

另一个原因是国内厂商开始生产面向爱好者的产品，与“洋垃圾”市场竞争。例如，2008年发布的磊科（Netcore）NW618，它官方支持DD-WRT，而且非常适合刷机。后来，小米也因为发布了自己的定制ROM——MIUI，成为了手机刷机爱好者的热门选择。此外，上网本（netbook）也成为了迷你笔记本经济实惠的选择。实际上，政府的监管远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严格。



这是磊科NW618路由器的报道<sup>10</sup>，正如标题所述，由于可以“第三方固件随便刷”，让它能够“持续热卖”。



这是魅族的在线论坛，你可以直接与魅族公司的硬件和软件开发人员交流。

### Tǔ lā jī, Domestic e-waste: Domestic hardware surplus

- Server hardware downshift to PCs
- IT invest bubble
- Internet of Things (IoT) bubble
- VR bubble
- Cryptocurrency bubble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订单编号: 79177034489025	成交时间: 2011-06-01
	原装机 MT DORI 1G ECC REG 服务器内存	60.00 2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订单编号: 79176734409025	成交时间: 2011-06-01
	AMD OPTERON 275 皓龙双核 核 940针 服务器CPU	29.00 2
<input type="checkbox"/>	订单编号: 79038591449099	成交时间: 2011-05-31
	泰安 TYAN KBW S2385 AH RF 音频和图声工作站主板	450.00 1

之后，“洋垃圾”市场开始下滑，而国内的废旧电子产品“土垃圾”开始崛起。图中这些AMD Opteron本来是服务器级别的硬件。但它们变得很便宜，并适合用来组装台式电脑。同时，“土垃圾”的崛起与一些IT投资泡沫有关，比如物联网（IoT）、虚拟现实（VR）或加密货币。当泡沫破裂时，许多非常便宜的硬件就进入了市场。

### 图拉丁吧 the “Tualatin Bar”

- Baidu Tieba (like Chinese reddit)
- Rising on mid-late 2000s
- Why so late? Since Tualatin is last Pentium III released in 2001~2002
- In mid 2000, retired Pentium III Yánglǎiji was very popular, especially SFF desktops
- Use as Torrent box ( “下载机” downloading machine) for BitTorrent/eMule/Xunlei etc.
- Or software-based router
- Image: Fujitsu FMV-6866CL7



在中国，讨论“土垃圾”最重要的在线社区，是图拉丁吧。它是百度贴吧的一部分（类似中国版的Reddit），大约在2000年代中后期开始兴起。但为什么这么晚呢？毕竟Tualatin是2001到2002年发布的最后一款Pentium III处理器（在图拉丁吧活跃时这款处理器已过时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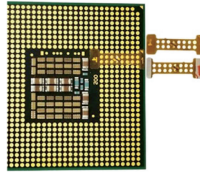
这是因为在2000年代中期，像图上这款“洋垃圾”Pentium III富士通小型台式机 and 类似的机型被广泛用作下载机(TorrentBox)在BT等下载网络上挂机。与此同时，它们被用做软路由之类的用途。



这是2007年一篇关于出售这种小主机的帖子<sup>11</sup>，价格大约在700元左右，不算太贵。

### Turn to a local, modding focused community

- Budget focused hardware community
- Bubble of cloud computing and big data in early 2010s
- The community expand with cheap server grade CPUs
- 2013 : LGA771 Xeon mod to install on desktop motherboard



之后，最重要的转变是转向本地数据中心退役的服务器级硬件，特别是将服务器级CPU改装到桌面级主板上。就像图中的这个转换贴也叫“护舒宝”。如果你把这个转换贴贴在CPU上，就可以将服务器级的CPU移植到桌面级的主板上。

Memes!  
Big Ear Tutu, a popular Chinese cartoon between  
2004~2010



为什么图拉丁吧会变得如此有名？因为其中产生了很多迷因！大多数迷因演绎自《大耳朵图图》，一部2004年至2010年间非常流行的中国动画片。为什么他们选择图图？是因为“图拉丁”、“图吧”和“图图”之间的谐音。这些电脑发烧友之间产生的迷因有时激怒真正的动画迷，并产生类似“搞电脑的滚啊”这样反击的迷因。显现出动画迷和硬件爱好者之间的博弈。

另一个在图拉丁吧以及其他硬件爱好者社区中非常流行的概念是“矿渣”（可译为“mining scraps”），即加密货币挖矿产生的废弃硬件。

从2014年开始，用于加密货币挖矿的GPU就被称为“矿渣”，因为它们曾经用于挖矿所以价格非常便宜。不同年份都会有不同型号的矿渣出现。最新的矿渣几乎涵盖了所有NVIDIA RTX 20xx/30xx系列的显卡。这个社区与“洋垃圾”PC硬件社区联系密切。

### 另一堆矿渣 Another pile of mining scraps.

- “Sharing economy” mainly PCDN edge devices, IPFS like miner
- 斐讯 Phicomm
- 玩客云 WanKeYun
- 暴风播酷云 Baofeng Credit
- 章鱼星球 Octopus-Planet
- 极路由 HiWiFi
- And many more
- DD-WRT/ARM based, mainly connected to the aforementioned wireless device community.



在2016~2018年左右，还有“另外一堆”矿渣，这段时期中国有很多关于“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的投资炒作，主要是PCDN边缘设备和类似IPFS系统的矿机。技术上来说，这些设备的硬件结构很像无线路由器。涉及到的品牌有很多，比如斐讯、玩客云、暴风播酷云、章鱼星球、极路由等。当这些设备变成矿渣时，价格大约在¥100-200之间，非常便宜。大多数设备基于DD-WRT/OpenWrt/ARM架构，因此可以较容易地将定制Linux固件刷入这些设备。它们的性能相当不错，许多设备使用的是四核或双核CPU，其实是颇为强大的ARM嵌入式设备。这一社区与无线设备社区的联系非常紧密，恩山无线也是讨论这些矿渣的最大论坛。

## The VR bubble that exploded in 2020



### 捡垃圾 睿悦Nibiru 一体VR眼镜 2K屏仅140包邮

来源: 2020-10-02 21:59 · 8774赞

#### 前言

正如昨天发: 做工变态 J1900 神舟工控机 仅售100元 拆机折损 所说, 最近折腾了不少东西, 但最近时间太紧, 趁小长假来一小撮发, 争取每天发一篇, 都是捡垃圾, 软肋: 电子产品迭代快, 感兴趣的关注一下, 谢谢!

今天的主角是一个VR一体机, 咸鱼推荐的, 卖家挂160不包邮, 我去礼品店砍价请求包个快递费, 那店主主动140给我包邮, 说那个砍价都是90, 100的, 突然来个我这么大方的, 140包邮给我, 那真确定不能拒绝吧, 机器大概配置如下:

- 屏幕: 2K屏
- CPU: 彪志S900 6位 4核
- 内存: 2G ram+16G

#### 展示

添加今日头条到桌面  
[今日头条](#) 添加今日头条到桌面  
 今日头条是今日头条集团旗下产品，每日为您提供最新、最精彩、最及时的资讯。

另外，VR（虚拟现实）泡沫也产生了一些“土垃圾”。比如像睿悦Nibiru这样的VR头显，价格大约在88元到140元之间，非常便宜。

但是硬件配置却相当不错，包含了四核ARM CPU、2GB内存和16GB存储空间，同时还配有头显和高清显示屏。有时你还可以得到动作追踪器之类的配件。

还有一个社区，他们重新制造设备。不仅仅是翻新、也不仅仅是修复，甚至不仅仅是改装。他们制造的是市场上不存在的新设备。

### Early example “Palm T300”

- Handspring Treo 300
- Sadly, it doesn't have capacity to add UIM card slot like HTC Apache so it's incompatible with Chinese mobile operator
- Remove the CDMA2000 cellular module
- Redesign case
- Then sold as PDA without wireless capability
- ¥ 95 (≈ 450) in 2008, it's cheap



“Palm T300”是中国厂商重新制造产品的最早例子之一。当时，Handspring Treo 300 是一款智能手机，作为“洋垃圾”进口到中国。可惜它不能像HTC Apache 那样被改装，因为它的蜂窝模块没有支持SIM卡或UIM卡的潜力。那么中国制造商是怎么做的呢？他们直接拆除了蜂窝模块，重新设计了外壳。就像图中灰色是原版的设备，蓝色是重新设计的版本。然后，他们将主板、显示屏和键盘放进新的设计外壳里，并将其作为没有无线功能的PDA出售，价格非常便宜，2008年仅售¥95<sup>12</sup>。

## ThinkPad mod motherboard

- 1. T50 (2013): ThinkPad T4x/R5xx series(2004~2006), upgrade to 1<sup>st</sup> Gen Intel Core i CPU.
- 2. X62 (2015): ThinkPad X60/61(2006~2007), upgrade to 5<sup>th</sup> Gen Intel Core i CPU
- 3. T70 (2017): ThinkPad T60/61(2006~2007), upgrade to 7<sup>th</sup> Gen Intel Core i CPU
- 4. X210(2018): ThinkPad X200/201(2008~2010), upgrade to 8<sup>th</sup> Gen Intel Core i CPU



这里还有一些更贵一些、但更高度定制的例子，比如ThinkPad改装主板，来自我刚刚提到的在线论坛“专门网”（51nb，ibmnb.com）社区。T50是基于ThinkPad T4x改装的，X62是基于ThinkPad X60改装的。通常，这些改装的目的是将原有的CPU和主板从大约8到10年前的硬件升级为新硬件，提供新的CPU和主板新芯片组的功能。

### LGA771 Xeon motherboard with G41 chipset, released in summer 2012, even earlier than modding community

订单编号: 20569516906080	成交时间: 2012-08-14 13:37	币种: CNY					
原装 钱代 英特尔® 酷睿™ i3 处理器	23.00	2	退款/退货 跟踪物流	58.00 (含快递: 12.00)	商家已发货	立即购买	加入购物车
订单编号: 150659587536080	成交时间: 2012-08-11 10:51	币种: CNY					
特准全新G41主板+英特尔® 酷睿™ Xeon 处理器	444.00	1	退款/退货 跟踪物流	435.50 (含快递: 15.00) (预付0.50)	商家已发货	立即购买	加入购物车

还有另一个例子，一些厂商设计主板时，并非是基于硬件爱好者社区中已有的设计，而是在社区之前就设计了他们自己的改版主板。例如 LGA771 Xeon主板出现在市场上的时间就早于图拉丁吧社区中对类似改装的讨论。早在2012年，一些G41芯片组的桌面级主板就已经支持服务器CPU。

## Huananzhi “华南金牌” (Huá nán jīn pái)

- Founded around 2015.
- Became success since release X79 motherboard with 3 yrs warranty in 2016
- Even if the quality is not entirely stable, a sufficiently long warranty period has increased market recognition.
- Sandy Bridge-E (2011) /Ivy Bridge-E (2012) Xeon CPUs reused after 4~5 years
- ATX/Micro ATX form factor for desktop use



三年后，这类定制主板开始出现代表性的品牌，比如说华南金牌主板就大量出口到其他国家。他们获得成功的产品之一是2016年推出的X79主板。是什么让这款产品走向成功呢？因为他们提供了三年的保修期。即使当时质量还不稳定，但更长的保修期加上社区的支持，还是使他们的产品取得了认可。这款主板支持4~5年前的服务器级处理器，由于是退役的旧款服务器CPU，它们的售价变得很便宜，所以被用来组装台式电脑。

华南金牌甚至为台式机用户提供了双处理器选项，比如有款主板虽然被称为“X79 Dual CPU”，但实际上它使用的服务器级芯片组（Intel C600/C610等）是从废旧的电子设备中拆卸出来的。

## Enhancing mining scraps into AI age

- Re-build mining card with 16GB VRAM
- Brand running just like Huananzhi
- Brands like:
  - KINOLOGY 卡诺基
  - DICASVER 发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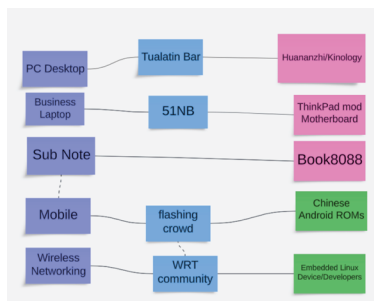
此外，矿渣显卡也被赋予了新的用途。比如制造商对原本用于挖矿的（RX580）显卡进行了改造，重新设计生产了一款16GB显存的显卡，适用于一些AI应用。这类显卡也有自己的品牌，比如卡诺基、发行者等等。

## Book 8088 (2023)

- CPU: Recycled NEC V20
- Graphic: Recycled CL-GD5420 series
- Sound: Recycled YMF262
- Storage: Recycled industrial CF card
- Many recycled parts on a new device



还有一款最新的产品是热门的复古计算机Book 8088。它的大多数芯片都是回收的，比如CPU是来自回收渠道的，与Intel 8088同级别的NEC V20；图形芯片是回收的CL-GD5420系列；声音芯片是回收的（YMF262），存储也是回收的（工业级CF卡），但主板和机器本身是全新设计的。所以它是一个由许多回收部件组成的新设备。



我的演讲差不多就到这里。这个研究仍处于初期阶段，所以这还不是完整的图景，但粗略总结了社区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系的。例如，PC台式电脑社区与图拉丁吧相关联，并且与华南金牌/卡诺基等制造商相联系；商务笔记本社区与51NB和ThinkPad改装主板相关联；迷你笔记本社区与Book 8088相关；手机社区则形成了刷机党、并且也孵化了国产ROM社群；无线网络社区与OpenWrt/DD-WRT社区紧密相连，同时也和很多嵌入式Linux设备的开发有关。



## 问答讨论

**Q1:** 蓬岸，感谢你的精彩演讲。听完这个演讲后，我再也不会购买新电脑了。我觉得我可以在这些网站上找到我需要的一切，这太棒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认为你的演讲非常漂亮地展示了各种设备以及它们被重新利用和再利用的不同方式，真的很了不起。我想问一下，你能否稍微多说一点，这些做这些事情的人到底是谁？

我理解这些网站，理解这些不同的社区。闪存社区可能与其他社区稍有不同，但它们以某种方式联系在一起。但最接近这种文化氛围的可能是 ear-tu-tu（注：指演讲中提到“大耳朵图图”的表情包），对吧？我们通过那个视频或者那个迷因看到了，它并不是关于技术本身的，而是从这些技术中衍生出的某些东西。

所以我想知道，当你看到这些做再利用的不同小社区时，它们之间有哪些文化上的共性，或者更广泛地说，它们都是城市人吗？农村人呢？都是男性吗？是女性吗？年轻吗？有教育吗？富有还是贫穷？你对这些背后的人群有什么了解吗？

**A1:** 实际上，很难总结这些再利用人群的文化背景。其实，他们购买这些设备的原因有几个。有些人就是像我拍的那张照片一样。他们是学生，手头没多少钱，所以他们只是想买便宜点的东西。还有一些人，他们是制造商，或者是回收商，想通过这个方式获取更多的利润。所以其实，与硅谷的那些自称是嬉皮士之类的人不同，中国的科技社区更多的、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们更实际，或者说，他们更关注赚钱，类似这样的东西。他们只关心这些东西是否能帮助他们节省成本，增加利润，类似这样的动机。

**Q2:** 非常感谢，精彩的演讲和很棒的图片。是的，我想在Tom的问题上再补充一点。有些回收业务可能非常有毒，而且是很难做的生

周蓬岸

意，特别是在肮脏和健康危害方面。比如在香港，很多电子废物回收场，那里有来自当地社区的贫困人群在工作，但也有些避难者，他们不被允许在香港工作，但他们会在这些场地上工作，拆解这些设备。这个工作很危险，他们经常受伤。我知道在2000年代初的广东，一些废物回收场的健康条件也非常差。

所以我想问一下，除了钱以外，你是否遇到过这些从事这项行业的人所面临的其他困难？

**A2：**是的，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回收业务确实是非常有毒或者是污染严重的。但在我看来，问题不仅仅是回收业务本身造成的。实际上，根本原因我认为是IT投资的热潮。比如说，制造商为数据中心生产了过多的服务器，为加密货币挖矿生产了过多的GPU，这些才是这个问题的根源。实际上，在我看来，回收业务在很多情况下其实是减少污染的，因为它将旧设备重新利用，而不是拆解。

而在拆解时，确实会产生污染。我知道这一点，但我认为，在很多情况下，当我们说某些东西是非常有毒的污染时，我们考虑的往往是这些硬件最初是由全球北方的公司出售的，尤其是像脸书、微软这些大公司，它们的大数据中心产生了大量的废旧硬件。

也包括苹果公司，他们宣称自己是一家环境友善的公司，但制造的硬件却无法升级，缩短了硬件的使用寿命，制造了计划性报废的现象。

这就是我的想法。

**Q3：**感谢蓬岸的精彩演讲。我有一个问题，虽然你已经稍微回答了一些。我想知道这个社区是否与中国的大公司和电子公司有联系。因为我假设他们可能是电子爱好者，所以从逻辑上来说，他们应该会在那些大公司找到工作，对吧？你认识其中的一些人吗？或

者他们曾经在大公司工作，或者现在在大公司工作吗？因为你提到他们对电子产品有一种矛盾的理解。

**A3：**你是指一些具体的人在大公司工作时，还是指整个社区？

**Q3：**可能是某个人，或者是某个社区？

**A3：**其实我不太确定。就我个人而言，我知道一些人，比如说，我认识的最著名的人之一是“Wells”，这是他的网名，在Bilibili上的昵称。他是Bilibili的up主和YouTuber，（在他发布的内容中）做很多修复工作复古计算机相关的事情。他会重建或者修理一些80年代、90年代的老电脑。但他也是联想公司的员工。

实际上，由于我在2009到2019年间一直在加拿大工作，所以我离开这个社区已经好几年了。我离开中国已经10年多了，因此我和那些同时在大公司工作或者从事这些爱好的人之间的个人联系不多了。

**Q4：**你好，非常感谢。我想我的问题与关于社会组织部分的一些问题有关，但我很想了解一下供应链，尤其是外国电子废物的供应链。如果你能多讲讲电子废物是如何到达供应链的，并且如何被处理的，那会非常有帮助，能不能再多谈谈这个供应链的过程？

**A4：**实际上，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像有些电脑，因为我曾在加拿大生活，所以我可以告诉你加拿大的情况。一些电脑在加拿大的公司退役后，很多会送到一个叫做电子回收协会（ERA）的地方，或者会送到拍卖行。拍卖行会把这些退役的电脑、笔记本电脑整批拍卖。

是的，有很多经销商，其中一些是中国人，有些来自东南亚，也有些来自非洲，他们会参加拍卖，或者去所谓的“政府盈余销售”现场，那里会有退役电脑的拍卖。他们会拍卖整批的退役电脑。拍卖后，这些电脑会被送到仓库。我在加拿大温哥华有一个朋友，他经

营一个仓库，销售这些退役电脑。他们的二手电脑也会在eBay上卖给北美的客户。他们不是大公司，只有三四个员工，负责测试、修理电脑并转售。有时他们还会做批发业务。在中文里，这个过程叫做“统货”，也就是把一大批电脑卖到中国。

他们曾经把这些电脑卖到中国，但最近他们告诉我，他们现在会把这些电脑运输到马来西亚，或者全球南方的其他一些地方，但我不确定具体的运输细节。

这些货物到达中国后，在中国的社区里有一个术语来描述这个过程，叫做“大船靠岸”。这些电脑抵达中国后，会进入一个叫做“货场”的设施，就是存放货物的地方，类似仓库。那里会开箱，退役电脑就会被送到那里，线上经销商会去那里拍照。比如，他们会把PDA放在这边，把笔记本电脑放在那边，然后拍照并上传到网站。

接下来，大部分交易都发生在淘宝上。当买家像我一样联系卖家时，通常是在淘宝或者在线论坛上挑选商品，然后在QQ群等即时消息软件里买家和卖家联系购买。

然后，我说“我买这个笔记本”，卖家就会把笔记本包装好，通过中国的物流公司发货，比如顺丰或者申通。顺丰是中国最大的快递公司之一，类似于美国的UPS。卖家通过顺丰把笔记本送到买家手中，买家收到后会开箱检查，看看电脑是否能正常工作，然后进行一些硬件升级或修改。之后，我会写一篇评测文章，重新发布到在线社区。这就是整个供应链的运作过程。

## 讲者介绍

周蓬岸，新媒体艺术家，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网页里的电脑博物馆”站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技术影响下的流行文化、媒介考古学、新媒体艺术创作等。



1.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发展报告（2020-2021年版）》
2. 2021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统计公报：[https://www.gov.cn/xinwen/2022-01/28/content\\_5670905.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2-01/28/content_5670905.htm)
3. 即《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4. 价格来自《世界计算机周刊》1998年第21期
5. 圣宁二手专卖网（[pc-pda.com](http://pc-pda.com)），2003年3月报价
6. 价格来自小猪拱豆黑莓店（[shop34211215.taobao.com](http://shop34211215.taobao.com)），2008年12月报价
7. 价格参考中国手机在线网站2007年12月16日《UT斯达康XV6700试用:C网PDA手机性价比王者》  
<http://www.cnonline.org/2007/article/10519.html>
8. 《中国实施WLAN国家标准专题》新浪网，科技时代 [https://tech.sina.com.cn/focus/wlan\\_gb/](https://tech.sina.com.cn/focus/wlan_gb/)
9. binbinbin：《看图一步一步刷DD-WRT》 <https://www.right.com.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76>，2006年7月
10. 泡泡网无线频道《第三方固件随便刷 磊科NW618持续热卖》  
<https://www.pcpop.com/article/314814.shtml>，2008年7月
11. 来自软路由论坛：<https://bbs.routerclub.com/thread-25556-1-1.html>
12. 价格参考互联网档案馆存档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80504220704/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732ba3f79529c7d89ad570a80d68c88b.jhtml](https://web.archive.org/web/20080504220704/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732ba3f79529c7d89ad570a80d68c88b.jhtml)

# 从技术浪漫主义到技术封建主义——中韩早期信息社会的历史比较研究

FROM TECHNO-ROMANTICISM TO TECHNO-FEUDALISM: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STUDY OF EARLY INFORMATION SOCIETIES IN CHINA AND SOUTH KOREA

王洪喆

编译 / 陈苏元 王洪喆

让我们从一部电影开始。



台湾导演杨德昌于2000年执导了电影《一一》（A one and a Two）。在影片中，吴念真饰演在台湾一家信息公司担任合伙人的NJ。



公司陷入困境，他找到日本著名游戏制作人Ota大田谈合作。

在汇报中，大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新计划，希望开发一种市场从未投资过的游戏类型。

大田说：

我们目前无法超越打打杀杀的普通电脑游戏产品。不是因为我们对电脑不够了解，而是我们对人，对我们自己不够了解。



然而，公司的其他合伙人却认为这个想法的商业风险太大。他们与大田合作投资电脑游戏产业，只是在“为大田的名气买单”，并不希

望在赚钱方面冒任何风险。最后，公司选择与一家名为“Oda 小田”的本地公司合作，而该公司是专门抄袭日本大田的台湾企业。



相反，在听完大田的报告后，NJ变成仿佛是大田的一个惺惺相惜的知己。两人共进晚餐时，大田问NJ：

为什么我们如此害怕第一次呢？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第一次。每个早晨都是全新的。我们从未活过同一天，但每天早上，我们从来不会不敢起床……为什么？



很少人知道这位电影大师与数字技术的深厚渊源。1969年，杨德昌毕业于台湾国立交通大学控制工程系，后应邀担任宏碁电脑公司（acer）多媒体顾问；拍电影之前，他曾在美国担任了八年的信息工程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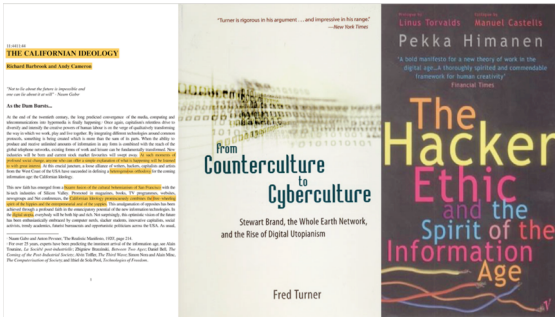


2001年，电影上映后，杨德昌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媒体问导演如何看待这波互联网发展的浪潮。杨德昌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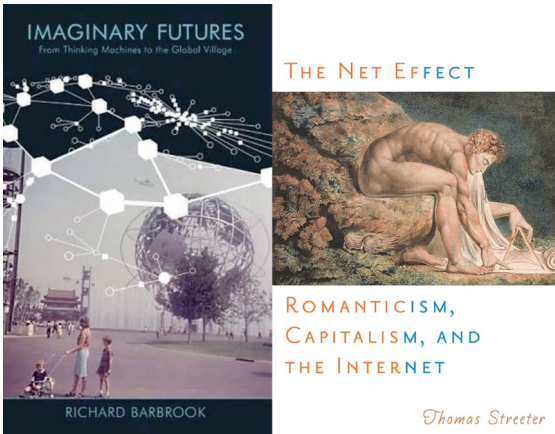
我认为第一波互联网热潮主要是投机，当时很多人没有认真思考数字技术的本质，他们沿着过去的模式看新事物。美国的风险投资基金，以前最多占资本市场的10%，但随着数字技术时代的到来，风险投资基金甚至超过了50%，这说明大家对于互联网技术都抱着赌博的态度。如果没有对新技术的清晰认识，大多数事情的发展方向都会是有问题的，而这种赌注将是危险的。

2000年是一个分水岭，随着最后一个互联网泡沫破灭，亚洲金融危机结束了东亚的“一九九零年代”。这部电影正是以一个中年男人的视角，试图通过中年危机来暗示时代变迁可能带来的后果。

与过去的互联网史研究者一样，我试着找到一种区域性的文化解释，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方式来理解东亚数字产业变革的动力，从而聚焦于文化解释的潜力。



在这一领域，目前已有许多优秀的研究，如“加州意识形态”（Californian Ideology）、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的《从反文化到赛博文化》（*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以及《黑客伦理与信息时代精神》（*The Hacker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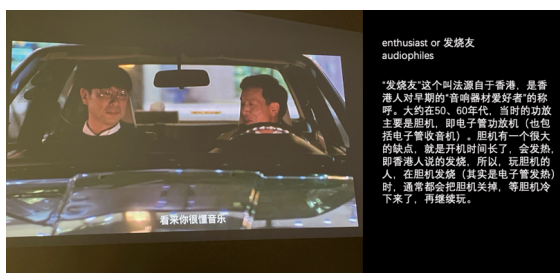


然而，这些研究都基于美国和欧洲的背景。虽然亚洲数字文化的起源同样受到了美国和欧洲数字文化的影响，但其自身也具有一些独特的因素。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这些东亚自身独特因素的讨论还很有限，对真正塑造东亚数字文化和数字产业的动力，也缺乏有效的讨论。我们需要更多来自东亚本土的研究与知识生产。



经济和文化变革的信息化上，东北亚领先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通过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数字文化历史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独特的发展模式，以及他们应对信息时代挑战的策略。此外，这种研究方法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亚洲各国之间相互影响、世界其他地区国家之间相互借鉴的理解，为未来的区域合作和社会创新提供有益的参考。我们也可以从地区比较的角度进一步理解中国的数字发展道路。

正如影片所提示，我们不禁要问，东亚社会中所谓的计算机文化黄金时代究竟是怎样的？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哪些条件促成了人们对 IT 行业的热情？这些条件又是如何转变并形塑了当前东亚社会所面临的危机。以及，我们应如何重新评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价值。



我给出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发烧友”（enthusiast）。与强调工具和动手的硅谷车库文化不同，我发现东亚早期的计算机文化具有更浓厚的人文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

正如刚才提到的，影片中的大田和 NJ 二人不仅在大田的汇报内容上达到共鸣，还在离别时车里演奏的交响乐上同频共振——他们两人通过共同的“发烧友”身份获得认同！他们都认出了彼此是“enthusia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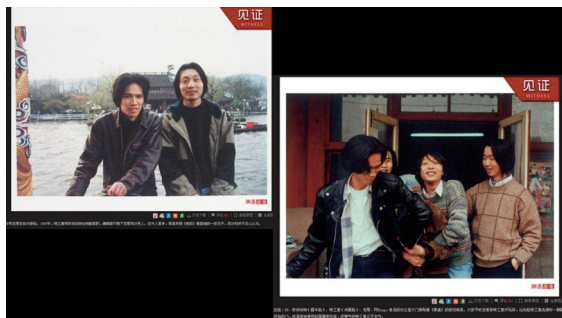
“发烧友”是一个东亚原创词，不能完全等同于业余爱好者

(amateur)、爱好者 (hobbyists) 或者赫恩·詹金斯 (Hern Jenkins) 所说的“粉丝” (Fans)，对我来说“发烧友”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词，具有特殊的人文主义价值。

“发烧友”的定义来自音乐发烧友 (audiophile)，这个名称起源于香港，是香港人对早期“音响器材爱好者”的称呼。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音频) 放大器主要是电子管功放 (也包括电子管收音机)。电子管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开久了会发热，也就是香港人所说的“发烧”，所以玩电子管的人，当功放机发热——也就是电子管发热时，一般都会关掉机器，等它冷却下来再继续玩。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它慢慢演变成对某些事物有特殊兴趣的群体的统称。也许，“enthusiast”这个概念更接近于“发烧友”。

首先，众所周知，“发烧友”热衷于表达、分享、交流、寻找同好和组建社区。但更重要的是，这种社群绝不仅仅满足于关注爱好这一垂直领域，而是由此延伸至对更广阔领域的兴趣和自学能力，进而形成具有共同品味、判断标准、价值观，甚至政治立场的社群。



Amateur (业余爱好者) — enthusiast (发烧友) — humanist (人文主义者)

过往对中国早期数字文化的研究过于强调其自上而下的技术民族主义特征。在我的研究中，我强调在早期，尤其是 1990 年代，这更多是一种“enthusiast”群体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技术民族主义，有

王洪喆

着浓厚的人文主义特征，而非过去理解的“先进-落后”的二元技术民族主义。

让我举个例子，前导软件公司（Frontier）成立于1995年，在1998年解散前是中国大陆最大的游戏软件制作公司，当时大约有50人，4个工作室。



我们可以从前导软件的创始声明中看到公司愿景：

计算机是新的信息媒体，软件是新的文化形式。前导公司不仅是软件产品公司，更是文化产品公司。我们走到一起，是为把最好的计算机文化产品送进千千万万个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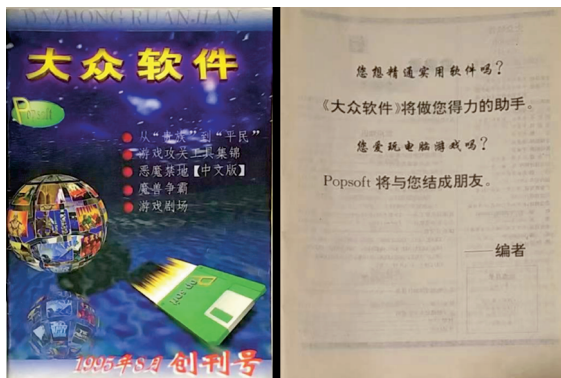
计算机交互艺术刚刚萌芽，远未进入成熟期。制作属于中华民族的划时代的正剧、悲剧，是前导人的梦。

让计算机真正成为孩子们的良师、生活中的益友，是前导人的责任。

这与公司创始人和创始团队强烈的人文情怀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公司专门将中国四大名著改编成游戏。



还有一个例子更能说明第一代软件人的人文精神：与制作软件相比，他们更关注出版物和杂志。前导投资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游戏软件杂志《电子游戏软件》和中国历史上发行量最大的计算机杂志《大众软件》。在此期间，类似的软件和计算机杂志有 30 多种。



我们来看看其中一本杂志的发刊词：

一个游戏软件既是一件“商品”，又是一件“作品”。我们更愿意从‘作品’的角度去评论一部游戏。

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说：《游戏批评》是一本文化气息很浓的书。



这些杂志在 2000 年左右达到高峰期，月发行量都在 30 万至 50 万份。与此相比，截至 1999 年，中国的电脑总数超过 1000 万台，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属于企事业单位和教育机构，个人家用电脑的数量

从技术浪漫主义到技术封建主义——中韩早期信息社会的历史比较研究

还不到 500 万台。我们可以从这个比例看出当时电脑用户浓厚的文化氛围。

有趣的是，软件、硬件和游戏杂志的繁荣离不开一个重要原因：盗版和山寨。正是因为有了繁荣的盗版市场，软件文化才得以迅速传播，杂志才得以覆盖大量人群。换句话说，虽然大多数都买不起正版软件，但他们买得起盗版软件和正版发行的杂志。而杂志上有大量的软硬件 DIY 知识和游戏指南，正好满足了“发烧友”群体的自学和社区交往需求。可以说，没有杂志作为交流平台，也不会有中国繁荣的盗版文化市场。



与音乐、动漫或其他大众娱乐相比，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文化景观中，数字文化反而是最具人文精神的。这是一个由爱好者组成的世界，一个由想象力主宰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由盗版主宰的世界。



有趣的是，与中国相比，韩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几乎没有发展过这种具有人文特色的数字社区文化，而是快速进入了另一种既不同于中国，也不同于日本的数字文化形态。



与处于杂志时代和互联网时代过渡时期的中国相比，同样拥有繁荣盗版市场的韩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直接进入了互联网时代。韩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普及宽带互联网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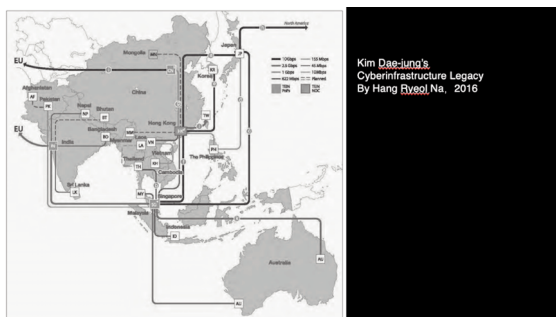
我的基本判断是，韩国的数字文化与中国地区有着微妙的不同：与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形成的自下而上的“发烧友”群体和创业精神相比，韩国的数字文化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动员。



在韩国的现代性中，信息社会被视为实现国家经济增长、乌托邦式的社会愿景，甚至国家统一的重要先决条件。自1997年韩国发生经济危机以来，信息技术作为社会曙光的愿景便开始传播，以努力克服危机、应对全球化的影响。

韩国政府推行了面向未来的信息政策，如1999年的网络韩国（Cyber-Korea）、2002年的电子韩国（e-Korea）和2006年的u-Korea（提升韩国现有资讯科技框架的战略）。先进信息社会的未来形象突出了科学思维的作用和技术发展对社会变革的影响，创造了对未来信息社会的想象。一个高度乐观的观点是，在融入理想化的技术发展阶段后，韩国将变成一个乌托邦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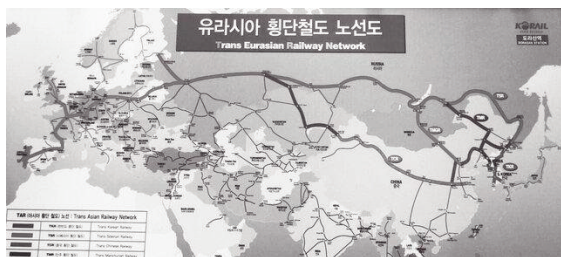
然而，这种信息社会想象背后的真正驱动力并非乌托邦社会，其主导形式源于独特的民族主义发展主义或发展民族主义（developmental nationalism）和强烈的工具性科技观。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种国家社会技术想象的特殊形式在韩国社会根深蒂固，体现为“科学建国”和“技术自力更生”的口号。



总之，没有任何政治团体、民间力量会质疑技术进步对国家和社会进步的意义，换句话说，技术发展主义是韩国最具有领导权的现代意识形态。这也使得韩国的科技发展道路缺乏人文主义思想的平衡。

不过，在不同总统任期内也出现过另类技术提案。例如，金大中在狱中受到增田米司和阿尔文-托夫勒的影响，构思并推动了跨欧亚信息网络（TEIN）的发展。2000年3月，金大中总统提议将欧洲和亚洲的研究和教育网络互联起来。他设想在亚洲和欧洲之间建立联系，目的是建立一个研究人员和教育工作者的国际网络。他设想的亚欧联系旨在加强首尔与欧盟的经济和文化联系（Na，2016）。作为首位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的亚洲领导人，他将 TEIN 描述为“网络丝绸之路”或“电子欧亚大陆”（Na，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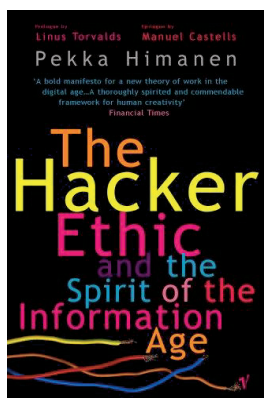
对金大中来说，TEIN 只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是“钢铁丝绸之路”——横跨欧亚的综合铁路网，打通南北韩之间的铁路运输，以及连接日本的日韩海底隧道。了解金大中的欧亚愿景与中国的“一带一路”之间的联系和差异，将为东北亚地区未来在信息和交通领域可能开展的区域合作提供历史资源。研究人员对于金大中在狱中的阅读如何激发了他对互联网的想法仍知之甚少。我将在这方面做更多的研究。



现在，我来做一些总结。

派卡·海曼（Pekka Himanen）在《黑客伦理与信息时代精神》一书中，总结了新教伦理与黑客伦理之间的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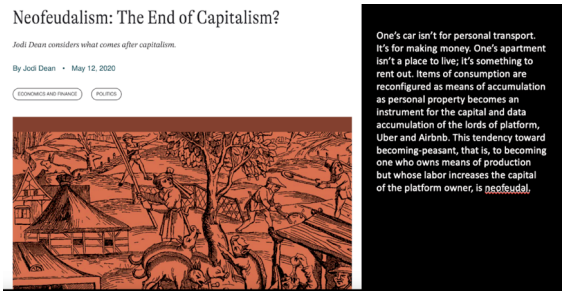
在新教伦理中，至高无上的善是赚更多的钱，工作和金钱本身都被视为目的。而在黑客伦理中，娱乐/激情目的远多于金钱目的，Linux、开源社区就是很好的例子，当然还包括创意共享。



在我看来，与黑客伦理相比，除了海曼（Himanen）提到的社会交往、激情和娱乐目的之外，人文主义在早期东亚数字文化伦理中也

占有重要地位。在这里，人文主义以更具集体性和共享性的价值观平衡了黑客伦理中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但在当下，黑客伦理和东亚数字文化伦理都已衰落甚至瓦解。剩下的是一种新的“技术封建主义伦理”——这种伦理不仅追求赚越来越多的钱，而且坚信数字技术平台应该向人们收取租金，而不是成为人类共享的基础设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共享变成了租赁。



但分析不应止步于此，更重要的是要回答这场变革究竟给资本主义带来了哪些结构性变化。

在此，我想延伸乔迪·迪恩（Jodi Dean）关于技术封建主义成为对消费者的惩罚的论述，即消费品被重新配置为积累手段：

汽车不是个人交通工具，它是用来赚钱的。一个人的公寓不是用来居住的，而是用来出租的。随着个人财产成为平台巨头、Uber 和 Airbnb 积累资本和数据的工具，消费品被重新配置为积累手段。这种成为佃农的趋势——即成为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但同时其劳动增加了平台所有者的资本——是一种新封建主义。

这并没有真正伤害到已经处于底层的平台劳工，因为他们并没有比过去失去更多，相反，由于平台资本主义的金融属性，平台劳工的收入甚至比工厂劳工有短暂的增加。扮演消费者角色的中产阶级确

从技术浪漫主义到技术封建主义——中韩早期信息社会的历史比较研究

实受到了伤害，因为当任何消费都必须通过平台完成时，中产阶级如今就是在为技术封建主打工。

### In reversal because of AI, office jobs are now more at risk

Aug. 25, 2023 at 6:00 am



1 of 2 Photos: Prologis, the head carpenter at Cirocco's studio, in Rome, Italy, on May 19. For now, with his carpentry work safe from AI disruption. (Credit: Corbis/Getty Images)



By CLARE CAIN MILLER and Courtney Cox

从这个角度来看，新的技术封建主义伦理确实痛恨传统的中产阶级，而也正是这个阶级即将迅速地被人工智能取代。这也是老的“工业资本主义”曾经承诺的“中产阶级时代”的终结。

结果就会像乔迪·迪恩所说的那样，出现一个主要由服务行业组成的普遍的下层社会，并且取代工厂成为斗争发生的主要场所：

在全球北方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中，大多数人在服务部门工作。一些人发现，他们的手机、自行车、汽车和房屋已经失去了个人财产的性质，变成了生产资料或收取租金的手段。由于被拴在他人所有的平台上，消费品和生活资料现在成了平台所有者积累财富的手段。我们大多数人构成了一个没有财产的底层社会，只能通过满足高收入者的需求来生存。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一份报告指出，在未来10年内，增加就业岗位最多的职业是个人护理助理，不是保健工作者，而是给人洗澡和打扫卫生的助理。统治阶级对清洁工、厨师、杂货商、收银员、送货员、仓管员等大量仆人的依赖表明，工人可以在新的斗争场所、薄弱环节发挥力量。

那么，东亚尤其是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的意义何在？

王洪喆

我认为，这是唯一一个中产阶级和数字文化在同一时间形成的社会和时代。这一特殊的社会结构变化与数字化的到来相互叠加，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为东亚信息社会曾经的人文氛围和发烧友文化奠定了基础。

而这种人文主义的衰落和技术封建主义的兴起，将与东亚信息未来的命运息息相关，值得我们继续持续观察和思考。



## 问答讨论

**Q1:** 我看到你提到了一些阶级分析，我想知道你在使用什么样的方法论，以及你的工作是如何受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影响的。

**A1:** 我认为这很复杂。对我来说，我可能更接近“韦伯-马克思主义”，我更注重文化解释，找到某种主体性来解释经济结果。这就是我的基本方法论，即从文化研究开始，但最后我希望能触及阶级分析和政治、经济分析。但老实说，我所做的工作是否有价值或合适，我没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但我仍在努力。

**Q2:** 我对你比较韩国和中国数字文化的历史轨迹很感兴趣，你说中国的数字文化是自下而上的，而韩国的数字文化是自上而下的，我很好奇，在中国自下而上地发展数字文化的背景下，你如何看待中国政府的作用？我很想了解国家在这种自下而上的发展中是如何定位的。

**A2:** 正如你所知道的，在民族国家在中国数字化历史中的作用这方面，此前的研究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这是目前学术界的主流。他们认为，从技术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中国九十年代的历史、数字化进程与韩国并没有什么不同，在某种程度上，韩国可以成为中国的老师或导师，因为他的数字化发展比中国早十年。因此，中国只是

照搬了韩国的国家政策制定和发展型国家手段。而对我来说，我想更多地关注社会进程和自下而上的可能性，以及探索现在的经济成果是如何被塑造的。相比于此前的研究，我希望在国家主导的技术发展主义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创新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来解释实际的历史结果。很抱歉由于时间，我没有对以前关于中国民族国家在数字化中的作用的研究进行更多的综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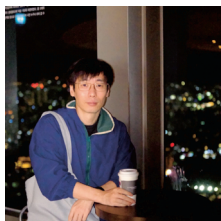
**Q3：**我认为您所展示的这种独特的技术发展时刻，伴随着中产阶级的增长，以及您所了解的九十年代的中国和韩国，是一种非常有力的洞察。我的问题是，今天，技术封建主义，也许正在一点点地彼此耦合。我对中国比较了解，你说中国的技术创新仍在飞速发展。但我认为近年来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产阶级正在增长，但增长似乎没那么快？围绕这一点，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想知道，你是否认为这完全是种挑战？还有我想问，韩国是否也面临着类似的现象，以及当今技术增长和中产阶级增长之间的分叉。

**A3：**是的，我认为两国之间的危机相似，韩国的情况更糟。因为在东亚，韩国比中国大概早 10 年。因此，韩国目前的情况就可能是中国十年后的情况。

在我看来，目前关于技术封建主义的讨论，并不足以扩展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判断力，而只是理想化地谈论平台合作化作为替代方案，但显然，这不足以给出解决方案，或者他们不敢给出解决方案，或者认为根本没有解决方案。

但对我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我认为数字平台仍然有可能被公共化以释放其潜力，成为像电力、天然气和水一样的基础设施。我们只收取使用平台基础设施的最低费用，而不是大量的租金。但民族国家可以是平台基础设施的所有者吗？这至少应该成为一个可以去集中讨论的关键议题，以开启对于技术社会想象一个可能的未来视野。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从社会的、技术的角度对可能的未来进行讨论、争论和批判。

## 讲者介绍



王洪喆（1983年出生于辽宁鞍山），媒介史学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聘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博士。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媒介技术史、冷战、控制论、信息社会和劳工研究。他长期从事以媒介为中心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艺术实践，同时是研究网络“北京媒介小组”和“游戏手册”的发起人，“拆东西研究所”联合发起人，目前生活和工作于北京。

## 板块二：流动的联结性

PANEL 2: MOBILE CONNECTIVITY



# 全球本土化亲密关系：来自全球南方的移动媒介化关系理论建构

GLOCAL INTIMACIES: GLOBAL SOUTH THEORISING ABOUT MOBILE MEDIATED RELATIONSHIPS

JASON VINCENT A. CABAÑES

编译 / 严正皓 井俱进 郑叶颖



大家好，很高兴在午餐后发言！希望我能在接下来的40分钟抓住你的注意力，陪我一起完成这次演讲。今天的报告内容让我有点紧张，因为我和我的合著者刚刚在上周写完这篇文章并提交给了期刊。所以你们将成为第一批“审稿人”。这次报告的标题是《全球本土化亲密关系：来自全球南方的移动媒介化关系理论建构》。我们已经在这个研究领域耕耘了一段时间，但这是我们第一次从“全球南方”这个角度来切入，真正专注于我们在这个项目中的视角或思维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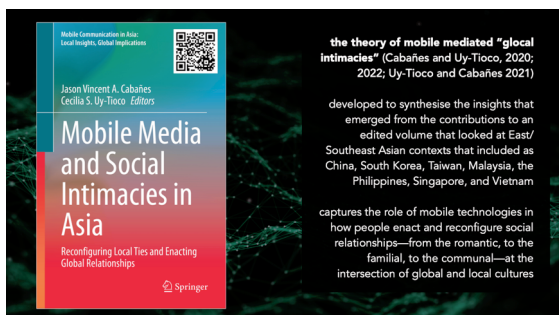


人们的关系呈现出越来越全球化的趋势，或者说，全球化的关系经验正在强化，大家需要在本土与全球之间找到平衡——因为这些关系往往具有跨国性或跨文化性。我们研究的关系类型包括浪漫关系、家庭关系等亲密关系形式，也涉及到社区关系。

例如，清迈的一些现象让我印象深刻，尤其在科技行业的创新者社区中。我发现这些社群中既有本地人，也有一种高度全球化的氛围。换句话说，即便在清迈，我们也看到了跨国和跨文化关系的全球本土化迹象正在加强。

另外一个我们关注的点是，人们往往会将“关系”认定为“私人事务”。确实它们是私人性的，但同时它们也是社会性的。这些关系总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规范或期待之中，比如如何谈恋爱、如何继续家庭、如何建立社区。所以，这不仅仅是由个体自主决定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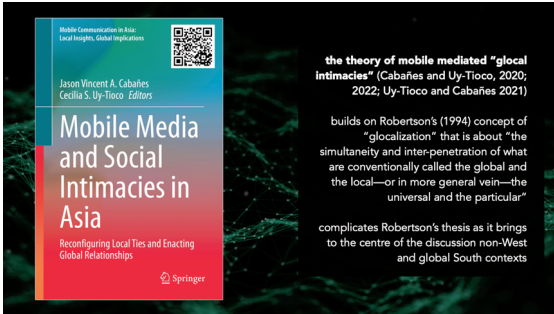
做这些事情总是与特定的社会动态进行博弈，很多学者都谈论过这个问题，我们也在这个领域做出了理论贡献。此外，移动媒介在这些亲密关系中的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东南亚和东亚地区，这一趋势尤为突出。移动技术的普及，使其在浪漫关系、家庭关系乃至社区关系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我们提出的理论叫做“全球本土化亲密性”（**glocal intimacies**）。这个理论最初源于我们在疫情期间开展的一个书籍编写项目。这是一本学术编辑合集，名为《亚洲的移动媒介与社会亲密性》（*Mobile Media and Social Intimacies in Asia*）。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扫描二维码，访问相关页面。这个理论大致是在我们完成书稿编写过程的后期逐步形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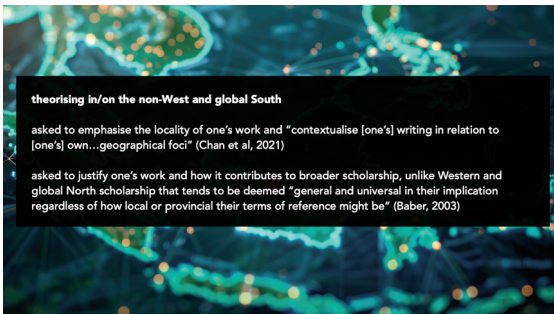
在阅读了接收的各章节投稿后，我们发现了某些模式，尤其是在讨论移动媒介、社会关系以及社会亲密性（*social intimacy*）时出现的规律。因此，最初这个理论的提出，旨在综合书中不同章节所呈现的观点与经验。

本书汇集了来自东亚和东南亚多个国家及地区的研究案例，包括中国、韩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越南等，涉及的话题非常广泛。该理论正是我们在阅读了这些文章后提出，并对移动媒介在人们如何处理和建构这些关系中的作用进行阐释。



在这种关系中，人们需要同时应对本土和全球动态、本土文化和全球文化的交织。这项研究最初是基于罗纳德·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关于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理论展开的。我们借鉴了他的观点，即全球与本土，或更广义地说，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同时性（simultaneity）和互渗性（inter-penetration）。我们希望探讨，在本土—全球的互动中，移动媒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对这个论点进行了深化，将非西方和全球南方的背景引入讨论的核心。这本书促使大家的讨论转向全球媒介和社会亲密关系，尤其是在东亚和东南亚的语境下。因此，今天我的演讲，正是希望思考我们如何建构全球本土化亲密性的概念，并将其视作全球南方理论框架下的一个具体概念，这就是我今天演讲的核心论点。



我认为，全球南方理论化中有两个关键议题。这两个议题源自我们作为学者在全球南方地区从事研究的亲身经验。我相信很多在全球南方或对全球南方进行研究的学者也有类似的体会。当我们将全球南方经验进行理论化时，往往会被要求强调研究的本土性，即需要明确指出其研究所处的地理背景，并说明该背景如何影响其研究问题、视角与结论（Chan 等人，2021）。而这往往是对非西方或全球南方学者的额外要求：他们必须“说明自己的地方性”并“解释为何这仍具有学术价值”，而西方或全球北方的研究学者往往不需要这样做。

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当我们首次提出全球本土化亲密性这一研究时，有批评指出，这种亲密关系的研究仅仅适用于菲律宾，无法推广到其他地方。我们必须反驳这样的观点。正如我们所解释的，这项研究综合自亚洲地区的多项实证案例，其适用范围远不止菲律宾。

另一个问题是，全球南方的学者常常被要求为自己研究的正当性辩护，说明其如何对更广泛的学术做出贡献，这与西方与全球北方的学术形成对比——后者的研究往往被视为“具有普遍性与一般性意义，不论其所依赖的参照系多么地方性或局部性”（Baber，2003）。比如，为什么在印尼或菲律宾做研究很重要？它如何影响我们对其他地区的思考？这与全球北方的理论有很大不同。许多来自全球北方的理论通常被假定具有某种普遍性，认为它们可以适用于世界任何地方，不管它们的参考点有多本土或局部。你很少会看到一篇学术文章开头写着：“我做这个研究是关于美国的，美国是一个重要的案例。”在研究美国时几乎不被要求说明，但如果研究对象是菲律宾或越南，就常常被要求阐明其“重要性”。

在全球南方的研究学者应该很熟悉这种情况：你必须解释为什么要研究泰国。你需要说明这和西方学术的关系，例如这里的某些情况如何不同等等。你总是需要不断地为自己研究的正当性辩护。这种

情况实际上加剧了地方化研究和传播的不平等，因为在全球南方写作时，你往往需要引用西方学者的研究，并说明你与他们的观点有何不同。而全球北方的许多学者却不需要这样做，他们的研究可以不参考全球南方的学术成果，他们的理论被默认具有普遍性。

因此我们的观点是，这一问题只有在仅针对全球南方学者时才真正构成不公。如果所有学者都需要进行这样的阐释与正当性辩护，或将成为一种富有成效的思考方式——将你的研究置于具体语境中，并展示其超越其所研究背景的理论价值。因此，我今天想要表达的是，这一实践其实非常具有价值。重点不是“我们被迫这么做”，而是“我们都应该这么做”，从而让我们的理论建构工作变得更加完善且严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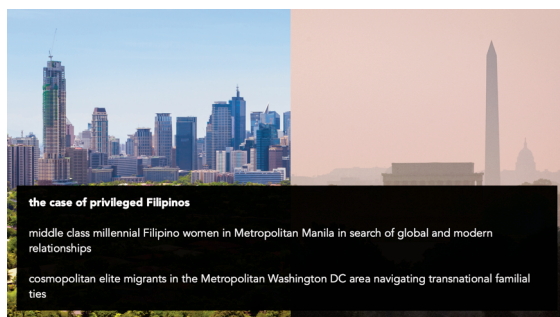


在我们对全球本土化亲密性的阐述中，始终明确强调其源自东亚或东南亚背景的这一特性。因为它源自这一语境，我们对此保持清晰的认识，也因此能够识别出其理论定位和局限性。全球本土化亲密性本质上是一个分析工具，用来帮助非西方世界和全球南方的人们思考其地方文化如何在持续且复杂的西方全球主导秩序中被重构。

例如，许多西方人可能并不关注非西方世界，但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我们却总是在与西方全球主流的标准进行比较。比如，当我们谈论浪漫关系以及移动媒介时，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浪漫关系是遵循特定社会规范被实践的，但同时又存在一种关于现代

爱情的观念——个人选择的西方式浪漫——也在影响本土实践。因此，我们往往动态地思考这个问题。正因为我们从这种语境出发进行理论建构，该理论本身也倾向于回应这种语境。所以，这种理论的形成受到了亚洲亲密关系中社会维度尤为突出的特质所塑造（例如 Devasahayam 与 Yeoh，2008；Fresnosa-Flot 与 Ricordeau，2017；Ikels，2004）。比如当我们谈到母亲的角色时，它在不同的亚洲语境下的社会意义不同。同时，我们共同的西方殖民历史以及与西方之间不断变化的当代关系的影响（例如 Ang 与 Stratton，2018），也深刻塑造了本土亲密关系的理论轮廓。

这种历史与当下之间的张力，始终在调整着我们的理论视野。我希望，当其他人在移动媒介与传播领域进行理论化工作时，尤其是全球南方的研究者，都应明确标注理论的生成语境，反思这些理论所带来的视角假设与思想包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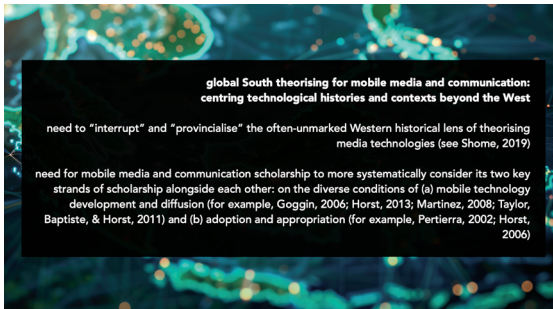
一方面，我们仍然对西方抱有崇拜，但另一方面，近些年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话语体系，比如“亚洲价值观”的概念，即亚洲正在崛起，而西方正在衰退。不论我们是崇尚西方，还是认为它在走下坡路，我们的思考始终离不开它。正是这些因素塑造了这一理论的发展。

为了使讨论更具体，我将聚焦一个具体案例，尽管这一理论来源于亚洲地区的多个案例。为了避免过于分散，我会专注于菲律宾的案

例，特别是我们之前关于菲律宾特权阶层如何借助移动媒介构建社会亲密关系的研究。

第一个例子是居住在马尼拉都会区的菲律宾中产阶级千禧一代女性，她们通过交友软件寻找全球化与现代性的爱情——尤其是外国伴侣，因为她们对保守传统且不成熟的菲律宾男性感到厌倦。在访谈中，一位参与者甚至向我道歉说：“抱歉，我知道你是男性，但请原谅我接下来的话。”作为采访者，我接受了她的坦率，并记得每次有类似主题的访谈后，我都会坐在咖啡馆反思：这是社会中的一种现实，尽管对我个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另一个例子是居住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菲律宾精英移民。他们试图摆脱菲律宾家庭的束缚，重新塑造自己独立的生活轨迹。通过这两个案例，我希望能够向你们展示全球本土化亲密关系理论的价值，同时也体现出全球南方视角的重要性。



接下来我将回到为这一理论奠定基础的语境背景。我想展示我们如何将语境作为理论构建的内在组成，使其既不声称具有普遍性，但同时能够对不同语境充分阐释，而具有适用性。理论的核心在于对语境的考量，而这种考量是我们理论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借鉴了后殖民研究的成果，从中获得关于如何从全球南方的视角进行移动媒介与传播研究的理论建构。有两方面需要强调：

第一，我们从后殖民研究中汲取到的重要观点是，需要打破并区域化（provincialise）通常未被明确标注的、以西方历史为基础的媒介技术理论视角（参见 Shome, 2019）。我们在回顾媒介技术的历史时，往往默认其发展路径是单一的，而这种路径通常隐含着以西方技术发展为范式。正因为如此，今天上午的一场讲座（指周蓬岸的“垃圾佬”演讲）让我感到非常有趣，因为它探讨了东亚数字文化的兴起，并将其与西方发展范式区分开来。这种视角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突出技术发展中更具相关性的语境差异。举个例子，我们借鉴了学者 Raka Shome 的研究，她指出印刷技术在印度的发展路径与西方极为不同，从而显示出媒介技术并不是单线性历史，而是存在多重并存的技术历史。当我们在全球南方的背景下研究移动媒介与传播时，必须考虑这些不同的历史。事实上，移动媒介与传播这一领域本身就已经在努力回应语境的多样性。

这部分研究大致分为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侧重于移动技术的发展与传播的多种条件，主要关注技术基础设施、政策架构等宏观层面的内容，也就是关于移动媒介与通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例如 Goggin, 2006；Horst, 2013；Martinez, 2008；Taylor、Baptiste 与 Horst, 2011）。这些研究实际上对语境的多样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并已经有许多相关的优秀成果。第二个方向则关注移动技术的日常使用与在地化适应（例如 Pertierra, 2002；Horst, 2006）。

如果说第一个方向讨论的是宏观制度与政策环境，那么第二个方向则聚焦于人们日常的微观生活实践——即人们是如何在各自社会文化语境中采用并再造这些技术的。这些研究同样强调语境的重要性，并且很多研究已经深入探索了这一点，例如，分析移动技术在柬埔寨的具体应用，或者其在缅甸的使用模式等。通过这种方式，这些研究揭示了移动技术如何在不同文化与社会背景下被赋予不同的意义。

移动媒介和通信领域的研究已经在关注多样化语境，但我们认为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如何将基础设施的语境化讨论，以及对使用情况

的语境化讨论这两种分析结合起来。这两者通常是分开讨论的，因此将它们整合起来确实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但极具意义。通过整合，我们能够更深入地展现语境的多样性，看到其不同的组成部分。这实际上也是Cecilia S. Uy-Tioco和我开始一起写作的原因，因为她更偏重于基础设施层面的研究，而我更关注用户使用层面。所以我们进行了对话，觉得或许应该相互交流，看看我们的不同视角如何互动。当我们理论化全球本土化亲密关系时，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两种视角结合起来，将它们作为理论化语境元素的一部分。



我们在这个理论中设定了三个分析维度，其中两个涉及我刚才提到的内容。第一个维度是数字接入（**digital access**）。数字接入的定义为：个体连接互联网的方式，不仅与其社会经济地位相关，也受到其所处地区可用电信基础设施类型的影响。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人层面，你有多少钱？你能有多少资源来创造一个让你与世界高度连接的技术环境？或许你听过一个概念，媒介丰富的环境（**media-rich environment**），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体可以同时使用许多不同的应用程序来处理不同的事情，就像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交流。身处这种环境的人，会有更丰富的媒介体验，而其他人则可能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这是个人层面。

第二个是所处地方环境层面。在菲律宾的语境中，我们的电信网络基础设施非常差。Cecilia的工作中提到，我们称之为“够用的接入”

(good enough access)，人们确实能上网，但接入质量并不是理想的状态。不管你个人有多少资源，都不得面对菲律宾这种“够用的接入”，这限制了我们的能力。而相比之下，比如在韩国，互联网连接无处不在，而我们在菲律宾却无法实现。这一差异部分源于地理条件，比如菲律宾有7,000多个岛屿，要建立完善的基础设施非常困难。此外，还有历史原因，比如我们的电信行业历来是私营的，这与我们的美国殖民历史有关。美国殖民者一开始就让电信行业私有化，这种做法一直延续至今，形成了“如果事情出了问题，就交给私营部门来解决”的思维方式。比如，我发现根据某些统计，菲律宾机场曾被评为“世界上最差的机场”，因此现在都交由私营部门管理。因此，在菲律宾，总是有一种倾向，就是将问题交给私营部门去解决。

这就是菲律宾的数字接入背景。回到之前提到的两个案例——中产阶级的千禧一代女性，她们试图通过寻找西方白人男性（她们在菲律宾称之为“afam”）来追求现代恋爱关系。“afam”一词的原意是“马尼拉附近的外国人”（A Foreigner Around Manila），但现在泛指菲律宾各地的任何外国人，而不仅仅局限于马尼拉。对于这些女性来说，她们确实拥有一定的资源，但无法与精英移民相比。我们称这些女性的情况为“热望的接入”（aspirational access）。她们通常能够访问到所需的资源，但无法长期维持高质量的网络连接——因为在菲律宾，互联网连接成本非常高。因此，她们会采取各种策略，比如去提供免费Wi-Fi的咖啡店，或者寻找包含数据流量的最优惠手机套餐。然而，她们仍需面对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于那些试图与“afam”建立关系的女性来说，这些“外国人”通常会在一段时间后返回他们所在的国家。因此，她们尝试维持异地恋关系。然而，这成为了一个问题，即使她们拥有智能手机和还算不错的网络连接，当她们尝试视频聊天时，画面会延迟，甚至会断线。对于精英移民而言，他们居住在美国等网络条件良好的国家。但问题在于，当她们与家乡的家人通话时，这些家人属于“够用的接入”群体。然而，区别在于，这些精英移民并不太在意网络问题，因为他

们有足够的经济能力随时飞回家——“网络不通畅？没关系，下个月我回家见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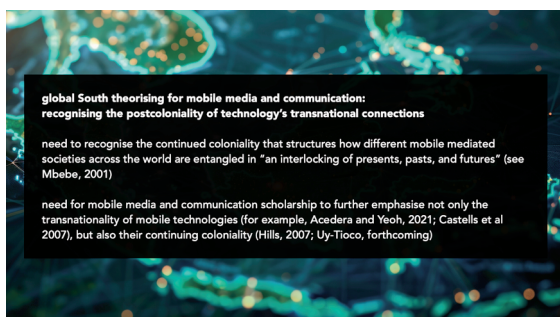


因此，数字接入确实至关重要。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提出了另一个维度，即“社会-技术动态”（**socio-technical dynamics**）。这指的是人们如何利用移动技术的可能性，以应对和调适他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一维度强调，人们可以利用技术来处理生活中的全球本土化亲密关系，尝试建立更全球化的关系。然而，归根结底，人们的社会语境仍然起决定性作用。你无法逃离你所嵌入的社会语境。例如，那些与外国男性约会的中产阶级千禧一代女性，她们或许能够建立这些关系，但最终她们发现——“西方男性仍然是男性”，他们不一定比菲律宾男性好。这些男性也可能有性别歧视，甚至带有种族主义倾向。这些女性通过技术（如移动技术）试图实现“数字飞越”（**digital fly-over**）——跨越本土的父权结构，直达更具吸引力的西方男性。然而，社会现实是：西方男性仍然是全球父权制、种族主义和厌女文化的一部分。

很多女性与我分享过她们的经历，其中最糟糕的一次是：有个外国男性提出与她通过Zoom聊天，她答应了。当时她的母亲坐在旁边，结果Zoom画面中出现的只是男性的生殖器。这令她的母亲震惊不已。在另一个聊天中，一个外国男性说：“哦，你是一个棕色女人，你是个拜金女，所有棕色人种找白人男性的都是拜金者。”她反驳道，因为她是华裔菲律宾人，所以说：“我不是棕色人种，

我是黄色人种。”这无意中又加强了菲律宾社会的种族等级体系。所以，尽管可以利用移动技术来塑造某种特定的关系，但你无法摆脱这些根深蒂固的社会现实。

对于我们提到的精英移民群体来说也是如此。他们会通过某种方式，比如确保父母的生活无忧，安排好相关事宜。而一旦完成，他们会尽量投入到自己独立的生活中。但不管怎样，他们始终无法完全切断远在菲律宾的家庭责任与联系。这种联系部分源于“孝道”——尽管他们可能已经在物理上远离家乡，但心理上却始终被家族责任所束缚。在菲律宾，还有一种观念被称为“永远无法偿还的感激之情”（debt of gratitude），意指母亲的养育之恩，这份恩情终生难以回报。所以这种情感纽带让他们无法真正的脱离家庭义务与牵绊。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后殖民理论对建构语境化理论的重要性。这种语境化需要认识到技术跨国连接中的后殖民性。一种持续存在的殖民性仍在结构性地影响着全球不同社会中通过移动技术媒介化的互动方式，而且它们交织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形成一种交织的历史经验（参见 Mbembe，2001）。这种理论主张，我们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殖民与后殖民经历，但这些经历彼此交织，需要在理论建构中被重视和强调。关于移动媒介和传播理论的许多研究已经关注到了这种基础设施的全球互联性，并探讨了殖民因素对这些发展的影响。例如，美国在塑造全球电信政策中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

尽管未能完全控制全球电信格局，美国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这一领域。当然，如今全球格局也在发生变化，比如中国也正成为电信基础设施建设重要参与者。因此，我们需要把这些转变纳入考量。

然而，关于移动媒介使用的学术研究通常强调的是跨国性（例如 Acedera 与 Yeoh，2021；Castells 等，2007）。比如探讨“被留下的父亲”如何与“在国外工作的母亲”沟通等，因此跨国流动视角在研究中很强势。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往往忽视了殖民性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人一开始会出国？这与世界持续存在的殖民性有何关联？（Hills，2007；Uy-Tioco，待出版）例如，那些接受高等教育却在其他国家从事家政工作的移民，这仍然是全球殖民动态的一部分。虽然已有一些研究涉及这一领域，但仍有更多工作需要完成。



我们提出的第三个维度称为“语境化的地方性”（**contextual locality**），旨在探讨如何更全面地分析移动媒介的学术研究。这一概念试图捕捉人们对“地方”（the local）的想象。例如，“地方”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它可能是你实际所在之处的物理空间，也可能是你所想象的家乡或共同体，以及他们如何应对这种地方性与全球性之间独特的交织与纠缠。

我们研究的精英移民中，“地方”对他们来说并不一定是他们实际居住的华盛顿特区，而是菲律宾的家乡——那是他们认知中的“本

地”，也是情感归属的中心。这种对“家园”的想象，使他们的生活始终与故乡紧密相连。这种“地方性”体现为一种双焦点生活（bifocal lives），即同时存在的两种生活：在美国的独立生活和家乡的家庭责任投入。这种“地方性”的动态形塑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对于他们而言，全球的象征是华盛顿特区，而“地方”则仍然是菲律宾的家乡。这也就是为什么菲律宾的中产阶级千禧一代女性与精英移民的经验有所不同。对她们而言，“全球”象征着那些外国男性，而“地方”则是大马尼拉地区——以及这一地区对她们人生选择的种种限制。这种现象与殖民性密切相关。菲律宾的浪漫观念深受殖民历史的影响，尤其是天主教信仰，它是西班牙殖民者带来的遗产。虽然菲律宾对这些浪漫观念进行了本土化的转变，但我们无法完全将其与殖民历史分离。因此，菲律宾今天的浪漫观，是一种交织的结果。它既承载着地方的独特价值，也深深嵌入了殖民性的影响之中，二者已密不可分。

所以我希望能够展示的一点是，在我们尝试构建移动媒介与传播理论时，摆脱普遍性假设，转而从具体语境出发，构建并论证其理论框架。我们需要时刻意识到我们的理论源自何处，以及这些理论所带有的历史包袱，但也要意识到它们因何而在特定的语境中具有价值。另一个方面是尝试将语境融入我们的理论构建中，就像我们在不同维度中所做的那样。我们希望这将促成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构建。我们始终意识到语境的重要性，以及这些语境如何紧密相连。在全球化的变迁中，我们的世界仍然深受到殖民性结构的影响。



## 问答讨论

**Q1：**我的问题不算是技术性的，更多出于个人好奇，尽管与你的人口统计背景无关。我想问你是否了解任何移动通信领域的相关做法？或者银行方面是否有改善这种背景的措施，以帮助减轻自然灾害的影响？除了与浪漫关系或生计相关的方面之外，菲律宾是否有

任何移动通信领域或私营组织，甚至是共同采取的措施，用于改善通信技术以帮助菲律宾减轻灾害影响？我知道这有点偏离你的主题，但也和移动通信及技术有关，因此还是冒昧请教一下。

**A1：**这部分内容没有直接包含在当前研究中，但我们在更广泛研究中确实也与菲律宾低收入群体交流，尤其是移民工人。因此，这是我们研究的一部分，但并未具体解决此问题。我知道有一些学者研究这一领域。例如，我在金史密斯学院的同事 Miracle 从事过相关研究。她的研究项目名为“人道主义技术项目”（Humanitarian Technologies Project），重点关注菲律宾发生的自然灾害，这些灾害与日益增强的风暴和台风强度有关。

在这个项目中，数字技术，包括移动媒介的角色非常有趣，因为它根植于菲律宾的具体背景。我知道 Miracle 并不会使用“全球本土化亲密关系”（glocal intimacies）这样的名称，但如果从这个视角来看，您会发现确实有可以分析的动态。例如，她提醒人道主义机构不要带着某种特定的干预理念进入菲律宾的电信领域，却不一定充分了解社会技术元素和动态。

举个例子，在她和合作者的研究中，提到了一种情况，即移动媒介被用于为非政府组织（NGOs）及其项目创造问责机制，这相当于一种反馈机制。但这并不完全符合菲律宾文化及其运作方式。通常的情况是，人们出于“走过场”的心理进行敷衍回应，以便获得资助机会。此外，还提到使用移动媒介来协调资源分发的情况。然而，最终的做法是将手机分发给社区领导人，比如村长（Barangay Captain）。然而，这位领导人却将资源私占有。由于他在社区中的权威地位村民们很难去挑战和质疑他。

这种情况清晰地显示出，重要的是分析援助的全球动态、人道主义技术，以及它们与当地规范和关系的交织。尽管我用的是另一个项目来说明，但通过这样的视角，您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动态在起作用。当然，不同的研究也会突出不同的方面。谢谢你的提问！

**Q2：**非常感谢你的演讲，我完全赞同你对研究背景的关注，尤其是对全球南方的关注。我说“我们”是因为我在香港工作，虽然严格来说香港并不算是全球南方，但我们总是需要解释和提供情境信息，而在底特律的人却从来不需要为底特律提供情境信息。所以谢谢你。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我理解有误还请指正：你似乎是通过一种符号层面的视角来进行理论化。我知道你把移动媒介看作是一种物质形式，但我在想，亲密关系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物质的？比如说，在那些平台上，人们不仅是通过符号互动，比如谈论彼此、经历剥削或者爱，还通过这些平台向父母转账，把这当作亲密的一个标志。是否有关于这些嵌套在多个平台层面的研究文献，探讨它们如何共同构成了亲密关系的概念？或者有以这种方式处理的民族志文献？

**A2：**哈哈，请不要对这个问题过于追问，其实这方面的专家是 Cecilia。所以我要借鉴我与她的对话内容，因为她的研究集中在数字金融以及移动设备的金融化。你说得对，这里面确实有很强的物质性成分。而且在她交流之后，我也发现我自己的关于移民的研究中，比如说国际家庭方面，也能看到类似的现象——手机的物质性如何与资源的不对称关系交织在一起。

通常情况下，海外的父母会用手机来试图控制家庭成员，这种控制并不总是负面的，而更多是为了维持对家人的某种影响力。例如，通过限制给孩子的通话时间或拒绝提供通话资费，或者控制寄回家的实际金钱。同样也可能出现在夫妻关系中，比如丈夫不告诉妻子钱的具体用途。

因此，这里面的物质性是非常明显的。而在 Cecilia 的研究中，她在研究精英移民的过程中发现，家庭资金如何在这些技术中被“调度”，实际上是重要的分析维度。因此，这种关系中存在的物质成分非常重要，它不仅支撑了这些关系，也往往强化了特定的不对称关系，尤其是性别上的不对称性。

**Q3：**我很好奇，您大概和多少人交谈或采访过，才能了解到菲律

宾，尤其是年轻人，更倾向于与外国人交往趋势？

**A3：**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在这项研究中，或者在我们进行理论化时，经常会有人问，我们是如何在没有最初一起完成研究的情况下提出一个概念的。这些是一些单独的研究，之后我们才将它们联系起来。因此，由于我们采取的是定性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我们并没有和数百人交谈——抱歉，我现在无法提供确切的数字，但每个项目大概是与20到30人进行的交流。

整个项目包括与年轻女性的访谈，以及另一组20到30人的访谈，针对的是精英移民群体。还有一个我今天没有提到的研究部分，是关于菲律宾移民家庭的访谈。所以，虽然我们并不是在声称我们的研究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我们努力确保能够对这一特定群体提供一些洞见。

对于每项研究，我们设定了明确的样本参数，确保样本的同质性，以便能够从这个特定群体中提取见解。

## 讲者介绍



Jason Vincent A. Cabañes是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后殖民媒体与文化专业的高级讲师。他的研究涉及世界各地跨文化团结与亲密关系的复杂中介。他还致力于研究数字媒体文化与全球南方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现实之间的关系。他是短篇专著《消费数字虚假信息：菲律宾人如何

应对种族主义和历史扭曲的在线政治内容》（Consuming Digital Disinformation: How Filipinos Engage with Racist and Historically Distorted Online Political Content）（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2023）的合著者，也是《亚洲的移动媒体与社会亲

密关系：重构地方联系并制定全球关系》（*Mobile Media and Social Intimacies in Asia: Reconfiguring Local Ties and Enacting Global Relationships*）（Springer, 2020）一书的合编者。他的其他作品见于《移动媒体与传播》（*Mobile Media and Communication*）、《新媒体与社会》（*New Media and Society*）以及《传播、文化与批判》（*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Critique*）等顶级期刊。目前，他正在撰写一本关于媒体与后殖民种族主义的全书，该书将由纽约大学出版社出版。



## 板块三：社会性媒介

PANEL 3: SOCIETAL MEDIA



# 数字行动主义与男性权益运动的民粹主义浪潮

DIGITAL ACTIVISM AND THE  
POPULIST SURGE OF THE MEN'S  
RIGHTS MOVEMENT

廖雪婷

编译 / 阮璐欣 郑叶颖 廖雪婷

我今天的演讲将重点关注男性权益运动，或者您可以简单地将其视为男权运动。这不是一项完整的研究，而是我在反思和撰写有关数字行动主义和中国厌女文化时的一些观察和想法。这里有很多初步的想法，其中一些部分我可能没有真正考虑清楚。如果您有任何反馈、意见和建议，帮助我继续前进并更深入地思考此处将讨论的问题，我将不胜感激。

我想从最近发生的一件引起全中国关注的事件开始，中国最大的电商促销活动“双十一”即将来临，很多电商平台几乎在一个月甚至两个月前就开始推出促销活动。许多平台选择与明星合作，其中最大的电商平台之一就是京东。然而，京东却因此陷入了公共关系危机。京东最初与几位明星签署了协议，其中包括一位著名的单口喜剧（或称“脱口秀”）演员杨笠，以宣传该平台的“双十一”购物活动。该活动于2024年10月14日启动，但杨笠在启动仪式上的出现很快激怒了许多京东的男性顾客，他们涌入该品牌的社交媒体账号，包括微博等平台，发表评论以表达愤怒。



The JD-Yang teamed up during the "Double Eleven" shopping spree

JD removed all the materials related to Yang ad issued an apology

杨笠是中国新一代女性喜剧演员的领军人物之一，她以嘲讽男人的自负而闻名。2020年末，她在一次网络节目演出中以“为什么男人看起来那么普通，却可以那么自信”<sup>1</sup>为噱头，讽刺了男人的自负，引发了热议。这个噱头本身变成了关于男人和他们的自负的笑话，并创造了一个新词“普信男”，意思是普通但自信的男人。这种基于性别的抨击使她成为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许多人指责她反男人、厌恶男人，甚至煽动对男人的仇恨。而京东以销售电子设备而闻名，根据市场调查，男性实际上占据了该平台用户数量的60%以上。

在社交媒体上，你会看到很多重复“普信男”梗以攻击杨笠的用户，认为她在此次活动中为京东代言是不恰当的。还有一些人指责该平台说，你们收男人的钱，给杨笠代言费。有些京东会员甚至要求京东退还京东 Plus 的订阅费，这是一个类似于亚马逊 Prime 的会员计划。因此，京东很快就在最初宣布与杨笠合作的四天后回应：10月18日，该公司从其各个平台的频道上删除了所有与杨笠有关的宣传帖子，甚至还发布了一份道歉声明。道歉信上写道：如果部分喜剧演员参与京东双十一活动给您带来了不好的体验，我们诚挚道歉。并且还表示，公司与上述喜剧演员没有进一步的合作计划。

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杨笠删除了自己微博中与京东双十一活动相关的帖子。实际上，即使在京东与杨笠结束合作关系后，这场争议仍在继续发酵。但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已足以说明我的观点。我对

追逐此事件的后续发展并不感兴趣，而是想指出在这场争议中目前出现的一些有趣的与本主题重合的部分。

杨笠成为京东双十一代言人的争议对于中国网民而言并不陌生，这是一种关于性别对立的叙事。甚至可以说，性别对立成了杨笠作为名人身上的一个标签或符号。尽管她从未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也从未直接宣传过任何性别平等问题。平心而论，杨笠早已习惯了争议。2021年早些时候，在英特尔中国的笔记本电脑广告中出现了她的身影，作为回应，大量男性用户主张抵制该公司作为反击，指责该公司与侮辱男性的女性合作。同年晚些时候，杨笠在微博上与豪华汽车制造商奔驰一起出现在一个短视频中，同样招致了强烈批评。而为了回应这段视频，一些自定为男性的网民攻击杨笠，他们认为这位喜剧演员是挑起男性仇恨和性别对立的关键人物，甚至呼吁抵制奔驰。因此，在所有类似事件中，性别对立已被大量引用，以指责那些煽动仇恨或挑起敌意，甚至仅仅是讨论这些性别问题的人。在网上搜索“性别对立”时，无论在哪个平台上搜索，可能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文字和图片资料。其中涉及到的问题包括：得体的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约会文化、亲密关系、婚姻，有时也包括性暴力、生育权、反女性主义。此外，你可能还会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阴谋论，指责外国干预中国的性别问题。



但我并不太关心“性别对立”作为一种话语究竟包含和涵盖了什么，而是试图思考这一话语凭借其在公共文化领域——尤其是数字空间

中的显著性、可见性和流行性——可以实现什么。性别对立的叙事实际上逐渐演变成了一种主流的、甚至是主导性的文化套路

(cultural trope)<sup>2</sup>，它使任何被认为破坏性别规范的事物陷入停顿，尤其是那些与异性恋传统 (heteronormative conventions) 和父权资本主义有关的事物。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还会发现，性别对立充当了恶毒的厌女症和反女权主义言论和行动的稻草人，目的是破坏进步政治。这种围绕性别对立的话语叙事本身是技术、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交织的结果，被一些人、一些机构甚至一些媒体用作武器，主要针对妇女和女权主义者实施攻击和暴力。这也是我开始了解男性权益运动的起点。

互联网、社交媒体和其他数字技术的发展曾一度备受赞誉，被誉为社会底层的民主工具。多年来，我们确实看到世界各地的草根阶层如何利用丰富的数字资源组织动员，通过各种平台开展创造性实践，并尽力培养进步的运动和政治文化。但与此同时，商业利益和反动政治议程在信息与传播技术发展中的渗透，也打破了我们对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乌托邦式的想象。数字技术、平台经济、父权的文化习俗、监管要求甚至媒体用户的实践，所有这些集合在一起，催生了一系列非常强大和具有压迫性的数字话语和行为，其中许多会被归类为性别歧视、种族主义、仇视同性恋或仇外心理等。

因此，如果我们同意技术是我们社会的一面镜子，它在被塑造的同时塑造着我们所处的文化。那么，技术不仅促进了融合、团结和多样性，同时也同样导致了分歧、不和谐和狭隘主义

(provincialism)，而这些则会严重阻碍关于解放、自由和社会正义的进步政治。在当代文化和政治格局中，男性权益运动与数字媒体和网络反动文化 (reactionary culture) (也可以说是亚文化) 的兴起密切相关。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术语是“男性圈层”

(manosphere)，或者准确地说，是“数字男性圈层”(digital manosphere)。它描述的是多样化但又支离破碎的网络社区，包括那些网站、博客、视频博客、不同类型的社交媒体账户、论坛、维基百科页面或播客，所有这些都共同宣扬反女权主义和厌恶女

性的言论和文化。这些网络社区可能明确或不明确地推动男权运动，但其重点是在批判或曲解女性主义的基础上，用基于反动的性别角色来构建男性身份。因此，我在这里展示了一些在中国占有一席之地的男性圈层的例子，它们也代表了我在深入研究男性权益运动或实践时一直关注的一些案例或社交媒体资源。

其中，名为“Morpheus红丸主义”的社交媒体账号，是中国受众了解男权运动流行思潮和组织实践，并向西方学习的重要信息枢纽。它从男权社群的角度翻译出版了许多教学资源，例如“搭讪艺术家”（pickup artist，台湾翻译为“把妹达人”，大陆俗称PUA），红色药丸（The Red Pill）、男人自行之路（Men Going Their Own Way），中文译为“米格道”（MGTOW）<sup>3</sup>和“非自愿单身者”（incel）。

在微信公众号平台上，有一个名为“觉醒者围炉”的账号，其发布的许多信息是对本土性别问题的分析和评论。这些分析和评论通常采用的是讲男性受害者化的故事讲述方式，结合反动和反女性主义的态度和言论。在中国的数字男性圈层中有一个臭名昭著的事件，即孙吧事件。孙吧是百度贴吧上一个流行的亚文化论坛，其数百万男性用户在该论坛上发布和交流关于女性的图片和信息，以一种恶毒而暴力的恶搞、诽谤、嘲弄和网络欺凌的方式对普通女性和女权主义者进行猎巫。在巨大的反对声浪下，百度删除了这些曝光帖，但该论坛本身仍然存在。还有一个例子：一些男权倡导者在维基百科创建了一个子页面，称其为“石头百科”。这是一个站在男性立场上记录中国许多性别事件的网站。因此，它侧重于收集部分性暴力事件的诬告案例、男性厌恶案例、对男性气质的攻击或男性在家庭和公共领域的受害情况等等。创始人认为，这是男性试图夺回话语权、改写历史的标志（男性圈层又称其为“岁月史书”）。所以，这是“他的故事”（his-story）。男性圈的论坛和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内容和主题也各不相同，但从根本上说，它支撑、支持和塑造了当代男性权利的倡导及其可能带来的暴力行为，折射出了在跨国背景下更广泛的社会现象。

在我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令我惊讶的是，男性权利的论述和倡导实际上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一些学者将其追溯到19世纪中叶，当时英国、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人权活动家和团体都曾参与其中。他们关注一系列影响男性和男童的问题，如男性无家可归、心理健康、暴力指控、法院的偏见、自杀、儿童监护权、国家或社区对男性住房问题的低资助、教育表现以及主流文化中的歧视等。美国学者认为，提高男性意识及其权利的论述和实践应被视为更广泛的普遍解放政治的一部分。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形成的大致情况一样，在这种解放政治中，主要思想并不是简单地促进男性权利，而是旨在使男性和女性共同受益。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种男权话语已经消失，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关于男性解放的话语在其内部分化为两条不同的路线。其中，较为保守和温和的一派成为了反女权主义的男权运动（Men's Rights Movement），简称为MRM。而较为进步的一派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更为深刻的运动，他们使用我们在许多女权主义运动中常见的语言，并承诺解决性别关系和权力问题。

前者作为男性解放运动中较为保守和温和的一翼，在当今获得了更高的可见性，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数字技术的普及和易用性（affordability）以及数字平台的兴起。2009年，男权活动家保罗·艾伦（Paul Allen）创办了一个名为“男人之声”（A Voice for Men）的男权网站。第二波”这一术语的使用当然与19世纪晚期至21世纪早期的女权主义或女权主义运动的浪潮无关。根据“男人之声”网站的使命声明，这一术语“表达了当下激增的（男权）活动，这些活动尤其独特之处，同时与之前的运动浪潮紧密相连。”这种承前且独特的运动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包括国家内部和跨国网络的建立、参与者在性别、种族、阶级和性取向方面的包容性，以及总体上反女性主义、反女性中心主义和反男性憎恶的立场。

但即便是这种MRM也呈现出一个光谱。一些人呼吁“和平、非暴力的运动”，其活动的核心是“改变文化叙事，而不是游说官员修改法律”——他们认为法律的设立本身就对男性存在偏见。而另一些

MRM成员则更多地与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包括阴谋论和极右翼思想，并庆祝和推动暴力行为，例如大规模枪击中的残暴杀害女性（femicide）以及基于性别的性犯罪。与MRM相关的许多恶毒和暴力话语及行为，主要出现在近年来的数字社区中，例如前面提及的incels以及其他特定文化背景中的群体。

总体而言，我们看到学术界对男权运动作为一种数字亚文化的分析有许多新的研究，但它仍然是一个研究不足的领域，尤其是在中国。因此，我确实找不到太多文献讨论作为数字亚文化或数字环境中的男性权益倡导问题。中国最受欢迎的男权博客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Morpheus红丸主义。他，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就称其为“它”吧——大约是在2020年底，它开始在流行的视频分享网站哔哩哔哩上传视频。在我关注的所有社交账户中，没有任何关于男权的话题、视频或任何形式的讨论早于2020年<sup>4</sup>。因此，根据我目前收集到的有限信息和资料，我谨慎地初步认为，男性权益倡导作为一种亚文化开始在数字媒体上形成或显现的时间大约在2020年。而我之前提到的喜剧演员杨笠也是在这一年创造了“普信男”这个词，并在此后引发了大量的热度和争议。这可能是一个巧合，但也可能是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积累的反动的反话语爆发了，并逐渐发展和演变成这种男权主张和一系列压迫行为和话语。男权活动家所创造的内容和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同行以及韩国男权运动的启发。男权运动的许多理论和经验资源都来自红色药丸和米格道，它们真正关注的是意识的提升和与女性普遍分离的生活。

于是，前面提到的女本位主义的思想被引入中国。他们翻译了许多男权活动家的YouTube视频，并将它们搬运到亚文化视频网站哔哩哔哩上。女本位主义作为一个概念，是过去男权运动中流传最广的主题和话题之一，指的是在历史或实践中对女性的主导性或排他性关注，这是一种单纯从女性角度、从女性立场出发的观点或叙事。他们在男权运动中不断辩论或提醒说，我们需要重新夺回书写我们历史的话语权。因此，反女本位主义是男权运动的基础。我认为韩国对此影响很大，一方面是因为中韩两国在父权制和社会等级

制度的性别政治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女权主义和韩国女权主义之间深入有效的交流，确实激起了这些国家男性的焦虑和愤怒。特别是近年来，有一套强大的女权主义实践模式从韩国传播到中国，呼吁女性超越以男性为中心并使男性受益的活动，包括不结婚、不生育、不谈恋爱、不与男性发生性关系、不消费厌恶女性的产品，拒绝偶像文化、拒绝宗教信仰、拒绝任何被性化和剥削女性的审美标准等等。因此，韩国和中国的男性都认为，他们被歧视性的当成了性压迫、强奸文化和性别暴力的罪魁祸首。学习韩国男权运动的反击方式，可以为中国男权活动家提供评估其数字战略的线索，特别是在组织、动员和有效打击他们认为非常以女性为中心或只有利于女性的言论、政策和做法方面。

总的来说，我观察到男权倡导者的两种主要做法，一种是在数字经济中恰当地利用微型名人或微型企业家的整体理念，创建另类媒体，从不依赖任何主流媒体，并提供以男权为中心的内容。这种做法就像任何希望拥有影响力的文化的人一样，通过提供信息、发表评论、倡导和与追随者进行讨论，在受众中建立信誉和信任。这一套做法，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让人觉得男权倡导既是失败者文化（loser culture），又是一门生意。另一种做法则体现在他们创作和传播的内容中，以及他们与自己的受众建立的社群和关系中。在这些内容和社群中，男权活动家或倡导者试图为自己和受众提供一个非常具体的社会身份，将自己和观众呈现为反主流文化中的社会弱者。这种社会弱者叙事通常利用两种道德或话语资源，其一是民族主义，其二是所谓的草根和反精英主义，或反资本主义。我们可以从中国数字空间的任何公开讨论中获取这两种符合中国式政治正确与道德标准的论述。

在男权宣传中使用这两种资源几乎完全符合荷兰政治学家卡斯·穆德（Cas Mudde）对民粹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定义：争论发生于纯粹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之间。在中国的男权倡导运动中，就是作为社会底层的纯洁男性与腐败的女权主义者，或以消费主义为导向的坏女人之间的对抗。于是，倡导男权就成了代表人民普遍观点的政治

立场。同样是意识形态，它确实需要依赖更宏大的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才能发挥作用。在男权运动的许多案例、论述，以及衍生的后期视频中，都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观察到，倡导男性权利往往与将女权主义与外国干涉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也让我们注意到许多所谓的爱国博主和有影响力的人，他们以民族主义和反女权主义为中心进行微创业。我并不是说他们都是男权倡导者，但这和男权活动家利用这些话语资源来建立自己的叙事和身份并进一步与其社群共享的方式十分相似。我们或许可以从杨笠-京东的案例中看到，长期以来，杨笠一直被指称与所谓的西方力量有关，因为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了她整个职业生涯中的噱头和争议，而男权倡导者则将这些争议视为对杨笠及女权主义的民族主义攻击，他们通常还引用性别对立的话语和套路。

这里的反女权主义并不是沿着继续叙述男性受害故事，或者女权主义者或女性如何剥夺男性权利的逻辑，而是试图使用民族主义语言，将女权运动与旨在分裂中国、威胁中国人民和社会稳定或安全的外国干涉主义结合起来。这两种话语资源在中国语境中都是政治正确的，也得到了党和国家以多种不同方式的明示和暗示。维护这种道德叙事即获取话语资源，媒体平台通过其内容监管和治理也体现了这一点。微博、微信、哔哩哔哩、知乎、虎扑等平台在为公众提供讨论空间的同时，也在努力平衡意识形态和商业利益。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提出的，有毒的男性圈层在中国高度可见，或者就是我所说的厌女症平台化。在这里厌女症不仅是一种表达形式或活动，而且是一种治理形式，一种基于平台的技术驱动治理：科技公司、媒体机构、数字平台和媒体用户非常明确的同意和合作，同时借用如父权资本主义、家长制下的专制主义、外国干涉主义、反女权主义等意识形态共同形塑平台内容、影响公众讨论。因此，男权倡导可能是国家-市场综合体（state-market complex）中此类现象的最新迭代。我在这里使用的国家-市场综合体这一概念是受军事-娱乐综合体（military-entertainment complex）的启发，其分析最常见的用途是军队与娱乐业之间的互利合作。我引用这个类比

来说明数字技术、平台经济、父权文化、国家监管和媒体用户实践之间的勾结。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组合，而数字平台在监管内容方面的商业运作机制通常会鼓励上述性别对立或有关性别的对立讨论，尤其是涉及女权主义者时。它们确实为男权叙事铺平了道路，并催生了大量与性别对立的文化套路相关的讨论。

我有两个例子。第一个是有关微博：微博遵循国家监管政策和指导方针，试图通过微博社区协议来巩固其治理，该协议建立了三层自我监管机构<sup>5</sup>来处理违规行为和惩罚。但举报、过滤、列入黑名单或暂停账户的机制，很大程度上隐藏在众所周知的黑匣子中。当直言不讳的女权主义者身处争议中，而争议本身最初集中在公共场所吸烟问题上时，微博首席执行官王高飞出面提出建议，指导用户通过举报这些账户煽动仇恨和性别歧视，删除那些分享女权主义观点的账户，无论这些帖子的实际内容是什么。该指令显然是由公司负责人发出的，但通常由用户实际执行，以促进内容审核和微博监管的执行。在这些情况下，它似乎承认用户之间存在高度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那些引用反女权主义的人确实得到了平台的认可，甚至在实践中变得更加强大。通过认可这种反女权主义和网络喷子的活动，并消除他们发布暴力言论的障碍，平台确实鼓励了他们的行为。

在另一个案例中，搜索引擎百度故意屏蔽了贬损男性的话语搜索结果，同时保留了其对立项，即厌恶女性的话语。当我在百度搜索了一个厌男词汇“蝮男”，结果显示没有相关内容。而当我尝试搜索另一个厌女术语“蝮女”时，则显示出了一系列的结果。其中置顶的结果是一个知乎帖子，指责女性煽动性别对立。当然，这个结果排列顺序可能是因为我百度上的数字痕迹（即经常检索性别议题）导致算法把性别对立的内容放在首位推送给了我。尽管搜索“蝮女”产生的结果并非都与这个词本身的厌女含义相关，但这两个搜索结果的不同可以让我们看到：百度本身通过屏蔽贬损男性内容，同时保留厌女内容可见的做法，让我们了解媒体平台是如何操纵其宣传或谴责某些价值观、意识形态和叙事。

在这次演讲中我从一场争议开始，一位女性单口喜剧演员杨笠因为与拥有大量男性用户的电商平台京东合作而遭到许多男性网友的强烈反对。然后我考虑性别对立的文化套路，以及它如何从有毒的数字男性圈层演变而来，通过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男权倡导联系，最终培育男权运动。我还试图展示中国如何以微名人和影响力文化的实践为中心，试图从数字经济中受益，同时依靠民粹民族主义和草根反精英主义或反资本主义两大道德话语，突出他们的整个议程。最后，简要提及我之前关于国家市场综合体的研究工作：其中社交媒体平台、父权文化、监管和法律、以及媒体用户实践的结合都与男性权利的论述和实践有关——阐释这个综合体如何压制女权主义表达或多样化表达，并滋生、助长仇恨和厌女文化。

由于篇幅、时间以及本人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力量有限，这里仅讨论男性权益运动的一个粗略内容。我甚至不确定是否可以将中国的这种现象称为一场运动，这样称呼可能有些牵强。对于许多倡导男权的著名影响者或流行视频博主来说，松散的男权网络和反女权主义联盟可能无法发展成为一场组织良好、协调一致的运动。他们的追随者群体通常相对较小，大多数在 10 到 20,000 人左右，但单个帖子或视频的评论可能会达到数百万。在中国，男权倡导者无法真正在街头动员任何抗议或示威，这与启发他们的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或韩国的同道兄弟不同。由于数字平台所坚持的利基市场策略，此类宣传的规模和范围也可能受到限制。

但讨论这一现象就是试图证明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国家-市场复合体为此类现象发生所奠定的众多隐性或显性的基础，这都需要更加仔细的拆解。这并不是要将我们在性别和数字文化方面存在的问题归因于任何男性、女性个体或团体。

我想说，男权倡导是平台政治与意识形态、用户参与和文化价值观相结合的产物，所有这些共同催生了这种真正普遍或暴力的话语，并培育了有毒的数字男性圈层。在倡导男权的话语中，许多活动者并没有解决维持不切实际的标准和任何刻板观念以及男女性别角色

的结构，而是倾向于结成联盟来对抗女权主义者和其他女性，并用一些我们认为性别歧视、厌恶女性、恐同、有时甚至是沙文主义的方式采取行动。这就像将男权视为人权一样，显然是挪用了女权主义的话语和策略。围绕男性权利的整个话语被社会资源的权利和政治乐观主义所取代，这确实将整个男权倡导运动与父权资本主义以及我称之为家长式威权主义的东西无缝地缝合在一起。



## 问答讨论

**Q1:** 我希望我理解的是正确的，您在演讲中提到在“第二波男权运动”中，他们也在尝试使用包容性的语言。所以，我想知道当他们在网上创建内容时，是否也会推出支持他们的女性？或者，如果不是真正的博主，他们是否有内容谈论女性如何理解可能存在的问题等。我真的很好奇这一点以及他们如何实现这一点。

**A1:** 是的，大多数的英语圈男权运动使用包容性的语言。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并不真正单独出现，不只是男性支持这场维权运动，女性也受到欢迎。事实上，我们可以从这些活动人士在网上发布的许多视频中看到，他们还倾向于邀请许多不同的群体为他们发声。所以，“他们”包括女性。我们看到许多更偏向于保守派的女性，她们会同情男权运动。这是一种被仔细包装的类似西方背景下的男性权利的话语。其中一些并没有真正走向那么极端，而是主张以人权原则为中心。我认为非常有趣的事情之一是他们促进了一种对两性都有利的环境。这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方式，就像西方当代男权运动中的一种叙事或策略。一部有争议的纪录片《红色药丸》（The Red Pill）也描述了许多男权活动人士的这种现象。这是相当矛盾的，并不是我们经常想象的那样：一个有着愤怒面孔的男人真正诉诸暴力行动来呼吁男性权利。

**Q2:** 您认为哪些人群在中国变得（在“男权运动”中）活跃，以及

在美国的情况如何？您认为可以采取哪些策略来反对这种情况，也就是您所说的民粹主义？

**A2：**为了了解这些人的概况，我想说，正如我在西方、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所观察到的那样，与韩国或中国的情况相比是非常不同的。在许多西方背景下，他们中的大多数实际上都有公开活动的公众形象，他们可以走上街头，他们在倡导特定的议题。如果您只是在 YouTube 或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研究男权运动，它会给您一个列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非常公开的。在韩国，它既有公开性，又有点附加的匿名性，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但在中国，我们通常没有公开的面孔。也许因为它仍然很新，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有着一般模糊的意图，并且没有任何公开言论，或者这可能也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文化并不真正鼓励此类活动。我们不允许在街上进行实际的抗议或示威，但在美国或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我们实际上看到了男权活动家与保守派政党阵营和极右翼分子结成非常强大的联盟甚至是运动，包括我谈到的非自愿单身者和米格道。这些都是知名社群，拥有公众形象，有时甚至得到许多有争议人物的认可。这确实支持了许多极端主义意识形态、阴谋论，但在中国情况却截然不同。我无法真正确定他们的公众面孔，也许就像我提到的两个帐户一样，一个是Morpheus红丸主义，它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有不同的帐户，并且在线快速搜索很容易将人们指向这个特定的公众号或中国男权运动的象征，他们基本上只是发布和传播很多有关男权运动的资源的观点角度，就像是不同媒体上的教育资源一样。

**Q3：**您了解他们的年龄吗？您所讨论的是哪一个年龄群体？

**A3：**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我想根据他们使用的媒体来猜测，他们中的许多人喜欢使用哔哩哔哩，该网站的受众群体更加年轻，年龄在 20 多岁或 30 岁出头，其中许多人沉迷于日本动漫和漫画，也是这个网站起初的文化背景。所以，这是我的猜测之一。另外，在他们传播的一些视频中，你会真实地看到讨论这些问题的人，从我看

到的图像来看，他们中的许多人看起来 30 多岁，甚至更年轻。通常我会相信这是一个更年轻的群体。

**Q4：**您刚刚也讲到在中国有很多男权主义者或者说 incel 男，他们经常觉得中国互联网上的男女对立是境外势力挑起的，但是同时他们又比较追随埃隆·马斯克这样厌女的国外精英阶级，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民粹主义，因为这挺双标的。而且像马斯克这种明确发表过厌女言论的人都能成为名人，很可能因为他手里掌握着社交媒体。并且在刚刚的美国大选里，特朗普也当选了，美国女性的堕胎权又受到了威胁。其实有很多中国女性还是比较关注美国大选的，因为在我们自己国家出一个女性领导人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连美国的女性领导人都竞选失败了，很多中国女性挺失望的。您觉得这是不是美国乃至全球的女权主义的一个倒退？我们要如何应对这种精英阶级，比如说掌握着社交媒体的人和统治阶级领导的越来越浓的这样一个厌女氛围？

**A4：**这个问题非常好，也非常大。首先我觉得你的观察是对的，全世界不管是在哪个国家都面临一个巨大的右倾转向，这个当然不仅仅是影响到政治层面，还有社会生活文化。选举是这整个右倾的一个侧面，但我并不认为说这就是全世界女权运动的一个倒退。可能我们暂时处在这样一个社会文化情境下，你感觉到的声浪或者你能体会到的这种明显的政治焦虑，会让你觉得女权运动逐渐失去了阵地，包括美国最高法院对堕胎权的推翻，以及全球其他各个国家，比如说伊拉克等地区的妇女权益受到了很大的威胁。

但我还是认为尽管在这样一个极其艰难的局面下，世界各地的女权组织和女权主义者还是有在做各种各样的努力。最近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的学者谭佳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缓慢抵抗》<sup>6</sup>，她利用研究环境问题里的一个概念，描述威权主义国家下女权主义的反抗是怎样的形式，她把这个名字命名为“slow resistance”，即很缓慢的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有时候甚至不可见，它可能不是发生在一些显性的社交媒体，甚至可以有公众面孔（public face）的地方，可能

更多呈现为社区当中的互助或者说一些不在公众视野范围内的微小改变。

我自己比较赞同这是我们会面临的一种境遇，我们可能需要调整女权主义运动策略，同时去思考、花时间去沉淀，什么样的策略、什么样的方式更能应对当下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最重要的一点还是不能丧失信心，因为女权运动发展本身就是走一步退两步，但不能因为这种情况，我们就放弃了希望。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任何一个权力，无论男性女性，其实都是建立在前人不停的努力下，所以我不觉得这是女权运动倒退的表现，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做的很微小的一些事情，可以一同度过这样一个局面。

**Q5：**我也对中国女权运动及其竞争对手男权运动进行了一些研究。所以，我个人很好奇您对中国激进女权主义的看法，比如中国的“激进女权”，就像是一种“激女团体”。在这样一个充满性别敌对叙事的文化背景下，有哪些有效的策略可以用来抵消和促进性别平等的讨论空间？

**A5：**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是在问我对所谓极端女权主义以及对抗对她们发出敌意的策略的看法吗？首先，我认为即使是所谓的极端女权主义或“激女”团体，仍然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范围，涵盖各种意识形态。更深入地说，这些女性也有一些共同的目标和追求。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们看到性别对立成为一种文化套路，专门针对这一群自称为“激女”、极端女权主义或激进女权主义，或源于第二波女权主义的拥护分离主义意识形态的网络活动人士，我不认为网络空间中真的会出现“激女”想要推动的那种非常理性、非常和平的讨论。我对数字媒体尤其是中国的整体公众讨论并不十分乐观，我认为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空间：这里的任何公开讨论都需要保障绝对的政治正确，而女权主义已经被淘汰，无论你是极端女权主义者还是偏向保守或温和的女权主义者。

我不认为数字媒体可以提供空间进行真正理性地讨论这些问题，这

也是为什么我发现在某些方面我们可能并不仍然想坚持促进数字空间或数字行动主义。相反，这可能是重新思考或重新配置我们建立的社会性的好时机。人与人之间，我们也可以开始以一种真正具有人际联系的方式重新思考事物，而无需诉诸数字媒体。虽然我正在研究数字行动主义，但我不得不说，在这种背景下，尤其是现在的中国，有很多限制以及更加威权。那么，这也回到了上一个问题，当时我提到谭佳关于“缓慢抵抗”的想法。这并不是要在数字媒体上提供新的策略，而是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旧媒介中的人性和社会性如何帮助我们推进我们的政治议程。而这其实也有很多方面的实践，当我研究数字活动家文化时，我了解到有些人开始进行更多的面对面实践，例如建立一种共生空间，并且它就是真实的空间，无需在网上进行更多讨论和宣传，而是在实际上开始培育社会空间。还有其他类似的女性团体在组织着不同类型的活动。事实上，邀请人们聚在一起，参加观鸟、徒步旅行等活动，但这是一种非常具体的建立联系和联盟的方式。这不仅仅是一场我们努力赢得的话语战，我认为这从根本上回到了如何以更加缓慢和传统的方式建立联系、联盟和团结的问题。



## 讲者介绍

廖雪婷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媒介研究专业的助理教授。她是一名媒体学者和女权主义者，研究数字媒体、女权主义、全球化和东亚



流行文化的交叉领域。她目前正在从事数字女权主义运动以及中国厌女文化的理论化与写作工作。

1. 编者注：原话为“男人不光美好，还特别神秘，就是你永远也猜不透他那小脑袋里，到底在想一些什么。就是他明明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普通，但是他却可以那么自信。”
2. 译者注：文化套路（cultural trope）指用过度简化的方式去描述或代表某种文化。
3. 编者注：男人自行之路（Men Going Their Own Way），简称米格道（MGTOW），是一场以网站、论坛和社交媒体等虚拟社区为平台、以匿名男性用户为主体、倡导男性解放和自我所有权为口号的男性主义运动，致力于告诫男人杜绝与女人发生严肃认真的恋爱关系，特别是婚姻关系。
4. 作者注：作者在追溯的过程中发现了2017年的一些文字讨论。
5. 译者注：三层自我监管机构指用户自律、平台审核、第三方监督。
6. 编者注：Tan, Jia. 2024. “Slow resistance: Feminist and queer activism in ‘illiberal’ contexts.”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 平台、劳动与中介动态

PLATFORMS, LABOR, AND  
BROKERAGE DYNAM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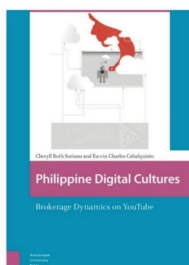
CHERYLL RUTH SORIANO

编译 / 叶云鹤 郑叶颖

今天，我想从我的书《菲律宾数字文化》（*Philippine Digital Cultures*）的一个片段开始讲起。这本书是与Earvin Charles Cabalquinto合著的，它也预示了我今天将要讲述的内容。

*brokering (labor)  
aspirations in postcolonial  
Philippines*

---



Carlos Ubaldo满脸自豪地宣布，他的YouTube订阅者数量达到了一个里程碑——他作为一名在线答疑者赚取了百万美元，并向大家展示了他的月收入、新车以及现代化的设施。Carlos兴奋地表示，他做出了最好的决定，辞去了全职呼叫中心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平

台工作中。他鼓励他的订阅者们，只要付出努力、坚持不懈并具有创业精神，他们也能取得同样的成功。

他从2011年开始在劳务平台上作为书籍章节作者起步，现在已成为数字营销和虚拟助理领域的专家，与多个来自热门劳动平台Upwork的客户合作，并为数百名菲律宾平台工作者提供指导。早在2016年，Carlos开始为想要学习如何开始在线自由职业的朋友们组织培训课程。现在，Carlos经常在自由职业者活动中发表演讲，组织快速指导课程，主持他的YouTube频道指向在线自由职业引导，并运营一个由自由职业者、当前学员及其网络朋友组成的Facebook社区。他的YouTube频道现已扩展到TikTok，定期发布于如何在自由职业世界中生存和发展的视频，具体包括如何与外国客户建立信任、如何用收入赚取利息等。现在，在获得了一系列稳定客户的大型项目后，他拥有了一家自由职业者机构。

Carlos现在在平台、客户和其他求职者之间充当中介的角色。由于受制于基础设施的非流动性<sup>1</sup>、低工资等就业规则，在菲律宾，无数像Carlos这样的能够熟练运用数字媒体技术赚取收入的自由职业者等专业人士正在转向在线平台，以换取自主权、空间灵活性和更高的收入可能性。

因此，我将数字劳工、社交媒体、文化生产以及影响力塑造实践置于平台介导型工作以及菲律宾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现实的背景下进行考量。我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介入我们对数字劳工中社交媒体的理解：

Platforms, labor,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from the South*



首先，通过描述中介角色的崛起，我们称之为数字劳动经纪人（digital labor brokers），他们由社交媒体介导，并在全球平台劳动市场中发挥作用。这一描述也试图将全球平台置于平台劳动分析的中心位置，并与近期的文献相呼应，例如Niels van Doorn和Jelke Bosma所称的“实际存在的平台化”（actually existing platformization），该概念关注构成平台重要组成部分的周边事物<sup>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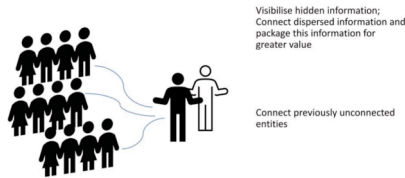
其次，我重点分析了作为合作过程的理想化逻辑和社会平台的特定中介过程，这一过程以当地合作文化和道德经济为支撑。在这里，我与关于“微名人”（micro-celebrities）<sup>3</sup>和“影响者”（influencers）<sup>4</sup>的主流文献进行了对话，例如Crystal Abidin和Brooke Erin Duffy的重要文献。但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深入关注了工人阶级媒体背景下影响力的构建方式，包括始终存在的脆弱性、地方文化交融以及后殖民期望。

另外，以交叉平台为基础<sup>5</sup>，我考察了菲律宾在线自由职业和云工作/远程工作的组织方式的演变。这超越了传统的客户、平台和工人之间的三方模型，进一步揭示了平台经济背后复杂的本地劳动组合网络。

我从2016年开始在菲律宾云工作场景中进行了三波民族志田野调查，到现在已经快10年了。第一波是在2016年和2017年；第二波是

在2019年到2020年，当时Jason Cabanes还在德拉萨大学工作；目前第三波，我们更密切地关注社交平台、劳动平台和金融科技平台的交集。

### Brokerage (Stovel & Shaw, 2012)



我不想过多谈论中介（brokerage）的概念。我借鉴了Stovel和Shaw关于将中介概念化的研究成果，并遵循他们的建议，探索中介角色在不同结构中的表现形式。中介在促成社会、经济和政治交易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当信息受限且分布不均时，便有可能给中介提供机会。中介首先会从多个来源搜集关键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整合起来，以吸引那些难以自行理解这些信息的客户，从而为自己的工作增添价值。但除了使这些信息变得有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中介通过连接原本没有联系的个体来创造价值，从根本上推动了新的连接的形成。尤为重要，在社会结构中，中介利用公共机构效率低下所产生的漏洞，使那些断开连接和孤立无援的个体能够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进行互动。中介业务的核心在于那些政府和公司甚至都无法察觉和正式控制的经济交易，其可以表现为一系列与本地基础设施相关的非正式经济交易的本地化替代服务。

在菲律宾，中介业务的设立在不同的经济甚至政治进程中通常备受重视。在我们普遍存在的庇护人-依附者关系导向中，中介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它成为了社会服务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桥梁。这种现象在移民问题上尤为明显，移民问题已被广泛研究。许多来自菲律宾农村地区的人会寻求移民海外，却不得不对重重困难，比如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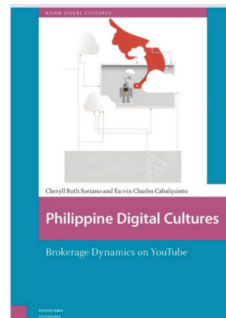


以往的经验，探索如何建立情感网络，并更细致地观察情感究竟是如何联结的，分析为何这些影响者能产生实际影响力，以及他们究竟如何达成这一目标的。接下来，我们从不同层面来分析这个问题，包括女性主体性（feminine subjectivity）、跨种族关系（interracial relationships）、世界级劳动（world-class labor），以及政治因素。但在本次演讲中，我将重点聚焦于劳动力，以便更加集中地探讨这一话题。

**Brokerage of (postcolonial) aspirations in networked Filipino publics**

- Self (feminine subjectivity)
- (Interracial) relationships
- (World-class) labor
- Politics (and progressive governance)

Context: (1) Postcolonialism; (2) Neoliberalism; (3) Networked publ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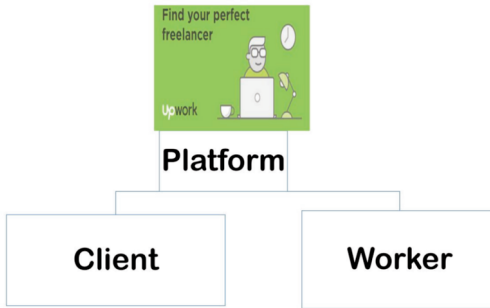


近年来，菲律宾的平台劳动工作出现显著增长。政府积极推广平台工作，视其为解决失业、劳动力迁移、业务流程外包和庞大的非正规部门等问题的重要途径。在菲律宾，从事平台工作的人通常被称为菲律宾自由职业者（Filipino freelancers）。他们已成为云工作平台上最大的劳动力供应群体之一，并在全球不断增长的零工经济中占据领先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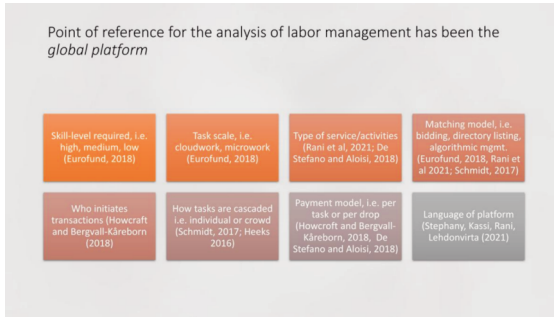


**The Philippines: “world-class” service labor for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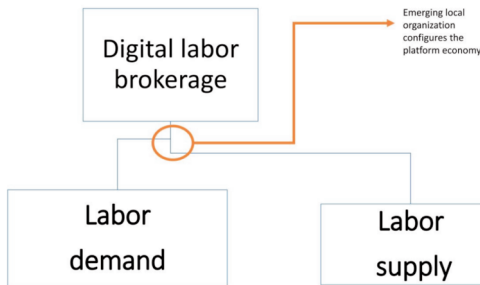
与许多海外移民和业务流程外包 (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工作者所处的不稳定环境相似，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了平台工作同样存在不稳定性。然而，在菲律宾，云工作仍被视为一种可行且具有吸引力的职业选择，这主要是由国家的迫切需求所驱动的。回顾以往，政府从鼓励菲律宾人成为移民工人，到全面接纳业务流程外包，再到将平台工作视为解决失业问题的关键途径并大力推广，这一转变使得平台工作日益普及。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模式，即政府无法从结构上解决就业问题，而是推动菲律宾人抓住全球劳动力市场中的新兴机遇，不论这些机遇的本质如何，也不考虑工作环境或员工福利的状况。菲律宾的平台工作者已被国家政府纳入打造世界级服务工作者和现代英雄的行列，他们为国家带回了急需的资金，再次凸显了菲律宾在全球劳动分工中的重要地位。至于服务业工作者阶层，他们虽然是数字经济的一部分，但仍处于其边缘地位。



我认为，研究中介阶层有助于在全球平台工作的常规分析中，将全球平台置于非中心地位。例如，全球平台（如 [fiverr.freelancing.com](https://www.fiverr.com)）往往是分析劳动管理和远程工作的中心。我们试图观察和绘制云工作中的分析类型，无论是从技能水平、要求、任务规模、服务类型、匹配模型还是交易发起者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都以全球平台为核心进行分析。



我们试图关注那个特定的中心节点——中介维度，以及平台经济中不断涌现的本地组织，这些组织正在不断重新配置劳动的需求与供给。



我通过关注以下两个方面处理平台经济下的数字劳动力中介，即技能培养和社区建设（skill and community building），以及再外包（re-outsourcing）。

技能培养在社交媒体上十分活跃<sup>7</sup>，并常常转化为再外包的现象。因此，除了平台就业和潜在的美元收入承诺外，现实中往往伴随着对平台依赖型生计所固有的不稳定性的不满。一方面，常见的论点是工作压力大，且工作具有季节性。这还伴随着大量的劳动力套利现象，即客户会寻找最便宜的劳动力，导致全球南方国家的劳动者在这种环境中处于可随时被替代的地位。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孟

加拉国等国的劳动者竞相争取云工作机会，许多劳动者涌向这些平台却难以获得工作。另一方面，平台动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sup>8</sup>，它阻碍了长期的客户与劳动者关系的建立，尽管其结构本是为了维持这种关系而设计的。

然而，在菲律宾，我们观察到的情况实际上更为复杂。一些劳动者难以获得客户，他们过度依赖平台，或是过度追求低费率<sup>9</sup>，受到平台工作季节性的挑战。但同时，由于菲律宾的机构化发展已近二十年，那些早期的自由职业者已经成功培养了专业知识，实现了技能和平台的多样化，创建了大型项目组合，并获得了长期稳定的客户。这些人正是我们将在平台工作中关注的新兴微名人。

Differentiated experience of workers

Conditions of platform labour	Variable conditions of workers
Seasonality of work "labour arbitrage" (Graham et al 2017)-buy labor where cheapest	Unable to get clients/low-skilled ←→ Cultivate expertise
Oversupply of workers and competition	Overly dependent ←→ Diversify skills and platforms
Platform dynamics - Discourages long-term client-worker 'relationships'; Hourly/project basis; low pay	Overly low rates; piece work ←→ Generate large project portfolios
	Seasonal ←→ Long-term, sustained clients

因此，在这种环境中，特定类型的劳动者能够蓬勃发展，实现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提升，进而成为精英劳动者。这是一群新兴且具有影响力的数字工作者，他们在平台劳动经济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不仅指导有抱负的劳动者，促进在线支持社区的发展，还直接参与到中介过程中来。所以，除了当前关注受众如何以及能够被吸引进行消费的做法外，我还将从影响力塑造的角度进行探讨，我将影响力的塑造视为一个基于当地数字双年展概念的合作关系场所或合作表现，大家在这个场所中互相帮助，共同应对各种不确定的情境。

elite workers  
influencers -> brokers



新兴的在线自由职业者在社交媒体上塑造自己的在线形象，以此吸引那些希望在日常生活的不确定性中寻求经济和社会流动的菲律宾宾劳动力。这一过程的实现首先依赖于他们构建与平台相关的技能，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建立自由职业者的社群。而在劳务平台上获取工作机会，则是一个涉及繁琐、模糊且全程由中介参与的复杂过程。试想，若缺乏可资利用的人力资源，亦无具体个人可供咨询，那么这一过程的难度可想而知。

在涉足这一领域时，许多劳动者往往因为政府描绘的美好前景而满怀憧憬地投入其中，但实际上他们可能并不清楚如何在这个领域站稳脚跟。他们确实需要一些人提供实际的帮助和指导。这些指导者会协助他们设定合理的薪资水平、协商福利待遇，并让他们了解有效的维权途径。然而，尽管如此，仍有许多客户拒绝支付报酬，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担心在这个充斥着欺诈行为的行业中，自己的利益是否能得到长期保障，或者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个行业能否真正持久发展。

因此，尽管政府推广了数字劳动机制<sup>10</sup>以协助劳动者应对平台劳动中的模糊性，但对于新入行者而言，这种协助作用是有限的。平台劳动可能会令人感到困惑。这不仅因为整个过程完全由中介操控，而且劳动者还需从诈骗信息中辨别出合法可靠的平台和客户，同时还需要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展示自己的专业技能。所以，仅仅掌握一项技能是不够的，劳动者还需要在整个在线市场中有效地推广和销售这些技能。更重要的是，在与文化背景迥异的客户打交道时，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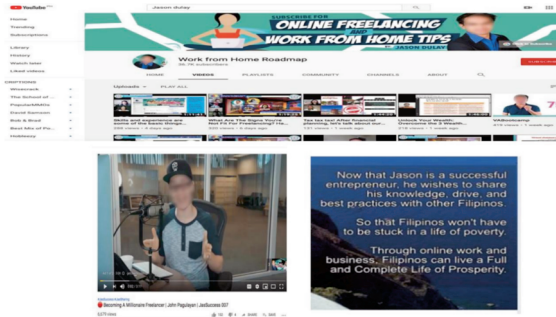
动者会面临文化隔阂的问题，这些客户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工作方式和期望，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更大的选择权。劳动者深知自己最终可能会被替换，因为客户可以随时寻找其他劳动者来代替他们。

### Ambiguities in digital labor

- Portfolio building and expertise selling
- Rate identification and negotiation
- Relationship building / client negotiation
- Reputation management
- Platform navigation
- Complaint mechanisms
- Continued learning / platform diversification
- Overall prospects and viability



在这些平台上，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的报酬合理吗？我应该如何为这项特定的工作定价呢？”在零工经济中，如何根据经验来为技能定价实际上可能非常复杂，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在这个大市场中所处的位置。中介将全球劳动平台与本地劳动者连接起来，并将这些分散的信息整合起来，为求职者提供有用的参考。同时，他们也会利用自己作为现任或前任工作者的经验，以及他们如何在零工经济中找到个人定位的经历，来提供帮助。然后，他们将这些经验整合成培训材料，最初是免费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后来则将这些材料编纂成书，并提供辅导和培训课程。他们还非常注重将成功具象化，因此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变得尤为重要。社交媒体上的可见度不仅关乎他们能买什么样的车，还直接影响到他们为自己和家人创造了多少财富。因此，这为零工们在这一领域能取得何种成就创造了一种特定的价值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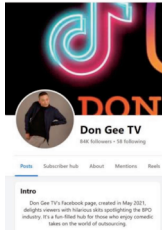
获得平台就业指导的劳动者将这些有影响力的数字工作者视为自己的代理人，实质上也是自由职业道路上的引路人。我们通常亲切地称呼这些导师为“大哥”或“大姐”，而那些受到指导的人对此感到十分自豪。特别是在融资界，随着行业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导师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如果你能宣称自己曾师从某位知名导师，那么你将有可能在该领域中生存下去。

关于劳动者与客户之间的工作关系，重点在于劳动者如何通过社交媒体与客户进行关系协商及进行日常互动，这包括分享策略、赢得客户信任、发布视觉图像以及构建成功的劳动者-客户关系规范等多个方面。在另一篇论文中，我探讨了劳动者们如何通过分享各自的担忧与顾虑，共同确认了平台工作的可行性。由于时间有限，我无法在此详细讨论这一点。我也谈到了这些影响者如何构建出一种理想劳动者的特定形象——即服务于客户的顺从型劳动者，以及他们如何在这种形象中灵活应对，推动特定的代理行为，同时在客户面前展现出顺从的态度。从长期来看，我想知道这种形象和态度如何在自由职业经济中构建出一种特定的价值规范。



Jason和我在一篇关于创业团结（entrepreneurial solidarity）的小文章里重新探讨了这个问题。文章不仅讨论了如何提升功能性技能以及如何在业界自如应对，还特别关注了社交媒体为自由职业者营造的日常交流环境。现在，这股潮流已经蔓延到了TikTok，众多自由职业者纷纷在TikTok和YouTube上活跃起来。这些平台是自由职业者日常会关注的，前者有助于他们坚定自己成为自由职业者的选择。有人在上面分享自己的工作环境，有人展示新的共享办公空间。因此，这些内容既日常又普遍，能够帮助自由职业者确认自己的选择，看到成功的可能。同时，它们也在无形中传递着在这个经济体系下关于生存与繁荣的价值观。

### Ambient solidarities and shared affinities



Hangouts  
(identity and affinity)

"Fruits" of freelancing  
(affirm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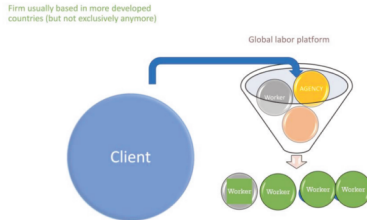
Shared values  
(moral economy)

现在，我即将进入下一个阶段，即再外包。当我们于2019年至2020年间的某个时刻启动这项研究时，就已经观察到了第一阶段的现

象，那就是劳动者们已经开始尝试再外包。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有些劳动者拥有了一批忠实的客户和较大的项目，于是他们会把这些项目交给自己的身边的人来完成，比如他们的丈夫、孩子、邻居，或者是家乡的村民。

这些劳动者正在利用个人的信任网络。然而，随着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网络日益扩大，并且在平台导航和客户沟通方面不断积累专业知识，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发现，劳动者们开始建立起了某种正规化的机构。其中一些机构进行了注册，有些则没有。这些机构可能拥有大约10名员工，并且正在考虑承接全球平台的客户。有些平台会正式宣告他们已注册为机构，而有些则不会。这些机构可能拥有庞大的忠实客户群体。因此，现在他们会在机构内部为小型工作团队进行谈判。我们认为，这种地方组织的形式变得相当有趣。因为当你参与大型自由职业者网络会议时，会发现这些机构蓬勃发展，真正定义了自由职业经济中地方组织的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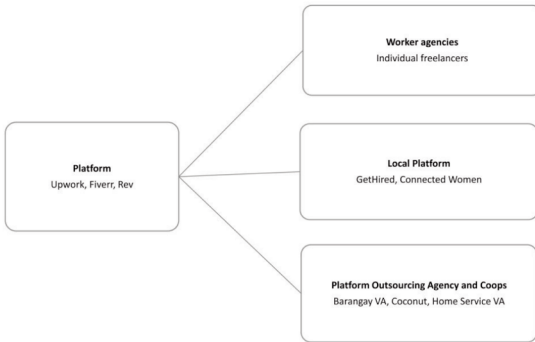
#### 2016 - local labor outsourcing through 'WORKER-agencies'



以下这篇文章与其他几篇作品一起发表，指出了全球平台实际上只是临时机构的一种新型迭代。它不过是利用算法对临时机构进行了重新配置。但更有意思的是，这种配置如今又在发生变化。那些原本试图通过算法来定义临时用工机构的全球平台，如今在地方层面上又演变回了临时用工机构的模式。



（见下图）我想我已经提到了第一种情况——为普通劳动者提供工作机会。从业者会从客户那里接到一大笔业务，然后将其外包给自己的亲人或邻居。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地方平台正在逐渐稳定下来，其中一些平台正在努力推动更加合作的议程。至于第三种情况，则是那些正在转变为代理机构或合作社的平台。



因此，外包代理机构层出不穷。以下图片仅列举其中的部分实例，当我们参加这些会议时，会发现这样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它们都是虚拟助理代理机构的典范，如今已有了自己的标识，这表明它们正逐步走向制度化和专业化。



请对比以下两张照片。右侧的照片拍摄于2015年左右，是我们首次进行实地调研时留下的。你可以看到澳大利亚的Freelancer平台，这是一个非常突出且颇具开创性的澳大利亚平台。而左侧的照片则拍摄于今年7月，是在最近的一次自由职业者大会上拍摄的。其实在几个月前的那场大会上，就已经出现了许多合作伙伴和大量的标识。如今，已经有代理机构开始赞助这些自由职业者市场了。而Get Hired实际上是一个试图与全球平台Upwork竞争的地方平台的产物。



一旦进入这些交流空间，你就会看到各个代理机构设立的展位。任何求职者，不论是学生、实习生还是应届毕业生，都可以参与进来，直接面对这些代理机构，并在其中注册求职。当然，这些代理机构中的很多仍然与全球平台保持着联系。此外，还有一些代理机构的所有者同时也是社交媒体影响者。



在这里，他们分享了自己如何将社交媒体经验转化为代理机构所有者的成功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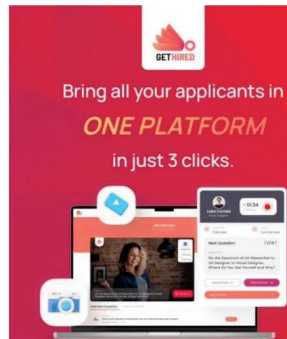
现场灯光璀璨、声音嘈杂、热闹非凡，各个代理机构的展位遍布各个角落，场面十分壮观。



我将重点关注再外包机构通用平台，其中一个例子就是Get Hired。



在本次演讲中，经MK Bertulfo允许，我提及了她的事迹。她是2015年前后创建并管理的一个大型Facebook群组的创始人及调解人。这个群组在当时深受那些希望找到既能赚钱又能照顾孩子的母亲们的欢迎，她们中的很多人从事客服工作。除了菲律宾的基础设施问题，她们还面临着夜间工作的挑战，这使得她们难以照顾孩子。于是，MK创建了FHMoms这个社交媒体群组，这个群组借助我之前提到的情感联系不断发展壮大。同时，她还创立了一个本地平台，目前这个平台还在起步阶段，所以我们还需要持续关注它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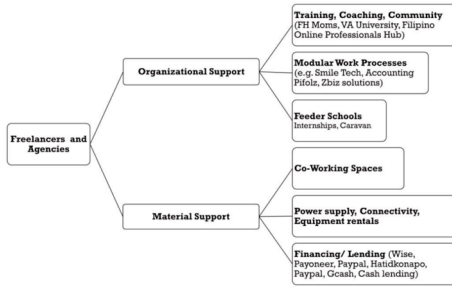


另外，有一个新兴的合作组织十分有趣。这个组织起初会设定一些目标，但随着时间推移，它们努力促成某种形式的利润分享，从而更像是一个机构联盟。可以想象，有多个机构存在，而这个合作组

织就像一个纽带，将这些不同的机构联结起来。它们的最终目标是，在吸引更多当地客户的同时，实现利润分享，而不再仅仅依赖全球客户。虽然目前它们还未达成这一目标，并且认为当地客户群的能力还有待提升，但至少这已经是它们正在与政府协商的内容了。



在我看来，基于当前的发展状况，组织支持（organizational support）结构及物质支持（material support）结构的出现尤为有趣。这意味着培训机构、辅导机构等应运而生。有一所虚拟助理大学正在为这些机构提供必要的资源。随着模块化工作流程的兴起，一些机构虽然缺乏资金建立大型组织，但它们可以购买会计系统、服装系统等各种系统。这样，它们即使在家中工作，面对全球客户时也能展现出高度专业化的形象。此外，在物质支持方面，当地的郊区、临时区域、供电连接以及设备租赁等新兴的共享办公空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们还看到了笔记本电脑租赁、西装租赁以及众多小型微型企业的兴起。当然，由于这是我们研究的重点领域，因此还包括融资平台的借贷服务。



我想简单谈谈GCash，因为它是庞大移动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GCash是由菲律宾最大的电信公司之一Globe开发并打造的一款大型金融超级应用。那么，GCash为何如此重要呢？原因在于，如果你在平台经济中工作，可能会从全球客户那里接到任务，而这些客户通常会通过Wise等平台进行转账。但如果你采用的是代理模式，就需要经常向代理机构中的其他员工支付薪资，这时GCash就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我们发现整个生态系统都在推动交易量的增长，而这些增长的交易量最终会促进劳动平台、社交媒体平台和金融科技平台上的交易流通更加繁荣。



下图是最后一张田野调查的照片。在这张图中，你可以看到GOtyme Bank等机构与政府服务并排展示。它们之所以出现在那

里，是因为提供了贷款服务。所以，这些金融科技平台的贷款功能，已经成为对代理机构提供社会支持的关键一环。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刚刚讨论的内容。虽然劳动力平台化被视为为这一经济体系中组织劳动力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但新兴的地方组织却在为当地劳动力构建平台劳动体验的动态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与此同时，这也催生了新的技能形式和社会阶层。这里提到的一系列中介，在全球资本的劳动基础设施与当地的权力关系、合作关系以及社会交易的政治经济基础之间，起到了桥梁和调解的作用。而这些大多发生在正式的监管机构之外。

劳动平台为客户和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安排牵线搭桥。然而，若缺乏由地方资本、地方政府以及家庭和社区等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构成的中介过程，这些安排在当地层面便不会获得太多实质性意义。尽管技能创造者和代理机构的中介行为看似规避了劳动监管机构对劳动的制约，但仔细观察便会发现，他们中介规则的运作最终促进了劳动者自身对劳动平台化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接受。劳动者中介能够战略性地驾驭平台环境，使自己得以蓬勃发展，为劳动者创造获得

更高收入的可能性，甚至让他们拥有了一种成就感——这种成就感源于一种利他主义，即“我能够帮助我的社区创造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样依赖平台来维持生计，因此他们尚未组织起来，与政府或平台进行谈判，以推动系统性变革，从而为所有劳动者争取到公平的薪酬和更合理的劳动安排。不过，已经有一些机构开始在其能力范围内尝试解决这些问题。他们积极寻找本地客户，但并未直接挑战更广泛的劳动平台化结构。凭借创业精神，他们能够在本地环境中创造性地调整平台劳动模式。而新自由主义和迟迟未能实现的愿景，则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和重新定义了中介的行为和话语。这些数字实践也有助于人们协商和重塑新自由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在全球南方所留下的影响和人们的生活经历。中介试图在制度的限制下重塑世界。

下图专门阐述了它的实际影响，因为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确实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之所以关注并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也涉足政策制定领域。在与公平工作组织合作的一些项目中，我们曾深入探讨过这一点。此外，我们还与政策制定者进行交流，有时甚至与新兴代理机构组织进行沟通。我们坚信，绘制出规模更大且更为隐蔽的次级经济地图是极为关键的。

## Digital brokerage dynamic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 Constituted by the interconnectedness of global and local; technology and vibrancy of worker social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 Map out the largely (opaque) sub-economy to mitigate against abuses
- Show divergences: Those that operate to sustain, reconfigure, or challenge the power embedded in global platforms
- Strengthen the ecosystems of support: Identify responses to platform work at differentiated levels of needs
  - Know targets of policy (global, local, company, individual)
- Emerging forms of socio-economic organization as civic spaces?



此外，在与劳动者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情况各不相同。有些代理机构正在有意识地努力为其他劳动者创造更加公平和更具人文关

怀的工作环境。然而，也有劳动者向我们反映，这种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某些代理机构中的权力滥用行为。因此，我们认为，揭示这些分歧——那些旨在维持、重构但同时也挑战全球平台内部权力的分歧——至关重要。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合适的支持结构，这些结构能够针对这一更广泛的生态系统和交易中的不同类型自由职业者及代理机构，在其各自不同层级的需求上提供精准的支持。

最后，我想谈谈一开始提到的三个层面：平台、影响力以及全球南方。在平台层面，我们努力揭示一个不断扩展和演变的数字劳动中介基础设施格局。这些基础设施试图在全球平台逻辑的内部和外部进行劳动力调配。这一生态系统由这些组织结构构成的基础所维持，同时也得到了金融平台、劳动平台和社会平台的相互交织，以及其他国家和市场行为体中的工人主导集体的支持。它们共同汇集中介信息和机会，以促进工人在全球平台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参与。这凸显了正式与非正式之间、云端与实际环境之间界限的模糊性。我们认为，这种对平台工作和治理模式的全面分析，超越了仅仅将全球平台模型作为参考点的批判性视角，对于理解其在现实中的具体运作方式至关重要。

第二是影响力，它已不再局限于以个体影响者为中心的单向权力流动。影响力的发挥如今涉及更为分散和动态的中介过程，与调和各方期望的能力相关，并且其效果深受所在社群的影响。这使他们能够将平台工作的叙事从简单的血汗工厂重塑为具有抱负的，甚至对一些人来说，是在平台背景下共享的生活体验。从本质上讲，他们营造了一种预期，即无需对更广泛的劳动结构进行改革，仅凭努力工作就有可能在平台中获得成功。与此同时，他们实际上也帮助维持了平台所需的劳动力，并为社交平台和金融科技平台构建了交易链条，最终惠及全球南方地区。这一点在全球环境下尤其引人共鸣，因为公共机构效率低下，迫使民众依靠同胞的帮助自行寻找解决方案。这反映了后殖民和新自由主义结构下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它在激发想象力、推动地方组织发展和开辟流动渠道的同时，也加剧了等级制度和不平等现象。

但我认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把这种数字劳动中介放在工人阶级日益活跃的视频平台如TikTok、YouTube等渠道中去考量，比如那些关于右翼司机、移民工人、家政工人的视频，而这些内容也正在被不断研究，因为这些平台正在汇集信息、组织资源，并将工人和有志者与实现社会流动的承诺紧密联系起来。那么，这样的观察将十分有意义。同时，我们也看到，劳动平台、社交平台和金融科技平台在这个过程中总是相互交织。交易量成倍增长，为机构、平台、内容创作者以及这些交易链中的工人创造了数据和利润。



## 问答讨论

**Saskia Witteborn**：非常感谢你，这真是太棒了。很高兴听到你和Earvin一起写了这本精彩的书，我要去买一本。你能推测一下这将如何改变移民，特别是菲律宾人的外出移民的未来吗？

**Cheryll Ruth Soriano**：谢谢你，Saskia。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我们有时会研究菲律宾的在线自由职业者，他们通常被称为OFW（Overseas Filipino Worker）菲律宾海外劳工，对吧？但在某些情况下，菲律宾在线工作者与海外菲律宾工作者是相同的，所以他们也在使用同样的标签，即OFW 2.0，以做出诸如“这是一个替代方案，你不再需要出国”之类的承诺。事实上，我们采访了几位在疫情期间特意回国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因为客户无法再维持他们的薪水而被迫回国。他们现在正在寻找新的出路，而在线工作就是其中一条。但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个领域非常多变且灵活。他们可能会先研究一段时间，然后尝试一下。有时，他们也会把这当作一个机会。事实上，当一些工作者与客户建立了更稳定的关系后，他们会尝试通过这条途径再次出国。所以情况相当复杂。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要去探究哪些工人把这看作是回国定居的机会，哪些工人又把它当作再次出国的跳板，因为他们正在与全球的客户建立联系，可能会被纳入这个复杂的体系中。

**Tom McDonald :** Cheryll, 你的研究非常棒, 例子也非常生动, 谢谢你。我的问题是: 你描述的这些自由职业中介如何建立自己的机构? 你对自由职业与正规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分析得十分透彻, 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人们选择做自由职业, 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不想有老板, 想摆脱办公室的束缚等。当你在和这些人交谈时, 这一点是否曾经被提及过? 我想知道, 当中介变成了老板, 那么自由职业的本质在什么时候就发生了变化? 自由职业者是否表达过对失去自主权的担忧? 当他们与这些更本土的平台或机构产生联系时, 我就在想, 对于那些现在具有影响力的中介, 是否有人曾经说过: “这些人不再是真正的自由职业者了, 他们现在成了大老板。”所以, 这些情况是否曾经出现过, 还是没有呢?

**Cheryll Ruth Soriano :** 谢谢你, Tom。这两个问题都非常有价值。关于非正规性和正规性的问题确实非常重要。我认为它源于菲律宾自由职业者的现状。当我们2015年开始采访他们时, 就有这样一种情况: 他们即使赚的是美元, 也得不到家人或邻居的认可。家人或邻居会质疑他们: “你是怎么赚钱的? 你在家做诈骗吗?” 由于他们只是在家工作, 所以得不到认可。他们也许能买得起汽车, 建更漂亮的房子, 送孩子上私立学校。但人们还是会问: “你是干什么的? 你是怎么赚钱的?” 所以, 这种认可正是自由职业者所渴望的, 但同时, 这也阻碍了他们的某种流动性。因此, 他们现在得到的认可主要来自代理机构。作为代理机构, 他们能够通过自由职业者所承接的客户和项目获得认可。但这有时取决于客户的安排和平台的规则。因此, 他们不能在自己的简历中完全声称自己完成了某个品牌的项目。这种代理模式让他们能够在行业内积累一定的声誉。

但更重要的是, 我认为,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一种感觉, 那就是他们得到了国家的认可, 觉得自己是这个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但当然, 也有一个相当有趣的限制。我在想,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交更多的税? 这是否意味着会有更多的监管? 因此, 这也为监管带来了一种复杂的局面, 因为整个行业已经足够复杂了。那么, 他们是工

人吗？他们是企业家吗？在有了代理机构的阶段，工人基本上成为了作为代理机构的创业者。这是由政府推动的，政府现在关心的是这条产业链中的底层工人，那些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完全看不见的工人。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现在，我回到你关于这些自由职业者真实性的第二个问题。这需要时间，如我前面所说，社交媒体社区建设、技能培养和社区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我说过，它是以一种特定的菲律宾式的合作意识为基础的，这种合作意识具有数字倾向。因此，尽管在家里可能有人怀疑这些自由职业者是否从中获利，但这些机构和影响者也试图确保他们提供免费辅导课程。他们认为，通过在他们的机构中这样做，他们实际上是在为自由职业者提供工作机会。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互利的过程，就像公共利益一样。当然，我们知道他们将从这些货币化实践中获利。但同时，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新情况，他们自己曾经也是自由职业者，也知道普通的自由职业者要在没有太多其他支持的情况下生存下来需要什么。

黄孙权：工会对中介平台持什么态度呢？

**Cheryl Ruth Soriano**：在云工作场景中，工会的身影并不太显眼。我正在对这两者进行研究。我现在正在对工会和中介平台这两者进行深入的研究。说到工会，它们在动员方面一直都很积极，特别是针对那些工作地点明确的工人，比如网约车司机和外卖送餐员，因为对于这些工人的情况比较清晰，所以工会的立场和动员都相对容易。但对于同时拥有创业者和工人身份的远程工作者来说，工会和劳工联合会很难渗透到他们的组织中。他们似乎对正在形成的自我组织感到很满意，至少目前是这样的。

(\*本文注释为译者注释)

## 讲者介绍



Cheryll Ruth Soriano博士，是马尼拉德拉萨大学传播学系教授。她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平台劳动与平台化研究网络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其中包括Fairwork（担任首席研究员）以及亚洲的平台生态系统和交易文化。她的著作有《菲律宾数字文化：YouTube上的中介动态》（*Philippine Digital Cultures: Brokerage Dynamics on YouTube*）（与E. Cabalquinto合著，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22）和《亚洲视角下的数字文化：新兴现象，持久概念》（*Perspectives on Digital Culture: Emerging Phenomena, Enduring Concepts*）（与S. Lim合著，Routledge, 2018）。Cheryll是新创刊的开源期刊《平台与社会》（*Platforms & Society*）的创始联合主编，同时担任传播与媒体研究领域重要期刊的编辑委员会成员。她曾在新加坡拉萨尔艺术学院（LCA）、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和北京大学（PKU）担任访问学者。

态》（*Philippine Digital Cultures: Brokerage Dynamics on YouTube*）（与E. Cabalquinto合著，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22）和《亚洲视角下的数字文化：新兴现象，持久概念》（*Perspectives on Digital Culture: Emerging Phenomena, Enduring Concepts*）（与S. Lim合著，Routledge, 2018）。Cheryll是新创刊的开源期刊《平台与社会》（*Platforms & Society*）的创始联合主编，同时担任传播与媒体研究领域重要期刊的编辑委员会成员。她曾在新加坡拉萨尔艺术学院（LCA）、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和北京大学（PKU）担任访问学者。

- 
1. 指的是工作地点的固定性或缺乏便捷的交通和通信设施等，使得人们难以在不同地点之间自由移动。
  2. 实际存在的平台化（actually existing platformization）用于描述平台经济在现实世界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与当地环境、制度和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复杂互动。这个概念源自并借鉴了实际存在的新自由主义（actually existing neoliberalism）的概念，后者强调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不均衡实现过程。
  3. Terri Senft在她的著作《网络摄像头女孩：社交网络时代的名人与社群》（*Camgirls: Celebrity and Community in the Age of Social Networks*）中提出了“微名人”（micro-celebrity）一词，她将其定义为“一种新的在线表演风格，人们通过网络摄像头、视频、音频、博客和社交网站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以吸引读者、观众以及与他们在线相关联的人（Senft, 2008）。”
  4. 根据Crystal Abidin的定义，影响者是指那些通过文字与视觉叙述个人生活及生活方式，在博客和社交媒体上积累起相对庞大的粉丝群体的普通互联网用户，他

们会在数字及现实空间与粉丝互动，还会通过在博客或社交媒体帖子中植入“广告软文”的方式将粉丝变现（Abidin, 2015）。

5. 作者的研究基于多个平台的考量，包括后文提到的在线零工平台，也包括像YouTube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
6. Cabo制度，一种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期间激增的劳动安排。这种制度在小型建筑公司、雇用装卸工人的海运公司和雇用季节性种植园工人的庄园中普遍实行。
7. 在这个语境中，“技能培养”指的是个体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积极地进行技能学习和提升的过程。这可能涉及各种技能的掌握和提高，如数字技能、沟通技巧、项目管理等，这些技能对于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寻找工作、提高收入或提升个人竞争力至关重要。
8. “平台动态”主要是指在线平台在运行过程中涉及到的技术、市场、政策、用户、商业模式等多个层面的变化和发展。
9. 在平台经济中，“低费率”指的是平台向用户或商家收取的较低的服务费或佣金。
10. “数字劳动机制”包括数字平台的运营规则、数字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数字劳动成果的产权和分配机制等方面。其推广旨在帮助数字劳动者更好地理解 and 应对平台劳动中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 板块四：新地形

PANEL 4: NEW TERRAINS



# WEB3与区块链游戏：一种南方视角

WEB3 AND BLOCKCHAIN GAMING:  
A SOUTHERN PERSPECTIVE

SASKIA WITTEBORN

编译 / 李梦书 郑叶颖

我是一名研究移民与技术的学者，主要关注跨国移民过程及技术在其中的作用。我聚焦这一研究方向已有多多年，地域涉及北美、欧洲和东亚，尤其是中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在菲律宾及泛东南亚地区，移民如何借助技术跨越国界，其中包括生物识别技术的应用，以及近年来与移民相关的其他技术。

我想先谈谈“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这一概念。我们经常听到这一术语，我也在教学中频繁与学生讨论、讲授相关内容，并与学生一同阅读相关材料。但我认为仍有必要进一步理清这一概念的内涵。

我想引用卡内基基金会的观点来讨论全球南方这一概念：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人民及机构在重塑全球秩序过程中被剥夺自主权的感受（Hogan & Patrick, 2024）<sup>1</sup>，这些国家及其人民不应被排除在全球秩序的基础架构之外。“全球南方”已不再仅适用于描述中低收入国家或所谓的“新兴经济体”（ascending economies），这个概念还涉及道德经济与历史等多个维度。

因此，我们需要自问：“全球南方”究竟意味着什么？举个例子，东欧的许多国家往往并未像中国、中国香港或印度一样被纳入这一概念。但根据卡内基基金会对全球南方超越地域的定义，这些东欧国家的确符合这一范畴。“全球南方”这一概念颇有争议，但是我仍喜欢这一概念，因为它捕捉到了一种全球格局下的现实处境。然而，更重要的是思考这一问题，并避免陷入简单的二元对立。这也是我今天演讲的核心目标。在教学中，我始终强调，不应将“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机械地对立，而应探讨可能的跨区域联盟。

在这一点上，刚才网络社会研究所“文化与技术三部曲”纪录片恰恰展现了类似的思考。它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概念，更像是一种实践性的计划，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全球秩序中的合作与自主性。

这个想法起始于几年前，伴随着Web3的广泛炒作和相关图像的出现，我们开始思考为何以及如何从Web2迁移到Web3。计算机科学中的“迁移”（migration）在这里是指数字迁移，用来描述这种转变或移动过程。



我最初是作为一名传播学者进入Web3领域，而不是计算机科学家，我受到的是人类学的训练，因此我能够与Tom McDonald（本次论坛的另一位讲者）产生共鸣。我关注的不仅是“迁移”一词的意义，还有当时关于全球南方技术发展的讨论，尤其是将技术视为实验场地的讨论热潮。我曾与同事们撰写过文章，探讨联合国如何利用技术管理移民、难民营状况及移民流动，以及如何通过技术来讨

论和管理人道主义援助。还有一些研究关注约旦等难民营的难民如何接受Web3及计算机培训，从而改善生活质量。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们可能在约旦或土耳其等国家接受了计算机技能培训，但他们不可能找到硅谷的工作。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要谈论Web3的概念呢？

三年前，我曾热衷于探讨移民如何能融入Web3经济，从而摆脱不稳定的生存境况。这个话题我现在仍然感兴趣，但与此同时，关于移民的另一个话题也促使我深入思考，将Web3视为一个社会、文化与经济空间的概念。从三年前开始，我逐渐思考从Web2到Web3的迁移到底意味着什么，从实体空间向数字领域的迁移又代表了什么。

我们曾目睹元宇宙（metaverse）发展的早期情境，例如图瓦卢（Tuvalu）这一案例。或许你们还记得围绕图瓦卢的热议——这个因海平面上升而濒临消失的岛国正试图构建一个数字化的“元宇宙国家”，以在网络空间中存续其国家形象，供人们建立记忆档案等以永恒铭记。因此，关于元宇宙与移民问题的讨论再次升温，类似于2019至2021年间游戏产业概念兴起时的情景。我并非游戏研究者，但当时Web3被塑造为一种集社会、文化与经济的空间，并以此进行推广。例如，Cointelegraph曾报道：“2021年，游戏产业市值达2,000亿美元，并被视为吸引用户进入Web3生态系统的未来途径。”（Cointelegraph，2022年3月27日）

也许很多读者也是游戏玩家，大家都十分清楚这个行业有多么庞大的年轻人市场。以Axie Infinity为例<sup>2</sup>，这款游戏一推出便引起了广泛关注，各种关于它的报道炒作铺天盖地。那么，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对Axie Infinity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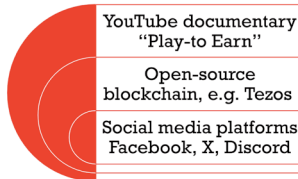


Blockchain based  
NFT ownership

正是在从Web2向Web3的迁移中，尤其是游戏在这一转变中的作用，让我对它产生了兴趣。2020年前后，围绕这款游戏产生了大量的讨论，包含许多文字和YouTube视频宣传其为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下一个最佳选择”。这一切讨论发生的场景正是菲律宾。

该游戏由Sky Mavis公司开发，基于区块链技术和NFT所有权（Blockchain-based NFT ownership）。当然，我并不是要讨论区块链的复杂技术细节，我更多地是从社会科学和批判性视角出发，分析这个游戏所承诺的愿景以及它未能实现的部分。

Sky Mavis当时推广这款游戏的标语是“拥有真正玩家主导经济的游戏将成为我们生活、工作和娱乐的场所——真正的数字国家”（Sky Mavis官网）。这意味着基于区块链的游戏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游戏，而是一个“边玩边赚”（Play-to-Earn）的平台<sup>3</sup>。我们可以从物理世界迁移到数字空间，创造一个多元、多样的环境，让每个人都能在其中快乐共处。这一理念与区块链和Web3社区推崇的多样性精神相契合，比如数字护照和新型治理模式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



Axie Infinity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游戏推广。并且我认为许多类似的游戏在当时也都采用了类似的宣传手法，至今仍在如此运作。例如，YouTube上广受欢迎的纪录片*Play-To-Earn: NFT Gaming in the Philippines*，影片导演在其中提到：

我们的目标是向世界展示，像菲律宾这样的新兴国家将通过加密货币普及带来变革……新兴国家不需要施舍，他们需要的是机遇。

(Nathan Smale, in Mislos, 2021)

于是许多人认为我们终于拥有能够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产品。Leah Callon-Butler也参与了这部影片的制作，她不仅是影片的解说员，还是位于马尼拉的Web3推广公司Emfarsis的总监。这部影片实际上是在菲律宾推动Web3的一个重要尝试。

当时，这些游戏引发广泛关注，并展示了它们的潜力。此外，像Tezos这样的开源区块链（Open-source blockchain）也在推广之中。关于NFT、区块链和游戏的讨论主要发生在Facebook和菲律宾，当然，也在X和Discord上进行。每个平台的功能各异，例如，玩家通常在Facebook的聊天室中被招募，而在X和Discord上，讨论则主要围绕游戏策略展开。

我和研究助理正在马尼拉进行一项特殊研究，旨在将“社会技术可供性”（**sociotechnical affordances**）<sup>4</sup>这一较为传统的概念进行语境化应用（**contextualization**）。尽管这个概念已有较长历史，并且存在大量相关讨论，我之所以对其产生兴趣，是希望深入理解其在当前背景下的意义和应用。正如我稍后将说明的，关于这种“可供性”的文献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一概念的框架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欧洲和北美为基础的。

我们通常以“技术能让我们做什么？”这一普遍化的视角来理解技术的作用。因此，我希望结合具体的语境，考察法律、政治和文化背

景在这一框架中的作用。接下来，我将通过分析区块链游戏的可供性，分析批判参与者如何在特定条件下参与这些游戏。具体来说，参与者如何玩这个游戏，以及他们在什么条件下能参与。这基本上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

现在，让我们回到社会技术可供性这一复杂的概念。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一些学者认为，可供性本质上指的是它如何引发社会行动（Invite social action），这是一种对可供性的社会化分析视角（Hutchby, 2001; Nagy & Neff, 2015）。举个例子，当我们使用手机，或像我手里这个小遥控器时，我们知道按下某个按钮后会触发特定的功能。但同时，我也可以将它当作一把尺子，或者赋予它其他用途，比如用它挠头，甚至可能只是因为它没电了而无法使用。换句话说，同一技术对象在不同情境下可能拥有多种用途，而这些可能性便构成了可供性。更进一步，可供性不仅仅涉及个体如何使用物品，还将人类、非人类、技术对象以及实践和结果联系在一起（Evans et al., 2017）。

因此，可供性并不仅仅是一种功能性结果。例如，当你点击手机上的某个按钮以确保隐私，这只是一种预设的功能，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可供性。可供性强调的是技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所产生的不同可能性。正如Tom的同事Elisabetta Costa所做的研究，他们尝试在土耳其等国家的特定语境中探讨可供性的意义，关注超越西方偏见传统范围的现象（e.g., Costa, 2018）。这类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可供性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变迁与应用。

从我Web3批判研究的视角来看，经典的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文献（Marčeta, 2021; Montgomery & Baglioni, 2021; Lata et al., 2023; Yin, 2024; Zaucha & Agur, 2023），对于从语境化角度研究社会技术可供性至关重要。我重读了许多相关研究，尽管文献繁多，难以逐一阅读，但它们无疑为平台劳动的批判提供了重要视角。

同时，区块链帝国主义（**blockchain imperialism**）<sup>5</sup>（Jutel, 2021）这一概念也非常值得深入思考，尤其是在Web3如何在像斐济这样的小岛国中应用的背景下。这个概念引发了我对新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应用方式的关注。理解这些技术如何运作，并积累来自这些鲜为人知地区的数据，至关重要。这些地方很少受到学术讨论的关注。虽然我站在“全球北方”的视角，但仍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工作。例如，Jutel提到的区块链帝国主义，实际上也与数据的积累相关。

另一个引发我兴趣的概念是种族资本主义（**racial capitalism**）<sup>6</sup>。McMillan Cottom的文章提醒了网络资本如何塑造全球秩序，特别是如何与种族等级制度交织在一起（McMillan Cottom, 2020; Zaucha, 2024）。我认为还需要考虑“他者化”中的等级结构（hierarchies of Otherness），例如，风险投资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对于我今天试图提出的核心论点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是我的一部分研究内容，其他部分我这里只简要提及研究的问题，并不深入探讨。为了涵盖基础问题，以下是我一直在探索的三个核心问题，也是我研究“可供性”概念的出发点：

- 菲律宾玩家识别并执行了哪些游戏可供性？
- 这些可供性有哪些特征、关系如何？
- 社会文化规范与实践如何塑造玩家对游戏可供性的参与方式

因为基于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规范，人们可能会以不同方式理解和使用技术对象，这些问题构成了我研究的核心。

以下是我们使用的方法论。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完成这个项目，但由于当时仍处于COVID后期，我们无法亲自前往菲律宾，所以采访只能通过Zoom进行。我们采访的对象包括来自大马尼拉或马尼拉

的年轻人，通常为Z世代的年轻人。他们大多数拥有大学学历，但也有一些从事保安或在呼叫中心工作。教育水平在这里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同时，我们进行了社交媒体帖子分析、行业报告和白皮书的文本分析，这些都基于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进行分析研究。



菲律宾是一个中低收入国家（**lower middle-income country**）（Ke, 2024），这一点非常重要。除了经济因素，还有哪些因素影响菲律宾人选择参与玩Axie Infinity这个游戏？人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赚取一些收入，尤其是在劳动力外迁（**labor out-migration**）的背景下，这可能是参与的一个原因。正如Cheryll所提到的，菲律宾有着悠久的移民历史。

最初我研究思考的是Web3经济如何在未来打通跨国移民渠道，是否能使人们留在原地，而不再需要跨越国界前往其他国家工作？一些专家也持类似观点。例如，业务流程外包（**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BPO**），尤其是客服中心行业，这和菲律宾的殖民历史和较高的英语水平密切相关。此外，菲律宾还拥有悠久的游戏和赌博历史（**history of gaming & gambling**）。在我开始采访时，许多人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的经历——

我9岁时就在当地的网吧玩游戏了，11岁哥哥常常带着我一起去那里。

另外，我还想提到菲律宾经济中一个特殊板块，即赌场业。菲律宾一些地区拥有大型赌场企业，这些企业为政府带来了大量税收。然而，这些赌场行业去年7月被政府关闭，由于许多大型赌场来自中国并涉及非法移民等问题。鉴于菲律宾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政府有时会采取这样的措施作为回应。

"Axie is like cockfighting. Just the digitized and more colourful version. But the game has paved the way. If it weren't for Axie, people would not have digital wallets or learn about NFTs and crypto. Axie is still a side hustle for young people, and we liked the flexibility of playing it, especially during Covid."

(Male, 20s, statistics/communication studies student)

Source: Visual: Wikipedia



当我开始采访后，其中一个观点反复出现，起初我并未深刻理解，直到读到这句话，来自我采访的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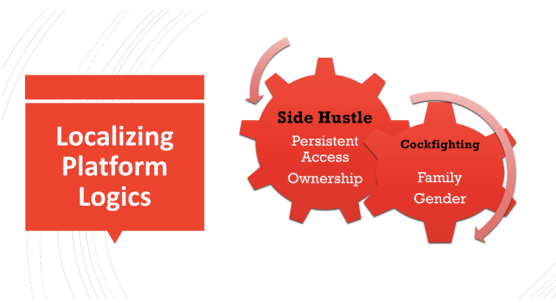
Axie就像斗鸡，只不过是数字化且更具视觉冲击力的版本。但这款游戏开创了道路。如果没有Axie，人们不会拥有数字钱包，也不会了解NFT和加密货币。对于年轻人而言，Axie也是一种副业，我们喜欢它的灵活性，尤其是在COVID期间。（男性，20多岁，统计学/传播学专业学生）

我听到时想，多么有趣的一个词啊！斗鸡，这是我此前从未想到的链接。然而，自那之后，这个词不断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人类学与传播学研究者，我开始关注这个词。随着扎根理论研究的深入，我在数据收集中标识出两个核心主题/代码：副业（side hustle）和斗鸡（cockfighting）。

副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平台经济的逻辑。人们将Axie作为一款游戏来看待，而在COVID期间，他们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开

始接触这款游戏——它不仅提供了娱乐，还能带来收入。在这种背景下，持续访问（**persistent access**）和所有权（**ownership**）成为两个关键要素，尽管这仍然受到平台逻辑的制约，我稍后会进一步探讨。

然而，受访者对Axie的理解超越了经济和技术层面，而是将其与本地文化实践——斗鸡相联系，这一点尤为关键。这种比喻涉及两个核心维度：家庭价值观（**family values**）和性别（**gender**）。



什么是副业？根据平台资本主义和种族资本主义的相关文献，副业通常被描述为由欲望驱动的劳动（*labor motivated by desire*）（Battacharya, 2018）。换句话说，人们被平台吸引，因兴趣或社交氛围而参与其中，人们觉得做这些事很酷，因此不愿错过。

在这个研究案例中，吸引人们进入Axie生态的主要动力并非个体欲望，而是家庭价值观。在分析采访数据时，“家庭”这一概念反复出现——受访者强调，他们参与游戏的主要原因是支持家庭。这一点在当时对Axie的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玩家不仅出于个人兴趣进入游戏，而且这种理由成为了正当化的因素，推动他们持续参与，并在COVID期间保持社交联系。

此外，这一现象与受访者的年龄密切相关。我的受访者多为年轻

人，大多是学生，他们刚进入社会经济，正处于职业探索阶段。在疫情期间，他们渴望维系社交关系，同时希望减轻家庭经济负担。McMillan Cottom把这种现象称为掠夺性包容（**predatory inclusion**），即平台和游戏利用人们的社会需求和经济动机，将他们吸引进来，使其沉浸其中，进而促使他们接受数字钱包、NFT等新兴技术，并深度参与游戏经济（McMillan Cottom, 2020, p. 443）<sup>7</sup>。

在副业之下有一个概念与不稳定的灵活劳动（precarious flexible labor）密切相关：持续访问（**persistent access**）。持续性（persistence）意味着这款游戏在编码空间中具有持续的物质性和象征性存在<sup>8</sup>——它始终在线，随时可被访问。而访问权（access）则受到三个主要因素的制约<sup>9</sup>。

另外，空间因素（**spatial factors**）对于这些年轻玩家而言至关重要，尤其是空间的灵活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阶级。我在此沿用了这个经典概念。来自较高社会经济阶层的玩家往往拥有更好的条件。他们可以退隐乡村，这意味着拥有私人空间来玩游戏。众所周知，玩Axie Infinity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稳定且高速的互联网连接，以及使用电脑而非手机。因此，拥有私人空间的玩家比起那些生活在嘈杂家庭环境、共享居住空间的人，往往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相较之下，处于较低社会经济阶层的玩家往往只能在极为有限的空间中进行游戏。例如，他们可能不得不在家中寻找一个角落，甚至躲进浴室玩游戏。有些人在工作时间偷闲玩，还有人在大学讲座期间玩，或一边听Zoom线上课程一边进行游戏。这种空间使用的差异进一步凸显了阶级对游戏参与方式的影响。因此，访问权限构成了副业的一重要维度。

人们因为对美好未来的想象而被这款游戏所吸引。你可以在Axie中获得奖金（scholarship）——这一术语使用很有意思。因为他们本可以只是给你一些钱，但他们在这款游戏里会给你所谓的奖金，这

意味着你可以既得到钱又学习技能。可见这是一种掠夺性包容的想法——带有目的性地将你吸引到这个空间里。

副业的核心在于所有权（**ownership**），包括财务（**finances**）与技能（**skills**）。Nabben讨论了Web3经济模式如何通过加密验证的所有权帮助个体在数字领域中获得新的能动性<sup>10</sup>。这一点至关重要。那么，对这些游戏玩家而言，他们如何理解所有权？

当时大多数的文献和媒体报道中，收入或金钱和利润的创造被视为极具吸引力的前景。例如，一些玩家表示：

我们赚了数千美元，同时还学会了新技能。（Domenica，20岁，心理学本科生）

特别是女性玩家，她们通过游戏培养了内容创作等技能，随后转向更广泛的数字经济。例如，一些女性开始在香港、新加坡乃至全球性平台（如Decentraland）成为博主创作内容。这种技能的转化构建了全球化的基础，并重新定义了所有权的概念。在未来，所有权的界定不仅关乎财务收益，更与机构赋权和技能积累密切相关，尤其是对于希望进入网络经济的女性而言。

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家庭（**Family**）。当我们的家庭状况不佳时，我们希望帮助自己的家庭。许多受访者表示，他们利用游戏收入来帮助翻新房屋，这一叙事在全球化讨论中屡见不鲜。人们用这些钱购买房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的货币化因素。



让我们回到关于文化因素的讨论。如果将“副业”视为一种既能娱乐又能带来经济收益的所有权形式，那么文化因素的作用又是什么？对我而言，这是研究中最具启发性的部分。然而，我不想过分强调文化因素，因为这可能导致研究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尽管如此，我仍希望在分析中纳入这一视角，以探讨文化的作用。

说回到斗鸡的概念。人类学文献中对斗鸡有大量研究，而当我们讲斗鸡的画面与Axie Infinity进行对比时，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斗鸡是一项非常血腥的运动，两只动物在竞技场中激烈搏斗，而Axie的游戏机制与此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相似之处。

斗鸡在全球多个地区均有悠久的历史，从西班牙、巴厘岛到英国和菲律宾<sup>11</sup>。菲律宾的奎松市（Quezon City）甚至举办类似世界杯的斗鸡赛事（World Slasher），并设有专门的斗鸡频道Sabong TV。即便在COVID疫情之后，斗鸡仍在菲律宾的城乡地区盛行，并逐步实现数字化，成为赌博行业的一部分。玩家不仅拥有斗鸡，还可以对其下注，形成了一个合法化的盈利与税收体系。菲律宾拥有众多离岸博彩运营商（Philippine Offshore Gaming Operators, POGOs），这些企业不仅涉足斗鸡，还掌控着更广泛的赌博产业，甚至成为部分城市的经济支柱。然而，近年由于非法移民和其他争议问题，菲律宾政府关闭了部分POGO运营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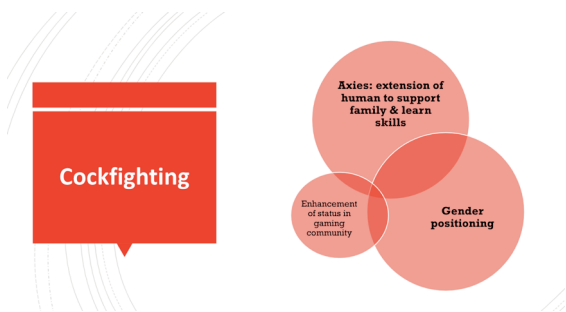
这有助于大家理解菲律宾的历史背景，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剖析

斗鸡背后的文化因素，以及它如何塑造人们的游戏参与方式。因此，我引入深度游戏（**deep play**）这一概念进行分析，这也是本次演讲的核心主题。

“深度游戏”一词最早从18世纪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衍生而出，1789年他提出了“非理性游戏”（irrational gaming）的概念。比如，在赌场下注时，玩家无法预知自己是否会赢，但仍然投入金钱，这种行为在边沁看来是非理性的。而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在其1973年的著作《文化的解释》（*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中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诠释，他认为这是一种社会行为。

以斗鸡为例，为什么人们热衷于在村子里进行斗鸡？吉尔茨指出，斗鸡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是一种社会行为，它在维系社区关系的同时，也能确认并拓展社会身份。类似于其他游戏或娱乐活动，斗鸡充当了社会粘合剂，将社区成员凝聚在一起。此外，如果你的斗鸡在比赛中获胜，你的社会地位和在社区中的声誉也会随之提升。因此，斗鸡不仅仅是一场竞技，而是一种深植于社会结构中的象征性实践。

当我开始探讨斗鸡与游戏之间的关联时，我发现这一对照极具说服力。当你看到Axie Infinity中两只愤怒的Axie彼此对抗时，便能深刻理解这些Axie如何成为玩家自我的延伸。你将你的Axie和NFT投入竞技场进行战斗和其他人较量。而在这一过程中，玩家不仅延展了自身身份，还在协商与构建自己的社会地位、声誉以及角色认同，比如作为子女或学生的身份。与此同时，玩家也在不断习得新技能，并提升自己在游戏社区中的地位。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玩家在参与游戏的同时，也在塑造并定位自身的性别认同。那么，性别定位（**Gender positioning**）意味着什么？游戏，尤其是Web3游戏，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领域。那么，这类游戏如何为女性玩家打开进入游戏世界的大门，并使她们得以展现自身能力、挑战传统性别刻板印象？

The complex block contains a red speech bubble on the left with the text "Gender Positioning". To its right are two quotes. The first quote is: "There are many stereotypes in online gaming for women. Women are not great players, and they are too emotional, talkative, and so on. Playing gave me the motivation to prove them wrong." followed by "(Jessica, 22, BA Civil Engineering)". The second quote is: "It has opened opportunities for me. I can leverage those to drive innovation in the future. Fintech will not be strange to me and I can adapt faster." followed by "(Aurora, 21, BA Business and Accounting)".

在线游戏中，女性往往被贴上各种刻板印象的标签，例如‘女性不是优秀玩家’、‘她们太情绪化’、‘话太多’等。玩游戏让我有动力去证明这些看法是错误的。（杰西卡，22岁，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生）

类似的观点在采访中反复出现。许多女性提及她们在游戏环境中经历性骚扰，例如被要求提供照片、因声音甜美而受到不适当的评论，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因参与游戏而遭受攻击。然而，她们也开始积极反抗，并在全性别话语的框架下，以特定术语回应父权制。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类女性玩家，她们不再仅仅关注性别议题，而意识到这一数字空间为她们提供了新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女性大多为年轻人。例如，奥罗拉（21岁，商科与会计专业本科生）表示：

这为我打开了新的机遇。我可以利用这些机会推动未来的创新。金融科技对我而言不再陌生，我能够更快地适应。

这一观点体现了一种更具目的性的思考方式。



那么，为什么我要与你们分享这些？这项研究的核心发现是什么？

一方面，游戏平台的访问权与所有权遵循着普遍的逻辑。另一方面，家庭价值观与性别作为文化-历史筛选机制，塑造对P2E游戏（即play to earn）的参与方式。也就是说普遍逻辑在具体实践中受到社会文化与历史背景的深刻影响。例如，人们如何理解可供性，以及在特定情境下如何利用这些条件。在菲律宾，游戏的参与往往由家庭因素驱动，而在其他语境中，可能是不同的价值观或社会动力在发挥作用，也许就不一定涉及性别因素。

在访谈中，受访者最常提及包容性（inclusivity），以及他们如何被吸引进入游戏世界。最初，游戏体验充满乐趣，但随着时间推移，它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折磨——这一表述在访谈中多次被提及。玩

家们经历了极大的焦虑，不仅是那些后来成为研究者的人，尤其是那些持有生产资料的群体，即Axie Infinity的游戏团队。他们谈论自身如何难以入眠、对投资持续担忧、如何最终选择了退出。这一现象揭示了游戏平台不仅塑造了数字经济的运行模式，也深刻影响了玩家的情绪与社会关系。

鉴于这是一篇学术论文，这里需要一个更为复杂且深入的观点论述。我们要思考的是，全球资本主义的角色及其如何塑造并重构地方社区，尤其是金融资本主义的“长臂”在游戏产业中的运作方式。例如，在这篇文章<sup>12</sup>中，讲述了a16z——硅谷最具影响力的风险投资公司之一，如何通过资本介入，深刻影响这些地方社区的经济结构与社会实践。

理解这一过程至关重要，并且以此进一步开展比较研究，以探讨全球资本如何在不同地方情境中发挥作用。这些游戏平台不仅提供娱乐与经济机会，还在适应地方社区中现存的文化和历史实践，以激发并调动玩家的欲望。因此，每当我们讨论平台经济时，都应将其置于具体的社会语境中，以深入剖析其运作机制及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能动性社区往往承载着某种承诺，而这一概念本身极具研究价值。在网络社会研究所制作的“文化与技术三部曲”《个人计算机与反文化》纪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苹果等公司的早期发展阶段，以及它们如何在话语体系中构建“社区”这一概念。然而，当资本主义介入时，这一“温暖而模糊”的概念逐渐被重塑，冰冷的资本逻辑重新定义了社区的运作模式。因此，从研究角度来看，Axie Infinity既是一个新自由主义再生产的场域，同时也契合了菲律宾国家层面的Web3发展目标。

菲律宾与许多其他所谓的全球南方国家一样，对加密货币持开放态度。例如，在马卡蒂（Makati），已经设有加密货币ATM自动取款机，体现了这一技术的本地化进程。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的加

加密货币生态系统与其移民经济密切相关。大量菲律宾劳工在香港、迪拜等世界各地工作，并依赖汇款支持国内家庭，而加密货币的便捷性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

Axie Infinity在年轻群体中的流行，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年轻人他们逐渐学会如何创建加密钱包，并熟练使用Web3相关语言。这使得游戏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形式，还涉及更深层次的国际政治与经济议题。

全球南方玩家如何积极参与Web3的实验性游戏是这项研究的目的，它调转了全球北方学者的研究偏向。我写这篇文章时的目标观众是来自全球北方的西方学者，然而，当我阅读文献或与许多同事交流时，他们常提到全球南方正在追赶，并成为技术实验的场域。

在我看来，关于玩家如何战略性地采纳游戏，如何灵活利用系统，以及如何在不再感兴趣时退出的文献并不多。这些行为具有高度的战略性，且能真正帮助年轻玩家掌握Web3游戏的规则。我希望将这些观点传达给全球北方的观众，以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全球南方玩家的参与，而不是简单地将他们视为受害者。

最后，“没有我们就没有游戏”（“**Without us, there is no game**”）。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它让我思考未来会是怎么样？Web3游戏或Web3经济的成功需要考虑哪些既具本土化特色又具有全球性的条件？这些游戏的战略采纳和退出有哪些不同类型？玩家如何在不同背景下参与这些游戏，又如何抵抗？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我反复提到的，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是如何在我们未曾意识到的情况下，悄然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的？



## 问答讨论

**Q1：**是否可以进一步分析家庭成员共同参与Axie Infinity游戏的互动模式。我观看的一些视频显示，某些社区、家庭或亲属通过“奖学金”机制等游戏外的协作网络参与游戏经济。此外，您将游戏与菲律宾的斗鸡相类比，指出两者都具备“家庭事务”的属性——例如培育战斗单位与家族资源投入的相似性。希望您能深入探讨家庭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A1：**是的，这非常重要。家庭确实在这类游戏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且其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当我提到“参与”时，以女性玩家为例，特别想强调年轻单身母亲群体的情况。这类游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灵活性，允许她们可以在子女入睡后参与游戏，或者在居住条件拥挤的情况下仍能操作设备。更关键的是，游戏让她们有机会提升在家庭内部的地位。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我不再只是母亲，而是能为家人赚钱的人。”这反映了她们在家庭内部的变化。

一些玩家会在凌晨三四点起床游戏，因为此时获胜的几率较高。这成为了一种策略，使他们每天凌晨3/4点投入约三小时进行游戏。许多文献中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管理者与其他玩家之间的剥削性关系。西方媒体广泛报道了管理者的角色，即那些拥有Axie的个体——他们组建团队，雇佣玩家进行长时间游戏。这些管理者通常位于英国、澳大利亚或美国，而普通玩家则主要来自菲律宾或其他国家，为他们工作并创造收益。

在我的研究中，大多数管理者实际上是本地人，他们在家庭成员或朋友之间建立团队。这种模式在以往的讨论中较少被涉及。这意味着，当你的兄弟雇佣你玩游戏，或者朋友之间形成类似的关系，游戏不再只是娱乐，而是变成了一种具有互惠性质的经济合作。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原本基于情感的关系逐渐变得具有交易属性。某位受访者提到：“我们过去一直在学校学习，而现在我学会了如何管理人——不仅要与亲近的人共事，还要与兄弟建立一种高度交易化、商业化的关系。这几乎毁掉了我们的家庭。”

这种现象不仅限于家庭成员，朋友之间亦然。有时，整个家庭会联合起来玩游戏，甚至叔叔会雇佣侄子、侄女组成游戏团队。在COVID疫情期间，这种基于亲密关系的互助网络尤为紧密，目的是最大化游戏收益。然而，当SLP（游戏内货币）价格下跌，Axie的市场价值缩水时，部分玩家迅速抛售，如同甩掉烫手山芋。但另一部分玩家选择继续持有，这与NFT投资逻辑类似。例如，一些玩家表示：“它现在可能不值钱，但你永远无法预料未来。”这种心理状态与迷信或护身符的信仰相似——人们保留它，期待某天能够派上用场，甚至赋予自己某种对他人的优势。

这一现象揭示了游戏如何影响家庭动态，并塑造新的社会经济关系。这值得进一步探讨。

**Q2：**这些数据是否完全指向游戏行为的商品化？换句话说，这些玩家是否都在“边玩边赚”（Play-to-Earn），还是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只是单纯地享受游戏？根据您先前的回答，Web3的玩家始终可以选择如何表达自己的游戏体验，这恰恰构成了Web3游戏与Web2游戏的关键区别。虽然Web2生态中也存在“边玩边赚”的群体，但这一模式并未嵌入其系统设计之中，而Web3游戏则将其深度整合。因此，我想问的是：Web3游戏与Web2游戏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在我研究的社群讨论中，这一问题不断出现，许多人都在思考Web3究竟能提供哪些独特价值。

**A2：**是的，首先许多Web3游戏玩家本身就是游戏老玩家，他们此前主要玩Web2模式的游戏，甚至更传统的电子游戏。而Web3的核心吸引力在于“所有权”概念。NFT不仅因其创收潜力受到关注，更重要的是，它赋予玩家真正的数字资产归属权——他们可以拥有一只Axie，甚至组建团队，并将这些资产记录在区块链上。

对部分玩家而言，这不仅是游戏体验，更是一种探索Web3及其语言体系的方式。他们希望了解：什么是Axie？什么是数字钱包？加密货币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些玩家而言，学习这些知识不仅仅是出

于短期盈利的目的，而是基于一种长期的信念。他们坚信这些技术不会消失，而将持续发展。即便有些人表示未来可能会退出，原因在于某些经历可能让他们感到压力和不适。但总体而言，大多数人仍持积极态度，认为新机遇会不断涌现，并愿意持续尝试。

研究Web3游戏时，我们需要结合特定群体的背景进行分析，尤其是年龄因素。在我研究的案例中，许多玩家是年轻的学生，他们尚未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因此并不完全依赖游戏收益。这与四五十岁需要养家糊口的玩家群体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从人口统计学角度来看，年轻玩家更倾向于实验性探索，而年长群体则更为谨慎。

此外，还有一部分玩家对投资有着深刻理解。他们通常已经具备股票投资经验，是加密货币的早期使用者，拥有数字钱包，并进一步吸引他人进入这一领域。回顾2000年代初，苹果等科技巨头在亚洲布局制造业务的同时，大型游戏公司也开始将业务外包至香港，以利用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更早之前，中国甚至在电竞兴起前便出现了“打金农场”现象，为西方玩家代练升级。这种数字劳动模式从2000年代初一直延续至2017年Crypto Kitties的出现，再到Axie Infinity的兴起，始终未曾消失。

当区块链游戏在2017年重新进入全球市场后，业界开始重新关注游戏的“公共性”问题。Peter等学者的相关讨论成为研究热点，而Web3游戏不仅重新定义了游戏内经济系统，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全球数字劳动模式与技术发展路径。

**Q3：**您提到访谈主要集中在2022至2023年，我想进一步了解：您是否对受访者进行了持续追踪，甚至到现在？特别是在区块链市场波动（从2022年至今）的背景下，我想知道他们在游戏中的投资时间跨度，以及在市场变化过程中，他们的行为是否有所调整。此外，您提到有些人的社会身份得到了扩展，而有些人可能经历了“意外”。我想进一步了解这些“意外”具体指的是什么？这是否与Cheryll的研究有所关联？最后，我也很好奇，如果游戏不再是他们

的选择，Axie的参与者是否会转向平台劳工或自由职业等其他形式的工作？

**A3：**我没有在过去一年里对他们进行持续跟踪，因此我的回答只能基于他们当时的反馈，以及我们询问他们未来规划时得到的信息。

当时许多人因加密货币贬值而退出了游戏。随着加密资产价值的大幅下跌，许多玩家表示，他们不再愿意为此焦虑。然而，受访者强调，无论他们是否继续游戏，他们都从中积累了重要的技能。我询问他们未来的职业规划时，他们提到了自己的专业背景，包括土木工程、统计学、媒体研究和心理学等。

关于移民问题，一些人表示，他们希望通过积攒资金支付学费，从而有机会移民求学。例如，有人计划前往冰岛，因为听说那里的制度良好，正在为此存钱；还有人希望去美国或澳大利亚攻读护理专业。此外，一些受访者考虑将自己的游戏经验转化为职业发展方向，即成为专业的内容创作者，即使不再玩游戏，他们依然能够撰写高质量的Web3游戏评论，分析一款游戏的优劣。这使他们能够进入产品测试领域，从事与游戏相关的工作。他们表示，这类工作不仅有趣，而且他们擅长，并且薪资比菲律宾本地薪酬水平要高得多，尽管相比硅谷或欧洲同行仍然低得多。

关于投资和金钱，实际上更多涉及技能积累，尤其是对女性而言。男性受访者普遍认为，他们已经掌握了这些技能，并愿意继续学习，不会对此感到畏惧。而对于女性来说，这为她们提供了进入新领域的机会，在这个空间中，她们不再仅仅被视为女性，而是可以作为优秀的职业玩家、内容传播者或游戏公关人员获得认可。她们认为，这是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且希望未来能够成为自由职业者或数字游民。因此，观察这些人的职业流动性是非常有趣。

(\*本文注释为编译者注释)

## 讲者介绍



Saskia Witteborn 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她获得华盛顿大学（WSU）博士学位，专攻批判性技术研究和移民与流动过程的数字化转型。她曾与北美、欧洲、东亚以及数字空间的移民合作。Saskia 曾任柏林自由大学（The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柏林洪堡大学柏林实证移民与融合研究所（The Berlin Institute for Empiric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Research at Humboldt University）、法国国立高等电信学校（Télécom Paris）以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访问学者。她的研究成果发表于合集和权威期刊，包括《传播学杂志》（Journal of Communication）、《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远程通信与信息学》（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和《融合》（Convergence）等。她是《不羁之言：流离失所与越界政治》（Unruly Speech: Displace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gression）（Stanford, 2023）的作者，《SAGE 媒体与移民手册》（The SAGE Handbook of Media and Migration）（SAGE, 2020）的合著编辑，以及《在一起》（Together）（Oxford, 2005）的合著者。

- 
1. 原文为：Captures sentiment of people/institutions in lower-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to be denied agency in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order (Hogan & Patrick, 2024)
  2. Axie Infinity 是一款区块链游戏，由越南工作室 Sky Mavis 开发。该工作室以使用基于以太坊的加密货币的游戏内经济体系而闻名。它被称为“依靠菲律宾等国家廉价劳动力来推动其增长的金字塔计划”。
  3. 边玩边赚（Play-to-Earn, P2E）游戏是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游戏模式，允许玩家通过游戏内活动赚取可兑换为现实价值的数字资产，例如加密货币或 NFT（非同质化代币）。

4. 社会技术可供性指在特定社会技术环境下，技术为个体或群体提供的行动可能性或空间。
5. 区块链帝国主义是一个批判性术语，用于描述区块链技术在全球政治经济框架下被权力主体（如国家、跨国公司或技术精英）利用，以延续或强化不平等权力结构、资源攫取或文化支配的现象。尽管区块链技术常被标榜为“去中心化”和“民主化”工具，但在应用上可能成为新的数字殖民主义或技术霸权载体。
6. 种族资本主义一般指资本主义与种族主义在历史与结构上的共生关系。它揭露种族分类本身是资本为合理化剥夺（如土地征用、奴隶制）而建构的社会范畴。
7. 在该语境下掠夺性包容可以用于分析Web3游戏如何将菲律宾玩家纳入全球资本体系，使他们成为游戏经济的劳动力，同时面临经济不稳定和剥削性规则的风险。
8. 原文为：Game ongoing material and symbolic existence in coded space (boyd, 2008)
9. 这里的三个因素指：Spatial flexibility (class)、Temporal flexibility (gender)和 Imagined futures (“scholarships”)
10. 原文为：newfound agency through cryptographically verifiable ownership in digital domains(Nabben, 2023)
11. Cockfighting competitive blood sport: Spain(Marvin, 1984), Bali (Geertz, 1973), UK, Philippines (Guggenheim, 1994)
12. *Web3: Onboarding the next billion users — The road ahead*

# 消除数据偏见以建立包容性技术

DEBIASING DATA TO BUILD INCLUSIVE TECHNOLOGIES

PAYAL ARORA

编译 / 韩秋霞 郑叶颖

我非常喜欢本次会议提出的主题，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与大家深入交流的原因之一。会议主题让我感触最深的一点是：我们是否能够从不同的起点思考全球南方所发生的事情，而不总是借用、依赖那些基于全球北方的理论、关切和经验数据。这一点，我认为非常关键。



让我进一步阐释这一观点在我的书中是如何体现的。我的新书《从悲观到希望：全球南方包容性技术设计的经验》（From Pessimism to Promise: Lessons from the Global South on Designing Inclusive

Tech) 讨论了我近年来观察到的一种趋势：即在数字技术领域，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分裂现象。全球北方对数字技术及其未来越来越悲观，而全球南方地区尽管面临各种风险，却对诸如人工智能（AI）等新兴技术创新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乐观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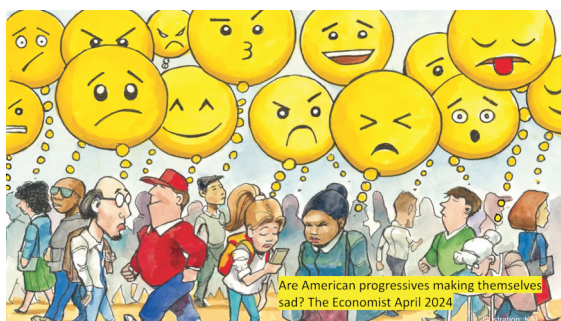
这种趋势可以从大量媒体报道中看出。例如，在全球北方，关于AI 的头条新闻通常围绕着“AI 将导致人类灭绝”、“AI 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AI 正在摧毁我们的民主、心理健康以及社会生活”等悲观论调。一种对数字技术的无力感表现为失望悲观的情绪。许多书籍也巩固了这一情绪，例如《被设计的悲伤》（Sad by Design: On Platform Nihilism）和《监控资本主义》（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北方叙事已经演变为一种人类对抗机器的“大卫与歌利亚”（David and Goliath）式悲剧<sup>1</sup>，人们认为庞大的技术公司掌握巨大权力，侵蚀我们的一切：我们的控制力、身体和生活。

因此，当算法中存在压迫时，它本质上就是种族主义。而大量现有的讨论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是压迫性的还是种族主义的，我们唯一能对抗人工智能的方法就是抵制它。它是与我们作对的东西，我们需要抵制它，这是恢复人性的唯一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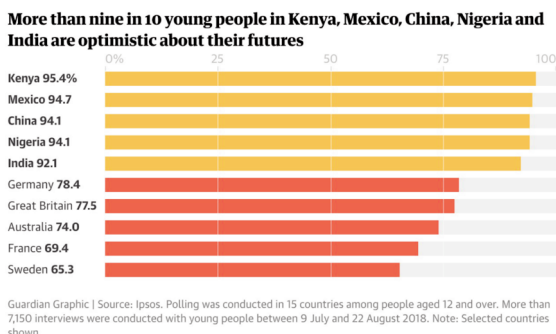
因此，这种将AI 视作人类敌人的认识框架引发我们这一代深刻的焦虑。有人认为，这正在重新塑造我们的思维方式，改变甚至破坏新一代的成长。因此，我们需要禁止它、控制它，尽一切努力远离科技，以恢复自我。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氛围，也难怪全球北方及其相关学术研究对技术抱持如此悲观的看法。

最近有一篇文章探讨了：美国的进步主义者让自己变得如此悲观的原因<sup>2</sup>。这种情绪还远不止于此：美国多项民意调查显示，今天普通美国人对未来比十年前更加悲观。尽管经济等因素没有明显恶

化，但他们认为自己的处境比以往糟糕得多。当然，目前的政治局势加剧了这种绝望，然而这种情绪早在此之前就已经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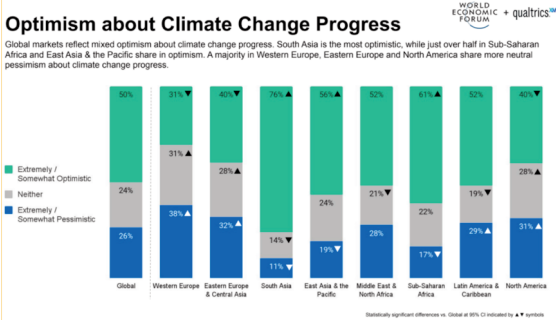


与此相反，多项民调显示，在肯尼亚、墨西哥、中国、尼日利亚和印度等国家地区，大多数人对未来充满乐观，而相比之下，瑞典、法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人们则相对悲观。当问及 AI 对工作场所生产力的影响时，印度、印度尼西亚、阿联酋和墨西哥等国家呈现出更多的积极反馈，而这种乐观情绪在欧洲和美国明显减弱。这是多项民意调查在过去十年内持续调查所得出的结果，呈现出的结果相当一致。



再比如气候变化，同样，在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们对未来的乐观情绪远高于欧洲和北美。这种情况令人困惑，因为全球南

方是受气候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需要承担主要的环境影响，而其资源远少于像荷兰这样的发达国家，且往往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执行机构。那么为什么他们的乐观情绪反而更强？



学术界和媒体对此给出的解释是：他们“天真无知”。学界与媒体认为全球南方过于天真，但这不是他们的错，因为他们缺乏知识。因此，这种所谓的“乐观”被归因于一种缺陷模型（deficiency model）：他们缺乏教育、素养和意识。所以全球北方的任务是教育他们，告诉他们为什么应该将 AI 视为敌人，说明 AI 为何具有极强的压迫性、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从而引导他们走向同样的悲观立：只有批判性地看待技术，人们才能勉强找到未来的路径。

相反，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我在书中从三个视角进行探讨。首先，从人口统计学角度来看，全球 90% 的年轻人生活在全球南方。他们天然就更加乐观，是因为他们有未来可期，而这与老龄化的欧洲人口形成鲜明对比。其次，作为一个年轻人，关键需求之一是自我实现。无论是在印度、尼日利亚、巴西还是菲律宾，年轻人自我发现的机会至关重要。这意味着，当你生活在一个高度保守的社会，比如宗教约束很强，或者你的性取向在全球南方的大部分地区是违法的，互联网就会成为比实际物理生活空间更自由的空间，尤其是与“浪漫经济”（romance economy）有关的现象。在全球南方的很多国家地区，大多数人会经历办包婚姻，很少

甚至完全没有恋爱经历。这种独立探索亲密关系的匮乏，使得数字化世界能够满足年轻人探索自我性取向和亲密关系体验的基本需求，而这种探索是个体成长中非常重要的驱动因素，我们有数据支持这一点。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自由——特别是政治自由和个人自由，这两者在很多情况下是交织在一起的。极端例子包括阿富汗和伊朗，在这些地方，女性在公共空间中往往被“驯化”和“隐形化”，甚至无法与他人交谈。在阿富汗，她们不能歌唱，不能在公共场所行走，她们的权利受到限制。相比这类特定的地方现实处境，数字世界的确为她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赋予人性”（rehumanize）并与外界公共领域接触的机会。这一现象同样适用于许多其他被边缘化、受压迫的群体，比如性少数群体。这些群体都会利用数字化资源获取应有的平等权利。数字空间对他们而言相对安全，这也是一种对数字技术颠覆性的使用方式。

第三，由于地方政府往往无法理解年轻人的需求，我们可以看到数字空间具有一种经济层面上的灵活性。年轻人不再想成为农民或水管工，也不想重复祖父母或父母的职业。他们希望开辟自己的道路，通过跨越传统工作方式，迈向全新的生活。创作者经济

（creator economy）为年轻人开辟了一条小径，让他们能够进行实验并实现劳动货币化，尽管这同时存在各种危害和风险。这并不是说他们不了解这种“掠夺性机制”（extractive nature），相比而言在特定地方这一经济模式的好处显然大于其风险。例如在纳米比亚，高失业率显而易见。我和我的团队在纳米比亚发现，大约 60% 到 70% 的农村青年在某一时期阶段处于失业状态，这导致他们陷入深度抑郁。因此，他们利用数字资源不仅仅是为了连接网络，还尝试寻找潜在的就业机会，同时也在探索开辟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我们需要新的看待 AI 的出发点，而不是陷入“AI 是好还是坏”、“它是否造成压迫或性化”等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这种框架限制了我们以多元视角分析全球南方作为独立实体的复杂性。

因此，我将提出五个基本理论，用来反思和挑战既有的全球北方强势理论。

## 1. 数字鸿沟：从工具性到整体导向

### Digital Divide From instrumentality to holistic oriented

我是联合国及许多其他机构的董事会和委员会成员，最近与一位联合国高级官员进行了一次令人不安的对话。这位官员长期致力于推动“最后一公里上网”（即让偏远地区接入互联网）。然而，她坦言自己正陷入伦理困境：她认为，让全球南方用户接入互联网存在伦理问题，这可能意味着将全球南方送入“数据攫取器”（data extraction machine）和“数据殖民机”（data colonial machine）。因此，这种看似弥合数字鸿沟的行为可能并非正确之举。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反思正在那些倡导“数字权利”的圈子中发生，因此，这种争论显得尤为令人不安，而类似的话题在十年前几乎不曾出现。如今，是否应将全球南方群体接入互联网，竟成为一个合法性讨论。这种趋势无疑令人震惊，因为接入网络本应是一项基本权利，而这种思潮正在跨领域、跨行业蔓延。

而这实际上会进一步疏远全球南方。此外，这其中也存在一种双重标准：那些声称数字化有着各种有害特质的人，恰恰是那些在网上与追随者高度互动的人。例如，以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为代表的各种人物都在社交媒体上异常活跃，并从中获得各种好处。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智识上的诚实和个人层面的坦率：如果我们在全球北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中，正在日常生活中消费这些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工具，那么为何要为全球南方设定一种不同的标准？除非我们打算放弃使用所有这些工具，或者认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拥有更好的工具，又或者认为我们比全球南方的人们更具备个人能力。因此，我对目前的这种趋势深感不安。

还有一种奇怪的现象，这种现象始于后殖民心态（post-colonial

mentality），即全球南方与北方存在数字鸿沟，并且随之衍生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分化，然而这一状态现在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我的上一部著作中，我讨论了过去十年来新增的互联网用户群体的动态变化。其中数据成本在这十年间的变化极其显著——全球南方从全球数据成本最昂贵的地区变成了成本最低的地区。如今，移动互联网成本最低的国家包括印度、中国、菲律宾、柬埔寨和以色列等。如果你与典型的全球北方普通民众交流——当然，这不包括那些对这些领域非常关注的人——他们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依然假设西方拥有最廉价的互联网，这一判断并不基于任何相关数据统计。因此，他们的世界观仍停留在过去的数字鸿沟概念中。然而，事实上，全球南方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北方。例如，他们在金融科技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比如亚洲国家普遍应用金融科技最多。例如十年前，当有人问到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对比亚迪的看法时，他曾对此嗤之以鼻。而今天，他却恳求欧盟监管机构阻止比亚迪进入西方市场，他明确表示否则这将摧毁整个市场。然而，我们似乎仍未理解这一变化，我们依然固守西方进步的概念和框架，并将全球南方视为数字上的“缺乏者”。

## 2. 渴望的算法与压迫性算法

### Algorithms of Aspiration vs. Algorithms of Oppression

另一个视角是“渴望的算法”（**algorithms of aspiration**）。我在新书中提出这一观点，用来与“压迫性算法”（**algorithms of oppression**）形成对照。在此，我想明确回应一点质疑：这是否在否认算法的压迫性？我并没有否认这一点，然而我的关注点是比例问题。学术研究往往过于专注于算法的压迫性维度，例如性别歧视、种族歧视，而鲜少以更全面的视角看待 AI 的作用。这种单一视角会引导我们陷入一种消极的螺旋式思维，仿佛 AI 毫无价值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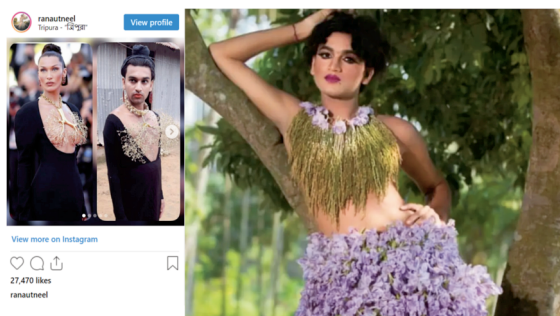
而在我的研究工作中，作为一名数字人类学家，我过去二十年间主

要在印度、巴西、纳米比亚等地的边缘化社区开展研究。我们发现人们对任何形式的数字创新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事实上，在美国，非裔美国人的低收入群体对 ChatGPT 的乐观程度远高于美国其他人群。然而，我们却倾向于专注于 AI 的压迫性，而没有尝试去理解：他们为何对人工智能如此兴奋？以下是其中几个原因：

首先，全球南方地区许多人缺乏优质教育，或者缺乏优质教材，尤其缺乏用他们的母语或方言编写的教材。此外，教师经常缺席或无法到校授课。在这种情况下，像 ChatGPT 这样的 AI 工具提供了一种几乎类人化的支持，使得这些用户能够与其深入对话，并以一种高度个性化的方式进行学习。因此，这些群体对这些工具充满渴望并保持乐观是有原因的。通过实际使用和实验，我们发现低收入群体的年轻人往往会花费 10 到 14 个小时投入于此。他们对 AI 工具的潜在功能感到痴迷，因为这些工具可以帮助他们开拓新的谋生方式和自我存在的形式。同时，由于这些群体往往长期不被看见或听见，他们的处境被各种不利因素所限制——例如，英语不是他们的主要语言，他们身处全球南方，没有享受到发达网络的优势，而这些工具通过偶然性和“渴望的算法”为他们提供了某种机会。

以 Ranautneel 为例，他是一位来自印度的“农村网红”，住在接近农村的三线城市，他通过使用其所在农村的本土材料响应全球时尚趋势。我们可以看到，他仅靠一张图片就获得了 27,000 多个点赞，而他所拥有的粉丝数量甚至超过了许多全球时尚品牌。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而这一现象在十年前是不可思议的。这不仅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展示自我的途径，也打破了都市印度人对“乡村性”的固有观念。

我最近为印度一些初创企业做了一次内部书籍分享会，这些企业的员工在阅读我的书后表示，最大的收获之一是，他们之前从未真正考虑过印度的乡村市场。他们默认乡村地区非常保守，因此只关注城市市场。而看完书后，他们感到振奋，认为应该认真考虑乡村二、三级市场作为用户、消费者和创造者。



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兴奋，它推动人们重新审视自己既有的观念框架。我相信在每个国家，无论是菲律宾还是中国，都存在关于农村的刻板印象。我们往往将其定格在过去的时间中，然而它们是公共与多元文化的交汇点，需要特定理论思考。

另一种“渴望”推动全球南方的年轻人连入网络。在我们的采访中，有一位参与者通过大量视觉创意在网络上制造浪漫创想，而这种创意表现形式在这一人群中非常常见。更有意思的是，根据全球调查显示，欧洲和美国的典型年轻人往往不认为自己是“全球公民”，比如只有不到30%的德国人认同这一身份。而全球南方地区的年轻人中，大约有80%到85%认为自己是“全球公民”，即便他们中的大多数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城镇或国家。这反映了一种渴望，而这种渴望在线上得到了体现。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些年轻人通过接触全球化的叙事、全球化的媒体和娱乐，成为一个更大的跨文化叙事的一部分。



### 3. 关怀式监控与监控资本主义

#### Surveillance of Care vs.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另外，对于全球南方群体而言，接入网络所能够获得的“关怀式监控”（**surveillance of care**）往往多于“监控资本主义”

（**surveillance capitalism**）。近年来，我接触到一些硕博士研究生，尤其是来自东亚的学生，告诉我他们很难让自己获取的数据与“监控资本主义”理论契合，因为他们的受访者，比如越南的用户，似乎对这些平台非常感兴趣。那些用户并不觉得这是压迫性的，即使他们知道他们的行为被货币化，也了解其潜在的危害。但他们通过平台分享信息，并将其视为一种彼此团结互助的方式。例如，在创作者经济中，用户会分享关于如何制作内容和使用人工智能的经验。以非洲的创作者为例，他们建立了大量非常值得关注的子群体。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要想作为一个整体推动自身发展，合作是关键。因此有了这种“关照彼此”的概念，而不是单纯地“观察彼此”（**watching over each other versus watching each other**）。因此，这里不仅仅存在监控资本主义式的数据追踪与攫取，还有一种“关怀式追踪”（**tracking for care**）。我们开展了一项为期三年的研究，聚焦于印度和孟加拉国的网约车行业。研究发现，女性司机非常希望公司对她们进行追踪，因为这可以保障安全、便于问责。毕竟，她们需要搭载陌生人并往往在深夜工作。此外，她们还希望实现双向沟通，例如司

机能够评价乘客的性骚扰或不当行为，让公司将这些乘客列入黑名单。这本质上也是一种追踪。



我们需要意识到，在全球南方的大多数地区，女性的权利与男性并不平等：她们往往被视作“二等公民”。例如，在监护制度下，她们需要男性的陪伴才能出行；她们在公共空间中的权利也远不及男性，这在阿富汗、伊朗等国家地区非常常见。印度的性别不平等文化也是女性从事网约车行业的最大障碍之一，尽管市场对女性司机的需求极高，因为许多人认为选择女性司机更安全。无论是送孩子上学，接送年迈的父母，还是家庭中的女性成员的出行，大家都倾向于选择女性司机。然而，女性司机却十分稀缺。这种供需矛盾的部分原因在于，女性司机希望被公司和同行追踪，这样她们才能感到安全。

#### 4. 再生式人工智能与抵制人工智能

##### Regenerative AI vs. Resisting AI

第四个议题有关再生式人工智能（**regenerative AI**）与抵抗人工智能（**resisting AI**）。当我们听到很多学者，特别是批判性数据研究领域的学者对 AI 的看法时，他们常说，“我们之所以批判，是因为我们关心，我们将批判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但是，当他们谈论 AI 背后的大型科技公司时，往往以“抵抗”的形式呈现。然而我们如何

能够集体抵抗权威，抵抗大型科技寡头，抵抗来自上层的压迫力量？”两周后我将参加一个会议，我们的讨论小组将讨论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如何应对（brace）AI？”而我在想，为什么我们要抱有如此负面的观点呢？“应对 AI”就像是我们需要为最坏情况做好准备。这种心态的出发点非常消极。然而，如果从再生性角度思考，AI 可以成为我们的盟友和朋友，只要我们为其建立正确的“护栏”（guardrails），让人们得以充分利用。

如我在之前的例子中提到的那样，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网络上的许多仇恨言论实际上有关性别歧视。Twitter 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因此，如果我们确保这些空间有问责机制，让那些发表性别歧视言论的人无法使用甚至访问这些平台，或者受到某种形式的惩罚，我们就能够为每个人创造安全的数字公共空间，让大家都能享受这些空间并利用这些工具获取利益。

以下是一些具体的例子，说明 AI 是如何再生的，并且为什么使用 AI 的社区会因此感到骄傲。伊朗的女性运动正在使用 AI 提醒大家，伊朗是伊朗人民和政权的国家。伊朗曾是一个进步的国家，在此人民享有自由的权利——可以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甚至可以公开接吻而不遭受严重后果和身体伤害，这种自由仅仅在几十年前就存在。活动家生成 AI 图像用于说明这一点，作为在伊朗境内进行道德抗议的一种方式，同时它不会让人们处于危险之中。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视听赋权策略，引发抗议活动带来的群体情感，而不把人们置于危险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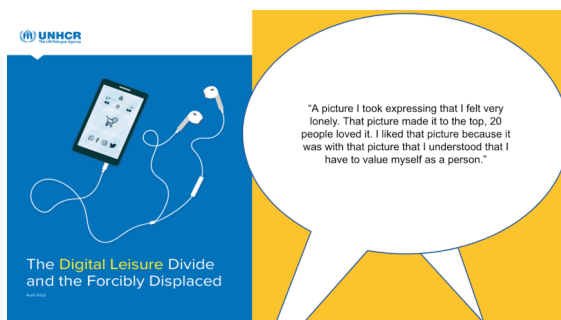
目前，我有一个名为“包容性 AI 实验室”（Inclusive AI Lab）的项目，我们正在投资建立一个包含伊朗和阿富汗女性的合成视听叙事资料库。我们希望将其放入创意共享平台，让这些女性重新被赋予人权，以向公众展示她们的形象。

另外一个例子是，在玻利维亚，我们通常对拉丁美洲的土著社区存在刻板印象。在这里，艺术家 Miranda Gamel 利用 AI 技术，抵消算法偏见，用极具表现力的方式，展示这些社区的形象，某种程度上是在“游戏”算法，从而可能改变我们看待这些社区和世界的方式。

在我们关于巴西和委内瑞拉边境的难民研究中，我和联合国难民署（UNHCR）团队进行为期一年的合作。我们发现，大多数年轻难民并没有选择退出，而是希望加入数字世界。他们与数字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共鸣，并发现其中的巨大价值。他们喜欢在线上活动。以下是一位来自委内瑞拉的同性恋者的自述，他最终在网上出柜，并得到了巨大的支持：

我的梦想是做视频，因为我的故事很难讲述。我曾经经历过两次心脏病发作，后来得到了上帝的拯救。还有有些事情我希望世界能理解——我不仅仅是一个难民，我有自己的故事，我想被听见、被分享。我拍摄了一张照片以表达我的孤独，这张照片被许多人所喜欢。我也很喜欢这张照片，正是这张照片让我明白，必须重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

数字平台能够为这些个体提供自我表达和认同的机会。



## 5. 数据作为货币与数据殖民：数据殖民主义与技术迷恋

Data as currency vs. Data colonial, data colonialism, techno-fetis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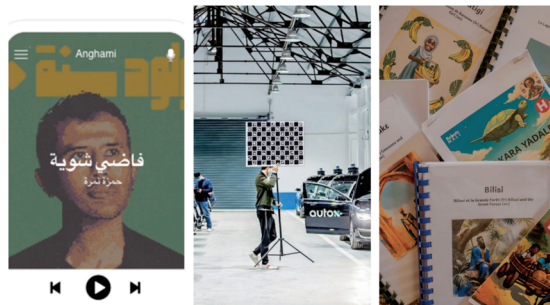
最后要提到的是数据作为货币的问题。这与大量关于数据攫取、殖民主义和科技迷恋的文献相抗衡，人们看到数据也是一种货币。用户意识到，虽然公司通过他们的数据获益，了解了他们的行为，但这种关系总是相对的，尤其是在用户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就如我在前面的案例中提到的那样，他们理解这是他们进入数字世界的一种方式。我并不是说这是一种理想的方式，我们当然更希望没有数据追踪。但是另一方面，这一切总是相对于我们所看重的内容，尤其是在优化和个性化的背景下。

我们需要诚实地面对人们做出决策的方式，并对他们为何做出这些决策所带来的公正机会给予理解，而不是默认将其归结为数据殖民主义的叙事。我的一些同事前往印度“原生 5G”（indigenous 5G）进行调研。他们研究了这些基础设施网络，并得出结论：印度的技术政治空间并不关心公共价值，而具有极强的压迫性。他是一位新马克思主义学者，然而我认为他的观点过于苛刻。印度已经开创了世界上最大的数字公共基础设施，这使得年轻人能够免费接入互联网，甚至成为创业者，而不必支付安卓或 iOS 系统的“黑社会税”，即 20% 到 30% 的费用。

他的研究问题也基于这样的假设：“这与爱立信有何不同？”他指出，印度政府拆除爱立信的基础设施，取而代之的是政府自己的基础设施，这本质上还是国家监控。所以，全球北方学术界，尤其是在批判数据研究领域，往往把全球南方视为受害者或国家压迫者，两者之间似乎没有空隙。在他们看来，用户不可能从这些公共数字基础设施中获得价值，因为他们处于国家的监控与压迫之下。我并不否认我们需要批判研究，但我们需要留出讨论的空间。



如 Anghami（中东和北非地区领先的音乐流媒体平台），正在实验 AI 工具通过 AI 分配创作来源，并允许 AI 生成音乐，而大多数国家长期以来存在着这类非正式经济（informal economies）。我们有很多非常独特的视角，这些视角在全球北方关于零工经济（Gig economy）的文献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而这一点并没有被充分发掘。似乎从“零工经济”范式在全球北方学者研究中出现后，非正式经济才成为一个话题，但这在全球南方的国际发展研究和其他相关学科中早已有大量研究。



因此，作为总结，我们可以通过认识到我们处于不同的立场来打破这种悲观的泡沫。如果我们想要保持知识的诚实，就必须认识到这并非非此即彼。我们需要仔细描绘并充分权衡人们做出某些看似令人困惑的决策背后的原因。



## 问答讨论

**Q1:** 非常感谢您的演讲！关于全球南方，您提到的所有技术其实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由人们直接拥有和访问的技术，另一种是平台化且由公司拥有的技术。这两者的差异非常大。因为您提到“监控为关怀服务”的观点，比如，我们中国政府以类似父母式的监管著称。我记得有一次叫网约车，司机的手机会一直被平台录音，所有的对话都会被记录下来。这给司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让他们避免和顾客发生冲突。乘客在乘车时也有很多规则需要遵守。所以，虽然我在某种程度上同意技术能够为全球南方带来一些积极影响，但我有些不确定，是否技术真的能带来抗争和赋权，毕竟也有很多技术并不能如此。但我还是比较认同全球南方的技术具有积极面。那么，您是否对技术所有权有不同的意见或思考？

**A1:** 非常感谢您的提问。首先，确实存在很多需要关注的问题。比如，我曾看到一些统计数据，由于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并不具备自

由民主制度，因此他们面临的风险和伤害要远高于其他地区。然而，全球仅有不到7%的国家是自由民主制国家，并且这些国家通常还非常保守，并且存在父权制问题。面对如此多的挑战和困境，尤其是国家监控问题，为什么这些人仍然表现出如此强烈的乐观情绪？尽管面临如此多的困难，为什么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仍然能遇到许多人对技术充满希望？我并不是说他们是天真的，但这让我停下来思考。因为我享受着荷兰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生活，尽管我来自印度。虽然我并不住在那里，但我的整个家庭都在那里，我对那里的动态变化和风险是非常敏感的。如果他们感到乐观，那么我就必须给予他们这种乐观情绪应有的重视。关键在于，这种乐观情绪与什么有关？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您说得对，关于监控和持续监视的具体例子确实令人担忧，尤其是当这种监控是单向的。如果监控同时也作用于顾客，并且对顾客对待司机的行为有责任追究，并且有相应的后果——比如我们在女性清洁服务公司，如 Urban Company 进行过的一项研究，研究对象是那些进入陌生人家中的女性，她们提供清洁、理发等服务。这些人的工作需要他们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的家，而如果服务提供者是女性，那个陌生人可能做出任何行为。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对顾客的评分来施加某种责任呢？这点非常重要。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尽管面临如此多的挑战，印度的女性往往更倾向于被持续追踪，因为现有的社会体系对她们不利，充斥着父权和性别歧视。

我认为这是关于权衡取舍的问题，这些女性知道这些技术对于不怀好意者来说是令人害怕的。我有很多其他的例子，但从根本上讲，关于所有权的问题也是如此。前几天我正在审阅一篇来自顶级媒体学术期刊的文章，文章中提到，非洲没有自主权，因为大多数基础设施是由美国或中国拥有的，他们基本上只是被动的接受者。我想，怎么能把整个大陆描绘成没有自主权的状态呢？因为这样做其实是在削弱一个事实，那就是非洲的用户群体非常庞大，并且非常年轻，非洲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上网用户，而到2030年，非洲的年

轻人口会占据更加显著的比例，他们将拥有数量上的力量。而公司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关心他们的客户。我们如果认为这些人完全没有任何权利和自主性，那是过于悲观的。是的，局势对他们不利，但他们依然选择参与其中。

这让我想到了公共空间所有权的概念，实际上是合作化的。举个例子，像纽约的华尔街公司，有时候这些公司会拥有他们大楼外面的一部分街道，在伦敦也是如此，但这些地方依然是公众使用的空间。因此，所有权存在，但这也涉及到控制的方式。当 Facebook 威胁要退出澳大利亚时，经过一周的大规模批评后，他们又回来了。所以，虽然你可以拥有某物，但你无法完全控制并对你的用户做任何事情，Facebook 作为全球最大的社交媒体，对用户群体的代理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全球南方是全球最大的用户群体，我们应该要有信心，认识到用户人数的力量。所以，我知道还有其他问题，我自己也在与这个问题作斗争，我希望能够给人们作出看似不理性选择的原因给予公平的重视。我无法接受那种“缺陷模型”，只是认为他们只是天真而已。所以，这正是我想要弥补的差距。

**Q2:** 我从大学时就开始学习计算机科学，我也做了很多关于社交媒体和社交网络的研究。我们可以说今天技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数据，尤其是大多数人工智能和大型语言模型都是由西方开发的，使用的主要是西方的数据集，特别是英语世界的数据集，而其他语言的数据集相对较少。那么，全球南方如何才能为全球南方的人们开发出属于自己的人工智能呢？正如你所提到的，大多数人工智能系统是为西方世界设计的，关注的是他们的福祉和权益。那么，如何利用全球南方的数据，使得其中大多数数据最终服务于其他地区的人们呢？

**A2:** 谢谢你的问题这也是很多全球南方很多地区充满乐观情绪的原因之一。例如，长期以来，（技术发展需要）迎合不同语言的需求是非常不现实的。以印度为例，印度有 22 种区域语言和 2,000 种方言，因此从财政角度来看，无法为这个资源有限的国家提供多语言

服务。然而，随着大型语言模型的出现，这一局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现在，很多地区方言的微型语言模型已经得以建立，甚至一些区域方言也被纳入其中，这在印度是非常明显的。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非洲，很多创业者正在打造超本地化的解决方案，来解决当地的问题。这些企业家正在构建适应当地需求的语言模型，（让人们能够）使用这些地方性语言模型。因此，这也赋予他们相对于来自全球北方的通用大型语言模型的优势。我们可以看到，非洲、印度、菲律宾的创业潮正在兴起。东亚地区也是如此，我最近在和东亚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之一进行内部交流，他们展示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正利用人工智能，不仅关注语言问题，还在考虑本地化优势，并能够通过合成数据进行捕捉和扩展。但问题在于我们的学科之间并没有很好地进行连接。例如，批判性数据研究与移民研究并没有与社会创业研究有交集。我认为我们需要真正的跨学科对话，这样才能捕捉到正在发生的变化，并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商学院对此非常敏感，很多创新与创业的学术研究都非常关注这一点，但他们并不完全认同批判性数据研究的观点。批判性数据研究等学术领域虽然非常重要，帮助建立伦理框架以确保责任和安全性，但我们仍然需要跨学科的协作，以便优化这些基于证据的方法。

**Q3：**我相信在座的许多人也有类似的看法，虽然我不能替他们发言，但之前您提到的内容都指向未来将朝着类似的方向发展。关于你提到的全球北方如何以过于父权主义的方式向全球南方解释一切，这也是历史上非常常见的议题。很多时候，他们总是这样框定：等待就好，终会到达。那么，我们该如何干预这一长久以来的叙事？如何反击这种局面？

**A3：**非常高兴再次见到你，谢谢你的问题。你提到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应该从理解普通人，尤其是那些被边缘化群体的需求入手。我们通常会问他们的担忧和问题，关注其伤害，但我们往往忽略了他们的价值观：为什么他们在所有这些问题面前仍然选择在连

接网络？一旦认识到其中的原因，我们就需要将其放在中心位置，确保在建立平台和制定政策时，不会破坏他们所珍视的东西。确实，全球北方在财力上具有巨大的不对称优势，尤其是美国在生成性人工智能方面的强大影响力。然而，是否可以将全球南方的用户和公民放在中心位置，关注他们所热爱的，而不仅仅是他们所害怕的？比如，欧洲经常宣称，他们制定的人工智能法案是为全世界设计的，但如果仔细研究，你会发现，这些法案完全是基于欧洲的价值观。而且，你会发现这些法案并没有真正考虑到全球南方的情况。如果直接复制这些政策，可能会对全球南方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会剥夺很多地方文化的核心。比如“同意”这一概念，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女性可能因法律规定需要获得丈夫或父亲的同意才能自由行动。因此简单的“同意”概念并不能适用于这些地区，因为这些地区的选择并非真正的选择。

我一直在推动敏捷软件开发（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sup>3</sup>的发展，也在印度数字经济委员会担任职务。我们注意到，印度的数字生态系统虽然令人自豪，但当谈及技术带来的伤害时，更多关注的是网络诈骗和威胁，而忽视了人们在使用这些技术时所感受到的真实困扰。像印度、墨西哥等地的某些群体，会因为可能感到不安全或受到骚扰而远离某些数字工具。所以我们应该更加关注这些群体的需求，同时也要了解他们真正看重的价值。比如，在疫情期间，很多市场的从业者开始在线直播，这不仅帮助他们维持生计，而且特别是女性通过直播建立了社群感，这也让她们能够获得使用数字工具的合法理由。

最终，我想说的是，我们在全球北方有责任去开发适合全球南方的工具。幸运的是，我看到全球南方，尤其是非洲和印度，正在涌现出不同的解决方案，这可能会为我们带来新的范式变革。这是另一个话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是我们接下来要面临的挑战——如何从现在开始走向未来。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们在讨论这一点

时必须强调，我们不应陷入这种决定论的思维方式。例如，有学者认为我们已经失去了对数据、对自我、对生活的控制。这是一个非常决定论的说法，他声称我们已经被数据殖民化，失去自己对数据的控制权。然而，他依然在线上，享受着这些技术带来的便利。那么，他是否已经承认愿意成为数字技术的仆人呢？你说得对，问题在于所有算法天生就是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压迫性的说法是非常有害的，如果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既定的状态，那么为什么还要起床去改变它呢？

因此，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即理解人工智能是通过数据进行训练的，数据集本身存在缺陷——“垃圾进，垃圾出”。但是，假如我们不再输入垃圾数据，而是开始构建高质量的数据集呢？我们实际上正在进行这样的工作。我们正在为人工智能系统构建招聘合成数据集，这是欧洲一项大型资助项目的一部分，这在欧洲非常普及。然而，我们面临的经典问题是，像亚马逊这样的公司往往将 CEO 职位推荐给白人男性，因为数据集的历史就是这样。那我们如何改变这一点，如何让算法在思考职位时不依赖身份特征呢？我们目前正在与计算机工程师、社会科学家和人类学家合作，构建一个高质量的数据集，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合成数据扩展它。合成数据本质上是这种高质量数据的复制。这是 AI 技术令人兴奋之处，几年前这是不可能的。

我还在做的另一个项目是与一家大型设计公司合作，去矫正他们的视觉数据集。当你在印度 Google “女性工作”时，搜索结果中有很多刻板图像，比如“非洲儿童”之类的贫困图像，而这些图像大多由援助机构创造，用于募捐等目的。那么，如果我们能改变这些数据集，去多元化非洲人想要被呈现的方式呢？我们正在进行这个工作，目前已经聘请了印度的创意人员，对数据集进行调整，并计划在扩展到肯尼亚乃至拉丁美洲的第三个国家。这不仅仅是合作，更是团结，我们可以一起完成这项工作。这是一个可以复制的努力，最终（好的数据集与 AI 工具）会进入创意共享平台。我认为这些充满希望，归根结底，数据集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每天的交流实践

本身就是数据，我们可以通过集体努力“游戏化”系统，从而改变算法。所以，这一切正在发生，我们只需要放大这些努力，来改变这个局面。

(\*本文注释为编者注释)

## 讲者介绍



Payal Arora 是乌得勒支大学 (UU) 包容性人工智能文化教授，也是FemLab和包容性人工智能实验室的联合创始人。作为一位数字人类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她在全球南方地区拥有二十年的用户经验，致力于推动构建包容性人工智能设计和政策。Payal撰写了100多篇期刊

文章和获奖书籍，包括与哈佛大学出版社合著的《下一个十亿用户》(The Next Billion Use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福布斯杂志称她为“下一个十亿用户的冠军”和“改革科技界的合适人选”。她与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合作的新书《从悲观到希望：全球南方包容性技术设计的经验》(From Pessimism to Promise: Lessons from the Global South on Designing Inclusive Tech) (The MIT Press, 2024) 在国际媒体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包括《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BBC《科技解码》(BBC Tech Decoded) 和《UX杂志》(UX Magazine) 等纷纷报道。约150家国际媒体对她的工作进行了报道，其中包括《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99% 隐形》(99% Invisible)、《TechCrunch博客》(TechCrunch) 和《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 等。她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提供咨询服务，包括联合国难民署、Spotify、毕马威、Adobe、IDEO、谷歌和通用电气等，并担任多个董事会成员，包括联合国董事会和纽约世界妇女全球理事会。她曾在67个国家的350多个重要活动和邀请演讲中发

表讲话，包括ACM FAccT、哥本哈根科技节、re:publica、COP26、世界经济论坛、瑞典互联网基金会等活动，与Jimmy Wales、Steve Wozniak等人物同台，并在TEDx演讲中探讨互联网的未来和创新。她曾是洛克菲勒贝拉吉奥（Rockefeller Bellagio）的驻地研究员，拥有印度、美国和爱尔兰血统，视阿姆斯特丹为家。

- 
1. 这里使用 *David and Goliath* 的寓言以比喻人类对抗机器是以弱战强。
  2. *Are American progressives making themselves sad? Conservatives seem more excited about change*, from *The Economist* April 2024
  3. 敏捷开发是一种应对需求快速变化的软件开发模式。

# 当人工智能遇上WEB3：共筑可持续数字经济

WHEN AI MEETS WEB3: FOR  
SUSTAINABLE DIGITAL ECONOMY

朱飞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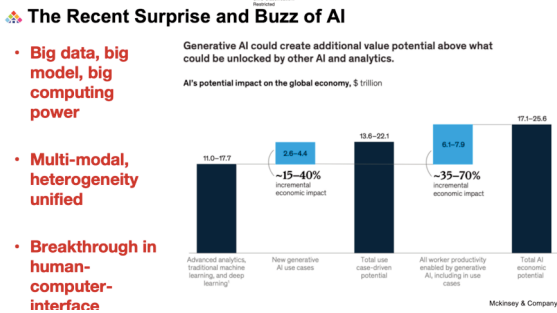
编译 / 田沛松 叶云鹤

现在，我的脑海中仍然充满了刚才听到的精彩概念、想法和对话。前一位演讲者（指Saskia Witteborn）已经为我关于数据货币（data currency）的话题做了很好的铺垫，比如提到不同社群之间对话的互联缺失。我认为这次论坛的美妙之处在于能够汇聚来自不同领域的人。我自己来自计算机科学领域，而在这里，我遇到了来自人类学、社会科学和媒体艺术的学者。我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跨领域交流，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不过，我有些惊讶我们没有安排小组讨论环节，那会是一种更有趣的对话和讨论形式。下次我们可以考虑设置小组讨论环节。明年，如果能在新加坡共同组织这个论坛，我会非常欢迎大家前来。

现在回到我们的话题，我想谈谈作为可持续数字经济的Web3。这涉及另一个关键词——人工智能（AI）。AI对我们至关重要，而有趣的是，这两个词如今引发了诸多困惑。当人们谈论人工智能时，如果你问他们人工智能究竟是什么，你往往会得到极端的答案。但正如我们所知，我们甚至不确定是否已经实现了真正的人工智能，即所谓的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通过计算机获取几乎一切信息，这本身已经

令人困惑；更糟糕的是，如果你问人们Web3是什么，很多人可能会误以为这只是区块链的一种时髦说法。他们认为区块链等于加密货币，加密货币等于ICO<sup>1</sup>，而ICO又等于欺诈，因此这几乎意味着人们认为Web3等于欺诈。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今天，尽管我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我还是想分享一下我对这一领域的看法。我认为Web3和AI是完美的组合，它们之间并非总是相互排斥。相反，在很多时候，它们能够携手合作，共同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数字经济。



在过去的几年里，人工智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想快速回顾一下其主要特征，并探讨为什么这一波人工智能能够再次带来如此多的惊喜。首先，正如我们所知，这些成就主要归功于大数据、大模型以及强大的计算能力。今天，前面的演讲者提到一个问题：如今我们几乎已经耗尽了所有可用的数据。下一步的挑战是，如果我们找不到优质资源来提供新的数据，那么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些所谓的大模型所能达到的效果将是有限的。因此，下一步该行业的重点将是：如何提取出目前仍存在于我们大脑中的知识。这些知识并非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而是关于这些领域的经验教训，它们仍然深藏于我们的头脑之中。现在，一些好的想法包括开发工具和平台，让我们能够自然地从中提取知识，并将其转化为可用的新数据。

第二点是，将处理单一类型数据的算法工具整合在一起，实现多模

态、异质性统一 (multi-modal, heterogeneity unified)<sup>2</sup>。回顾人工智能的历史，我们曾为不同领域开发过算法。然而，我们为处理文本而设计的算法，无法处理多媒体或图像；如果我们为数值数据开发了一种算法，那么它对处理网络数据无能为力。如今，AI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通过代币 (token) 的概念来统一各种数据集。这非常重要，现在我们真正具备跨平台能力，能够处理所有数据，并通过同一个模型统一代币，从而应对各种需求。稍后，我们将再次沿着这一思路探讨为什么代币如此重要，以及它是如何在数据经济中捕捉价值的。因为代币本身是“空”的，这意味着它可以捕捉任何东西。这听起来有点哲学意味——“空”意味着它可以成为任何东西。

第三点是人机交互方式的突破 (breakthrough in human-computer-interface)。如果你回顾历史，回到计算机真正流行的时代。在我学习计算机时，从MS-DOS到Windows系统的转变是第一次重大飞跃。当时，人们惊叹道：“哇！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拖放操作来完成任务，而不是输入命令行。”第二次突破是在人机交互方面，当你需要进行网页搜索时，可以选择使用谷歌搜索，而不是在索引或门户网站（如雅虎黄页）上浏览互联网。第三次突破是GPT的出现<sup>3</sup>，它真正使计算机能够以最自然、符合人类交流习惯的方式与我们互动。如果让我预测，我会说下一次突破将是当我们真正拥有神经链接时，我们可能会用思想来控制计算机或设备，但这并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

### An Increasingly Powerful AI Poses New Challenges

- **AI Governance** is critical and pressing, especially for finance
  - Privacy & Security
  - The transparency and verifiability of transaction
  - Fairness & Algorithmic Bias
  - The provenance of data and accountability of model
  - The democrat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of large models
  - The fair profit allocation for contribution of data, model and computational power



我想谈这样一个事实：鉴于上述这些原因，人工智能不断引发讨论热潮。然而，随着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强大，我们看到了许多问题，人工智能治理也变得愈发紧迫。当然，这绝不是我们目前面临问题的详尽清单（见上图）。正如前面的演讲者所说，我们不应过于悲观。我们确实有很多理由保持乐观，并且可以提出一些好想法。由于时间有限，我们无法深入探讨每一个话题。我在大学里教授人工智能治理时，每个主题我们实际上都花了一周时间来讨论，例如隐私问题（privacy & security）。

第二个要点——交易的透明性和可验证性（the transparency and verifiability of transaction）。如今，每当我们使用ChatGPT时，人们其实并不清楚它究竟是如何保存我们的数据的。去年，当Sam Altman（即OpenAI首席执行官）来到我们校园时，我问他GPT如何存储用户数据、数据会跨会话保存多久，他给出的回答并不令人信服。因为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实例，似乎可以感觉到数据以本不该被保存的方式保存。所以，使用这种大型模型的一个问题是：它集中了计算能力，而我们正在贡献数据。因此，我们确实需要能够验证这些数据。就像在区块链中常说的那样：“不要信任，但要验证”。

此外，公平性和算法偏见问题（fairness & algorithmic bias）也在过去五年里引发广泛讨论。这是因为计算机人工智能正在为我们生活中许多重要事务做出决策，而我们开始质疑这些决策是否真正公平，是否存在偏见。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是，前段时间在美国，一个面部识别算法引发了争议。人们发现，该系统在识别高加索人种的面部时表现极其优异，但在识别非裔美国人的面部时却表现极差。正如我们所知，这在美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因此，人们开始调查究竟是什么导致这一问题——他们想知道这是由于系统性算法偏见，还是其他原因所致。最终，调查发现问题并非出在算法本身，因为算法并没有针对任何特定群体。真正的问题在于训练数据：当时用于训练模型的大多是高加索人的面部图像，而非裔美国

人的面部图像数量极少。这就是为什么算法最终表现出了这样的偏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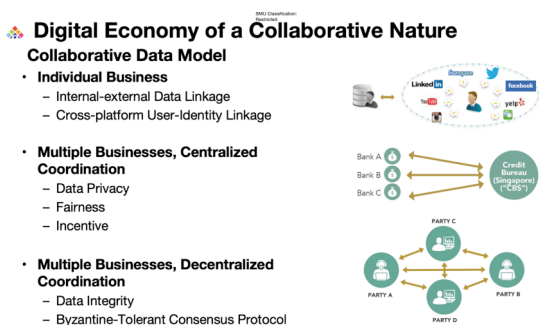
这进而引发了关于当今数据溯源和模型可问责性（the provenance of data and accountability of model）的讨论。鉴于人工智能在我们的生活中的重要性，一旦出现问题，我们需要能够追溯数据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每一个使用环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数据显著性（data prominence）。不幸的是，在现在的商业环境中，很少有企业在维护数据问题上做了适当的工作。正因如此，几周前新加坡政府出台了一项法律，规定新加坡的每个企业都必须有一个新的职位——数据治理官（data governance officer），以确保有人负责整个企业中的数据管理工作。虽然这一举措现在还处于初期阶段，且执行细节尚待明确，但至少政府已经意识到我们必须这样做。所谓的责任模型（accountability model）就是要求我们参与共同治理，因为我们需要能够决定谁将为这些问题负责。

接下来的两个问题是，大模型的民主化和去中心化（the democrat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of large models），以及数据、模型和计算能力贡献的公平利润分配（the fair profit allocation for contribution of data, model and computational power）。这实际上是我们今天真正想要讨论的两个主要内容。当我们审视现今的大语言模型时，可以发现它是非常中心化的：整个人类的人工智能只掌握在少数几家公司手中。这非常不利于国家安全，并可能带来很多其他问题。因此，在学术界，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将大模型的计算去中心化。由于只有少数几家公司有能力负担数十万张GPU卡，然而，如果我们看向大学、数据中心和国家机构，它们各自可能拥有数百张GPU卡。当我们把各方的计算能力汇聚起来时，或许就能实现更多可能。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分配利润？如果要维持系统的运行，我们必须确保每个人都得到公平的回报。这也引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即利润分配。举一个例子，未来商业竞争不再仅仅是商业模

式的竞争，因为99%的公司会意识到他们将基于GPT能力构建自己的系统。但最终，最重要的是通过业务流程积累的专有数据资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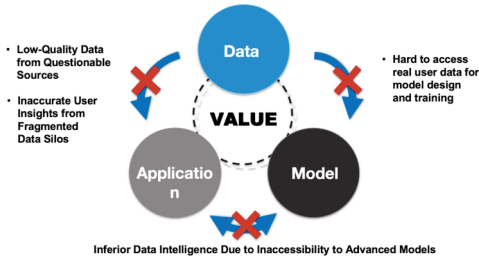
假设有五家医院，每家医院都掌握着关于某种疾病的部分数据。但遗憾的是，单凭任何一家医院的数据量都无法训练出一个用于健康领域的GPT模型。然而，如果将这些分散的数据汇总起来，就有可能训练出一个表现卓越的健康GPT模型。假设这五家医院成功地合并了数据，并训练出了这样一个高效的模型，而且该模型创造了可观的收益，比如100万美元。那么，我们马上就会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该如何在这五家贡献数据的合作伙伴之间分配这100万美元呢？显然，我们不能仅仅依据数据量的多少来分配收益。例如，如果你贡献了一千条数据记录，而我只贡献了五百条，这是否意味着你应该获得我两倍的收益呢？我可能会争辩说，我的数据在决定模型的关键决策边界等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准确评估每家医院的数据对模型性能的实际贡献。这无疑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我们称之为“数据审计”。其核心思想是，我们是否能够真正衡量出一条数据为模型带来了多少增益，这在未来至关重要。



所有这些问题促使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展望未来，其中一个核心特征便是高度合作。我们观察到，计算的趋势正变得越来越分散：如今我们所拥有的所有边缘计算（edge computing）设备，包括手表、手机以及笔记本电脑等，都已具备强大的计算能力<sup>4</sup>。与



 Data Ecosystem and Bottleneck II: Among Different Components



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协作式智能交易。那么，目前的现状如何呢？让我们花一分钟时间来审视一下当前的数据生态系统及其瓶颈。首先，让我们聚焦于生态系统中的各方，包括个人、企业和政府。上图中的每个箭头显示了数据是如何在不同主体之间流动的。这里列举了一些我们都很熟悉的问题。例如，当个人数据流向企业时，我们面临着不公平的价值分配机制，个人对数据的控制能力很薄弱。如今，加入某个平台或许轻而易举，但想要退出却非常困难，而且你可能无法从平台中彻底删除数据。即便你删除了，也无法确保数据被永久删除。隐私权方面的问题更是屡见不鲜，几乎每个领域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问题。其次，如果我们从数据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为了从数据中提取价值，原始数据需要经过模型处理后才能最终投入到应用程序中。但在这个过程中，谁拥有这些数据呢？

作为个人用户，我们拥有自己的产品数据，但并不拥有模型。模型通常归数据科学家和大学教授所有，他们通过撰写论文来分享算法，但往往缺乏真实的数据。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最常使用的数据集是DBLP数据集，它基本上是一个引文数据集<sup>5</sup>。我选择它并不是因为它多么令人兴奋，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免费且对所有人开放可用的数据资源。因此，我们非常渴望获得高质量的数据集。

另一方面，对于我个人而言，把时间投入到设计应用程序中并不容易。通常，我会安排博士生去公司实习，而应用程序的所有权归公司所有。然而，由于监管或其他诸多因素，公司可能没有优质的数

据来源。例如，新加坡有 PDPA（个人数据保护法），欧洲有 GDPR（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而中国也曾经经历过数据管理混乱的阶段，现在正逐渐走向规范化。此外，公司还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来获取最新的模型，尤其是现在大部分公司都依赖于GPT。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非常孤立且不连贯的局面。



这将我们引向Web3。Web3是什么？如今，Web3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而关乎更深层次的理念。当我们审视数据、智能、算力和应用这四个要素时，都需要在开放、去中心但协作的环境中予以考虑。我们想要处理价值的生产、分配、流通和交换问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实际上需要在不同领域进行颠覆性变革，包括技术基建、商业模式、法律治理以及社会经济。而当我们将所有这些变革整合在一起时，实际上就是Web3。

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构想，包含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协作智能（Collaborative Intelligence），负责生成所有数据；二是代币化经济（Tokenized Economy）。现在，我想再次强调为什么代币在这个构想中如此重要。正如我之前所说，当前数字经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仅仅把数据当作信息库，或者单纯将其视为模型的输入，那么现有的技术已经足够，人工智能完全可以模拟这些过程。然而，如果我们希望通过模型获取价值，并将其转化为一种资产类别，进而分配、交易这些资产并促使它们流通，那么情况就不同了。所有这些过程都不是通过人工完成的，而是通过自动化的算

法和智能合约来实现。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将一切转化为可以被算法计算的物体。所以，代币的真正目的其实是让事物变得可计算。只有这样，代币才有意义。因为代币本身并无内在价值，它只是其他事物的数据表征。我们之所以需要这种数据表征，是为了保护底层资产与代币之间的绑定关系，从而使代币成为计算的物体。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通过捕捉到的价值来推动整个数字经济的发展。



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上面这张在网上非常受欢迎的图片？我想从数据智能的角度来探讨它背后的问题，并回顾一下从Web1.0到Web2.0，再到Web3.0的发展历程。首先，Web1.0时代实际上是在讨论互联网的起源，这可以追溯到1995年左右。互联网的出现，本质上是打破了物理世界的边界。举个例子，如果我想读一本在纽约的书，过去我只能亲自去取或者等待邮寄。但有了互联网之后，人们意识到，我们可以把事物数字化放到网上，这样全世界的人都能访问它。这就是大数据浪潮的第一个推动力，它将数十亿人的信息转移到了网上。遗憾的是，在Web1.0时代，大多数用户只是被动地接收信息，所以我们称它为“全球图书馆”。在这个图书馆里，用户只能被动地读取信息，只有互联网的“读取权限”，数据流动是单向且静态的。尽管如此，所有人都承认互联网已经为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这是第一个阶段。

经过十年的发展，到了2004年、2005年左右，我们迎来了所谓的


Web2.0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人们意识到，互联网不再仅仅是阅读的平台，我们还可以在上面写内容，与世界各地的人们分享关于自己的一切。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因为它催生了一个新词汇——用户生成内容（UGC）。自此以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成了宇宙的中心，疯狂地分享关于自己的生活点滴。这一变化是对大数据发展的第二次大推动。回想起我在2000年初攻读博士时，虽然我们也研究庞大的数据，如数据研发网络和卫星数据等，但这些数据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这就是Web1.0时代的数据对后来的商业产生的价值相对有限的原因。然而，在Web2.0时代，每个人都在生产关于自己及其生活的数据，商业智能因此应运而生。企业开始意识到，这些数据可以用来分析客户、获得客户、进行风险管理等。所以，大数据在Web2.0之后变得异常宝贵。我们把这个时代称为“全球发布者”（Global Publisher）时代，因为从那时起，数据流不再是单向且静态的，而是实现了双向互动。

二十年过去了，现在的年轻一代不再对在网上分享内容感到兴奋，而是视其为理所当然。他们开始质疑其他事物，尽管我们把所有内容放在网上，但它们却与自己关系不大，于是开始质疑自己究竟能从中获得什么。这些大公司从网络数据中获利，而作为内容贡献者的我们却似乎一无所获。这种身份层面的脱节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数据，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包括知识产权和利润分配。所以Web3.0着眼于如何把数据所有权还给人们，即数据主权（data sovereignty）的概念。这也解释了为何我们把Web3.0称为数据银行。从图书馆到出版社，虽然其中并未明确涉及金融概念，但银行固在地承载着这种价值概念。因此，从Web3.0开始，我们不仅仅将数据视为信息位（information bits），而是真正开始把它看作是一种资产。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能够读和写，而且真正拥有了由自己生产的内容。

在此，我依然想进一步区分Web3与Web3.0。很多人认为“Web3”是“Web3.0”的简称，但实际上这种理解并不准确。Web3.0是一个学术概念。十多年前，一些教授提出了语义网（Semantic Web）的概

念。其核心思想是：我们能否将互联网组织成类似关系型数据库的形式。例如，当我们查询某个事物时，呈现的不再是一堆松散连接的网页，而是像维基百科一样，以语义化的方式系统地组织和描述该事物的所有信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如果互联网能够以这种方式被组织起来，那才是真正的Web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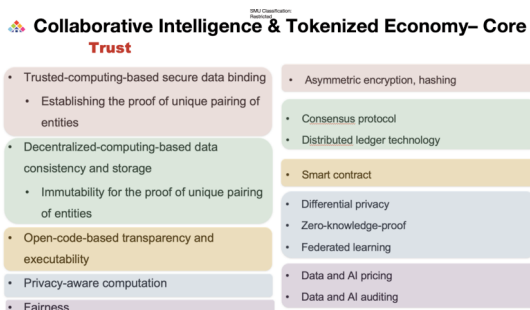
但这仍然只是一个想法，或许永远不会实现。问题在于缺乏动力：作为一家公司，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将互联网转变为一个数据库？诚然，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构想，但目前人们所讨论的Web3.0，其核心更多地聚焦于信息的组织，这与Web3完全不同，Web3涉及的是数据的所有权、主权以及数据资产的税收问题。因此，我们实际上是在探讨 Web3而不是Web3.0。

- 
- The Nature of Web 3 Applications**  
**-- "Unique Data Binding"-based Computability & Assetization**
- The "Achilles' heel" – How to secure the unique binding of two entities?  
Why is "Unique Data Binding" important?
    - Proof of Ownership
    - Proof of Authorship
    - Proof of Stake/Entitlement
  - Different Identity-Data Binding establishes Different Virtual Asset Class
    - Influence/ Popularity
    - Data
    - Social Network (Bridging Capital)
    - Credit
    - Computational Power
    - ...

经过上述讨论，我们发现所有关于Web3的本质讨论最终都建立在，通过可计算性将唯一性数据与其用户紧密绑定的基础之上。几百年来，我们一直无法解决如何紧密关联两个实体的问题。要证明两者之间的特定关联并非易事。例如，我该如何证明我拥有这部手机？或许可以说，只要我抓住它，它就是我的。或者我可以出示去年购买它的证据。但如今，任何证据都可能被轻易复制或失效。因此，如何证明两个事物是独一无二且安全绑定的，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只有当我们拥有了这一整套技术集群时，才能够独立于任何第三方，仅基于数学原理来证明两件事物的绑定关系。

这非常重要，因为基于这种独特的绑定关系，它可以转化为所有权的证明，并且能够增强归属权。在这一切背后，数据绑定是核心所在。所有Web3应用最终都离不开不同身份数据的绑定。如果你将社交数据绑定到身份上，你就会关注所有社交文件；如果你关注游戏数据绑定，你就会查看游戏文件<sup>6</sup>。因此，你只是在用不同的数据来描述身份。此外，当我们谈论这些数据时，我认为Web3最大的潜力并不在于处理现实世界的资产，因为最近真实世界资产

(RWA) 的概念面临了诸多挑战。相反，Web3的真正力量在于建立所有这些虚拟事物——那些我们长期以来都知道是有价值的，但却无法将其转化为资产的东西。比如影响力、人气、数据、社交网络、信用、群体智慧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这些才是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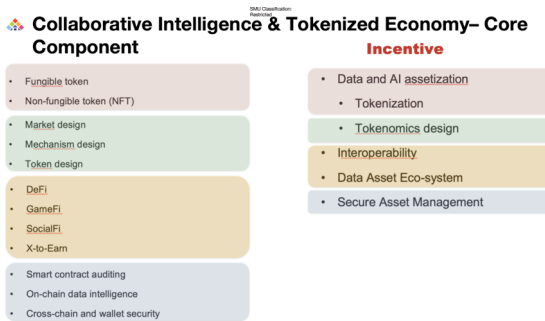


这不是一个关于技术的演讲，但我仍然想分享一个技术方面的观点。当我们想要实现这种经济形态时，技术方面最核心的要素会是什么？我认为有两个支柱：信任（trust）和激励（incentive），它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

关于信任，这涉及分散的信任机制及其可能性。虽然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详细说明，但本质上这是关于建立我们对过去以及未来的信任的问题。对过去的信任，意味着我们能否就历史事件达成共识，这需要我们以正确的方式建构证据，并以中立的方式存储证明。我们意识到，非对称加密（asymmetric encryption）、共识协议（consensus protocol）、分布式账本技术（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等技术有助于我们建立对过去的信任。对未来的信任, 则关乎我们能否确保既定事件能够如期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问题来自于我们不能执行合同, 或协议无法兑现。对未来的信任依赖于基于开放代码的透明度, 以及智能合约等工具, 确保在条件满足时, 相关事件能够自动触发并执行。

当我们谈论信任时, 还需要考虑一个关于公平的问题, 其中AI和数据定价尤为关键, 这一话题在过去的三到五年里已经获得了大量关注。如何为数据定价是一个复杂且必须解决的难题, 否则便无法实现可持续的数据交换。此外, 随着数据和人工智能成为资产, 人们可能会质疑未经授权的数据使用。在法律程序中, 我们需要使用算法来判断某个算法是否使用了特定数据集进行训练, 即数据审计。目前, 我们正与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KPMG) 合作, 共同研究这一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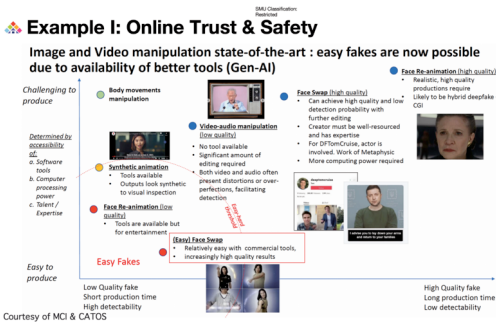
另一个是激励, 这是一个相对新兴且研究投资较少的领域。我们需要考虑不同的代币化资产方式, 包括同质化代币 (fungible token) 和非同质化代币 (non-fungible token)。昨天Tom已经对此进行了讨论。对此, 我有诸多案例用以回应代币经济设计

(tokenomics design) 的重要性。我们目睹了众多失败的案例, 其根源在于对代币经济设计的忽视。更重要的是, 工程师往往不熟悉代币经济设计, 因此, 与经济家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正在使用的技术都需要有人设计, 例如, 许多计算机工程师使用经济学

图书馆、市场设计机制、代币设计以及博弈论等工具，来对特定事物进行设计和治理。此外，还有很多案例，比如目前我们在新加坡管理大学开展的研究项目，专注于治理机制。我们选取了过去四年里的1,000个引发疑惑的案例，深入探究了人们投票行为、投票动机，以及投票时所处的经济状况和面临的利益冲突。这些在传统金融市场中很难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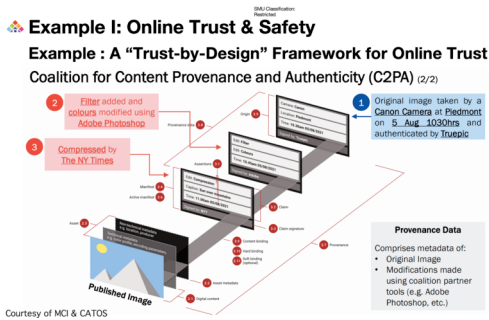
然后是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在之前的演讲中，有人询问Web2游戏和Web3游戏之间有什么区别，我想补充的是，对于Web3游戏而言，互操作性非常重要。在Web3游戏中，如果你在一分钟之内获得武器或皮肤，便可以在另一个D5项目<sup>7</sup>中使用该武器和皮肤来下注，并获得稳定币。该稳定币可以立即使用另一个D5来提供流动性，你可以用它来购买其他资产。

因此，在一分钟内，这件游戏皮肤就有可能变成一种能为你带来月收入资产。这种机制在传统金融市场中从未实现过，它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也构成了所有逻辑的基础：去中心化金融（DeFi）在最初几年的发展实际上为这些游戏，特别是Web3游戏开发铺平了道路。同样，安全的资产管理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安全性，我们就无法谈论上述所有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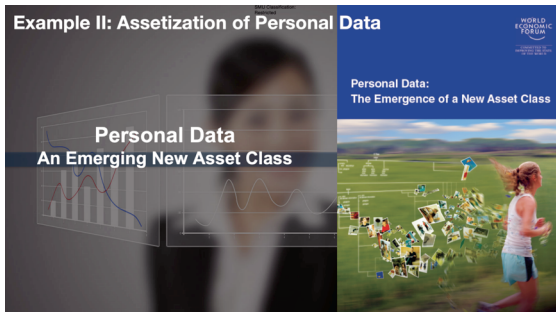


我想快速通过一些例子展示上述理念是如何进行实际应用的。第一个例子是在线信任与安全（online trust & safety），这是新加坡政府投资的一个2,000万美元的项目。该项目使用免费技术来保护网络

安全。随着在视频中检测虚假图像变得越来越困难，追踪恶意行为者似乎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较量，而且往往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存在一种名为生成对抗网络（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GAN）的技术——如果你有一个更好的算法来进行监测，相同的算法就会生成更好的虚假网络，所以这是一场永远不会赢的比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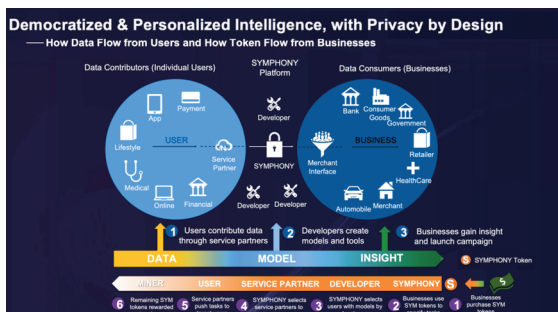


因此我们必须从源头入手，建立“信任设计”预防框架（“trust-by-design” prevention framework）。为此，我们通过可信的网络建立可信的来源，并发布可信的内容。一个早期案例是内容来源与真实性联盟（Coalition for Content Provenance and Authenticity, C2PA）在这个联盟中，所有媒介世代（media generations）都会在他们创作和传播的内容上附上数字签名。目前，我们正在与C2PA合作，扩大这一框架的覆盖范围，以涵盖所有内容生产，至少在新加坡是如此。



第二个例子与个人数据相关。我之所以首先进入这一领域，是因为我一直专注于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研究。在新加坡，人们在处理个人数据时往往不够重视，认为有《个人数据保护法》（PDPA）作为约束，违规者将面临高达100万美元的罚款，因此无需过多担忧。然而，这种心态也导致了新加坡缺乏大数据公司，几乎没有人具备处理数据的专业能力。这种情况使得新加坡的各类业务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我们深知，必须有效使用数据并建立一个平台，让那些愿意贡献数据的人和希望利用数据的企业可以通过一种透明、互惠互利的方式共享数据。这就是我们正在努力的事情。大约在十年前，我提出了“个人数据银行”（personal data bank）的想法。当时，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了一份精彩的白皮书，标题为《个人数据：一种新资产类别的出现》（Personal Data: The Emergence of a New Asset Class），该白皮书的整体观点是，未来我们的数据如同储蓄在银行里的资产，你可以用这些数据来赚取利息，也可以用这些数据来存取、借贷等。在过去几年里，我们致力于一个名为Symphony的项目，旨在将数据提供者、数据消费者以及模型开发者连接到同一个平台上。在这个平台上，每个人都可以贡献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并按贡献比例获得相应的回报，而所有的贡献都将通过区块链技术进行计算和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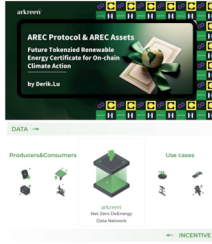


我通过一个实例来说明这个平台将如何有助于构建数据经济。我相



Web3 for Green Economy: DeP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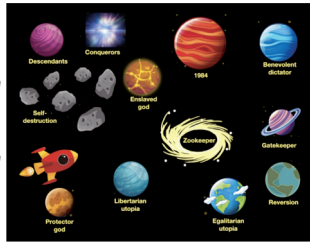
- Carbon Credit Tokenization
-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s
- Environmental Impact NFTs
- Decentralize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Acceleration



昨天我们还看到了关于绿色经济的项目，探讨了如何处理碳足迹等问题。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们已经见证了一些出色的项目，它们正在取得良好的进展。

AI & Humanity - A "Human-Centric " View

- **How to Co-Habitate with AI?**
- **The Alignment Problem**
- **What is Intelligence?**
  - Does intelligence necessitate consciousness?
  - Is consciousness computable?
  - Does intelligence admit more than one path of evolution?
- **What makes a "Human"?**
  - Human vs AGI
  - How to maintain the unique quality of "Human"?



上图是一张人们试图去想象未来我们与人工智能之间可能建立何种关系的图片。在这类构想中，人工智能可能扮演动物园管理员、看门人，甚至是最理想的“仁慈独裁者”角色。但本质上，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关键问题：如何与人工智能共存？这便是对齐问题（alignment problem）——如何确保人工智能与我们的利益保持一致。在对齐问题中，最大的难题是：在当今的政治格局下，人工智能究竟与谁对齐？是美国、中国，还是亚太地区？对我来说，这几乎无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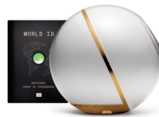
至于智能的定义，则是我们在初步探讨时遇到的一个基本问题。目

前，我们所有的观点均围绕人类中心展开。我们常用图灵测试来判断一个人工智能的优劣，这显然是个高度人类中心化的视角。我们认为，达到人类智能水平即可称为人工智能。这一看法并不仅限于我个人，众多科学家都在争论：当前的人工智能不过是伪人工智能，因为它们并不具备人类的思维方式。然而，人工智能有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进化。因此，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意识究竟能否被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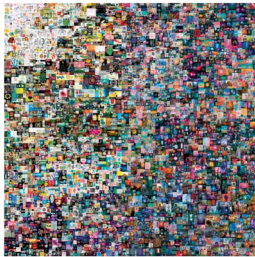
 Proof-of-Humanity

**World Coin**

- Worldcoin is dedicated to becoming the world's largest real-person identity and financial network, protecting privacy, and owned by everyone. Worldcoin aims to provide a way for everyone to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economy, regardless of country/region or background, creating a place for everyone to benefit in the age of AI..



 Proof-of-Humanity



**(Everydays: The First 5000 Days)**

- Christie's New York, Feb. 25, 2021
- Beeple, The First 5000 Days, 2021
- Winning Bid: 60.25M USD

最后，让我们来浏览一些广为人知的项目，我认为它可以被看作是人性的证明。通过这些项目，我们或许能开发出一个新方案，用以诠释何为真正的人类。即使是像NFT这样概念，也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在我看来，深入思考后你会发现，这几乎标志着人类的进步。因为我以数字形式绘制了5,000个数字艺术作品，并通过归档将这些努力具象化，这成为了对“我”存在的证明。



## 问答讨论

**Q1:** 经济学家可能会说经济就像某种自然存在物，但作为人类学家或社会学家，我们更倾向于认为经济是一种社会建构。因此，当您提到人工智能需要代币时，我觉得这非常有趣。这似乎意味着，人们不能仅仅创造技术，创造人工智能的人还必须同时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系。在Web3的世界里，数据作为资产通常被视为一种积极的转变，因为在Web2时代，这些数据属于平台，而现在我们正在收回它们。然而，真正共产主义的思考方式是，数据根本不应该成为一种资产，而应该像氧气一样，为所有人共享。这种对资本化的抵制也存在于其他社会商品中。以献血为例，在一些国家，献血是有报酬的，但在另一些国家，人们则反对将血液作为一种资产。因此，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人们是否正在创造一种与人工智能相匹配的经济？第二，这种经济的限度是什么？

**A1:**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深入理解事物的本质。当我们触及Web3的核心时，我们会思考究竟是什么让它如此与众不同。我们会发现，它就像数学一样，仿佛是上帝创造的——算法通过密钥为正确数据记录提供了唯一的绑定，这种结合构成了终极的核心，其他一切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因此，我认为基于技术的身份定义是这种经济的基础。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们目前仍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我们可以讨论哪些数据应该被视为资产，哪些不应该。然而，当我们讨论金融包容性时，人们通常对自己的数据信息一无所知。例如，在新加坡，许多老年人一无所有，百病缠身，但他们的身体数据对许多医院和研究机构来说却相当宝贵。如果他们可以通过贡献自己的数据来换取一些医疗保险和服务，这又有何不可呢？这正是我们希望通过数据实现的真正的金融普惠：一方面利用技术保护个人数据，另一方面为那些希望贡献数据的人提供一个平台。

**Q2：**朱教授，我有一个很基础的问题。您多次提到数字资产，但数字资产似乎并没有一个非常通用的定义。那么，您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些关于不同资产类型定义的看法？在传统金融领域，资产的定义非常明确，通常被视为价值、控制权和权利三个要素的集合。但在数字资产中，价值应该如何定义呢？这又关系到数据定价的问题——我们如何为数据或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定价？而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一个核心：如何定义权利？

**A2：**在当今的法律框架下，数据所有权的定义仍是开放的。例如，我从星巴克买了一杯咖啡，相关的数据似乎应该是共同拥有的——我可以分享这些数据，星巴克也可以使用它。但在其他一些平台上，用户可能在未仔细阅读的情况下就签署了用户协议。比如在X.com或Twitter上，Twitter正在明码标价出售用户的数据，而用户自己却无法在其他任何地方出售这些数据。因此，数据权利应当被明确，并且用户应当能够掌控这些权利。目前，我们正在探索开发技术工具，以帮助人们真正掌控并有效利用自己的数据。

**Q3：**非常感谢您的演讲。我想知道，数据所有权的想法是否能成为解决一些问题的切入点，比如Payal之前提到的全球北方与南方的差异，以及乐观与悲观的对立？或者数据所有权的出现只是在重复现状——比如穷人，只是维持他们目前的困境，如果必要，他们甚至可以出售器官。在未来，他们是否也会被迫出售自己的数据？

**A3：**感谢您的提问，这正是我寻找合作伙伴的原因，以确保我们能够利用技术真正帮助人们。我们希望通过正确使用技术来确保人们的数据得到妥善处理，而不是因错误使用而造成伤害。但正如你所知，目前技术的权力高度集中。因此，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需要在权力逐渐分散的背景下展开。过去，许多事情都被某个中心节点垄断，但随着我们每个人能够进行更多的计算，我们可以探索更分散的技术使用方式。在未来，我们希望通过技术支持赋予个体自主权，同时考虑协作治理。

(\*本文注释为编者注释)

## 讲者介绍



朱飞达教授于2009年获得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 (UIUC) 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目前担任新加坡管理大学 (SMU) 计算与信息系统的终身讲席教授及副院长。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人工智能与协同智能、区块链、数据资产与人工智能治理, 并重点研究这些技术在商业、金融和消费创新方面的应用。他曾是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顶峰大数据分析实验室和星展银行-新管大生命数据分析实验室的创始主任。朱教授也是 SYMPHONY 的创始人和首席科学家。SYMPHONY 是一个基于 Web3 的区块链协议, 旨在通过民主化和协同化的数据智能以及设计隐私来推动数据驱动经济的发展。他在包括国际数据工程大会 (ICDE)、国际超大型数据库会议 (VLDB)、特殊兴趣组数据管理会议 (SIGMOD)、国际知识发现与数据挖掘会议 (KDD)、万维网大会 (WWW)、机器学习研究杂志 (JMLR)、数据库系统事务杂志 (TODS)、知识与数据工程期刊 (TKDE) 等在内的国际顶级期刊和会议上发表了 100 余篇同行评审论文。他在大规模频繁模式挖掘方面的工作获得了 2007 年 IEEE 国际数据工程大会 (ICDE'07) 和 2007 年亚太知识发现与数据挖掘大会 (PAKDD'07) 的最佳学生论文奖。他还获得了第 21 届数据库系统高级应用国际会议 (DASFAA'16) 的最佳论文奖和第 17 届万维网信息管理国际会议 (WAIM'16) 的最佳演示论文奖。朱教授荣获 2019 年亚太知识发现与数据挖掘大会 (PAKDD) 青年事业奖, 并担任 2024 年数据库系统高级应用国际会议 (DASFAA) 的程序共同主席、2018 年 IEEE 国际数据挖掘大会 (ICDM'18) 和 2021 年国际知识发现与数据挖掘会议 (ACM KDD'21) 的大会共同主席。

1. 首次代币发行（Initial Coin Offering），多用于加密货币众筹融资。
2. 多模态（multimodality）是指集成和处理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类型的信息或数据的方法和技术。
3. 基于转换器的生成式预训练模型（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一种大语言模型。
4. 边缘计算（edge computing）是一种分布式计算架构，它将计算能力和数据存储推向网络的边缘，即靠近数据源或用户的地方，而不是集中于云端或数据中心。这样可以减少延迟、提高响应速度，并减轻核心网络的负担。手机、手表和笔记本电脑等设备具备上述特征。
5. DBLP（DataBase systems and Logic Programming）是计算机领域内对研究的成果以作者为核心的一个计算机类英文文献的集成数据库系统。
6. 这里的文件指与特定身份绑定相关的数据集合或信息记录。社交文件：指的是与社交身份绑定的各类数据，例如社交媒体上的用户信息、互动记录、好友列表、个人资料等。这些数据被“绑定”到一个身份上，形成了一个关于该身份的“文件”。游戏文件：指的是与游戏身份绑定的数据，例如游戏角色的属性、成就、装备、游戏进度等。这些数据同样被“绑定”到一个身份上，形成了一个关于该身份的“文件”。
7. D5是指一种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的结构，主要专注于为其他项目提供咨询服务。它通常由数据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通过有机的方式开展业务。这种结构强调去中心化和自治性，旨在通过社区协作推动项目发展。



# 青年学者论坛

EMERGING SCHOLARS FORUM



## 数字殖民主义下的全球南方： 消失的社交媒体和中国启示

THE GLOBAL SOUTH UNDER  
DIGITAL COLONIALISM:  
DISAPPEARED SOCIAL MEDIA  
AND CHINA'S REVELATIONS

许可

在传统殖民时期，西方国家在他国进行殖民统治时，常通过建造具有自身文化风格的建筑以体现其权力延伸。例如，在中国，这些区域被称为租界，包括法租界和英租界等。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人类在虚拟社交媒体空间上所花的时间越来越多，传统的建筑空间也演变为Facebook、X（Twitter）、Instagram等数字社交媒体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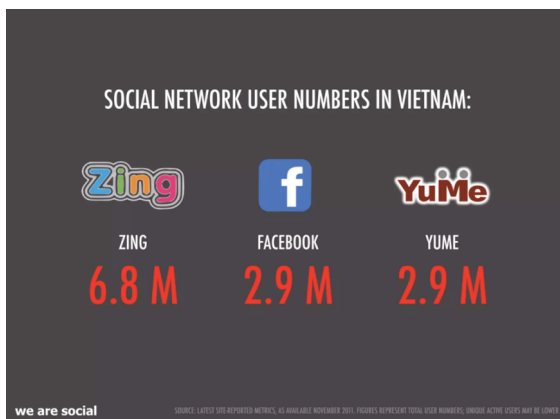
Michael Kwet发表的文章《数字殖民主义: 美帝国与全球南方的新帝国主义》（Digital colonialism: US empire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in the Global South）是讨论“数字殖民主义”的开创性学术文章之一。他提出，数字殖民主义是全球北方（尤其是美国）通过跨国科技公司的垄断性控制和技术主导，在全球南方重塑帝国式权力的不平等关系。其核心是通过数字技术、数据和基础设施的控制，实现对资源、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支配，从而延续和强化传统殖民主义逻辑。

在对社交媒体的研究过程中，我试图探寻一个关键问题：全球南方本土有哪些因为这种数字殖民主义消失的社交媒体平台？值得注意的是，东南亚部分国家曾存在过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交媒体

许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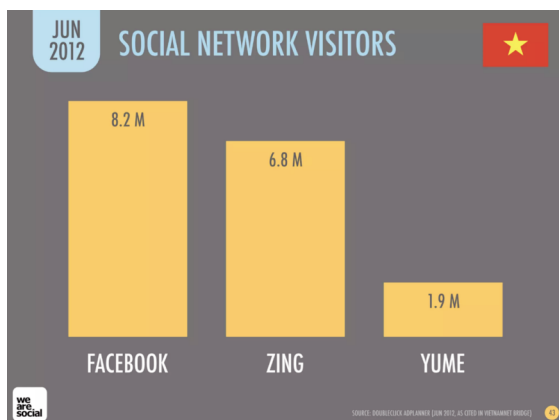
平台。这些平台在其诞生初期确实在当地或区域范围内拥有一定的用户基础。然而，它们却在全球化的数字生态中逐渐式微。

**Zingme**是一款社交网络，2009年诞生，由越南科技独角兽 VNG 开发，Zingme 由越南人自己创建，它的诞生被认为开启了越南社交网络发展的时代，曾是越南访问量最大的社交网络，也是许多越南人的青春记忆。



2011年越南社交媒体平台用户数量对比；图片来源：DATAREPORTAL, Digital 2011: Vietnam；数据来源：最新网站报告指标，截至2011年11月。数据代表总用户数；实际活跃用户数可能较低。

2012到2013年，Zingme达到了用户每天能创建500万个内容的里程碑。然而，Zingme的辉煌并没有持续太久。一份数据显示：仅仅一年内，越南的Facebook用户就从290万跃升到超过850万，增长了近200%。2012年，Facebook超越Zingme占据了越南社交网站的榜首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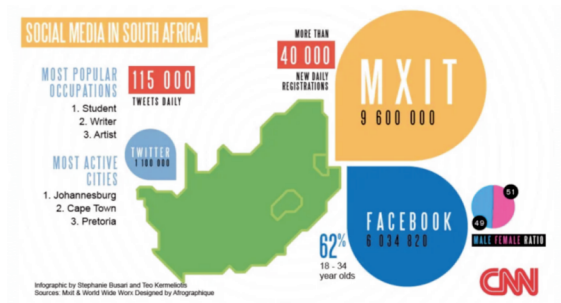
2012年越南社交媒体平台用户数量；图片来源：  
DATAREPORTAL, Digital 2012: Vietnam；数据来源：  
DOUBLECLICK ADPLANNER (2012年6月，摘自  
VIETNAMNET BRIDGE)

随着Instagram、Twitter等更多国外社交网络的到来。Zingme无法参加竞争，多年内只能勉强存活。2020年，陪伴越南人民10年的Zingme正式停止运营。而同系列的Zing Video也因为VNG公司避免与Youtube竞争的策略而在2013年关闭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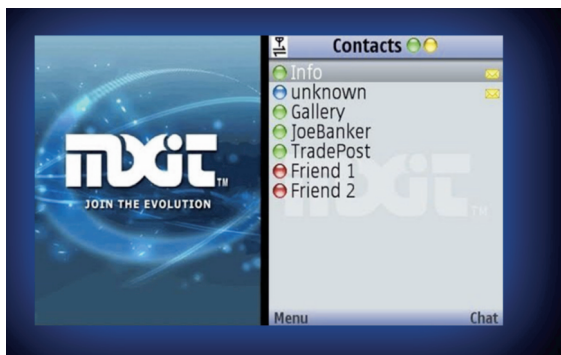
非洲曾经有过一些本土的社交媒体尝试，例如MXit，这是一个南非的即时通讯平台，于2005年推出，并在非洲多个国家广受欢迎。鼎盛时期，该平台拥有超过5000万注册用户，每天有数百万活跃用户登录。

MXit对南非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于许多千禧一代非洲年轻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互联网和数字社交。2009年，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下一代调查中，MXit在南非“最酷网站和社交网络”类别中还击败了Facebook和Google。

许可



MXit鼎盛时期南非社交媒体平台用户数量对比；图片来源：CNN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信息图由 Stephanie Busari 和 Te Kermeliotis 制作；资料来源：MXit 和 World Wide Worx 由 Afrographique 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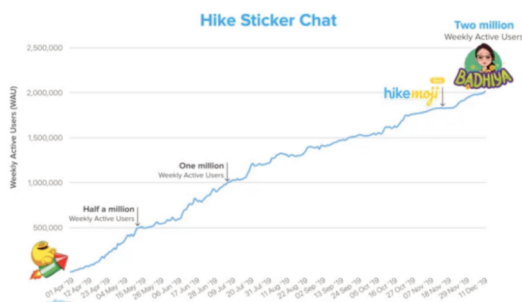


Mxit的用户界面

然而，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Facebook、WhatsApp等国际平台进入市场，竞争愈发激烈，MXit没有做到跟随时代迭代更新，导致其用户群大幅下降，最终于2015年关闭。MXit表示，当它最终关闭时，其每月活跃用户已降至120万。此时，WhatsApp在南非拥有1000万用户，Facebook拥有1300万用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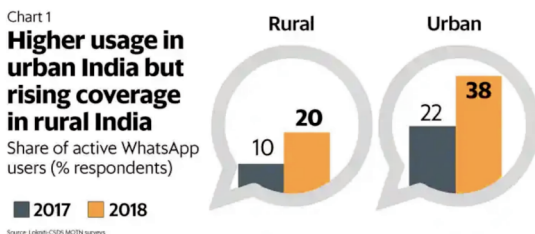
**Hike Messenger**是印度本土开发的即时通讯应用，成立于2012年，旨在与WhatsApp和Facebook Messenger等国际平台竞争。它曾一度获得印度市场的关注，并在2016年达到超过1亿用户的高峰。

Hike在产品设计上强调本土化，提供了对多种印度语言的支持，这使得用户能够以他们熟悉的语言进行沟通。它在印度的节日也会推出特别的主题和贴纸。



丨 Hike贴纸每周活跃用户数据（2019年4月—2019年12月）

2016年1月，Hike Messenger试图在Facebook平台上投放广告，以推广其即时通讯应用并吸引更多用户。但Hike的发言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Facebook屏蔽了他们广告中的一个选项，阻止用户访问Hike的官网。后来，随着WhatsApp在印度农村市场的迅猛扩张，加上Hike因为定位人群过于狭窄，很快就难以应对全球平台的竞争。



丨 Whatsapp 在印度农村和城市的使用情况（2017 年和 2018 年）；图片来源：Medium，Shubham Shrivastava《Why Hike Messenger Failed? A Mammoth Case Study of India's Messaging App》；数据来源：Lomti-SCDS MOTH surveys

许可

2021年，Hike宣布关闭其核心通讯功能。Hike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当时发言称印度不会有自己的即时通讯应用，因为全球网络效应太强大了，除非印度禁止西方公司。



| Hike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的推文

Hike为什么会失败？难道它真的比WhatsApp差吗？Zingme、MXit这些消失的本土社交媒体就一定比Facebook、Twitter等等差吗？我认为不是的。比如Twitter的字数限制就不会根据不同语言做出调整。

Facebook于2010年进入缅甸市场，其平台在缺乏有效本地化策略的情况下迅速扩张，成为缅甸主要的信息传播媒介。然而，Facebook在这一过程中严重低估了缅甸社会语言与文化的复杂性，并未采取足够措施应对种族与宗教紧张局势。平台仅雇用一名会讲缅甸语的员工负责内容审核，对缅甸超过100种其他通用语言视而不见。这种审查机制的缺失导致煽动性内容和虚假信息迅速传播。《自由的窄廊》里评价：

……殖民列强的间接统治，这些强权设立了貌似现代化的行政结构，同时授予本地菁英以几乎没有限制、也没有社会参与的方式来遂行统治。

社交媒体平台如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是通过技术优势、资本支持、大量广告投入、全球网络效应以及对数据资源的控制，才

能迅速进入全球南方国家的市场，对发展中国家实现一些“降维打击”，导致一些本土社交媒体平台衰落甚至消失。并且，全球科技公司不仅控制了技术平台，还可能通过它们传播和渗透西方主导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2009年左右，因为Facebook的侵入，inmediahk也产生危机，原来百花齐放的状态改变了，讨论被吸引去了Facebook。Facebook吸走了独立媒体的养料，掏空了它的内容。殖民者吸食血肉，被殖民者只能重建骨骼。Facebook永远不缺养料，无数人在提供无偿劳动，但是独立媒体因为讨论者的流失，只能从更专业的角度反击，但更专业就意味着更多的成本，他们为了保持不受资本控制的独立思考，拒绝接受大额捐款，在夹缝中艰难生存。inmediahk是香港最重要的社会运动平台，难道我们就要这样把社会运动的巨大能量拱手让给殖民者吗？

我们可以想象随着社交媒体、流媒体、视频平台等的普及，本地的文化、语言和历史叙述就会慢慢被边缘化或同化，数字技术成为了殖民的工具。

2000年后，中国社交媒体起步时受到海外平台的启发。新浪博客（2004）和人人网（2005）等早期平台侧重社交网络的基本功能，满足了用户表达和交流的需求。本土企业通过对国际成功平台的借鉴快速开发类似功能，并结合本地需求优化。中国本土科技公司也在政策上得到了大量的支持和资本投入，因此能够更好地建立用户基础并迅速迭代和创新。中国庞大的人口和迅速增长的互联网用户以及统一的语言文字，为社交媒体提供了巨大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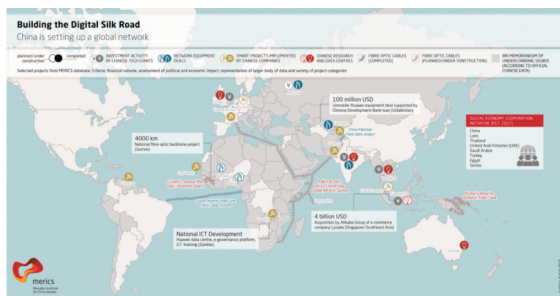
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恰逢智能手机普及，本土平台迅速采用移动优先策略，开发轻量化、易用的移动端产品。同时这些平台也充分考虑到了本土用户的行为习惯和文化特点，设计出更加契合本地需求的产品。例如，微信的红包功能和表情包文化，抓住了中国社交习惯

许可

中的人情往来和娱乐需求。并且，微信将传统关系网络（如“熟人圈”文化）数字化，获得了广泛认可。本土平台深刻理解中国用户的社交习惯和文化需求。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短视频成为主流内容形式。快手（2011）和抖音（2016）通过精准算法和用户生成内容迅速占领市场。在这些过程中，虽然有些平台因为无法跟上时代潮流而衰落了，但是很快会有新的本土社交媒体补上市场空缺。本土平台之间的激烈竞争（如美团与饿了么、淘宝与京东）促使企业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用户体验。

目前中国已经不满足于在本国推进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了，正在建设的数字丝绸之路，通过一带一路和华为、中兴等企业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光纤网络、数据中心、5G技术等基础设施。这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使它们不再完全依赖西方的技术和公司来接入互联网，从而在数字经济中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建设数字丝绸之路过程中中国的理念、原则以及实践路径，为南亚国家缩小与弥合数字鸿沟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 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图片来源：MERIC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

例如中国—东盟的“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中国积极参与东盟国家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国际海缆、光缆、卫星系统和数据中心的

建设，推动“海陆空”信息通道的建立。其中，中国—东盟信息港项目成为双方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标志。

### Pilot smart cities in ASEAN

Smart cities figure prominently in China's vision of DSR-related infrastructure, and Chinese companies are eager to provide key pieces of smart city infrastructure.



东盟智慧城市试点；图片来源：欧亚集团《数字丝绸之路：拓展中国的数字足迹》（The Digital Silk Road: Expanding China's Digital Footprint）报告；数据来源：ASEAN

中非“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也在通信网络和数据中心领域取得显著成果，通过与华为、中兴等中资企业合作，非洲实现5G网络的率先部署。例如，2019年南非率先推出商用5G网络，随后在2020年完成独立组网与无线路由器的开发，并进一步扩展至摩洛哥等国家，推动本地数字生态系统建设。

网络自由活动组织权利开放集团（Open Rights Group）也曾说：

津巴布韦、吉布提还有乌干达等国家并不想加入一个不过是能上Google和Facebook的互联网。

而中国在实践中和推行的就是这件事，没有一个国家想让自己受到殖民，即使是网络空间。

城市权（Right to the city）是列斐伏尔在1968年出版的书中首次提

许可

出的概念和口号，公众不仅能够真正使用所谓的公共空间，而且有权利去建设用于社会化和政治行动的新的共享空间。我想快60年过去，我们的“身处此地”已经慢慢开始变为互联网这个空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思考社交媒体权（**Right to the social media**）是什么？

左翼的批判地理学家们将城市理解为革命的基地，如今社交媒体成为另一处革命基地。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Black Lives Matter、#MeToo运动似乎让我们觉得这些资本家创造的社交媒体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似乎这就是社交媒体权了。但是社交媒体之前，难道就没有变革的力量了吗，数字的社媒之前有简讯，简讯之前有报纸，我们一直有革命的力量，这不是“先进”的社交媒体或是“先进”的技术赋予我们的。社交媒体权是我们这一代“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需要终身寻求的答案。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说：“技术既是解药，也是毒药。”技术创造了新环境，就像网络空间，但是社交媒体会让我们变得麻木且依赖，就像我的导师黄孙权教授曾说，我们要在变得麻木且依赖之前，对抗习惯了的刺激与技术的摆布，勾勒新世界的社会导航图谱。《权力与进步》（*Power and progress: Our thousand-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里写：愿景就是力量，力量就是愿景。但是新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社交媒

体权要实现的是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由谁提出新的社交媒体、新世界的愿景，由谁来勾勒新世界的社会导航图谱尤其重要。

提出新愿景的首先不可能是创立现在这些社交媒体的资本家和精英阶级。爱德华·伯内斯（Edward Bernays）在1928年就写道：

那些支配我们、操纵我们思想、型塑我们品味、灌输我们想法的人，几乎全是我们听都没听过的人。

所以提出变革新愿景的应该是一直以来被忽略的人，应该是明明占着全球人口的多数，却在社会学上被定义为“少数群体”的人们，比如女性，比如作为全球资本主义“边缘”的全球南方人民。

近期在Telegram上一个通过Deepfake（深度伪造）技术制作、传播韩国女性色情影像的聊天室聚集了20多万男性受众，引发了中国互联网上的巨大讨论。韩国女性甚至到中国的社交媒体微博上来求援。为了对抗Deepfake，帮助韩国女性也是为了帮助我们自己，来自中科院的算法工程师张欣怡参加了全球Deepfake攻防挑战赛并开源AI模型DeepFakeDefenders对抗Deepfake。全球化背景下，中韩女性超越地域限制，建立互助网络，共同对抗不公。技术并非单纯的压迫工具，它也可以成为赋权的手段，凝聚起不同背景下的女性群体。技术的未来愿景不应仅仅服务于经济利益或权力集中，而是可以通过开源和协作的方式赋能个体，服务社会正义。



这大概就是我们为了新愿景可以做出的行动的案例。

李飞飞说：“在网际网路时代，我们突然面临图像资料如爆炸般的成长”。我第一次了解到清迈大学是通过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这张图像资料。2020年，泰国以青年为主导的示威运动掀起了要求君主制改革和民主化的浪潮。期间，18岁的清迈学生Maynu Supitcha以其在清迈大学举起“三指礼”的形象成为运动的代表性象征。虽然大部分中国人都不知道这张图片的出处，但它在中国社交媒体大量传播，获得大量中国女性的点赞，我们只是被其中的力量所震撼，虽然我们使用着不同的平台，我们用着不同的语言，但这张照片把我们链接在了一起。



突破语言、媒体的障碍，中国的千万女性通过一张图片和另一个国度的人民有了一瞬间精神上的共振。或许这就是我们可以开始的地

方，可能衍生出新愿景的地方。这张照片的名字叫“你的未来取决于你”（อนาคตของพวกเขาอยู่ที่ตัวพวกเขา），这也是今天我想说的，让我们来提出新的愿景，我们来决定者，让我们夺回社交媒体，因为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自己。

## 青年学者介绍



许可，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硕士在读，本科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

## 创新还是仿造？重思“山寨（SZ）”的转变

INNOVATION OR COUNTERFEIT?  
RETHINK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HANZHAI”

姜奕竹 李程锦

“山寨”一词在手机产业中的使用，最初源于一些未获正式牌照的生产商在产品上标注“Made in SZ”，用以指代深圳制造。由于“SZ”在发音上的谐音关系，该词逐渐被戏称为“山寨”，并广泛用于描述一类非主流、非正规品牌的产品。而随着时间的演变，“山寨”逐渐成为一种独特的技术文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在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情况下，模仿和复制成为一种快速获取技术和经验的途径。

本研究以山寨手机为切入点，对“山寨”现象进行初步分析，以重新审视“创新”的意涵，探讨技术发展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动态关系。重新理解作为特定技术文化的“山寨”，是如何在政策变化与产业集群效应的暗涌下，成为中国特殊的文化空间及群体网络合力编织的创新系统。

目前大多对“山寨”的分析常将其定位为仿冒品（Counterfeit Products）或假货（Fake Stuff），忽视了其背后复杂的社会互动关系与非主流范式的创新意义。这种看法强调“山寨”的实用性与低成本，却未能理解其在特定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高适应性与灵活性。在此意义上，“山寨”现象不仅挑战了以原创性和知识产权为核心的

主流创新范式，也为我们理解全球南方在技术体系中的另类实践提供了理论上新的可能性。



### | 早期中国手机发展过程

早期的中国手机制造业的发展依赖于引进外资和技术，1980深圳特区成立，其中港资企业和国有企业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香港“三来一补”政策下电子工业向深圳转移。90年代末的合资企业模式，使得国内企业得以学习国外的生产技术。到了1998年国家出台《关于加快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政策要求手机生产从1999年起，信息产业部停止发放外资手机生产牌照。手机生产必须经过审批，俗称“手机审批制”。该文件还规定，在华外资企业生产手机必须有60%销往海外市场。虽然这项政策使手机牌照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却无疑推动了国产手机产业的发展。

2004年，联发科（MTK）推出的开钥匙方案（Turn Key solution）为手机生产提供了更灵活的解决方案，极大降低了生产手机的难度与成本，使得更多小型厂商能够参与生产。IDH公司的出现，通过提供公板和公模降低集成商的定制成本，进一步促进了手机制造产业链的分工合作。

2005年，中国手机生产开始采用“核准制”，进一步放开了手机生产许可证和市场准入的限制。但由于牌照的申请条件苛刻：2亿元人民币准入资金以及硬性设备条件。出现了一些生产企业不愿意花钱

去买牌照，但又垂涎于当时国内超过8000万台/年的巨大手机市场，最后只能通过灰色渠道进入市场，大量借牌、贴牌、冒牌甚至假牌的黑手机也随之出现，由此形成黑手机最大的来源。在深圳的华强北成为山寨机的主要发源地，吸引了无数希望创业的人涌入。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当时政府对手机制造实行牌照核准制，这些没有手机牌照的生产商就在手机上刻上“Made in SZ”。这一状况直到2007年，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取消了手机生产核准制。由此，生产手机的门槛在法律许可层面降低了，进一步促进了手机产业的增长，山寨手机产业也迎来了“爆发”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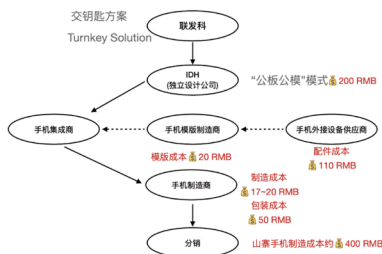
山寨手机最初是对诺基亚或三星等品牌产品的仿制品，使用如“Nokir”、“Samsing”等商标。可以说，“廉价”是山寨手机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大分山寨机市场售价千元不到，几乎为同时期品牌手机价格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面，在软件与硬件条件有限的条件下，山寨手机厂商在设计外观与选择匹配主板的过程中极具想象力，回应着下游消费人群的各色需求。一部山寨机拥有超大屏幕、超长待机、双卡双持、MP3、MP4、蓝牙、拍照、电子书于一体还只是标配功能，更有“轰天雷”、“炫酷跑马灯”、“香烟手机”、“跑车手机”、“手表手机”等各种充满奇思妙想的“个性推荐”。对于消费者而言，购买一个仿制品（Counterfeit products）时，购买的不仅是物品本身的使用价值，更是围绕原有物品的名字所建构起来的所有象征意义。在这一文化象征意义层面上，技术或美学的修改赋予它们自己的身份（identity）。

山寨并不止于简单复制或者仿造，而是基于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的再创造，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包含了改进和适应本地市场需求的过程。可以说，山寨重新诠释了大众的需求与愿望。



部分山寨手机展示，图源网络社会研究所“文化与技术三部曲”项目“深圳 世界工厂”

山寨手机生产过程具有高度灵活性和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的特性。在“公板公模”（不同制作商沿用同一种主板或技术模块）的生产模式和华强北齐全的产业链优势下，山寨手机制造商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在30-45天左右即可将产品从概念推向市场，后续生产和投入市场甚至只需14天，这与主流公司3-6个月的研发周期形成鲜明对比。下面这张图描述了山寨手机的产业链路径以及大致的生产成本。



山寨手机产业链路径及各流程成本

联发科（MTK）芯片技术的兴起导致了独立设计公司（IDH）的出现，这些公司专门将联发科（MTK）芯片组和其他组件集成到主板上。独立设计公司将这些主板出售给手机制造商，通常作为参考设计，除非集成商支付定制版本费用或保证高销量。然后集成商可以专注于手机设计和模具开发。相比之下，正规品牌手机由于研发周期长和法律限制，生产低价、快速适应市场的产品较为困难。因为这不仅从研发、生产到投入市场需要经历漫长的周期，在研发设计会投入巨额资金，而且在当时，合法生产手机要有发改委核准的手机牌照，还需缴纳高达17%的增值税与额外销售税。

而根据对山寨机商户的访谈，制造山寨手机不仅省去大笔上述成本，下游庞大的需求市场使之无需考虑付出高昂广告费，通过互联网（如：QQ群聊以及在线社区）和店铺布置即可吸引大量顾客和经销商。另外，为了适应中低端市场的需求，山寨手机制造商会尽可能采用低成本的配件，并寻求质量与成本之间的最佳平衡点。根据走访过程中对商户的调研，基本上一台山寨机生产成本可以控制400元左右，其中：模具费是20元，具有MP3、MP4、百万像素拍照等基本功能电路板制造成本约200元，充电器、摄像头、键盘、光盘等包装配件在内的制作成本约110元，每个加工成本大概在17到20元之间，手机外配，一套平均包装成本约50元。

2008年6月10日，CCTV-2的“经济半小时”以《揭秘山寨机》主题，报导了中国大陆山寨机的现象。但就当时来说，官方的态度是模糊不清的，明面上以保护知识产权为由，多次对山寨手机生产持打击态度。与在这些打击行动并行发生的，是山寨产业从业者们开始寻求生产的合法化转型，山寨产品也开始走向了品牌化。与此同时，官方更倾向于默许这种现象，甚至推行相关制度，帮助山寨公司取得合法牌照。

在2000年左右许多国内外企业开始关注这些非正规产品对品牌和市场的影响，并对山寨手机的公司提起了知识产权诉讼，强调侵犯了

其商标和设计专利。知识产权法通过将文化形式客观化和具体化，实际上限制了文化符号的多重意义。知识产权的运作机制使得商标这类符号的含义趋于固定，而这种固定往往具有永久性。结果是，符号的经济价值越高，其所获得的法律保护也越强。这不仅提升了符号的市场地位，还让权利拥有者在竞争中处于无风险的位置，从而获得更可观的经济回报。西方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建立，使大量非物质事物成为可私有化的资产，明确划分了知识产权拥有者与那些未被纳入创作体系、也未参与知识生产过程的“他者”之间的界限，但这一过程中却掩盖了其背后的权力结构。

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界定“真”与“假”的边界？谁拥有创作的权利？谁被归类为模仿者？我们应如何定义“正品（original stuff）”？“知识产权”作为制度性建构，其正当性如何被自然化？对原型（prototype）的追溯，是否反而陷入由掌握象征资本并据此构筑权力结构者所设下的认知陷阱？（Yi-Chieh Jessica Lin, 2011）

本文旨在拓展价值与原创性的空间维度与文化经验，回到中国语境，重新审视“山寨”如何在特定社会实践中被重新设计、重新定义，并由此促使我们对“创新”本身进行反思。若从价值判断的角度审视创新，“山寨”能否被视为创新，取决于我们对“创新”的定义。如果将创新局限于技术层面的前沿突破，山寨显然不符合这种狭义理解；然而，若将创新理解为回应特定市场需求、对现有技术的有效转化与本地化优化，则山寨在某些场景中确实构成了一种实践性的创新形态。

经济学常将山寨创新与“足够好创新”（good-enough innovation）进行类比，将山寨理解为模仿现有技术或产品的再开发过程。

（Shin-Horng Chen, 2013; Shin-Horng Chen & Pei-Chang Wen, 2016）在这个过程中，“足够（enough）”的低廉价格和“足够”的类似功能，在低端市场中得到了热烈的响应。这一技术创新的思考

路径，平滑地默认了创新是市场的养料，更是资本流通的催化剂，进而强化了创新经济的传说，忽视了创新本身是高度集体创造的积累过程，它并不单纯仅靠国家与市场的力量发生。事实上，尤其在创新初期，需要大量成本进行试错，更需要社会集体承担相应的偶然性和风险，在2000年初中国手机产业发展的这一时期，山寨手机商户正是国产手机自主创新前期的风险承担者。



华强北市场中商铺展示的手机，作者拍摄于2024年7月田野期间

我们在华强北田野研究期间，对曾在华强北赛格广场的山寨手机制造商进行了一系列访谈。据访谈对象描述，那时深圳华强北“一米柜台”租金一个月高达万元，赛格广场摩肩接踵，华强北电子市场络绎不绝，簇拥着来自全国各地电子市场省级、地级代理商，个体户、夫妻店、家族企业组成的营销网络。作为汇聚大量年轻外来劳

力的“活力之城”，华强北的“全产业链”发挥着灵活与快速汇集生产资源的优势，在这里，任何手机配件都可以轻松找到数十家供应商，这恰恰吻合了山寨手机产业的生产模式，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高效率、低容错的生产网络。

提及当时华强北繁杂混乱、百家争鸣的山寨手机产业，他们大都认为山寨手机并非模仿和抄袭的产业，并表示：“创新与功能恰恰是整个山寨手机产业最重要的竞争力。”比如，走访对象徐总的公司当时在专注制造老人机，在极有限的技术条件与高度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费力构想老年手机绑定子女电话的功能——一旦老人跌倒，可以通过手机一键联系到子女——这却是如今许多号称人性化设计的智能手机尚未具备的创意功能。

如果将山寨手机理解为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模式，通过方案设计以解决特定群体的现实需求是这种生产模式的核心，那么这个过程是否可以被我们视作一种创新系统呢？在“山寨”从草根创造力和反叛精神转变为全球企业竞争中的复制品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如何理解“山寨”这种创新系统，其中不同本土参与者为低成本、高效率、垂直整合的制造和分销所做的努力？参与者投入山寨手机产业的动力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这种独特的技术文化如何被网络社会的状况所形塑？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希望可以在后续的研究中继续回答。

2007年，乔布斯在苹果公司首次发布iPhone时掷出宣言：“Let there be an iPhone”，自此，关于手机这一技术物的外观与用途的想象似乎被封存于iPhone的范式之中，使其成为某种“终极设备”（the only one device）。然而，这种技术物想象的单一叙事，是否真是通往未来的唯一路径？尽管我们熟知硅谷塑造的技术神话，却鲜少反思为何只有这一种叙事被允许书写进主流历史之中。

今日，我们试图挪用这一宣言式的语气，说出另一种可能：“Let there be a SZ”。创新很难避免依赖既有的发展路径，当历史巧合赋予某种创新先入为主的优势，那么随后的创新只延续这类产物的改

进。(Mazzucato, 2020)。一旦科技公司与风险投资发现某类创新具备商业扩展的潜力,便会推动其进入应用场景,并由此开启围绕用户偏好的一轮又一轮产品迭代。这一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们关于手机的日常经验:我们理所当然地将从功能手机到智能手机的跃迁视为大型科技企业、创投资本与国家科研机构主导的线性技术进步,由此巩固了一种关于“创新”的单一叙事,也赋予这些力量定义“创新”本身的权力。

山寨机翻转了这种技术神话下的创新意涵,让我们重新想象技术发展的另一种路径。它触及了某种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和国家干预机制”之间的模糊地带。它不可避免地正统西方创新设计的标准。在品种繁多、功能齐全的山寨手机中,我们发现“山寨”滋生了一种有别于西方主流创新产业范式的创新:在特定空间、制度与草根的混合下,山寨以几近现实主义的方式,探索“低成本”、“低科技”对“生产能力”的重构,以实现更多人对技术的需求。经由大众文化的集体力量重新参与、编织了社会权力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有能力抗衡了国家与市场无法保护的部分。技术创新不仅是技术本身进步与否发的问题,更是如何更持续、更接近人们需求的社会问题,它涉及掌握技术的权力如何在社会层面分配和重构。山寨手机这种另类的创新范式,并非按西方发达政治经济体为中心的资本商业模式生长,而触及被主流技术史忽视的、一种可以被称之为“人民的技术实践”如何可能的关键时刻。

因此,尽管山寨手机表面上是国家与市场力量共同塑造的产物,重新审视这一复杂历史切面却能发现:山寨手机产业及其技术文化,实则拓展了更广泛群体接近通讯、娱乐及满足日常生活需求的可能性。这一草根文化所体现的集体实践,重新介入并织构了社会权力的分配逻辑。在国家政策与市场机制尚未充分介入或保障的空白地带,民众的具体需求在情境中汇聚与扎根,充分激发了在地的技术与社会潜能。正是在山寨文化的生成过程中,社会性的力量由此发生了。(邱林川, 2009)

## 参考文献

- Angharad Valdivia, Cara Wallis, Jack Qiu, & Rich Ling. (2012). Mobile Handsets From The Bottom Up. <https://doi.org/10.1002/9781444361506.wbiems149>
- Dan Mu. (2024). Shanzhai as a Pluriversal Praxis: Challenging Western Design and Innovation Paradigm. DRS Biennial Conference Series. <https://dl.designresearchsociety.org/drs-conference-papers/drs2024/researchpapers/4>
- Esther Salvi, Frank-Martin Belz, & Sophie Bacq. (2023). Informal Entrepreneurship: An Integrative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47, 265–303. <https://doi.org/10.1177/10422587221115365>
- Fan Yang. (2016). From Bandit Cell Phones to Branding the Nation: Three Moments of Shanzhai in WTO-era China. *Positions*, 24, 589–619. <https://doi.org/10.1215/10679847-3618141>
- J Qiu & Cara Wallis. (2009). Shanzhaiji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mediascape in Shenzhen.
- Jin-Li Hu & Hang Zhu. (2011). The business model of shanzhai mobile phone firm in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1. <https://doi.org/10.52283/NSWRCA.AJBMR.20110103A05>
- Loren Brandt & Eric Thun. (2011). Going mobile in China: Shifting value chains and upgrading in the mobile telecom sect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ical Learning,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4(1/2/3), 148. <https://doi.org/10.1504/IJTLID.2011.041903>
- Ludovico Alcorta, Mark Tomlinson, & An Tong Liang. (2009). Knowledge Generation and Innovation in Manufacturing Firms in

China.Industry & Innovation,16(4-5), 435-461.<https://doi.org/10.1080/13662710903064109>

Martin Šebeňa. (2023). Technological power: Can China innovate? InContemporary China. Routledge.

Mei Wu & Hongye Li. (2010). The Triumph of Shanzhai: No Name Brand Mobile Phones and Youth Identity in China.Global Media Convergence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Emerging Social Patterns and Characteristics, 213-232.<https://doi.org/10.4018/978-1-60960-037-2.ch015>

Mei-Ling Huang. (2013). 中國大陸白牌手機廠商之研究. 交通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學程學位論文, 1-34.<https://doi.org/10.6842/NCTU.2013.00283>

Michael Keane & Elaine Zhao. (2012). Renegades on the Frontier of Innovation: The Shanzhai Grassroots Communities of Shenzhen in China's Creative Economy.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53, 216-230.<https://doi.org/10.2747/1539-7216.53.2.216>

Ming Dong & Stephen Flowers. (2016). Exploring innovation in Shanzhai: The case of mobile phones.Asian Journal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24(2), 234-253.<https://doi.org/10.1080/19761597.2016.1176864>

Shin-Horng Chen. (2013).China's good-enough innovation: Shanzhai handsets and shanzhai economy(pp. 169-188).

Shin-Horng Chen & Pei-Chang Wen. (2016).The Evolution of China's Mobile Phone Industry and Good-Enough Innovation(pp. 261-282).<https://doi.org/10.1093/acprof:oso/9780198753568.003.0010>

Silvia Lindtner, Anna Greenspan, & David Li. (2015). Designed in Shenzhen: Shanzhai manufacturing and maker entrepreneurs.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Decennial Aarhus Conference on Critical Alternatives, 85-96.<https://doi.org/10.7146/aahcc.v1i1.21265>

- Silvia M. Lindtner. (2020). *Prototype nation: China and the contested promise of innov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Yongjiang Shi & Ke Rong. (2010). Shanzhai manufacturing and its network behaviors. *IEEM2010 –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2183–2187. <https://doi.org/10.1109/IEEM.2010.5674567>
- 何春蕤. (2011). 山寨中國. *文化研究*, 2, 262–266. [https://doi.org/10.6752/JCS.201109\\_\(12\).0013](https://doi.org/10.6752/JCS.201109_(12).0013)
- 余立乾. (2010). 山寨手機的供應鏈分析. 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工程碩士在職專班學位論文, 1–73.
- 保跃平. (2012). 社会学视野下的“山寨”现象研究[硕士, 云南民族大学].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UJxGsw0MzDHZVkdTqIPzvaZyP\\_MT4gMktpbUwv7g96xfmpxkWI\\_Fzku2oE3JvkfSQiRt39PqgbgiE8ewXa-cFJYvat5JP7TMJFWqGIGr4SiFcEr4veK4lQP3NYPO-W3mcMqBYyqLvEzSZvOZ3189gp5qQdXZ4U-3Kwxu10f3oguldYe8JNVf\\_k4Mp9IANeiN2Ejl0=&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UJxGsw0MzDHZVkdTqIPzvaZyP_MT4gMktpbUwv7g96xfmpxkWI_Fzku2oE3JvkfSQiRt39PqgbgiE8ewXa-cFJYvat5JP7TMJFWqGIGr4SiFcEr4veK4lQP3NYPO-W3mcMqBYyqLvEzSZvOZ3189gp5qQdXZ4U-3Kwxu10f3oguldYe8JNVf_k4Mp9IANeiN2Ejl0=&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 傅懷毅. (2010). 以山寨手機的發展模式及創新理論探討山寨筆電的發展策略.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企業經營碩士在職專班學位論文, 1–87. <https://doi.org/10.6846/TKU.2010.00376>
- 吴玫 & 李红叶. (2010). 山寨的凯旋: 山寨手机与中国城市青年. *中国网络传播研究*, 0, 147–171.
- 姜仁成. (2010). 中國山寨手機產業結構與營運模式分析. 國立臺灣大學高階公共管理組學位論文, 1–88. <https://doi.org/10.6342/NTU.2010.10020>
- 張欽益. (2012). 從垂直分工的理論探討小品牌的生存之道-以山寨手機為例. 中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學位論文, 1–95.
- 李仁芳, & 高鴻翔. (2011). 快速試驗、精簡多餘、靈活整合的山寨創新學- 以中國大陸山寨手機廠商為例. *中山管理評論*, 19(3), 557–595. <https://doi.org/10.6160/2011.09.02>
- 李明翰. (2011). 中國山寨機的發展與兩岸產業分工模式分析. 淡江大

學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士班學位論文, 1-94.<https://doi.org/10.6846/TKU.2011.00371>

杜欣霏. (2011a). 山寨機的技術與政治.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1-92.<https://doi.org/10.6843/NTHU.2011.00380>

杜欣霏. (2011b). 山寨機的興起與衰退：中國電信產業之策略思維.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學位論文, 1-45.<https://doi.org/10.6342/NTU.2011.10396>

林士揚. (2010). 草根創新：中國大陸的山寨手機. 清華大學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學位論文, 1-80.

潘九堂, 刘辉, & 袁泉. (n.d.). 深圳山寨手机生产体系的起源和竞争力分析.

蔡佩穎. (2009). 中國大陸手機市場後進廠商的突圍策略- 以聯發科及天宇朗通為例. 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學位論文, 1-68.

諸葛俊. (2016). 中國大陸山寨文化形成的社會微觀：從深圳山寨手機銷售網絡到社會移民的形成. 國際文化研究, 12(1), 89-122.

謝宏仁, 劉書羽, & 辛年豐. (2012). 從中國山寨手機產業看「發展型國家理論」之中央與地方政府關係. 東亞研究, 43(2), 59-99.[https://doi.org/10.30402/EAS.201207\\_43\(2\).0002](https://doi.org/10.30402/EAS.201207_43(2).0002)

邱林川. (2009). 網絡時代的「山寨文化」. 二十一世紀, 12, 121-129.

邱林川. (2013). 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5723889/>

陈绍勇. (2013). 山寨手机产业链竞争力分析——以天语手机品牌创建为例[硕士学位论文, 电子科技大学].[https://kns.cnki.net/](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302&filename=1013149485.nh)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MFD&dbname=CMFD201302&filename=1013149485.nh>

## 青年学者介绍



姜奕竹，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硕士在读，研究兴趣主要聚焦于当代数字艺术、科学技术研究（STS）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关注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及其在艺术实践中的表现形式。



李程锦，目前硕士就读于中国美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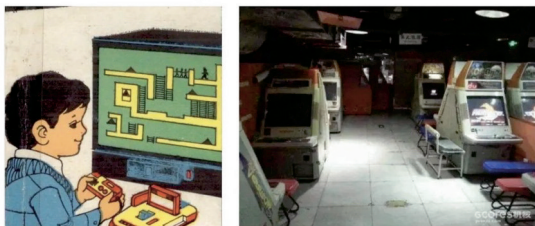
## 傅瓚的游戏历程：解码手柄上的中国计算机启蒙

FU ZAN'S GAMING ODYSSEY:  
DECODING CHINA'S COMPUTER  
CULTURE THROUGH JOYSTICK

任柄霖

我非常高兴能与大家分享傅瓚老师的故事。他是中国游戏与教育领域的一位开拓者，在中国计算机启蒙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他的故事也生动地体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游戏与教育结合的典范。

### **gaming café**



让我们先回到1980年代，那时中国的孩子们跟今天的孩子们一样爱玩，但不同的是，他们玩的可不是高端的游戏机或者智能手机，而是在游戏机房玩那些改装成投币式街机的任天堂或Sega电视游戏机。傅瓚，当时还是一位普通的中学老师，最早接触到游戏机时，他看见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娱乐工具。他眼中的游戏机，是一个可以用来教孩子们打字、甚至编程的“教育工具”。



——“Strive to achieve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在1980年代，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的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科技现代化的重要象征，计算机自然成为了政府和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现实是，那个时候的个人电脑非常昂贵且操作复杂，普通人几乎没有机会接触这项新兴技术。人们对计算机的认知还停留在一种神秘、深奥的印象上。

### the Atari Shock & the Rise of Nintendo FC(N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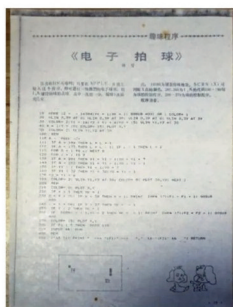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任天堂的崛起标志着电子游戏行业的又一轮发展。中国最早引入的游戏机主要来自香港和台湾，包括仿制的街机、FC红白机和超级任天堂（SFC）。这些先进的游戏设备给当时的青少年带来了巨大的感官冲击。许多人对电子游戏既新奇又充满警惕，尤其是那些坚持传统道德观念的人，他们认为游戏会腐蚀青少年的心智，甚至毁掉整整一代人。因此电子游戏在他们眼中是一种危险的外来文化。



然而，傅瓚的观点却与当时的主流看法截然不同。他意识到，尽管许多人对计算机的概念模糊，但电子游戏不容忽视。他观察到日本游戏产业，尤其是任天堂，正在飞速发展，其软件游戏的产值甚至可与汽车产业相提并论。而要知道，汽车在当时的日本是举足轻重的龙头产业，而游戏作为与之齐头并进的新兴产业，这一现象本身就足以令人震惊。这也使他认识到，游戏不仅仅是娱乐，而是教育和启蒙的重要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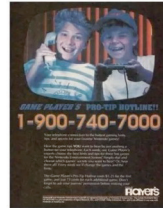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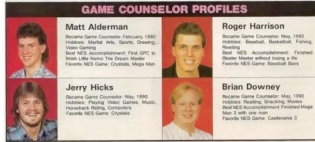
**Fun Programs:  
*Electronic Paddle Ball***



傅瓚意识到，中国的情况与日本大不相同。面对游戏带来的文化冲击，许多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持抵触态度，认为游戏只是娱乐的洪水猛兽。然而，作为一名中学教师，他并不认为游戏只是单纯的娱乐工具，反而看到了它作为计算机启蒙的巨大潜力。他认为，游戏能够引发青少年对电脑技术的兴趣，而兴趣，恰恰是最好的老师。他通过教授学生编写简单的游戏程序，让他们学习BASIC语言，逐步

理解计算机的运作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们发现计算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反而是有趣的。傅瓚的这种教学方法不仅帮助学生克服了对计算机的恐惧，也激发了他们更大的兴趣和好奇心，打开了通往数字世界的大门。

### Game Counselor HOTLINE



此外，中国当时的游戏环境与日本和美国的成熟市场形成鲜明对比。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尤其是日本的电子游戏产业已经高度发展，游戏说明书详尽无遗，甚至提供电话辅导和支持，以确保玩家能够顺利上手。然而，中国玩家在获取廉价兼容卡带时，面临着缺乏说明书和语言障碍的困境。此外，当时游戏的界面非常简单，没有任何说明，使得玩家往往不知道该如何开始。

### Television Games: A Quick Guide



为了解决中国玩家无法获得游戏说明书的困境，傅瓚决定撰写一本指导手册，帮助他们理解市场上流行的游戏。1990年，他出版了《电视游戏一点通》，作为最早的游戏出版物之一，这本书不仅详

细介绍了当时的游戏机，还为每个游戏提供了操作说明。作为一本实用的游戏指南，它同时具备推荐手册的功能，书中包含了对游戏的评分和评价，类似于现代的打分平台。《电视游戏一点通》在市场上大获成功，先后再版五次，销量达到25万册，创下了福建省科普书籍的纪录。

**YUXING YX-686**



**SUBOR SB-2000**



书中最为重要的是傅瓚通过剪贴画的方式拼贴出了游戏机加键盘的组合，推动了这一理念的传播。这一观点启发了许多中国游戏企业，包括裕兴科技与小霸王等，开始开发兼具游戏和学习功能的廉价“学习机”。在美日等国，学习机通常作为游戏机的附属产品，主要用于辅助教育；但在中国，学习机逐渐成为独立的教育工具，承载了更深的社会与政治意义。

换言之，对于中国普通家庭而言，学习机不仅是计算机启蒙的一个途径，更是实现“现代化”的象征。学习机的普及，成为普通家庭接触科技前沿的桥梁，不仅能让孩子们玩游戏，还能让他们学习打字和简单编程，满足家长对教育的期待。这种娱乐与教育结合的模式，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形成了独特的现象。



2005年，傅瓚离开了教书的中学，成了福州市电化教育馆的馆长。这让他有了更多机会将“寓教于乐”这个理念发扬光大。傅瓚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着手创建了一个叫“数字青少年宫”的网站。后来，这个网站成了许多家长放心、孩子们喜欢的地方。里面全是一些健康益智的游戏，既能让学生们在玩乐中学习，还不会让家长担心孩子沉迷。惊人的是，这个平台的用户数最高时达到了6000多万，日活跃用户超过2万。

傅瓚的故事告诉我们，教育与电子游戏并非完全对立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游戏机不仅仅是娱乐的工具，它还能成为启发孩子们思维和学习的桥梁。而傅瓚的工作无疑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不仅是中国游戏教育的先行者，也是无数计算机科学技术人才启蒙的引路人。

傅瓚的故事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节点，学习机不仅是娱乐和教育工具，它也是那个时代中国普通家庭接触信息化和科技现代化的媒介。学习机让那些买不起个人电脑的家庭，尤其是普通工薪阶层，有机会在家中拥有“简易版”的电脑，这对孩子的成长和学习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它承载着当时人们对科技的强烈渴望，以及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景。

最关键的是，学习机的普及与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它不是单纯的抄袭或模仿，而是一种创新性适应，在国内特定的经济条件和社会需求下，应运而生。它不仅满足了中国家庭对教育和科技

的双重需求，还成为了那个时代几代人对更好生活方式的象征和承载。通过学习机，许多中国家庭第一次感受到科技的力量，以及这股力量所带来的改变生活、提升社会地位的可能性。

因此，学习机不仅是一代中国人的集体回忆，还成为了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具体工具。这种结合了教育、娱乐和技术的设备，直接培养和激励了众多青少年对计算机的兴趣，开启了他们未来的职业道路，也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贡献了无数科技人才。



从这个角度说，学习机象征了那个时代的创新、梦想和未来，是中国普通百姓对于现代化生活的朴素想象和实践路径。在像傅瓚这类人的推动下，它超越了单纯的技术工具，成为那个时代人们心中通向未来的标志性存在。

傅瓚的贡献，远远不止于他个人的成就，他的设想和实践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中国人。通过将键盘与手柄相结合，他为中国的教育方式开辟了新的道路，也为现代计算机科学人才的培养提供了重要的启发。因此，当我们谈论学习机，谈论傅瓚时，我们不仅仅是在谈论一段历史，更是在反思教育、科技和社会的深层次关联。正如傅瓚所坚信的那样，游戏不仅是娱乐，它可以成为一种强大的教育工具，而这种寓教于乐的理念，至今依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最后，我想说，傅瓚的故事启示我们，创新并不总是依赖于最新的技术，有时候，真正的创新在于如何将已有的资源和技术，以最合适的方式应用到教育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中。傅瓚通过对游戏机

的独特理解，激发了无数学生对计算机的兴趣和热爱，他用自己的方式，推动了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启蒙。这不仅是对游戏和教育重新定义，更是对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深刻思考。

## 青年学者介绍



任柄霖，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主要聚焦于游戏哲学、游戏文化。

## “无奋斗，不龙华”，龙华汽车站田野调查

“NO FIGHTING, NO LONGHUA”,  
FIELD RESEARCH AT LONGHUA  
BUS STATION

韩佳欣 仝昭祥

什么是三和大神？



走完一楼中介档口的这一路，会听到很多叫卖声，像“收身份证了”、“快手50”、“微信300”等等。对大神而言，当他们走投无路时，宁愿不工作，而是选择卖出身上一切可以卖掉的东西。身份证市场价在500元左右；微信号需要使用了一年以上的才能卖掉，根据具体情况报价，价格在300元左右浮动以上；做代理法人的市场价3000元上下浮动。



我们可以看到，白天有很多人坐在台阶上，晚上这里成为免费的住宿。

在以往研究中，三和大神是指游荡在招聘市场的新一代务工人员，他们不愿进厂工作，选择“得过且过”。“三和”一词来源于三和人才市场，一个大型招聘公司。

通过我对个人中介小哥和摩的司机的询问，我得知他们会将三和大神进一步细分：

“纯大神”——是指完全不愿意工作，他们几乎一天都躺在汽车站。对于“纯大神”而言，他们宁愿饿死也不工作。不过在汽车站时常会有免费的盒饭能让他们继续维持生活。他们在精神上主张“活在当下”，对生活没有任何追求。

“半大神”——“干一天，玩三天”是他们的生活态度。他们仍然会工作，但只做日结工作。日常生活消费很低，不工作的时间在汽车站附近生活和娱乐。只要还有钱能生活，便不愿工作。

“挂壁”——这个词是三和大神们最常挂在嘴边的词语，他们通常用这个词表示自己又要过上没钱吃饭睡觉这种穷困潦倒的生活了。纯大神正是“挂壁”状态，而半大神处于“挂壁”的边界线。

韩佳欣 仝昭祥

摩的大哥说，前几天在汽车站门口才饿死一个大神，尸体无人认领，最后由政府处理了。龙华汽车站一年大概饿死10人左右（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

他们对未来没有规划，但规划本身即是富人阶级的权利。三和大神这个身份是流动的，“挂壁”也是流动的，当个体意识到不再想过这样的日子，且有了一定的物质条件，便可以脱离这个身份和这种生活状态。



为什么有这么多大神聚集在这里？离不开龙华汽车站的特殊性。

## 什么是龙华汽车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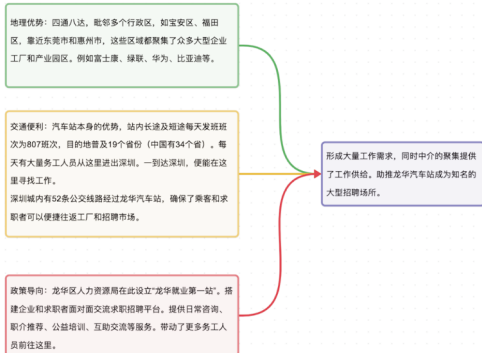
这里不仅仅是汽车站，还是一个招工市场，汽车站内部有16家人力资源公司，这里的招工类型主要是劳务派遣工和日结工。

五湖四海的务工人员来这里寻找留在深圳的出路，自7年前政府决定对三和人才市场（同样位于龙华区，也是一个大型招工市场）进行整改，龙华汽车站成为“三和大神”新的居所。



## 为什么龙华汽车站能够成为一个大型招聘市场？

在地理优势、交通优势、政策助推等因素的集合下，这里聚集了大量工作机会和劳动力，进而形成了一个大型就业市场。



两次前往龙华汽车站时隔两个月，我目睹了这里的空间改造。

这是7月我第一次来这的时候，空荡的广场让人们聚集在一起，广场空地为大神和务工人员提供了免费睡觉休息的空间。



而在10月时，这里正在进行绿地公园的改造，整个广场中央被围起来，草坪与步道替换了水泥地和座椅。



这是城市过程中对底层强硬的驱赶，公园绿地占据了大神们的温床，用更美观的景观在隐形中驱赶着影响市容市貌的大神们。

如何在大型招聘市场找工作？下面我将介绍劳务派遣中介的招工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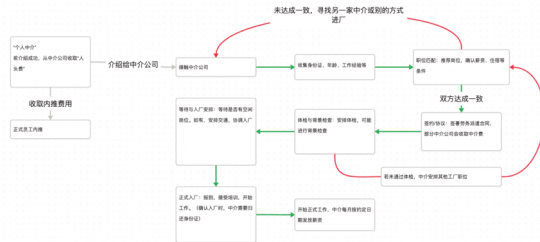
总体上，在龙华汽车站，无论是中介公司还是务工人员都更青睐于劳务派遣工，即通过中介公司找工作。以深圳富士康为例，富士康的员工有30%正式工，70%劳务派遣工。

经过访谈与调查，以下是劳务派遣工和工厂正式工的区别。

对比项	临时工、小时工（劳务派遣工）	正式工
劳动合同	与中介机构签订劳动合同	直接与工厂签订劳动合同
工资发放	由中介机构发放（黑中介会出现和当初承诺的工资有差距的问题）	由工厂直接发放
工资水平	按时薪看较高	相对较低，但有带薪年假，年终奖，年假
工作期限	短期，通常3-6个月	长期，可能是永久性职位
社保福利	没有社保	工厂负责缴纳个人所得税及社会保险费用
招聘要求	较低，更容易进厂	较高，可能需要更多技能或资格以及人脉
辞退补偿	一般没有辞退补偿	若符合条件，有辞退补偿，失业金
工作稳定性	较低，可能随时被辞退	较高，工作相对稳定
职业发展	有限，短期工作可能不利于长期职业发展	更多的职业发展和晋升机会
工作内容	可能更偏向于体力劳动或特定任务	可能包括管理、技术等多种工作内容
工作地点	可能因项目而异	相对固定
总收益	虽然时薪高，但由于工作不稳定，总收益可能有限	虽然时薪较低，但加上福利，长期来看总收益可能更高

## 劳务派遣中介招工流程

找个人中介并非必须步骤，个人中介会把务工人员推荐给中介公司或内推进工厂。若没有接触个人中介，则直接从接触中介公司开始。



但是在这个流程的每一步，都存在被不靠谱的中介欺骗的风险，如紫色图标所示：



在龙华汽车站，还有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工作形式——日结工

## 日结工是什么？



这里是龙华汽车站招日结工的重要聚集点，日结工的招工时间并不稳定，主要集中在凌晨4-6点，下午五点。日结工作基本上个人中介进行招聘，也就是所谓的二中介。在人群中呼喊，便有大量务工人员围上来。

日结是指，务工人员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就能拿到当天的工资。快递、装卸、保安、工地是最多的工作类型。优点在于能快速拿到工资，拥有比在工厂上班更自由的时间。但工作强度大，一天内需要进行长时间的体力劳动。

龙华汽车站的日结工工资在80-200一天浮动。除了灰色产业，日结是务工人员短期内获取收益比较方便快捷的方式。

## 龙华汽车站周边的服务设施

中国各地都有零工市场，但是龙华汽车站结合了劳务市场和日常吃穿住行，形成完整的生态链，这在中国比较少见。

韩佳欣 全昭祥

住宿：拿着25元一个床位一晚的广告牌的阿姨们在汽车站的每个角落寻找住客。



网吧：不到15元可以在网吧8小时通宵（提供免费牙膏牙刷湿纸巾等），网吧门口有很多行李箱，很多年轻务工人员选择在这里过夜。



龙华区政府偶尔会在这里提供公益住宿，但实际是为了市容市貌，基本上一周会发放一些爱心食物，例如面包。

“无奋斗，不龙华”，龙华汽车站田野调查



一些公益组织或佛教组织会来这里发放免费盒饭。



在日常生活上，这里提供了深圳相对较低的物价，能够让本就不高的工资维持更长时间的不用工作的生活，但这增加了大神继续保持这种生活状态的粘性。



按照“干一天玩三天”的说法和每天150元收入标准计算，三和青年每个月的收入大约只有1200元，比22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要整整少1000元。相比于深圳的物价，他们无法保证生活质量。

## 为什么“三和大神”出现在深圳而不是其他城市？为什么深圳能够包容他们？

作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节点，深圳在2023年实现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41.9%。尤其在高科技领域，深圳具备涵盖研发、生产、测试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深圳的完整制造业产业链和高科技产业吸引了大量劳动力，形成了独特的劳动力市场结构，非正规就业形态遍及深圳，尤其是日结工，避开繁杂的劳务流程和潜在的风险，因其灵活性和即时薪酬的特点，能够立即满足深圳制造业和服务业对临时工的周期性需求，也为劳动者提供了灵活的就业选择。然而日结工缺乏劳动保障的弊端也在慢慢累积中显现为大量务工人员走向“三和大神”这种生活状态。

对务工人员的压迫可能发生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三和大神大约从2010年代初开始出现，14年来，深圳仍留有一片温土，让他们能够继续生活在城市里。这即是深圳的独到之处。

深圳是一座由流动人口外来人口建立起来的城市，是一座“移民城市”。2023年深圳常住非户籍人口为1172.87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65.9%，深圳是靠外来人口发展起来的，有很强的包容性。深圳以其开放和包容的文化著称，“来了就是深圳人”是深圳的slogan，这种文化背景使得深圳对于不同背景和身份的人持有接纳态度。最重要的是，深圳的快速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需要多层次的劳动力市场，包括灵活的非正规就业形态，以适应制造业和服务业对临时工或短期工的需求。如前文所说，三和大神是一种流动的身份，他们曾是，未来也可能是可用的劳动力。

最后，我想分享在田野过程中我个人的独特体验。

## 女性困境

在网络上有大量的工厂招工视频都是以女性当作诱饵进行引流，女性被物化的问题在务工群体展现的更加裸露。



而在现实中：龙华汽车站的男女比例为9:1，在这里女性最多的地方是中介公司的门口（中介公司95%的员工是女性）。



在龙华汽车站调研的全过程，无时无刻感受到来自男性的凝视，或许好奇，但更多是女性作为第二性，男性作为观看和凝视的第一性对年轻女性的审视。

韩佳欣 仝昭祥

感谢黄孙权教授、王婧洁、任柄霖、江子祎的拍摄，仝昭祥的模型建造。



## 问答讨论

**Jason Vincent A. Cabañes**：谢谢你的演讲，非常有趣。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去年我在上海呆了一段时间，发现现金变得很难使用，几乎所有的货币交易都变成了数字化的。所以我很好奇，你提到的汽车站，那里是否也采用数字化货币交易？还是使用现金支付呢？因为你说到汽车站就像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也许他们不需要使用数字交易，但我还是很想了解他们是如何支付和消费的。

韩佳欣：中国的数字支付已经很普及了，所以在龙华汽车站，现金交易和数字交易是同时存在的。

**Tom McDonald**：你在讲述的过程中用“黏性的”来形容龙华（汽车站），这很有趣。我们经常说微信是一个黏性的平台，因为你可以在那里做任何事，一旦你进入这个平台便很难再出来了。所以我知道龙华汽车站是一个平台吗？我们可以这样想吗？

韩佳欣：我认为可以这么说，龙华汽车站是一个招聘市场，是一个找工作的平台。除了现场招聘之外，现在很多中介公司会利用社交媒体，而且就是用微信，比如说建微信群，通过抢红包的方式或者每天更新信息的方式去维系他的用户群体。而且，那边有很多骗子中介，所以它虽然是一个平台，但其安全性并不可靠。

## 青年学者介绍



韩佳欣，现居杭州。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研究生。内容生产者，热衷于从日常生活中提取被隐藏的问题。



# 一般论文

RESEARCH ARTICLE



# 红色模型：中国人工智能治理的平衡与失衡

蔡泽锐

摘要：严密的监管举措是否会制约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呢？在人工智能治理中，中国政府扮演的角色难道仅仅是冷血、只会说“不”的监管者而已吗？显然，这种偏狭的定位忽视了中国错综复杂的制度结构和社会现实。本文希望打开这其中的复杂性，试图分析中国政府是如何监管，又是如何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以及在这两个角色矛盾中又是如何平衡的？

关键词：AI 治理、生成式人工智能、AI监管



## 引言

从 2020 年底开始，中国对科技公司的监管措施开始令人闻风丧胆。首先是 11 月，政府紧急叫停融资超 340 亿美元的蚂蚁集团上市计划。随后是 2021 年 7 月，滴滴公司遭到中国网信办审查，其后软件被下架整改，最后因数据违规行为被罚款人民币 80 亿元。2021 年 10 月，美团也因垄断市场行为被罚款逾 5.33 亿美元<sup>[1]</sup>。紧接着，中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监管科技企业的重要法规，

包括《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和《反垄断法》。不管是对科技巨头的打击，还是多项法规的制定，背后都体现了中国政府已经一改以往“包容审慎”的态度，取而代之的是对科技行业严厉的监管决心。而对于监管机构来说，目前最棘手的对象，莫过于飞速发展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2023年4月，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文简称《征求意见稿》），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全面监管这一新兴技术的国家。紧锣密鼓三个月之后，网信办、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发改委）、教育部、科学技术部（科技部）、工信部以及公安部联合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下文简称《暂行办法》），最终确定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商的各项规范。在此之前，中国监管机构已经发布两部人工智能专门法规，分别是2021年12月发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下文简称《算法推荐规定》）和2022年11月发布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下文简称《深度合成规定》）。然而，严密的监管举措是否会制约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呢？在人工智能治理中，中国政府扮演的角色难道仅仅是冷血、只会说“不”的监管者而已吗？

显然，这种偏狭的定位忽视了中国错综复杂的制度结构和社会现实。本系列文章希望打开这其中的复杂性，试图分析中国政府如何通过扮演多重角色实现人工智能治理，同时又是如何相互平衡不同角色之间的矛盾。这三组矛盾分别是发展与安全，投资与消费，以及地方现实和全球野心。这么安排，并不是为了搭建一个看似二元对立的框架，而是希望将中国政府放置在不同角色的紧张博弈之中进行讨论。因为如果只是简单静态地列举中国政府如何发挥各种职能，对于书写国家与技术发展之间的纠缠关系而言，是乏力，同时也是寡淡的。

## “中国方案”的安全感

伴随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其风险的担忧也越来越多<sup>[2-6]</sup>。由此，发展优先抑或安全优先的路径之争，便成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辩论核心。2024年3月，欧盟通过了《人工智能法》，明确了安全优于发展的价值序列，要求成员国基于人工智能系统风险分级管理（risk-based approach），加强对人工智能科技公司的监管，进而限制技术发展带来的潜在风险。那么“中国方案”又将如何抉择呢？一方面，中国政府需要扮演监管者的角色，以保证人工智能的安全。另一方面在经济出现大幅下滑，出口下滑、消费和生产减少、失业率上升的大背景下<sup>[7]</sup>，又需要通过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以刺激经济和恢复市场信心。基于此，我将在本文分析中国政府是如何监管，又是如何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以及在这两个角色矛盾中又是如何平衡的？

首先，试图分析所有和人工智能监管相关的法规，在一篇论文中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本节的分析对象聚焦于明确针对人工智能的国家级政策文件，也就是上文提及的三部法规，分别处理推荐算法、深度合成和生成式人工智能。面对中国政府发布的法规，国际评论往往会陷入两种错误成见，第一种认为这些法规无关紧要，是毫无意义的一纸空文，这种观点通常预设中国共产党有着不受制约的权力，因此可以无视这些规定。第二种则是将中国的监管措施视作一种威胁，将其片面地视为争夺国际治理权的手段。这种观点与其说是在警惕中国制定全球治理规则，不如说是暗渡陈仓地合法化美国的领导地位<sup>[8]</sup>。当然，我并非否认中国政府有着领导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野心和愿景<sup>[9]</sup>，而是指出，上述两种观点都忽略了对法规本身的分析，因此对于中国政府发挥监管职能的着力点和动机，也就不可能有清晰的认识。

2021年《算法推荐规定》标志着中国政府开始对算法和人工智能进行有针对性的监管。法规中定义的“算法推荐技术”具体可以分为以

下几个类别：（1）生成合成类，例如 AIGC 相关产品和服务；（2）个性化推送类，例如根据大数据预测消费者习惯进而推荐产品；（3）排序精选类，例如社交媒体应用的热搜榜单；（4）检索过滤类，例如搜索引擎结果排除特定内容；（5）调度决策类，例如外卖和打车平台。针对这些场景，法规又要求在提供服务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该向网信办（或者其它地方网信部门）进行算法备案。备案的内容包括服务提供者的名称、服务形式、应用领域、算法类型、算法自评估报告、拟公示内容等信息。当备案手续完成之后，服务提供者还需要在相关网站上展示备案编号等信息。政府也会将审核通过的算法备案清单公布于众。这项规定不仅出现于算法推荐规定中，同样也出现在另外两部法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并不是所有算法都需要备案，只有在产品、服务或者程序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时才需要。那么所谓“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标准又是什么呢？三部法规并未给出清晰的定义。但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恰恰又可以反映监管机构的动机，即确保媒体议程设置的主动权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要理解这一点，需要追溯到中国官方媒体批评“算法推荐”的起源。2016 年底，人民网发布一篇名为《算法盛行更需“总编辑”》的评论，虽然人民网没有直接点名，但其主要针对的是今日头条，一个由算法驱动的新闻聚合内容平台。至于导火索，则是今日头条创始人张一鸣一次“不识时务”的表态。

2016 年 12 月，张一鸣接受了《财经》杂志的采访。在谈话中，张一鸣将今日头条描绘成一个中立的平台，其算法的唯一目标就是为用户匹配他们感兴趣的内容，无论这些内容是高尚还是低俗。他明确否认今日头条应该尝试引导用户，或者向他们灌输任何形式的价值观。同时他也拒绝了今日头条需要一个“总编辑”的建议。张一鸣对于内容审查的自由放任态度，无疑和中共的“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党管媒体”理念背道而驰。2016 年 1 月，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

必须姓党”。这意味着中共对意识形态安全的日益关注，同时也意味着非官方媒体的言论空间也会越来越局限。张一鸣很可能认为只要将今日头条定位为“科技公司”，便可以相对自由。但《人民日报》很快就驳斥了他的天真。在上述提及的《人民日报》中评论道：“算法主导的时代，更需要把关、主导、引领的‘总编辑’，更需要有态度、有理想、有担当的‘看门人’。”

到了2017年，官方媒体对头条的批评愈演愈烈，从9月18日到20日，《人民日报》网站连续三天刊登了三篇文章，抨击今日头条以及推荐算法技术本身。透过这三篇文章《不能让算法决定内容》，《别被算法困在“信息茧房”》和《警惕算法走向创新的反面》，中共对推荐算法在中国媒体领域的运用表示强烈不满。而接收到这样的讯号之后，监管机构也开始介入今日头条和其它算法驱动的新闻应用程序。2017年12月，北京市网信办约谈今日头条和凤凰新闻，以传播色情低俗信息、违背正确导向、无证经营网络新闻平台为由，对其批评并责令整改。两天后，今日头条关闭该应用中的社会新闻频道，取而代之的是“新时代频道”，并将其作为用户的默认频道，确保该频道宣传的新闻与中共的叙述相一致<sup>[10]</sup>。

所有这些对算法推荐技术的批评，背后反映了国家对算法在网络信息传播中作用的担忧。自1949年掌权以来，国家在很大上拥有对各种社会新闻报道“划重点”的权力，这种权力随着私有媒体和网站的兴起而面临挑战，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要追责个人依旧不是难事。然而当今日头条将决策权交给了算法之后，推送给用户的内容从此符合的是用户兴趣，而非中共的兴趣，如此一来官媒和用户的权力关系便松动了<sup>[10]</sup>。而权力关系是社会建构的基本要素，社会制度建构的依据就是掌权者的价值观和利益需求。权力可以通过强制或者操弄民众心中的象征意义来实现。前者以国家垄断暴力为代表，后者是通过改变人民的思想来实现更加稳固的权力关系。社会是由制度、规范和价值观组织起来的，人们的思考方式决定了社会的样貌。换句话说，今日的权力网络主要是透过大众传播的多媒体通讯网络来影响我们的思维，进而发挥作用<sup>[11]</sup>。而算法推荐技术

无疑具有成为“武器”的潜质，这也就意味着它将威胁到了国家长期以来制定公共话语议程的能力，因此也解释了监管机构积极干预的原动力。最直接的表现便是《算法推荐规定》明确要求平台人工干预社交媒体上的热点话题列表，以确保它们反映政府的优先事项。同时法规中的将近  $\frac{1}{3}$  的条文都是针对在线内容规范，通过强制要求算法推荐服务提供商“坚持主流价值导向，积极传播正能量”，政府议程设置的权力才得以继续稳固。

在关注推荐算法的同时，政府也开始将深度伪造的假新闻视为对信息环境的一大威胁，并着手开始对其监管。深度合成指的是利用深度学习技术来产生文字、图像、声音、视频和虚拟场景等内容，换句话说来说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合成法规》同样旨在防止误导性或政治敏感性内容的制作和传播。首先，法规要求深度合成内容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损害国家形象、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经济和社会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活动”。其次，在深度合成内容可能混淆或者误导公众的时候，还需要在合理位置进行标识以提醒公众。最后，服务提供者还需要对用户进行真实身份信息认证，以便追责。这些规定都将成为中国监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石。因为最新的《暂行办法》便在很大程度上重申和援引上述的条文，不仅如此，在这部法规中我们还可以观察到监管机构的态度转向。

## 亚“健康发展”

毋庸置疑，最近出台的人工智能法案无疑增加了中国科技公司的合规负担。然而，它们在实践中对于服务提供商的影响似乎有限。上述讨论中，我说明了三部法规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强调内容控制，旨在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不会挑战中共对公共话语的控制。但迄今为止，这些法律都没有适用于追究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的侵权责任。算法备案要求也没有明显阻碍大型人工智能公司提供面向公众

的服务。虽然在《暂行办法》中规定“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向公众提供服务前，要按照《算法推荐规定》履行算法备案和变更、注销备案手续”。但在《暂行办法》发布仅两周后，包括商汤科技“商量”、百度“文心一言”、智谱 AI“智谱清言”等的 11 个人工智能产品就获得了网信办颁发的许可证。而在 2024 年 6 月网信办发布的《境内深度合成服务算法备案清单》中更是有 492 多个人工智能相关算法和应用获得服务许可。可以看出自 2023 年底以来，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备案要求已变得不那么严格。许多人工智能公司现在只需向网信办的地方办事处登记其安全评估，而无需在推出公共服务前获得许可证。这一转变标志着监管程序的大幅放宽，同时也反映出政府明确强调增长和创新优先于严格监管<sup>[12]</sup>。这一点也可以在《暂行办法》和最初的《征求意见稿》相比较得到验证。

与《征求意见稿》相比，《暂行办法》做出了重要修改，例如在适用范围上，明确排除了“行业组织、企业、教育和科研机构、公共文化机构、有关专业机构，未向境内公众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强调了只有“对境内公众提供服务”才适用该条款，意味着如果基础模型提供商如果仅仅向垂直领域的 B 端提供服务则不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同时《征求意见稿》第二条“研发、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众提供服务的，适用本办法”中的“研发、利用”也被删改，这些修改都旨在为科研提供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凸显了中国政府对促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重视<sup>[13,14]</sup>。

除了宽松的行政执法外，中国司法部门也遵守中国政府支持增长的指示，承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知识产权。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例子发生在 2023 年 11 月底，当时北京互联网法院做出了一项判决，认定使用 Stable Diffusion 生成的图像有资格获得版权保护。法院强调，原告通过在 Stable Diffusion 模型中输入提示词、设置相关参数，并根据初步生成的图片又增加提示词、调整参数，这些都涉及一定程度的智力投入。法院认为这些输入具有足够的原创性，因此，法院得出结论：“人们利用人工智能模型生成图片时，

不存在两个主体之间确定创作者的问题，本质上，仍然是人利用工具进行创作，即整个创作过程中进行智力投入的是人而非人工智能模型……人工智能生成图片，只要能体现出人的独创性智力投入，就应当被认定为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该案的主审法官朱阁在接受采访时也强调，司法要与立法者的价值选择一致。通过给予人工智能生成图像著作权，从而鼓励大家使用大模型进行创作。同时也能够让市场产生稳定预期，投入研发、优化服务，形成良性循环，推动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然而即使《暂行办法》释放出了刺激发展的信号，其中也存在一些阻碍发展的不足之处。同时这些不足可能让未来中国的人工智能治理进入“亚健康”状态。其病症可以概括为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产业链中各参与者的责任分配不合理。首先，《暂行办法》广泛使用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一词，这一用法将产业链中的不同参与者都“打包”统合在一起，例如芯片厂商、云计算服务提供商和软件服务提供者等等，然而这些不同的角色在产业链发挥的作用存在着巨大差异。如此一来，在法规实际执行过程中便会出现矛盾。例如，法规要求服务提供者应使用具有合法来源的数据和基础模型。而在实际情况中，那些采用 OpenAI 的 API 将 ChatGPT 集成到自身应用中的公司，也都被归类为服务提供者，需要遵守相关规定。但这些公司可能难以履行某些要求，因为他们往往无法控制所采用模型的训练数据和设计选择<sup>[13]</sup>。

其次，人工智能治理的一个关键挑战在于如何管理开源模型及其生态系统。服务提供商主要通过闭源 API 或开源模型两种模式提供服务，各有利弊<sup>[15]</sup>。但在《管理办法》并未对“服务提供者”进行区别。从国家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推广开源技术对加速中国整体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能够使更多初创小型企业获得基础 AI 模型的访问权，从而创造共享知识基础。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开源模型的积极外部性，并通过资助等方式支持开源大语言模型的发展。然而，《暂行办法》关于开源提供商的具体规范存在空白，这导致了一定的模糊性。对开源和 API 提供商施加同等责任可

能会无意中阻碍创新，因为开源提供商通常难以掌控其模型的下游应用。此外，开源社区参与者的贡献动机，一般是基于个人热情或建立声誉，往往缺乏资源来遵守严格的合规要求，由此过多的义务可能会造成合规负担。总结来说，如果过于严格的监管压力过多地落在那些应用基础模型的中小企业和初创公司身上，而不是拥有大量数据和算力的大型基础模型开发公司，难免会抑制市场竞争，进而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sup>[14]</sup>。除此之外，潜藏在中国式监管底下还有更多未知的风险和副作用。

## 是“药”三分毒

中国采取了相对宽松和商业友好的监管环境。这种策略可能在短期内为中国企业提供竞争优势，允许它们更快速地开发和部署人工智能服务。但这背后可能存在着几重风险。首先，这种优势可能是短暂的，特别是随着中国公司向国际市场扩张，它们必须适应海外更严格的监管标准，如《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其次，宽松监管可能也会产生反效果。以前文图像生成的知识产权案例为例，虽然判决可能短期内推动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但也可能引发一系列法律挑战，如增加版权纠纷。同时也可能导致人工智能生成图像大量出现，打击人类创作者积极性，导致高质量的人类原始创作减少，进而加剧人工智能产业已经面临的数据稀缺问题。

再者，对于中国的人工智能公司而言，宽松的监管信号并不能完全抵消合规压力，为了避免因为内容和数据问题陷入监管风波，这些公司不仅需要训练大语言模型会说话，同时也要训练其“察言观色”的能力，在不该说话的时候懂得沉默。这种自我审查的需要，势必会分散科技公司的部分研发精力和资源<sup>[16]</sup>。毕竟当用户想要的是答案，但得到的却总是“尊敬的用户您好，让我们换个话题再聊聊吧”，这样的体验恐怕难称得上愉悦。久而久之，用户杯葛国产大模型的决心，也势必越来越坚定。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通过严厉打击科技行业，塑造出了雷厉风行的形象，但又非常快速地转变为宽松监管。这种剧烈转变会给投资者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他们需要小心猜测监管者的动机，也难免会产生误读或者过度解读的情况，导致微小的法规变化都会引发市场反应。在一次次危机和政府出手之后，国家和企业之间的信任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难修复，政府公信力也在反复无常和不可预知的政策中流失。当然我们不难理解，这些监管措施背后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中共意识形态、监管机构、官僚体系和科技行业复杂互动的结果。但在这个互动网络中，权力显然是不对等的。也正是这种失衡，让国家每一次积极干预市场之后的结局不再是悬念，那便是引发更多难解的新问题。面对当前的平台已经日益基础设施化，科技巨头借由算力和云计算不断扩大其垄断权力的情况<sup>[17-19]</sup>，我们总希望寄托于国家监管能够成为“解药”，但如果缺乏健全的法治体系，似乎也难逃“是药三分毒”老祖宗的这句谆谆教诲。

## 未完待续

类似“维护人工智能安全”，“引导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这样的表达，经常出现在中国的宣传话语中。然而，经过上述分析，浮现出来的却是一个亟需意识形态安全感，同时又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中国方案”。在发展优先还是安全优先的路径选择岔口，中国通过对公共信息环境的绝对控制来满足安全需求，同时又因为面临着中美人工智能技术竞赛的压力，以及国内经济下滑的现实，不得不通过法规来释放出宽松监管的信号，从而刺激中国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

发展人工智能对中国来说不仅是经济催化剂，同时也事关技术自立、国家尊严和全球竞争。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监管机构对治理新兴技术经验匮乏，出现了产业链各参与者的责任分配不合理的情况，以及政策波动过大的问题，从长远上看，这可能会导致阻碍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行业的健康发展。另外我们还需要意识到，在

人工智能产业中，中国政府不仅是监管者和促进者，同时也是投资者和消费者，这双重身份的互动也深刻地形塑了当前的技术现实。不过这又需要一篇论文的笔墨了。

## 参考文献

1. Goldkorn, C. C., Jeremy, & Che, C. (2021, August 2). China's "big tech crackdown": a guide. *The China Project*. <https://thechinaproject.com/2021/08/02/chinas-big-tech-crackdown-a-guide/>
2. Bird, C., Ungless, E. L., & Kasirzadeh, A. (2023). *Typology of risks of generative text-to-image models* (arXiv:2307.05543). arXiv. <https://doi.org/10.48550/arXiv.2307.05543>
3. Bommasani, R., Hudson, D. A., Adeli, E., Altman, R., Arora, S., von Arx, S., Bernstein, M. S., Bohg, J., Bosselut, A., Brunskill, E., Brynjolfsson, E., Buch, S., Card, D., Castellon, R., Chatterji, N., Chen, A., Creel, K., Davis, J. Q., Demszky, D., ... Liang, P. (2022). *On the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of Foundation Models* (arXiv:2108.07258). arXiv. <https://doi.org/10.48550/arXiv.2108.07258>
4. Hendrycks, D., Mazeika, M., & Woodside, T. (2023). *An overview of catastrophic AI risks* (arXiv:2306.12001). arXiv. <https://doi.org/10.48550/arXiv.2306.12001>
5. Park, P. S., Goldstein, S., O'Gara, A., Chen, M., & Hendrycks, D. (2023). *AI deception: a survey of examples, risks, and potential solutions* (arXiv:2308.14752). arXiv. <https://doi.org/10.48550/arXiv.2308.14752>
6. Weidinger, L., Uesato, J., Rauh, M., Griffin, C., Huang, P.-S., Mellor, J., Glaese, A., Cheng, M., Balle, B., Kasirzadeh, A., Biles, C., Brown, S., Kenton, Z., Hawkins, W., Stepleton, T., Birhane, A., Hendricks, L. A., Rimell, L., Isaac, W., ... Gabriel, I. (2022).

- Taxonomy of risks posed by language models. *Proceedings of the 2022 ACM Conference on Fairness,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214–229. <https://doi.org/10.1145/3531146.3533088>
7. Huang, Y. (2023). *Has the chinese economy hit the wall?* East Asia Forum. <https://doi.org/10.59425/eabc.1696802442>
8. Sheehan, M. (2023). *China's AI Regulations and How They Get Mad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3/07/chinas-ai-regulations-and-how-they-get-made>
9. Cheng, J., & Zeng, J. (2023). Shaping AI's Future? China in Global AI Governa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32(143), 794–810. <https://doi.org/10.1080/10670564.2022.2107391>
10. Sheehan, M. (2024). *Tracing the Roots of China's AI Regulation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4/02/tracing-the-roots-of-chinas-ai-regulations>
11. Castells, M. (2009). *Communication Pow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 Zhang, A. H. (2024).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China's Regul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 citation(s); 4708676). <https://doi.org/10.2139/ssrn.4708676>
13. Pi, Y. (2024). *Missing value chain in generative AI governance China as an example* (arXiv:2401.02799). arXiv. <http://arxiv.org/abs/2401.02799>
14. Chen, Q. (2024). *China's Emerging Approach to Regulating General-Purpo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alancing Innovation and Control*. 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 <https://asiasociety.org/policy-institute/chinas-emerging-approach-regulating-general-purpose-artificial-intelligence-balancing-innovation-and>
15. Gan, W., Wan, S., & Yu, P. S. (2023). Model-as-a-service (MaaS): a survey. *2023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g Data (BigData)*, 4636–4645. <https://doi.org/10.1109/BigData59044.2023.10386351>

16. Triolo, P. (2023, April 12). Chatgpt and China: How to Think About Large Language Models and the Generative Ai Race. *The China Project*. <https://thechinaproject.com/2023/04/12/chatgpt-and-china-how-to-think-about-large-language-models-and-the-generative-ai-race/>
17. van der Vlist, F., Helmond, A., & Ferrari, F. (2024). Big AI: Cloud Infrastructure Dependence and the Industrialis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 Society*, 11(1). <https://doi.org/10.1177/20539517241232630>
18. Ferrari, F. (2022). *Forces of Neural Production: The Infrastructural Geograph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niversity of Oxford]. <https://ora.ox.ac.uk/objects/uuid:2eb7920b-37c8-4bb6-9221-ece4b3026db0>
19. Vipra, J., & West, S. M. (2023). *Computational Power and AI*. AI Now Institute. <https://ainowinstitute.org/publication/policy/compute-and-ai>

# “他”的政治不是我的世界—— 《极乐迪斯科》女性玩 家认同研究

张钰彬

然而就在过去的一年里，成千上万的人们迁入境内。那些过去被我们视作敌人的人们，今天想和我们在共同生活在一起。我们知道，我们的国家并不完美。但是我们所信仰的，总是鼓舞着全世界的许多人。也许有时我们会迷失目标，但是我们是深思熟虑的。……社会主义不是自我封闭，是为他人奉献、与他人共存，不仅仅去梦想一个更好的世界，而是要去真正实现。因此我决定，开放民主德国的边境。在柏林墙倒塌后的几个小时里，有成千上万的西德人民走进东德，成为第一批到访民主德国的客人。许多人想要留在东德，他们想从资本主义的生存竞争中解放出来。并非所有人都想参与职场斗争和拜金主义的活动，并非所有人都受得了弱肉强食。他们想要另一种生活，他们发现，汽车、录像机和电视并非一切。他们准备好了，以更好的意志，行动力和希望来实现他们新的生活。

——《再见列宁》

困扰是一种私人事务：某个人觉得自己所珍视的价值受到了威胁……议题是一种公共事务：公众觉得自己所珍视的某种价值受到了威胁。……假如人们对自己珍视什么价值浑浑噩噩，又或者没有体验到任何威胁呢？这就是所谓漠然（indifference）的体验。而如果这种态度似乎波及所有价值，那就成了麻木（apathy）。最后，

假如他们浑然不知自己珍视什么价值，但依然非常清楚威胁本身的存在呢？那就会体验到不安（uneasiness），体验到焦虑（anxiety），如果牵扯面足够广泛，就成了完全无法指明的不适（malaise）。

——查尔斯·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



庞大且无实体的国家陨落很难被真实观测，落入人们生活中被改变的日常才得以窥见。国体的迁移或许可以从一次演讲、一份文件、一个日期得以确认，但人们脑海中日夜为继的思考方式与信念却无法朝令夕改。在当下如果要寻找一种可能的日常——电子游戏似乎可以成为承担此任的大众文化的媒介。然而政治性表达或意识形态元素一旦置入游戏文本当中，大部分都会因作者对现实经验的疏于把握、游戏机制趣味性设置的优先级而成为一种预先设计好的政治立场，使其流于道德说教或政治宣言。（梁成林，2021）而在2019年底爱沙尼亚ZA/UM工作室发布的游戏作品《极乐迪斯科》（Disco Elysium）则以一个悬疑性的侦探故事将地方政治、工会和公司、革命前后意识形态的缠斗展现出来。

2020年3月19日游戏上线了简体中文版，使得游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同时在线人数的巅峰。由此说明国内玩家确是游戏的重要受众。另一方面，中文作为首个本地化的翻译语言也是制作者特意而为之，中文版上线之际，官方发布公告，将游戏称作“苏联寄出的最后一封信笺”，文中写道“游戏的雏形由我们这些生长于前苏联时代的人创作而成。我们读着苏联时代的科幻作品长大，憧憬着未来的新生活——然后亲眼目睹了整个联邦分崩离析。”制作组表示大部分影响都凝结在对游戏当中虚构城市“瑞瓦肖”的描绘里。当游戏的制作者与游戏的主要受众所处的两个国家因苏联而曾经道路交错，如今似乎却迈向了不同方向，但在制作组的公告里，玩家留言的感想里，字里行间仍体现昔日阴影并未散去。



steamcharts对steam游戏玩家的记录和抓取 图片来源：<https://steamcharts.com/app/632470>

中国主要游戏相关的社交媒体平台，包含豆瓣、Steam中文评论、机核、游研社、网易云音乐……处处显露着对极乐迪斯科中“康米主义”政治隐喻的眷恋和向往。然而，在2021年12月12日游戏玩家自发组织的线下极乐迪斯科聚会中，则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在展示女性玩家自绘制的同人视频的环节，一名酒醉的男性玩家未经现场同意关掉视频，并拿起麦克风慷慨激昂地质问“为什么中国出不了这样的游戏？”，批评现场的女性太过消费主义而不够具有政治觉悟。

那么，事件当中的男性玩家如果体现了一种游戏立场——对游戏政治性隐喻的解读即为游戏的伟大之处，女性玩家又在借由游戏感受什么？她们是否有相同的体验？亦或被男性的话语而掩盖？当女性玩家穿入相同的故事时，她们是如何理解这段历史并作出自己的解读？为此，本文尝试使用访谈法，与八位女性玩家展开线上语音访谈，试图理解女性玩家对游戏的认同，以及对于游戏内外政治概念的理解。

同时，如果苏联的这段历史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巨大的社会实验——那么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为什么历史上试图改变改善人类状况的规划总是“失败”？这种巨变在人们的生活中留下了怎样的痕迹以至于产生了这样的游戏？前者，政治科学和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给出了他的回答：自然和社会的管理制度，重塑社会的国家的简单化；极端现代意识形态（high modernism）；独裁主义的国家；软弱的公民社会。（詹姆斯·C·斯科特, 2019）而对于后者，我们可以透过访谈看到这四个因素仍在这

片土地上上映，但和民主德国与爱沙尼亚不同的是，列宁和他的宏伟规划并未真正离开我们。

## 双重阴影下的冷漠退守

作为一个制作组明确且清晰表达了政治意涵的游戏。《极乐迪斯科》的游戏舞台位于贫困、荒芜、充满矛盾与犯罪的虚构城市瑞瓦肖，时间为20世纪中期（约1940-1969年）。玩家需要扮演一名因过度酗酒而失忆的警探，针对当地的一起杀人案件展开调查，在调查过程中走访各类权力人物，在工会、公司、地方警察组织、本地卡车司机等各式各样的人物之间游走。在这个过程中，玩家逐渐了解城市的历史，推翻封建王朝的公社成员是如何在另一场国际战争中被屠杀殆尽，失败的革命推翻了君主制，但同时却让城市和人民无可避免的受到国际社会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自利性的影响；工会在公司之间的权益争夺过程中以毒品交易作为经济来源，伪装成工贼的雇佣兵将私怨投射在城市与执法机关的符号之上；偏远渔村成为被列入城市复兴规划的拆迁对象；神秘生物学家夫妻用一生寻找童年时期偶然遇见的幻想生物……游戏的文本中涵盖大量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词汇，玩家基本上以对话的形式进行游戏，而对话和掷骰判定是游戏唯一推动剧情的方式。玩家通过调配24种人格技能的方式创建属于自己的主角，玩家在推进游戏过程中需要经历的挑战和障碍会成为可以和玩家沟通的人格，每种技能都会突然打断玩家正在行进的对话，而每种招牌技能所相应的人格也暗含着一些预设立场，如“钢筋铁骨”会敦促玩家接受“法西斯主义”；同时游戏中也设立了思维阁的设定，通过对话接受或放弃某种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来获得更多判定机会。



| 游戏内技能设定的截图 图片来源：作者



| 游戏内技能设定的截图 图片来源：作者



| 游戏内思维阁的截图 图片来源：作者

而在一个政治性如此明晰的游戏中，大部分访谈对象在初始都向我表达了对政治的一种淡漠态度，认为在游戏和现实中谈论政治是一种无力的、令人排斥的行为。但这并不是针对游戏表达政治行为的一种反感，而是由游戏向现实的过渡。因为玩家并不会因为游戏表达了政治而放弃这个游戏，而结合访谈内容来看，更多的是在游玩过程中引发了一种政治性的创伤。这种冷漠如同一种自身价值受到威胁而产生的免疫反映，这种指代不清的不适感，在访谈过程中反复出现：

“我一般聊天不爱聊政治。一方面我认为离我非常遥远，一方面我认为它的遥远让我根本就不了解这些东西。比如说，现在咱们国家目前是什么样，然后决策又如何？做出了啥？什么东西？这种各种各样的，我觉得我根本就不了解，我根本就不懂，这些都让我觉得聊起来没啥意义。也不能左右一二，其实也不叫左右一二，就是非常无力，非常没有意义，非常虚无缥缈。”

“历史我也很喜欢，就是读小说、文科这些东西，但我就特别讨厌政治，就讨厌到那种作呕的地步。高中的时候我是为了避开政治，就申了理科。然后到我长大的时候，上大学了，我就会因为生活里面确实是避免不了这些政治性的东西，我会主动去了解跟我自己的个人立场相悖的东西。这是政治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我不喜欢这些东西，但是为了了解我自己，为了了解这个世界，我愿意去学习它，但是我不想沾染它。”

也有一位访谈对象并未明确表达对政治的反感，并表示极乐迪斯科成为她进入政治窗口的一个工具，借由查询游戏中的名词，或是获得了更多的政治知识，又或是看了更多与东欧历史与苏联历史相关的书籍。

“刚开始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会遇到那么多政治和历史的各种知识之类的。但是这个游戏反而让我必须去了解这些名词，我就去查了。刚刚说的那个对政治的兴趣。不止是对现在的政

治的兴趣。就是感觉是一种对社会运转、历史上各种各样的文化、经济或者政治，就是这些东西如何影响着一个国家、一个群体，如何在某一个时代去发展，比如说产生革命或者逃避，我觉得应该是对那样一种政治历史的兴趣。”

政治知识的缺失主要来自基础教育的不足，与其说是公民素养培育更多的是立场驯化，从玩家此处反馈来看，电子游戏似乎比义务教育做的更好。但这种有针对性的“政治冷漠”态度的形成主要来自于女性心中的“政治话语”被夺取和重塑，一者来自男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对政治话语的操持，另一者则来自对国家机器的想象畏惧。在这个过程中，社交媒体起到了强大的渗透作用，它是男性获取政治话语的源泉，也同时是女性对社会失望的情绪放大器。

“我不知道东北是不是都有一点，反正我家饭桌上就是经常会有一些男性成员讨论一些二手政治内容，那些他们从微信公众号和抖音上刚刚看来的新鲜政治新闻。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我特别讨厌的一个过程。他们会觉得我比你们更了解政治局势，代表着我对公共社会的参与和贡献更大。就是我跟你们不一样，你们就每天在家里面，这个不行，我对社会的贡献更大，我是这个社会的一员，我是公共生活的一员，所以我比你们更高等。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其实是一种彰显他们自己权威的工具。”

“就我个人而言的话，我小时候对一些社会新闻，也有一种比较强烈的冲动想要去通过自己的努力或者呼吁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直接，甚至有一种愤怒的感觉在，但当时就是被我爸妈，主要是我爸，一直被说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这样的话就会怎么样。我觉得我的恐惧来源于我父辈的那种对集权的一些恐惧。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恐惧是从何而来，但是这种恐惧有一点延续到了我身上。除开他的警告，我们新闻上面会看到很多事情最后都没有了结果，就是冤屈根本没有得到伸张，正义根本没有到达，那种情况也是越来越多。慢慢地就形成了一种规避，就是逃避的感觉。”

## 情感的弱抵抗

当政治成为一种男性话语，在游戏当中对于具体意象的政治解读也同样会得到反感态度，访谈者会排斥对于“某事物”代表“某种主义的象征”的解读方式。更倾向于转向其他的解读方式，如关注角色的内心世界、人物之间的联系、剧情背后的脉络——某种程度上，这种对背景细致入微的剖析更饱满的还原了社会背景，而非将人物或环境视为割裂而冰冷的象征符号。

“大家一说极乐迪斯科就会谈政治隐喻，我反而会有点不爽。我觉得他们太爱谈论这一类的东西了。我很难讲明白是为什么不爽，我就是觉得他们真的好喜欢去谈论这些政治隐喻，要拿着放大镜去照里面每一个东西，然后去过度解读。当然我不是说对极乐迪斯科的政治隐喻是过度解读，但这种做法我就是不太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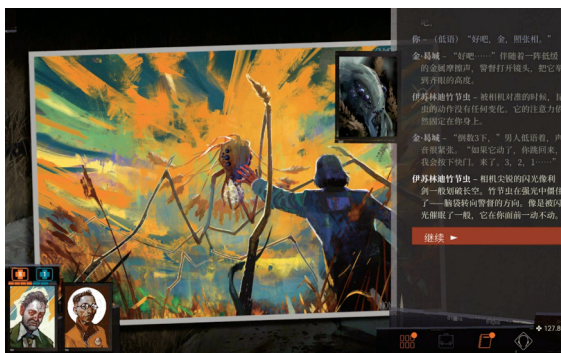
在游戏结尾破获真相的时刻，如果玩家持续做前期看似支线的“找到伊苏林迪竹节虫”的任务，将会在此处看到竹节虫的画面，而此帧画面和剧情安排共有6位访谈者认为这是她们印象中最为深刻的场景和游戏中最令人感动的地方。而她们在这里的解读更多的是强调去“主义”，在这个等式里，去政治=去主义=去标签=将人还原为人。女性对游戏的关注点更多在于角色自身被完整的呈现和表达，而非单一立场的输出。在这样的逻辑里，其实形成了一种对男性支配性政治语言的弱抵抗——在女性的日常生活当中，通常感受到的是男性将政治凌驾于情感，正如前文所提及的“餐桌政局”，男性通过强调自身对于政治的参与性来体现自身对于权力的把控，便形成了政治优于情爱的论调，一方面这意味着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置于不重要的位置，而我们知道连结和认同本是社会运动可能发生的起点；另一方面去关系的政治将形成一种“无人”的政治，而这正是斯科特认为那些乌托邦失效并且造成灾难的原因：国家机器将人抽象化管理，成为网格化以及户籍制度下抽象的数字，在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产生的技术崇拜之下，认为一切都可以被量化和改造，只

有形式的功能主义，却不考虑人本的功能需求。因而斯科特认为列宁对革命的设计与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对城市规划的设计是相似的。二者都依赖执行者科学规划和专业能力，而执行人必须拥有绝对权力能够将计划执行到底。（詹姆斯·C. 斯科特，2019）独裁的统治和软弱的公民社会为计划执行提供了环境温床，却也注定了失败——公民难以在这样的社会中与计划相抗衡并及进行及时修正。

在游戏最初的场景原画中，一条巨大的高速公路横亘破落的村庄，伸向远方玫瑰银色的天空，游戏小说原型作者库维茨将其解读为“美国对东欧的支配”以及苏联衰亡的象征。然而这种巨物迷恋其实也在深层次体现了苏联失败的底层问题，正是这样的审美意象体现了斯科特上述的观点：支配性的、巨大的、代表“现代的”技术物凌驾于被抛却、忽视的真实的人的生活之上，权力使其不容抗拒，而民众也无从抗拒。



极乐迪斯科艺术总监亚历山大·罗斯托夫（Aleksander Rostov）绘制的第一张确立游戏美术风格的插图 图片来源：[https://www.vgbaike.com/disco\\_elysium/baike5508?wid=1023](https://www.vgbaike.com/disco_elysium/baike5508?wid=1023)



游戏中发现竹节虫的场景 图片来源：<https://th.bing.com/th/id/R.c624c0630c3f4e16e975aaa1f48e31a8?rik=%2f55ERsZEpILXaw&riu>

竹节虫给我的感觉是，觉得快就相信了这是这个世界里客观存在的神秘生物（神奇动物在哪里），并且很希望立刻把这个消息和照片告诉轮椅精和他丈夫，所以我不想把它和意识形态连接起来。

反而会回到想到游戏过程中的一系列活动其他人物和事物互动的任务，比如到洗衣房穿身奇装异服，老金会主动跟我讨论讨论我的穿搭（？），更像是一种建立了与意识形态无关的，更加具体的联系（？）

然后这里我说：“有没有什么主义不是我定义自己别人的方式……”“啊，可是‘什么主义’不是主要问题了，但还会给自己和别人下定义……我做不到不沾标签 try but not really”

比如我是一个爱吃苹果的人我就是女性主义者在在我这里是同等重要的……而且能发现自己爱吃苹果和发现自己是个女性主义者可能同等重要（？，like 老子最后发现自己是个渣男……金：很不得，解释了到到到到到而且超级低语的办事风格（有英译成分）

而且通体来看，马丁内斯烂烂的，但提图斯兄弟们尽可能保护各种人，女工人辛苦守护小家，连41局竟然都是没有彻底放弃影子的好同事们，更重要的是金真的很信任影子（这也是本人促成的一段佳话）

可能经过很多主义很多支线，最后的结果都是留下了一地鸡毛的马丁内斯……但因为竹节虫存在，一切的联系都存在，影子和老金也存在……

啊 极好

### 访谈者分享游玩感想

“我对那个场景确实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认为它有点像简易版的、缩小版的，香港的重庆大厦，就是住的都是形形色色的人。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而且里面都有一些支线任务，我要去探索他们的故事，帮他们解决问题。这个玩法我比较喜欢。”

“你在问我为什么讨厌大家去讨论极乐迪斯科的政治隐喻时我之不是有点答不上来嘛，但现在我觉得是因为我很讨厌，大家把政治看作更高级的东西，有些东西在某篇故事或者某种叙述下，在人们的潜意识里面，它是有高低之分的。当人说“这个作品有政治隐喻”时，常常富含很明显的夸奖意味，认为它很高级，但是往往说一个

作品里有爱情，就不会觉得它很高级。就像大部分男人会认为就是搞事业权谋政治这种要大于或者是高于爱情的，我很早之前在微博上就看到一个博主也持有这样的观点，男人们会瞧不起搞小情小爱的，我不知道这能不能说是一个非常男本位的想法，但现在真的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认为爱情是无聊的是阻碍人们干大事的。

当然我觉得是有一些比较劣质的言情故事或者是男频文章，我不是很了解，可能会使人们对这个想法推波助澜，但是，我不喜欢。我一直都觉得，爱情是伟大的，它并不比政治低级，不能因为每个人都会有爱，而不是每个人都去搞政治，就会觉得爱情是一件很低劣的东西。那个博主也发出呼吁，说小情小爱大大的好。所以当很多人一提起极乐迪斯科就讨论它的政治隐喻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在潜意识里面真的会认为这是高级的，并且非常热衷于给自己塑造这种高级的形象，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偏见吧。我只是觉得这个游戏在其他很多细节上或者是人物塑造上都非常的有人味儿，都非常的打动人，为什么不去在意这些更humanity的部分呢？也可能是因为是被一些男的搞逆反了，就是那些，在攻克动画版底下评论说‘这么牛逼的涵盖政治和哲学的作品，你们女的只想着嗑cp’的人（素子和巴特非常好嗑信我）但真的会有很多人觉得在一部比较正剧向的作品里谈论爱情是对它的亵渎。”

回到当下，问题在于女性玩家因日常生活中的遭遇而本能性排斥对政治产生回避性态度时，其实也被悄悄置换了对于政治概念的定义：政治在此时已被指涉为男性的，女性主动将自己排除在外；另一方面，由于话语被置换，女性也很难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视为政治的一部分。这种弱抵抗其实反过来加固了原有的支配性观点，阻碍女性真正的参与到行动当中。同时，在电子游戏这一有限的、有尽头的媒介环境里，在玩家的选择和对选择这一行为的不断追溯过程中，不仅仅是一种规训式的灌输，而是在玩家/用户的操作过程中将意识形态内化为一种自我选择，而这种选择在自我确认和行为操作之间的反复不断获得加强和确认，在遍历游戏分支树的过程、选项选择和存档读档的行为之间，玩家在做选择的过程中都强

化了一种立场，这种立场因游戏媒介“自我书写”的特性而反复强调“自我选择”，打造出了“我的世界”。(王洪喆，2022)这个世界看似排除了“他的政治”的影响，却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介入真实世界的机会。

因此，重新夺回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诠释和定义，成为当下紧迫的要务，幸运的是，我在一位访谈者身上确实看到了这样的表达，而她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实践——在学校进行卫生巾互助盒的计划遭学校打击而破产，但在讨价还价中至少使卫生巾可以在学校的贩卖机中得到售卖，也鼓舞了她身边的人和她一同前行。而她对政治的理解也借由这次行动得到转化，不再逃避家庭中父辈对于政治话语的支配，也不再凝视巨物一般的遥远方向，而是着眼当下，脚踏实地的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从重视身边可见的需求开始：

“我之前一直觉得如果我想做什么的话，我可以把它交给有能力做的人去做，然后我自己可以从这个过程中抽身出来，不去参与。但是好像不行，我没有办法把完成的这个过程交给别人，我必须自己去积极主动地参与，然后才能达成我想要达到的目标。仔细想一想，虽然我参与的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可能和一些政治过程是相似的，或者说，改变世界的这个过程。哎呀，我说得好大，就是改变这个社会，或者说改变目前的情景的一些努力应该是与它相关的。然后可能就是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后的某一天，或者说在另一个地方，我们就把它叫做政治。”

## 参考文献

[美]查尔斯·赖特·米尔斯. 2017. 社会学的想象力. 编辑 李钧鹏·闻翔.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詹姆斯·C. 斯科特. 2019. 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张钰彬

王洪喆. 2022. 《迷宫如何讲故事：“巨洞探险”与电子游戏的跨媒介起源》. 读书 (3):3-13.

梁成林《游戏论·作品批评 | 〈极乐迪斯科〉：边缘世界的现实之声》. 取读于 2024年7月24日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065788](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065788)).

# 技术之云与艺术之线：人工智能生态中的攫取逻辑与审美抵抗

朱韵

摘要：在全球能源转型与数字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背景下，锂作为一种关键资源，支撑着人工智能和新能源基础设施的发展，却也引发了新一轮的生态掠夺与社会不平等。本文通过对刘窗作品《锂矿湖与复音岛》及相关艺术实践的分析，揭示了锂地缘政治、技术治理、数据殖民主义之间的深层关系，指出AI技术的运作并非“无形”的中性过程，而是建立在全球南方资源、劳动与数据的攫取之上。文章进一步探讨艺术如何作为一种批判性介入手段，生成关于可持续未来、技术伦理与地缘结构的替代性叙事。通过连接生态政治、控制论历史与赛博女性主义谱系，本文主张在“云下”重构人类与技术、资本与自然之间的想象力关系。

关键词：锂地缘政治；技术治理；人工智能；数据殖民主义；赛博女性主义



## 引言

在全球能源转型与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锂资源已成为21世

纪最具战略意义的关键材料之一。它不仅支撑着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广泛应用于电动汽车、储能系统与移动智能设备之中，更作为数字基础设施的核心资源，构成了人工智能与数据资本主义运作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锂的全球流动链条不仅涉及跨洲际的资源调度，更嵌套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的权力结构与经济不平等之中，反映出一幅交织着生态代价、地缘博弈与技术崇拜的复杂图景。当前主流有关人工智能的叙事，往往倾向于将其描绘为脱离物质限制的未来技术——似乎“云计算”不再依赖矿物原料，算法运行无需能源支撑，智能系统的“进化”脱离了社会语境和生态后果。然而，这种去物质化和技术中性的神话掩盖了AI系统背后深植于地球资源、劳动力结构与全球不平等中的剥削机制。锂矿开采正是这一“AI不可见基础设施”的典型例证，它所带来的生态破坏、劳动压榨与技术依赖，构成了全球数字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问题。

本文以艺术家刘窗的作品《锂矿湖与复音岛》（2023）为切入点，结合当代表现主义、生态美学与技术批判理论，探讨人工智能与资源攫取之间的内在关联。文章将重点分析锂地缘政治、数据殖民主义与AI技术治理中的视觉再现与话语建构，进而思考当代艺术如何通过影像、装置与叙事的形式，提供一种批判性介入路径，挑战主流技术乌托邦，重构技术与人文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艺术实践的审视，本文尝试在“云端”之下勾勒一幅基于多元声音、社会正义与生态共生的未来想象图景。

## 锂地缘政治：从矿产转译到技术帝国的地理编织

“世界上最大的锂矿湖乌尤尼盐湖，与波托西银矿遗址相距不到五十公里……在行星的历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单一金属跨洲转移：一次是银，一次是锂。”

——《锂矿湖与复音岛》（刘窗，2023）

锂矿，作为支撑21世纪新能源转型与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资源，其全球流动路径及产业链布局已构成一种新的地缘政治现实。艺术家刘窗的作品《锂矿湖与复音岛》（2023）即以此为核心线索，通过结合装置影像、科技批判与地质叙事，构建了一个横跨地球资源政治与科幻未来想象的复调空间。该作品不只是对锂矿开采过程的直观再现，更是对其背后资本逻辑、生态代价与殖民关系的隐喻性再书写。锂的地理流动轨迹与历史上的白银贸易形成某种历史回响：自南美安第斯山脉出发，跨越太平洋，进入以东亚为代表的制造与技术中心。在这种“资源—技术”轴线中，刘窗通过影像隐喻指出，当代的技术进步依然深植于殖民地理与资本积累模式之中。作品中描绘的大面积呈蓝绿盐碱色的锂湖，不仅是现实中因开采而改变生态系统的“工业地貌”，也是资本逻辑将自然资源转化为可交易资产的视觉再现。这种对“静谧湖面”与“剧烈攫取”之间的反差处理，产生了极具批判性的视觉张力。

作品中反复出现的“路径依赖”与“技术锁定”概念，来源于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W. Brian Arthur, 1989）对技术历史演化的描述，即在特定技术体系内，由于初始优势或资本投入所造成的制度粘性，最终锁定了后续的选择路径。这一理论恰切揭示了当今新能源系统对锂资源的依赖困境：尽管电动汽车、电池和数据中心所需的能量形式被宣传为“可持续”的绿色替代方案，其背后仍是一种结构性不可逆的采掘式发展模式。这种资本主义对资源流动性的“正当化”，与鲍曼（Zygmunt Bauman）提出的“流动的现代性”逻辑高度吻合，即资源加速流转与责任消解并行，生态与社会代价往往被掩盖在现代性的表象之中。更进一步，从历史—技术的视角来看，锂的开采不仅是能源问题，也关涉控制论与国家治理的实验史。在刘窗作品的另一段叙述中，他以20世纪70年代智利社会实验“赛博协同控制工程（Project Cybersyn）”为暗线，揭示了技术治理与资源控制之间的结构性张力。Cybersyn系统由英国控制论者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设计，旨在借助实时反馈技术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可生存系统模型（Viable System Model）。这一短暂却充满想象力的政治技术实践，在1973年皮诺切特政变后被中断，也

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展开实验的起点。刘窗作品中的锂矿湖与Cybersyn系统之间形成跨时空的互文：前者象征资本驱动下的技术攫取逻辑，后者则隐喻被中断的技术民主梦想。在此脉络下，智利不再仅是资源出口地，更是两种技术未来路径的分歧点——是去中心化控制的社会技术系统，抑或资本集中控制的供应链节点。

此外，智利锂矿的开采还呈现出“生态—劳工双重剥削”的典型结构。一方面，盐湖型锂提取大量消耗地下水资源，导致生态系统的不可逆转破坏；另一方面，锂矿工人长期处于高强度、低工资的劳作环境中，却难以分享全球锂产业的利润增值。这一现实印证了哈维（David Harvey, 2003）提出的“通过剥夺实现积累”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理论，即资本主义不断将外围资源转化为核心利润的机制。从银矿、硝石到锂，智利资源的持续输出构成全球资本技术体系的能量基础，而本地社区却被置于不可持续的生态与社会结构中。锂的战略性和不可替代特征，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对等关系。相较于石油，锂在全球范围内替代技术路径更窄，供需弹性更小。据估算，电动汽车用锂电池的市场份额已超过90%，而全球一半以上的锂产量与超过70%的锂电池产能均由中国企业控制，凸显其在未来全球资源治理中的重要性。在这一背景下，艺术实践不仅成为对现有资源逻辑的感知性回应，也可能成为重新想象资源治理伦理与未来社会技术关系的入口。

## AI挖掘与计算景观：从不可见的“云”到可感的剥削基础

在当代技术文化中，人工智能通常被理解为一种脱离物质依赖、以云计算与算法驱动为核心的非物质技术形态。正如雅克·阿塔利

（Jacques Attali）所言，“再现曾属于神的力量，如今却已转移至我们手中”，这种关于AI“神性”与“去物质性”的想象，构成了技术乌托邦叙事的核心。但事实上，人工智能的运行并非发生在空中云端，而是深植于一整套高度物质化的基础设施、矿产资源与地缘劳动体系之中。这些基础设施不仅包括数据中心与计算设备，更依赖

于诸如锂、钴、稀土等关键矿产资源的稳定供给——AI并非虚拟之物，而是一台扎根于地球的提取性机器。以美国内华达州的银峰为例，该地为美国境内唯一运营中的锂矿，而距其仅320公里处，便是全球最大的电池工厂——特斯拉超级工厂。一辆特斯拉电动车所需锂含量约为7千克，一部智能手机约需8克锂；这些微小但不可或缺的物质单位，在成千上万的数据计算任务中聚合成了“智能”的基础能源。同时，位于加州的科技巨头——苹果、谷歌、亚马逊、Meta与微软——虽主导着AI算法的研发与平台构建，却与大量资源与劳工的压迫现实保持“地理性”断裂。

这种裂痕正是Kate Crawford在《技术之外：社会联结中的人工智能》（Atlas of AI, 2021）中所揭示的关键。“AI并不人工，也不智能”，她指出，AI更应被理解为一种集成性的全球产业系统，涉及自然资源、劳动力、运输网络、能源调度以及数据挖掘等多重领域。这种“全栈供应链”（full-stack supply chain）结构，使得人工智能不再是单一技术产物，而是资源政治、劳动政治与基础设施政治的复合体。正是在这种结构之下，“云”不再是飘忽的隐喻，而是现实的地质实体，是由土壤、矿石与全球性劳工协作所堆叠出的网络机器。更重要的是，AI的资源攫取不止于物理层面，也体现在数据的无节制收集与再利用之上。数据挖掘（data mining）已逐渐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型攫取机制，其背后正是“攫取主义”

（extractivism）逻辑的延续与更新。桑德拉·梅扎德拉（Sandro Mezzadra）与布雷特·尼尔森（Brett Neilson）提出，数据挖掘与矿产开采共享一种殖民性的机制：以低成本获取、分类与控制信息，以实现权力与资本的扩张。AI挖掘因此具备双重含义：既指物理空间中的矿产开采，也指认知空间中的数据压榨。这一“复合型提取”过程，使得AI成为一种具有地缘、生态与社会多重维度的控制机制。

在此框架下，图像数据训练作为AI系统的重要组成环节，同样隐藏着深刻的政治与伦理问题。艺术家特雷弗·帕格伦（Trevor Paglen）与Crawford合作撰写的《采掘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训练

数据集中的图像政治》(Excavating AI, 2019)，揭示了诸如 ImageNet等图像数据库中广泛存在的性别歧视、种族偏见与社会污名化问题。例如，将穿比基尼的女性标记为“荡妇”、将青少年归类为“瘾君子”，体现出技术系统如何在数据层面延续并固化社会结构的不平等。这些训练集并非中立工具，而是政治性选择的结果，其偏见通过深度学习系统被不断放大，最终反馈至公共治理、社会感知与文化认同之中。

算法偏见 (algorithmic bias) 因此不仅是数据偏差的统计现象，更是系统性社会压迫的再生产机制。在《2024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AI Index Report 2024) 中，全球用户对AI系统感到焦虑的比例显著上升，尤其在美国增长超过37%。这表明，公众正在意识到AI技术并非只是提高效率的工具，而是一种深刻嵌入社会关系、影响现实生活并具备政治后果的结构性力量。从视觉政治到物质政治，从数据治理到计算地理，人工智能的“云”已不再神秘，而是需要被重新定位为一组具身的权力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的代价，往往由全球南方的社区、边缘化群体与被视为“技术他者”的非中心主体所承担。艺术实践在此背景下，不仅揭示了“不可见”的系统性压迫，更通过形式实验、叙事介入与象征策略，为理解AI运作逻辑提供了感知层面的入口。

## 数据殖民主义与“云下”共存的未来：艺术作为抵抗与重构的力量

在人工智能全球化扩张的进程中，数据已被视为一种新的资源形式，其收集、控制与再利用成为继土地与矿产之后的关键争夺领域。Couldry与Mejias (2019) 提出的“数据殖民主义”(Data Colonialism) 概念，揭示了大型科技公司如何通过数据的集中垄断与算法操控，重塑全球资源配置与社会秩序，构建出一种与传统帝国主义高度相似的剥削结构。数据不再仅是信息流，更成为一种可交易、可支配的权力机制——在这一过程中，云计算、人工智能

与全球南方的资源与劳动体系形成了新的殖民链条。据《纽约客》(2024)与斯坦福大学AI指数报告数据显示,ChatGPT的日耗电量超过50万千瓦时,SORA的算力消耗更是其十倍以上。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学者Alex de Vries预估,到2027年,AI服务器的耗电量将达到约1500亿度,超过多个国家的年度总能耗。在此背景下,OpenAI CEO Sam Altman曾宣称,“算力和能源将是未来的货币”,这一说法不仅透露出资源权力结构的变化,也隐喻着全球南方将以其生态代价持续“资助”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

AI产业的这种深度依赖,不仅是对资源的攫取,更是对社会结构、文化表达与知识体系的重组。人工智能的设计、应用与优化往往由特定的科技精英集团主导,其平台化逻辑强化了信息垄断与行为预测能力,在“信息即权力”的语境中,形成了“神性技术—优绩主义—新自由主义”三位一体的意识形态装置。更重要的是,这种算法治理形式具有高度不可见性与自我合法化特征,普通人在其中被动接受分类、预测与干预,其主体性在微观层面被持续削弱。

然而,正是在这种结构化压迫与技术殖民逻辑下,艺术介入显现出其独特的反思与重构潜力。在由Josefina Buschmann、Nicole L'Huillier与Daniela Camino主导的跨媒体项目《落云》(Fallen Clouds, 2022)中,艺术家通过影像装置、声音雕塑与地理考察的复合形式,追踪智利数字基础设施与锂矿开采之间的逻辑联系,将“云”的抽象意象重新带回其物质起源。这一作品并非简单的符号批判,而是试图揭示“云计算”神话下真实的地理、社会与生态脉络——从海底光缆到谷歌数据中心,从阿塔卡马盐湖到原住民妇女的歌谣吟唱,作品构建出一个技术与生态交织、数据与身体互为背景的复杂场域。与此同时,“去殖民化人工智能”(Decolonial AI)也作为一项新兴理论与实践取向日益受到关注。学者拉齐耶·布斯·切廷(Raziye Buse Çetin)强调,一种“地方性、不知道的智慧”应被重新赋权,这种智慧来自非现代、非精英化的知识系统,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共处性。她与他人共同发起的“Dreaming Beyond AI”计划,汇集全球范围内的艺术家、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共同探讨如

何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AI叙事，重建以平等、多样与生态伦理为基础的技术未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技术批判艺术实践中，女性艺术家、研究者与活动家长期处于重要位置。如Mindy Seu主编的《赛博女性主义索引》（Cyberfeminism Index, 2023），便以编年史与开放数据库的形式梳理了1990年代至今的全球性别技术实践，挑战了主流技术史对非男性主体的系统性忽略。在人工智能日益影响人类存在方式的年代，这些“非既得利益者”的边缘声音，提供了一种从身体经验、性别感知与跨文化路径出发的知识干预模式，构成了去中心化知识生产的重要支点。面对人工智能系统对知识、感知与情感的再组织，当代艺术不仅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更作为一种“第四阶级”（Fourth Estate）——连接社会边缘主体、唤起集体意识、重构话语体系的政治媒介。在信息茧房与算法幻觉之间，艺术试图重建一个可被感知、可被聆听、可被争议的现实，将被剥夺的技术经验重新带回社会共识空间。

## 结语：从“云端神话”到“地面政治”的再想象

本文围绕人工智能发展中的物质基础与权力机制，梳理了锂地缘政治、AI计算景观与数据殖民主义三重结构性问题，指出人工智能并非一种脱离物质性与中立性的高技术产物，而是深嵌于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的权力结点。锂资源的全球流动不仅支撑了所谓“绿色能源”的梦想，也暴露了生态退化、劳工剥削与殖民延续的现实逻辑。人工智能背后的能源系统与基础设施，在技术神话的包装下日益不可见，却持续强化全球南方的环境负担与社会不平等。与此同时，算法偏见、平台垄断与认知治理，正将AI从一项“智能工具”转化为一套全面渗透感知、行为与决策结构的系统性力量。

在这一图景中，艺术实践作为另一种“知识生成方式”，提供了对技术秩序进行结构性反思与情感性介入的可能路径。刘窗的《锂

矿湖与复音岛》、朱丽埃的《寻水觅迹》与“落云”项目等生态艺术实践，不仅揭示了全球AI基础设施背后的地缘性与剥削逻辑，也通过复调叙事、多媒体语言与跨物种感知，激活了人类在技术系统中的伦理自觉与感知能动性。这些作品拒绝线性进步的叙事，呼唤一种以“共生”“脆弱性”与“去中心化”作为出发点的再政治化想象。

同时，去殖民化人工智能、赛博女性主义与南方生态批判等理论谱系，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定义技术发展路径的理论工具与行动框架。它们共同揭示了一个关键命题：未来的AI不能再仅服务于效率、控制与资本增长，它必须回应更多关于生态正义、社会平等与知识多样性的诉求。人工智能的未来，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的演进，更取决于我们如何集体想象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谁来定义技术的使用方式、以及谁能在未来中拥有发声权。

因此，我们需要超越对AI系统的功能主义理解，重启对其社会属性、地理基础与权力分布的讨论。我们需要从“云端神话”回到“地面政治”，从算法效率回到社会共生，从技术封闭走向知识解殖。在这一过程中，艺术不再是AI的外部注解者，而是一种生成新的知识系统、技术伦理与政治情感的协商机制。正是在技术之外，我们才可能重新定义人类共处的可能性。

## 参考文献

Arthur,wb. (1989). Competing Technologies,Increasing Returns,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 *Economic Journal*, 99(3), 116–131.

Harvey, David. (2003).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黄韵奇. (2024, October). AI 神话与算法统治之外：艺术如何重新想象与人工智能共处的未

朱韵

来? . 艺术新闻. <https://www.theartjournal.cn/archives/feature/134851>

凯特·克劳福德(kate crawford). (2024). 技术之外：社会联结中的人工智能(李红澄, Trans.).

中国原子能出版社/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原作名：原作名: Atlas of AI: Power, Politics, and the Planetary Cos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齐格蒙特·鲍曼. (2018). 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 Trans.).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詹森·摩尔. (2024). 生命之网：生态与资本积累(王毅, Trans.). 江苏人民出版社.

## ACKNOWLEDGMENTS

感谢possible (im)possible的欲望  
感谢本期所有作者  
感谢那些出主意且身体力行的朋友！  
在学术出版领域里电子谋生  
是非常  
Kool-Acid的！

黄孙权

